

2016/01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第32卷 第1期 (总第164期)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程建军

副主任 刘守旗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坚勤 方露娜 冯保善

刘守旗 李洪天 张广才

张勤 沈仁国 周韵

周成平 黄正平 黄光耀

程建军 蔡飞

主编 程建军

执行主编 吴春浩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特约栏目主持人/冯保善

- 论《红楼梦》的故事讲述者与叙事层次 苗怀明(1)
- 明代小说对牙行的反映 孙旭(6)
- 论郑振铎的“水浒”图像之惑
- 以“天都外臣序本”与“容与堂本”为考察核心 赵敬鹏(10)

【政治研究】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性分析 崔志胜(16)
-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视角下的民主党派职能研究 谢从戎 沈骅(21)
- 视差关联下的蒲鲁东与马克思
- 重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的本质”概念 周秋明(25)

【文学研究】

- 无敌之阵里的新故事
- 论贾平凹的《怀念狼》 张晓琴(29)
- 世人对元稹生平的误解 吴伟斌(33)
- 《盛成台儿庄纪事》之《前线通讯》非盛成所作 蒋成德(41)

【历史研究】

- 《大宪章》时代约翰王专制探源 姜守明(45)
- 论英国孤立主义外交的特点
- 基于 A.J.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的分析 高建芝(51)
- 从克拉伦斯公爵之死到博斯沃思的硝烟
- 论约克王朝的衰亡 刘诗苑(56)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探析 潘国红(62)

【社会文化研究】

亢旱中的城市生活管窥

- 以 1934 年江南市民消夏方式为例 张 帆(67)
- 1903—1905 年盛宣怀与山西矿权的交涉 苏芝军(73)
- 汉画像石所体现的汉代勇战尚武精神评析 朱 鹏 彭恒礼(77)
- 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研究述评 高志勇(81)
- 试论释省常西湖莲社之特色
- 以《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为中心 黄文翰 陈元锋(85)
- 非物质文化景观的动态空间场景 王寅寅(89)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

- 概念整合视角下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的隐喻认知解读 魏梦婷(94)
- 国内外语需求分析研究述评 刘连营(99)
- 数字故事
- 改善大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的有效途径 吴骏杰(103)
- 从传统语法到构式语法的“漫漫长路” 赵利娟(106)

【美术研究】

回望与启示

- 民国小住宅对当下住宅室内设计的启示 叶志强(110)
- 民国文化元素在城市空间导识系统中的运用 薛 岩(112)

【音乐研究】

传承与变迁

- 以省级非遗南京白局传承人徐春华为例 段宝君(115)
- 法国合唱作品 *Lessirènes* 的分析与演绎 许 洋(118)
- 黄自艺术歌曲中钢琴声部的民族化特色初探 张 丹(122)

Main Contents

On the Narrators and Narration in <i>A Dream in Red Mansions</i>	MIAO Huai-ming(1)
Confusion about the <i>Water Margin</i> Images of Zheng Zhenduo	ZHAO Jing-peng(10)
Unity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UI Zhi-sheng(16)
The Parallax Connection between Proudhon and Marx:	
——A Re-reading to the View of Human Nature in <i>Theses on Feuerbach</i>	ZHOU Qiu-ming(25)
New Stories in the Invincible Array	
——On <i>Cherish the Memory of Wolf</i> by Jia Pingwa	ZHANG Xiao-qin(29)
Characteristics of British Diplomatic Policy—Isolation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by A.J.P. Taylor	
.....	GAO Jian-zhi(51)
From Death of George (Duke of Clarence) to Battle of Bosworth	
——On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York Court	LIU Shi-yuan(56)
City Life in Severe Drought	
——A Case Study of How Citizens in Jiangnan Region Spend Summer in 1934	ZHANG Fan(67)
Negotiations on Shanxi Mineral Property Right by Sheng Xuanhuai in 1903–1905	SU Zhi-jun(73)
An Overview of the Study of the Modern Chinese Culture Nationalism	GAO Zhi-yong (81)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st Lake Lotus Association Set up by Shi Xingchang	
——Taking <i>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Lotus Association in Zhao Xing Temple as an Example</i>	
.....	HUANG Wen-han CHEN Yuan-feng(85)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in Robert Frost’s Poems Based on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	WEI Meng-ting(94)
An Overview of Needs Analysis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LIU Lian-ying(99)
Digital Storytelling— An Effective Way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Aphasia of Chinese Culture”	
.....	WU Jun-jie(103)
Long <i>Journey</i> from Traditional Grammar to Construction Grammar	ZHAO Li-juan(106)

论《红楼梦》的故事讲述者与叙事层次

苗怀明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红楼梦》在继承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创新。全书设置了多位故事讲述者,在石头、曹雪芹之外,还有一位超级故事讲述者。由于各讲述者处于不同的故事讲述层面,全书的叙事由此分为三个层次,即超叙事层、主叙事层和亚叙事层。多位故事讲述者及多个叙事层次的设置使作者的创作意图由此得到充分、恰切的体现,显示出高超的叙事技巧。引入超叙述层的叙事动机是刻意淡化作品的真实感,探讨《红楼梦》的这些叙事手法,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这部经典之作。

[关键词] 红楼梦; 古代小说; 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7.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01-05

纷繁的头绪,众多的人物,琐细的事件,多变的场景,这是《红楼梦》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特点,要将这些安排得条理分明,疏密得当,张弛相宜,各得其所,恰如其分,是需要大手笔的。对每一位小说家来说,这都是一场并不轻松的考验和挑战。在众多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中,能达到这种艺术水准的并不多,《红楼梦》一书就做到了这些,而且做得非常优秀,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经典之作。从古至今,无论是一般的读者还是专门的研究者,无不惊叹于《红楼梦》的高超叙事艺术。

近年来,研究者借助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红楼梦》的叙事艺术进行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总的来看,技术层面的梳理和归纳较多,对种种叙事手法背后的成因及文化内涵仍缺少深入、透彻的剖析。有鉴于此,本文从叙述声音、叙述层次入手,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对《红楼梦》的叙事艺术进行探讨,以期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这部优秀的小说作品。

—

对叙述声音即故事讲述者的确认和分析是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安排、设计叙事者的身份、态度及语调,即作者使用什么样的身

份、姿态、口吻来讲述故事,对整部作品的文本形态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它涉及到作者对读者对象的设定、作品的创作意图乃至表达方式等重要问题。因此,对故事讲述者的分析无疑会有助于对作品的深入理解。

在探讨《红楼梦》的故事讲述者之前,先来追溯一下此前的小説作品对故事讲述者的设定,由此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叙事传统。

就主要使用白话的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通俗小说而言,作品的叙述者通常较为固定、单一,多数作品都虚拟了一位说书艺人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虚拟了一个说书场作为与读者交流的场景,预设的读者自然是来自市井民巷的听众。如宋元话本《碾玉观音》开头部分,故事讲述者在吟咏了一系列诗词后说道:“说话的,因甚说这《春归词》?”^{[1](P.187)}可见他把自己定位为“说话的”,即说书艺人。再如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开头部分,有一段和读者交流的话:“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2](P.3)}该作品虽然为拟话本,故事讲述者还是将自己与读者定位为说书艺人与观众的关系。话本小说如此,章回小说也是如此,如《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开篇,故事讲述者有一句自问自答的话:

[收稿日期] 2015-12-20

[作者简介] 苗怀明,男,河南平舆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3](P.3)}他同样将自己定位为说书艺人。其他作品在开篇往往用“话说”二字,采用的都是这种讲述模式。

这一叙事特点的形成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直接脱胎自民间说唱艺术有关。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主要是以演出的形式来实现其艺术功能和进行传播的。由于阅读的需要,逐渐向案头转化。后来的拟话本及章回体小说虽然已经脱离场上的表演,变成纯粹的案头之作,但它沿袭并保留了说唱艺术的诸多艺术传统,其中就包括对故事讲述人及讲述场景的保留和继承。不少作品虚拟一个说书场景,以说书人的身份与读者对话,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其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豆棚闲话》一书就改变了这一设定,将故事场景改为豆棚架下的闲话,其叙述者自然也就变成了乡里之人,且有多位叙述者。不过,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属于特例。总的来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对故事讲述者的设定基本上是比较固定的。

文言小说的情况与通俗小说有所不同,它受史传文学的影响较大,不少作者将小说定位为稗官野史、正史之余、补正史之不足,因此,小说作品更多的继承了史传文学的叙事传统,它往往是以见证者的身份来讲述故事,不少作品使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如张鹭的《游仙窟》以“仆从汧陇,奉使河源”八字开始故事^{[4](P.1)},故事的讲述者“仆”同时又是故事的亲历者。再比如陈玄祐《离魂记》,作品最后故事讲述者直接出面交代故事来源:“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谥则规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5](P.29)}

这样,故事讲述者实际上就是一位虚拟的史官。由于这类小说很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和确切来源,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不少作品在史官这位叙述者之外,还另外设置一个或多个叙述者,作为目击者或故事提供者,分别承担不同的叙事功能。多位叙述者的存在,也就使作品分出多个叙事层次。如李公佐《古岳渎经》开篇云:“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杨告公佐云……”后又云:“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文字古奇,编次蠹毁,不能解。公佐与焦君共详读

之……”^{[5](PP.79-80)}作品有三个故事讲述者,即李公佐、杨衡和《岳渎经》的作者,故事由此分成两个层次,李公佐为一层,杨衡和《岳渎经》作者为一层。

就《红楼梦》一书的情况来看,它在继承了上述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呈现出与先前小说作品迥然不同的新面貌,其对故事叙述者及叙事层次的安排设计,要比其他作品丰富、复杂得多。全书设置了多位故事叙述者,作品也明显地可以分为多个叙事层次,作者的创作意图由此得到了充分、恰切的体现,显示出高超的叙事技巧。以下详细分析:

总的来看,全书的主要叙述者是那位“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石头^{[6](P.4)}。书中交代得很明确:“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按照作品的设定,石头是全书故事的主要讲述者。^①

需要指出的是,这位石头在讲述故事时并不是完全隐在幕后,他还不时现身,以“蠢物”自称,对故事讲述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解释,发表议论。比如在第六回的开头,这位叙述者对如何讲述故事作了一段说明,并表示:“诸公若嫌琐碎粗鄙呢,则快掷下此书,另觅好书去醒目;若谓聊可破闷时,待蠢物逐细言来。”^②再比如第十六回写道:“凤姐因怕通灵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命人拿来塞在自己枕边。”在这一细节叙述之后,石头出面进行了一番顺理成章的解释:“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帐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此外在作品的第八、第十八回中也有石头所做的类似解释、说明性文字。

由此可知,这位石头不仅是全书故事的主要叙述者,同时也作为故事中的重要角色屡屡出现,具有多种身份和功能。有人认为石头、神瑛侍者和贾宝玉是三位一体的,但从作品的实际描写来看,并非如此,这属于误读。与石头对应的是贾宝玉出生时含在口里、后来一直佩戴、形影不离的那块通灵宝玉。

问题在于,作者为什么会选择石头作为故事的讲述者而不是其他人比如通常所说的说书人或

① 本文所引《红楼梦》文字皆出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后面不再一一出注。

② 这几句话庚辰本无,见于甲戌本、戚序本、蒙古王府本等版本。

史官?在此前的小说作品中,没有设置过这样的故事讲述者。显然这是作者别出心裁的首创。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作品自身的描写。在作品中,石头本是女娲炼石补天时剩下的一块石头,很孤单地呆在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它在听到一僧一道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时,“打动凡心”,要求“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僧、道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了结三生石畔神瑛侍者和绛珠仙草“一段风流公案”时,“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作品还通过甄士隐的视角,仔细观察这块石头:“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第一回)这与作品第八回中对通灵宝玉的描写完全一致。

从作品对石头这位故事讲述者的设置来看,它和神瑛侍者不仅不是同一个人,而且与三生石畔那段浪漫的还泪故事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一僧一道在处理一段风流公案时顺便把他带上而已。可见,它扮演的主要是观察者、见证者和记录者的角色,贾府的兴衰成败、宝黛的爱情都和它没有关系,他与故事中的人物也不存在利益和感情的纠葛,它可以以超然、冷静、客观的态度来观察,记录自己看到的一切。

石头虽然与三生石畔的故事没有关系,只是一位旁观者和见证人,但它下凡时,又被一僧一道安排,与神瑛侍者形成了一体的关系。到了下界,它先是被贾宝玉以口衔的夸张方式,带着一同出场,随后又被戴在贾宝玉的脖子上,形成形影不离的关系。而且这种一体的关系又被以贾母为代表的家庭成员维护着、监督着。因为这样的一体关系,石头对贾宝玉无疑会有更多的了解,在感情的天平上会向贾宝玉有所倾斜,同情贾宝玉及其家族的遭遇。

超然、冷静、客观而又不失同情,对石头这位故事讲述者的设计正好可以达到作者所需要的艺术效果,与他想要表达的思想及情感基调有着内在的一致,以往小说作品中通常使用的说书人和史官显然是无法满足作者的这种表达需要的。

对故事叙述者石头的安排,是通过女娲补天、三生石畔还泪的巧妙贯穿自然而然实现的,合情合理,妙然天成,可见作者之慧心,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新颖,别致,不同凡响。

作为故事讲述者的石头得一僧一道之助,被贾氏家族视为珍宝,一直佩戴在贾宝玉的脖子上,

形影不离。这种设计为石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即和贾宝玉基本相同的视角。贾宝玉在家族中居于核心地位,和其他各色人物有着较为频繁且密切的联系,具有贯穿人物故事的线索功能,这无疑为石头的观察和记录提供了方便。从表达效果上来说,故事讲述者的这种设定使其可以“亲睹亲闻”,增加了叙述的可信度,从而获得了一种现场感和逼真效果。

不过,两者的观察角度虽然基本一致,但石头和贾宝玉看待问题和判断事情的立场则未必一致,这就形成了一种十分有趣的错位。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暗示,那就是故事讲述者的立场和贾宝玉的立场未必是一致的,进而可以推知,作者与贾宝玉的立场也未必一致,在阅读作品时,不能把贾宝玉与作者的立场合二为一。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之所以说石头是全书故事的主要叙述者而非全部叙述者,是因为按照作品的交代,其他一些人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故事的讲述,其中最主要的参与者自然是曹雪芹,因为他“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可见,石头讲述的故事是经过曹雪芹多年“批阅”、“增删”等艺术加工之后的故事,曹雪芹也是讲述人之一,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很大的,其他如空空道人、孔梅溪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故事的讲述。

这种多个故事讲述者的设计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是很有必要的。仅仅从叙事逻辑的角度来看,让石头成为故事叙述者,固然有着特别的韵味,新颖,别致,但就叙事逻辑而言,这位特定观察者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憾,那就是它的视角是固定的,即限知视角,只能随着贾宝玉的行动来观察,存在着诸多视角盲区,比如王熙凤与净虚老尼、赵姨娘和马道婆的密谋,从情理上讲,石头无论如何是看不到的。但作品不可能只写贾宝玉视野范围内的东西,它还要写到家族其他成员的活动,这势必要用全知视角来弥补这一缺憾。于是曹雪芹等故事讲述者的设计便为这种全知视角提供了合理性和正当性。限制视角与全知视角的巧妙结合使作品的叙事转换自如,合情合理。两位故事讲述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颇为奇妙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石头、曹雪芹等故事叙述者之外,还有一位超级故事叙述者。在这位超级故事讲述者所讲述的石头“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红楼梦》产生、传抄及修订的故事中,石头、曹雪

芹等故事讲述者又戏剧性的成为故事中的角色,变成了被讲述者。这位超级叙述者自称“在下”,在故事的开头曾出面作过简要的解释:“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这显然是古代通俗小说中通常采用的说书人的口吻。这种超级叙述者化身为说书先生,给“看官”也就是他预设的读者来讲述一段神话与这部小说创作的相关情况。这种讲述需要一种超然、客观的立场,说书人的身份正符合这一要求。

二

由于这位超级叙述者与石头、曹雪芹等人处于不同的故事讲述层面,全书也就随之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叙事层次。大体说来,“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这句话之前为一个叙事层次,之后为一个叙事层次。前者是对全书故事由来及创作情况的交代,后者则是主要故事即贾府兴衰、宝黛爱情的展开。显然,从叙事层次上讲,后者是从属于前者的。如果将后者称作主故事层的话,前者则可称作超故事层。

从叙事逻辑的角度来看,超故事层的设置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主故事层以石头和曹雪芹为故事的主要讲述者,如果此前没有一段两位故事讲述者的交代,就会显得非常突兀,难以理解他们特别是石头为何具有故事讲述者的资格。

在超故事层,故事讲述者虚设了一个神话情景,即石头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的神奇故事。从功能上来讲,它相当于宋元话本小说中的入话和得胜头回,类似于元杂剧中的楔子。后来的章回小说保留了这种形式,如《水浒传》《说岳全传》《樵梅闲评》等作品的开篇部分皆是如此。不过,在这些作品中,其前、后两个叙事层的故事讲述者是一致的。

《红楼梦》继承了这一叙事传统,同时又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不仅为全书故事设计了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开篇,还将创作意图、修改经过借此作了巧妙的交代。由于这个故事和后文的贾府盛衰故事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作者对两个故事层故事叙述者的身份、态度和口语各自有着不同的要求,这自然就需要多个叙述者来承担不同的讲述故事的任务,作品也就因之分成多个叙事层次。

叙事逻辑的关联之外,超故事层的女娲补天故事与后文的贾府兴衰、宝黛爱情故事之间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前后两层故事既形成鲜明

的对比,同时又形成一种内在的呼应关系,这种关系远比话本小说中的头回与正话关系密切,其内涵也远比《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作品中卷首故事与后文之间的因果关系丰富、复杂。

作品还通过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将两个故事层贯穿起来,使两个故事层形成一种呼应关系。

《红楼梦》的这种叙事手法与西方文学的日记式小说可谓异曲同工。《红楼梦》之后,不少小说特别是现代小说也采用这一叙事方式和结构,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茅盾的《腐蚀》等。

此外,在小说主故事层之下,还有一个亚故事层,在这一叙事层面,有着更多的叙事者,比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刘姥姥讲农家趣事、贾宝玉给林黛玉讲耗子精故事、兴儿给尤氏姐妹介绍贾府情况,等等。不同的叙事者会采用不同的叙事立场和态度,多个叙事者会形成一种多声部叙事,使作品内涵大为丰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小故事套小故事的连环叙事模式。全书叙事据此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即超叙事层、主叙事层和亚叙事层。这种多故事讲述人、多叙事层次的安排与一般的通俗小说有所不同。

《红楼梦》这种多叙述者、多叙事层次的叙事方式虽然在先前的白话通俗小说中较难找到先例,但在文言小说中倒是比较常见的。有的研究者因此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将超叙述结构从文言小说嫁接到白话小说”,“《红楼梦》是在白话小说的叙述模式中引进了文言小说的超叙述结构,而将中国传统的两种小说体式(文言的与白话的)融为一体,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7](P.9,10)}。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两者在形式上确实存在相似之处,不过其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因为从引入超叙述层的动机和艺术效果来看,《红楼梦》与此前的文言小说作品有着很大的不同。

文言小说之所以较多的采用超叙述层,与作者对这类小说性质和特点的体认有关。不少作者在创作此类小说时,往往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及其补正史的功能。这样,消息来源的确切可靠及交代便成为营造真实感的一种重要艺术手段。总的来看,有两种营造真实感的表现方式:一种是故事为故事讲述者亲眼所见,叙事者通常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即以和作者身份基本一致的“余”作为叙事者。一种是故事讲述者道听途说,但通常会引入故事提供人作为故事的主要讲述者。在故事

结尾,故事讲述者还常常对所讲述故事进行评说,形成元小说的叙事风格。这样,有些作品就出现了至少两位叙述者:一是超叙述层面的“余”,一是故事提供人。由于两位故事叙述者所述故事都是耳闻目见,会达到较为逼真的艺术效果。即便是那些鬼神灵怪故事,也会在奇幻中带有一种真实感,这正是文言小说所特有的一种艺术风格。

但《红楼梦》采用这种叙事方式的动机、效果与文言小说恰恰相反。正如多数研究者所认可的,《红楼梦》一书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甚至有不少学者如胡适、周汝昌等人干脆将它直接等同于作者的自传。有意思的是,该书篇首神话故事设计的目的与一些文言小说的创作相反,它不是为了获得真实感,恰恰是为了削弱作品的这一特性,形成一种间离效果。从作品的相关描写来看,作者有意采用模糊朝代、官职、地点等手段,并不希望读者将书中的故事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事件等同起来,正如书中石头所言:“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作品两次写到太虚幻镜的那幅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结合作品的具体描写及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来看,他之所以要刻意淡化作品的真实感,主要是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出于艺术表达的需要。在超叙事层,神话故事的描写将全书置于创世补天的宏大视野中,具有象征意义,它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庄重感和崇高感;朝代、官职、地名的模糊则使作品超越具体的时空,指向永恒。这种叙事手法意在引导读者关注书中的人事、情感,关注作品所表达的思想、观念,而不是让他们纠缠于真假问题,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大加发挥,转移注意力,忽视作品的命意所在。小题大做,无限发挥,这是索隐式研究惯常的手法,也是作者所不愿看到的。

从艺术表达的角度来看,这种多声部、多层次的叙述方式使作品富于变化,产生一种亦真亦幻、虚实相生的奇妙艺术效果。

二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小说作者显然考虑到,好奇心重的读者们会将这部作品与自己独特的身世经历联系起来,谁都明白,这在文网森严的乾隆时代意味着什么。篇首的神话故事以及后面的三生石畔还泪故事、太虚幻境的描写、跛足道人、癞头和尚的屡屡出现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作品的真实感,造成一种间离效果。因此,多个叙述者及叙述层次的设计也可以看作是作者有意设计的障眼法,给人一种亦真亦幻、神妙莫测的感觉,形成一种保护色。这样做,自然有避免对号入座的意思在,不让读者把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看得过实,从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了解作者的这些叙事手法对深入理解作品是有帮助的。比如作者问题,不少人因作品多个故事叙述者及叙事层次的设计而怀疑曹雪芹的著作权,殊不知这是作者的一种艺术手段,石头作书、空空道人传书的描写与前面石头补天、下凡的故事是相对应的,而不能坐得过实。如果将这段描写当作真事,则也应将篇首的神话故事全部当作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都是一体的。承认神话故事的虚构而只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显然是以偏概全,对作品艺术手法缺乏正确、深入的理解。

再比如作品的真假问题。既然作者不希望读者将作品看得过实,和现实生活对应起来,并用含糊朝代、官职、地点等手段来达到这种效果,读者就应该尊重作者的这一要求,“取其事体情理”,而不必求之过深,无限发挥。否则,一味怀疑作者在字里行间设置什么密码,隐藏着什么重大的历史秘密,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忽视了真正应该注意的东西,这是有违作者本意的,也是对作品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歪曲,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参 考 文 献]

- [1]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0.
- [2]许政扬校注.古今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3]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4]李时人,詹绪左校注.游仙窟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5]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
- [6]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7]王彬.红楼梦叙事[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南山)

明代小说对牙行的反映

孙 旭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北京 100088)

〔摘 要〕 古代小说作品是法律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牙行是明代经济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不少明代小说中均得到反映。概言之,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牙行设置的地点、开设牙行的条件、牙行与客人的关系、牙行所提供的服务、牙行的违法行为等。小说中不仅将冰冷的法律条文还原为具体生动的人的意识与实践,而且提供了律例、史书、笔记等文献较少涉及的方面,弥足珍贵。

〔关键词〕 明代小说; 牙行; 法律文献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06-04

古代白话小说对社会现实、世态人情常有细致、真实的描摹,其中包含大量法律文献,是研究中国法制史及法学理论的重要材料。

牙人,亦称牙侩、经纪,是中国古代在买卖双方间进行接洽、沟通,并按成交金额收取一定比例酬金的中间人,“非徒射利,亦所以便地方也”^{〔1〕}(P.295)。由牙人组成的中介机构称牙行。李潇《明代牙人、牙行的职能与商牙关系的探讨——以明代小说材料为中心》^{〔2〕}(PP.121-125),从《包公案》《明珠缘》《禅真后史》等明代小说中发掘资料,就代客收买货物、代客出货、充当歇家、代雇车船人丁、平稳物价等方面,揭示了牙人的作用。但其他明代小说,甚至包括上述明代小说的其他部分,还有不少反映明代牙人、牙行的生动资料,对于细致、深入地了解彼时牙人、牙行的相关情况,颇有助益,兹予以补充探讨。

关于牙行设置的地点,“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3〕}(P.84),可见主要在买卖地及交通要道。明代小说对此有具体再现。《喻世明言》第一卷:“那枫桥是柴米牙行聚处,少不得投个主家脱货。”《拍案惊奇》卷一:“又到了一个去处,却是福建地方了。才住定了船,就有一伙惯伺候

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攢将拢来。”此外,明代小说还呈现了产地设牙行的情况。《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从来采漆之处,原有牙行。”《醒世恒言》第十八卷:“(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伧足之隙。”

关于开设牙行的条件,“(牙行)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3〕}(P.84)。可见开设牙行,必须拥有一定的资产。《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一回中韩道国告来保:“老爹分付,交俺每马头上投经纪王伯儒店里下。……他店内房屋宽广,下的客商多,放财物不耽心。”但从明代小说的描写可知,也存在牙行资产薄弱,空手套白狼的情况。《梼杌闲评》第十五回:“原来此地经纪人家,本无田产蓄积,只靠客人养生。有客人到,便拿客人的钱使用,挪东补西,如米面酒肉杂货等物都赊来用,至节下还钱。”

从明代小说可见,牙行主善于交际,往往在货主新来乍到之际,即设酒接风,笼络其心。《熊龙峰刊小说四种·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描写:“(徐景

〔收稿日期〕 2015-12-20

〔作者简介〕 孙 旭,女,吉林辽源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后。

春)收买米麦而回。账目俱以清楚,次早开知,径至北新关张克让家,交托米麦,明白交割账目。……其日正值端午良辰,景春急欲回家以慰父母妻子悬望,无奈张克让苦苦款留,解粽饮酒取乐。”《拍案惊奇》卷一中的福建波斯胡,“见说海客到了,连忙先发银子,唤厨户包办酒席几十桌……元来旧规,海船一到,主人家先折过这一番款待,然后发货讲价的”。其情意相孚者,交往可延续几代而不绝,如《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一回中的韩道国告来保:“老爹分付,交俺每马头上投经纪王伯儒店里下。说过世老爹曾和他父亲相交……”;《喻世明言》第一卷:“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到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

当然,也有一些势利的牙行,其待客的态度根据对方的经济实力而改变。《鸳鸯针》第四卷第一回中的吴元理问米行主范顺行情,范顺见其衣饰粗陋,道:“几升米,我这里不卖,你去问那小米店去买。”吴元理道有几担米,“要借贵行发一发的”,范顺“连忙跳出柜来,一面叫拿茶,一面就拱手”。吴元理道米在船上,范顺“把他估了又估”,疑心道:“这样人那里得有多少米,或是来骗茶吃的。”提出看后定价。待亲眼看到吴元理的千余担米,范顺“一路上鞠鞠恭恭陪着”,至家,“美烂丰精的肴馔,大盘大碗,堆架桌面”。《拍案惊奇》卷一中的波斯人玛宝哈接待的主要是海外贸易归来之人,亦“以利为重”——他款待客人,“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但因其事先明确提出“请列位货单一看,好定坐席”,不像范顺私心忖度,忽冷忽热,故而并不令人十分生厌。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几代的交情也不做数。《拍案惊奇》卷二十二评价:“那些做经纪的人,有甚情谊?”有一定的道理。

关于牙行为生意人所提供的服务,官箴书总结为:“四顾无亲,一家妻孥命脉所系,亦惟牙行是赖耳。”^[1](P. 295)]明代小说所描写的内容与此相同。《杜骗新书》第六类《牙行骗·贫牙脱蜡还旧帐》按语云:“出外为商,以漂渺之身,涉寡亲之境,全仗经纪以为耳目。若遇经纪公正,则货物有主。”明代小说中对此也做了较为细致的再现。

其一,告主行情。牙行了解本地商品买卖的具体情形,可以在最短时间为货主提供准确的行情,以便其采取合适的买卖策略。《鸳鸯针》第

四卷第二回,范顺听说江西广润门失火,“数百家京货甚缺”,贩货前去,“一来脱手讨帐快便,二来江西新米同湖广价钱时候争差不多。我们先落得上水这宗利息”。到了之后,范顺即寻牙行,并告以来意。行主道:“京货虽是要得,却要多讨个把月帐。这是如何说?这些开铺的人,本钱也烧得七八了,有些的又要先去设法弄房子,那里还有现钱置货?若是赶着收新回去,这就不敢包管了。”范顺到外面一转,果如主人所言,“只得将货物均散与众铺家,做了四个月的赊帐”。

其二,为主贮货。牙行建有货仓,一旦货主决定藉此牙行发卖货物,即可贮货其仓。吴元理将米发于范顺牙行,范顺“打贴几个□□,将三船米拢贮上仓,约有一千三百担有零,请吴元理封了仓口,专候行情发卖”。货仓由货主亲自封口,亦要由货主亲自开封。后范顺乘吴元理归乡,偷开仓卖米,并侵吞米款,待吴元理来问,假惺惺道:“……原主不在,我又不肯打开……”,并借口“几个要紧主顾,开仓装米,我此时也疑心要坏”,方才打开;吴元理埋怨“也该再留些时,待我见一见,才信是真的”,范顺眼看搪塞不过去了,破口大骂:“呸,我这仓是同你共的么?一家儿当官应卯,赚厘把适用,养家活口。”可见,仓虽归牙行所有,一旦贮货,则启闭必有货主在场。

其三,为主估价。《醒世恒言》第十八卷:“那大户人家积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市上出脱。一日,已积了四匹……一径来到市中。……到个相熟行家来卖。见门首拥着许多卖绸的,屋里坐下三四个客商。主人家站在柜身里,展看绸匹,估喝价钱。施复分开众人,把绸递与主人家。主人家接来,解开包袱,逐匹翻看一过,将秤准了一准,喝定价钱,递与一个客人道:‘这施一官是忠厚人,不耐烦的,把些好银子与他。’那客人真个只捡细丝称准,付与施复。”在这一过程里。牙行主人先检查货物,然后议定价格,促成双方买卖成交。

其四,代主出脱。经货主同意,牙行可代主出脱货物。如事先未征得货主的同意,但其目的是保全货主的利益,亦能得到货主的谅解。《鸳鸯针》第四卷第一回中的吴元理将米一千三百担发范顺牙行,专候行情发卖。不想连月大雨,米价不变。吴元理不愿耽搁身子,辞别回去再贩新米。几日后,天气转晴,米价陡涨。范顺和妻子商量:

“……趁此时卖，□□□□银子，恐怕后来价还要跌，他不在这里，怎□□□□□□既相应，就该卖了，我们也早得些使。那吴蛮子来，不过还他银子，难道着落你赔米不成。”于是“合了价，开仓卖了”，赚了“对合”。吴元理返回时，如范顺告以实情，吴元理不但不会埋怨其擅自开仓，反而会感激其货卖有时。

有时，牙行还替伙主出脱“滞货”。《拍案惊奇》卷一中的“倒运汉”文若虚，随人“走海泛货”，因无本钱，不曾置得货物。归途中，遇大风浪，船被吹至一处荒岛，拾一大龟壳，决定带回家中，“锯将开来……便是两长床”。及牙人玛哈宝骤见此龟壳，“吃了一惊”道：“这是那一位客人的宝货？……莫不是不要卖的？”得知是文若虚的，“纳他（文若虚）头一位坐下”，又摆下几桌酒，“为首一桌比先更齐整”，请文若虚出价。然文若虚并不知价值多少，在同行商人张大的指点下，“竖着三个指头，再把第二个指空中一撇”，张大乘机说：“依文先生手势，敢像要一万哩。”玛哈宝道：“这是不要卖，哄我而已。此等宝物，岂止此价钱？”众人“目瞪口呆”，撺掇文若虚出五万两，玛哈宝还是摇头：“罪过，罪过。没有此话。”直至张大告知：“……若有这五万与他，勾他富贵一生，他也心满意足了。”玛哈宝方才相信，请张大作保买卖。原来，“鼉龙万岁，到底蜕下此壳成龙。此壳有二十四肋，按天上二十四气，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若不是玛哈宝见多识广，“肚中”“晓得”，此壳竟“明珠暗投”了。因此，后来众人得知实情，要文若虚“起个风，要他些不敷才是”，文若虚道：“……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得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味心争论？”诚然斯言也。在玛哈宝的帮助下，文若虚出脱了“滞货”，由“倒运汉”一变而为“转运汉”。

其五，代客收货。《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中阿寄决定替主家贩漆赚钱，前往庆云山中。漆行代客收货，但因货物抢手，“都是挨次儿打发”。阿寄担心耽搁日子，又费盘缠，请牙行主人吃酒，求其照管。牙行主一口应承，“当晚就往各村户凑足其数，装裹停当”。阿寄将漆运至苏州，正是缺漆之时，“不勾三日，卖个干净。……除去盘缠使用，足足赚对合有余”。阿寄第二次到庆云山，送主人一些小礼物，主人“一如前番，悄悄先打发他转身”。阿寄至杭州，“也不消三两日，就都卖完了。算本利，果然比起先这一帐又多几两”。第三次到

庆云山，阿寄因出门久了，想先回家探望主人，遂“将银子教主人家一面先收”；待其从家中赶回，“那行家已与他收完，点明交付”。此次运至兴化，“利息比这两处又好”。如果没有牙行从中帮助，阿寄不会如此快捷地拿到货物并顺利发卖。

牙行确实为买卖双方提供了便利，但伴随着牙行交易，也出现了一些违法行为，“甜言巧语，勾引客人入店；视货物如己有，不择好歹，滥为放出。致客商捆载而来、垂橐而去者，皆牙行利己而不利人所致”^[1]（P.295）。明代小说主要从如下方面做了表现：

其一，私充牙行，“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3]（P.84）。明代小说表现了某些人在利益的趋使下，私充牙行的情况。《廉明公案》下卷《骗害类·汪侯判经纪》中的苏州人朱秀，本为“喇虎市棍”，却“私充牙行”。丰城耿文来苏卖糖，朱秀“口称高价，拦河饵接，强抢夺船”，运至家中，私自发卖，“三日一空”。本约定“十日毕帐”，结果耿文“半载无收”。无奈之下，耿文以“孤客牢笼”告官。朱秀诉称“并无赊帐”，皆因“取牙用饭钱”，而耿文意图白骗，遂“黑心反诬”。司法官汪侯秉公执法，查明朱秀乃私充牙行，“此唇吻为剑锋，门户为坑阱，厘秤为戈矛”，吞骗客人糖货，断朱秀“理合追还，疏通客路”。

其二，把持行市，“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3]（P.85）。《廉明公案》下卷《骗害类·任侯判经纪》中的九江府邓凤，贩铁投丁端牙行发卖。丁端之党陈路等“饵发强吞”二十担，邓凤不愿，“限期还价”。陈路等“强取不吐”，后竟“脱逃”。邓凤以陈路等为丁端“恶党”告官，丁端则诉称“实出无辜”。司法官任侯认为：“客人有货，主家须要担当。铺户无钱，经纪岂得出帐？”明确指出牙行对客人所负的责任，故此“路等之脱骗客，本是丁端误之也”，判丁端“理合赔还，无得异说”。

其三，诬赊货物，“各处客商辐辏去处，若牙行及无籍之徒，用强邀劫客货者，不论有无诬赊货物，问罪，俱枷号一个月。如有诬赊货物，仍监追完足，发落”^[3]（P.387）。范顺代吴元理卖米后，见了偌多银子，不免心生贪婪，和妻子齐氏商量：“……只照他初来时价钱还他，我们就吃了这一半，也不是他该股的，他从何处来查考。”齐氏怂恿道：“依我说，连这一半都不与他也可。”吴元理转回，问

“我那米发了些不曾”，范顺欺心，道：“……几个仓里都烂得稀糟……及至开时，臭了满屋。只得自己打出钱来，请人搬去，顷在河里。”只此一谎，贪了吴元理“三千金”，一个“二百余金”的米行，发展至“就坐在屋里，一个月也有几百两银子挣”的规模。

以上与牙行有关的违法行为，明代律例、小说均有涉及；还有一些与牙行有关的违法行为，其他史料较少涉及，亦明代小说中所特有：

其一，以后盖前，“凡牙儉之弊，客货入店，彼背作纲抵牾，又多窃取供家。每以后客货，盖前客帐，此穷牙常态也”（《杜骗新书》第六类《牙行骗·狡牙脱纸以女偿》）。苏州牙人翁滨二，“乃宿牙，叠积前客债甚多”。福建大安施守训造纸来卖，翁滨二欺其雏商，将其千余篓、价八百余金纸，“尽还前客”，致施守训坐候半年无果。后施家又发五百篓纸来，翁滨二代为现卖，付银讫，仍不还前帐，施守训复候半年。

明代小说认为，“择经纪，乃经商一大关系也”：遇狡诈牙家，“抑货亏价必矣”（《杜骗新书》第六类《牙行骗·贫牙脱蜡还旧帐》）；遇贫穷牙家，以后客货还前客帐，兼且家用，亦“受其笼络”（《杜骗新书》第六类《牙行骗·狡牙脱纸以女偿》）。故明代小说给出了“早审牙家”的具体方法（《杜骗新书》第六类《牙行骗·狡牙脱纸以女偿》）：“如其人言谈直率，此是公正之人。若初会晤间，上下估看，方露微言，则其心中狡猾可知。若价即言而不远，应对迟慢，心必怀欺。若屋宇精致，分外巧样，多是奢华务外之人，内必不能积聚。倘衣补垢腻，人鄙形猥肩耸，目光巾帽不称寒暑，此皆贫穷之辈。若巧异妆扮，服色变常，必非创置之人，其内必无财钞。若衣冠不华，惟服布衣，此乃老实本分，不可以斯之曰贫商。”（《杜骗新书》第六类《牙行骗·贫牙脱蜡还旧帐》）

其二，累及他店，贫牙以后客货还前客帐，引起后客不满，贫牙即将“明白交易，并无对债之事”（《杜骗新书》第六类《牙行骗·贫牙脱蜡还旧债》），重告官府，致他店受累。丘牙家贫彻骨，得四川张霸发来蜡，“即以光棍顶作鬼名来借蜡”，其实是偿还前客旧帐。后张霸偶见其蜡遍在诸铺，问及姓名，皆与帐名不同。在其责问下，丘牙承认：“……此蜡真还前客旧帐，并家用去矣，何能问各店重取？”张霸道：“你将还人的及各店买去的，

都登上帐，只说他揭借去，俱未还银。我将帐去告取，你硬作证，怕他各店不再还我。”公堂上，丘牙一口咬定：“蜡非卖他，是小人先欠诸店旧帐，张霸蜡到，他等诈言揭借，数日后即还银。及得蜡到手，即坐以抵前帐，非小人敢兜客银也。”其中有江客，再三辩论，司法官梅爷不听，责之三十板，“诸人惊惧，皆称愿赔求饶”。

其三，以奸脱本，“牙家纵容妻女，与客人成奸，后脱其财本，此常套也”（《杜骗新书》第十七类《奸情类·奸牙人女被脱骗》）。经纪廖三，有女淑姬，貌美如花。客人张鲁，磊落俊雅，于廖三店发卖闽笋时，与淑姬结识。两人互有情意。乘廖三与客人“上乡讨账”而成奸。廖三妻得知，与丈夫商议“密捕杀之，以消其恨”。廖三颇知法律：“……凡妻与人私通，当场捉获，并斩呈官，律方无罪。今女与人通奸，并杀则不忍。单杀客人，彼罪不至死，岂死后无话？”定下一计：“现今笋帐已完，其银皆在我手，密窥女与奸时，当场捉之，打他半死，以锁系住，勒其供状，怕他不把笋银献我，彼时亦何说。”张鲁果堕其术，但要求“银须以一半还我便罢”。廖三不允，张鲁告府，刑馆吴爷审之，认为：“汝牙家常以妻女赖人奸，而脱其银，吾岂不知？”可见牙家确有此不法行径，但此案有所不同——“此女不知，为父母作货；张鲁亦不知，而落此套中”。

关于明代牙行，律例、史书、笔记等提供的材料非常之多，但小说却对牙行的设置地点、开设条件、牙行与生意人的关系，及其为生意人所提供的帮助等，有着更加细致入微的描写，这也为我们了解彼时牙行的一般情况，奉献了更加具体的资料。至于小说对牙行违法行为的描写，既有与史书相符之处，又有超越史书之处，则慧眼独具，显示了小说家较强的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汪天锡. 官箴集要[A]. 官箴书集成第一册[C]. 合肥：黄山书社，1997.
- [2] 李潇. 明代牙人、牙行的职能与商牙关系的探讨——以明代小说材料为中心[J]. 东南大学学报 2014(5).
- [3] 大明律[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南山）

论郑振铎的“水浒”图像之惑^{*}

——以“天都外臣序本”与“容与堂本”为考察核心

赵敬鹏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郑振铎先生在《水浒传》小说插图版画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但也不免存在令人疑惑的问题,这集中表征为将“天都外臣序本”看作先于“容与堂本”、最早的插图本《水浒传》。通过此两种版本插图的对比释读发现:就数量而言,“天都外臣序本”当是对“容与堂本”插图版画的再一次挑选;就图像结构而言,前者是对后者的临摹和修改。总之,“天都外臣序本”早于“容与堂本”插图的证据不足。

[关键词] 郑振铎; “天都外臣序本”; “容与堂本”; 版画

[中图分类号] I207.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10-06

郑振铎先生当属版画研究界的巨擘,其《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第一次勾勒出古代版画的发展、成熟与式微,诸如“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年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1](P.49)]便是留给后人的经典名言。事实上,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国内就出现了古代小说、木刻版画以及连环画的专门整理和研究,《水浒传》在这一阶段得到大范围地校勘和出版,但是插图问题却很少被谈及。专注研究《水浒传》的潘力山、胡适、鲁迅、孙楷第等人,集中讨论这部文学名著的本事、版本演变,以及主题与思想,等等,^[2]唯有郑振铎的《水浒传的演化》(1929 年)一文提到了《水浒传》的插图:“余本插画很精美,但刊印颇不经心。”当时并没有出现整理相关文献的大部头著作,尚处于对插图本《水浒传》的搜集阶段,其中郑振铎在这方面用力颇多。然而,他也留下了一些“水浒”图像方面的疑惑,特别是“容与堂本”与“天都外臣序本”插图的关系,有待后学的进一步研究。

—

郑振铎先生编录了多部版画图录,其中《中国

版画史图录》《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最为博大。《中国版画史图录》共 5 册、20 集,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40 至 1941 年连续出版、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2 年再版。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汪刘鲍郑诸家所镌版画集”收录了两种《水浒传》版画,分别是“一百回本水浒传插图”(四幅)、“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插图”(八幅)。虽然郑振铎先生并未标出任何有关于这两种版画的文献信息,但他都选录了此二种版本《水浒传》开篇第一回的插图(图 1、图 2),为下文我们辨识、对比这两种《水浒传》版画插图提供了方便。

新中国成立之后,郑振铎亲自编校了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版),他在序言中写道:

我们手头所有的各种版本的《水浒传》是:

(一)《忠义水浒传》二十卷(一百回,残存第十一卷一卷,即第五十一回到五十五回),明嘉靖间武定侯郭勋刻本。

(二)《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明万历十七年己丑(一五八九年)天都外臣(汪道昆)序

* [基金项目] 2015 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水浒传》小说成像研究”(项目编号:15ZWC002);2015 年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博士专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JSNU2015BZ23)。

[收稿日期] 2015-12-20

[作者简介] 赵敬鹏,山东莘县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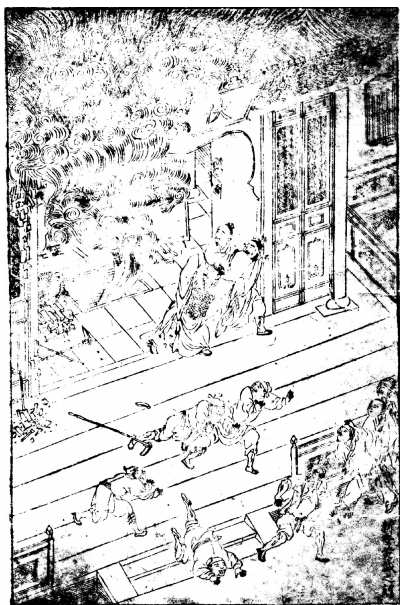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版画史图录》
“一百回本水浒传 插图一”



图2 《中国版画史图录》
“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 插图一”

刻本。

(三)李卓吾评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明万历间容与堂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今用照片本)。

(四)钟伯敬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明末四知馆刻本(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今用刘修业先生校录本)。

(五)《忠义水浒传》不分卷(一百回),明末大涤余人序刻本(李玄伯氏藏),李氏排印本。

(六)李卓吾《忠义水浒传》不分卷(一百回),明、清间芥子园刻本。

(七)《忠义水浒传》不分卷(一百二十回),亦题“李卓吾评”,明末杨定见增编,袁无涯刻本。

(八)《忠义水浒传》不分卷(一百二十回),明、清间郁郁堂翻刻杨定见本。

(九)《第五才子书》七十五卷(七十回),明、清间金圣叹评,贯华堂原刻本,中华书局影印贯华堂本,又其他坊刻本甚多。

除了《古今书刻》著录的明代都察院本和《百川书志》著录的那部一百卷本之外(这两个本子,很可能就是郭勋本),所有已经知道的《水浒传》的各种本子,差不多都已经集中在一起了。^{[3](P.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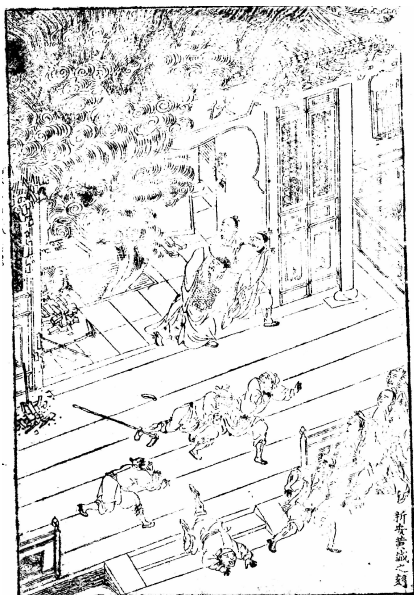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古版画丛刊》“误走妖魔”



图4 《中国古版画丛刊》
“卢俊义涪青石峪”

其版本之丰富,远超于一般“水浒”研究者和

版画史家,所以有人慨叹郑振铎“罗列版本,阵容的强劲至今一般学者仍难以超越”。随后,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1957至1959年间先后出版了共5函18种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增订再版)。该书的第2册收录了“明万历刊本”的插图本《水浒传》目录及其全部版画(如图3、图4),并在书末“《忠义水浒传插图》跋”中对明清插图本《水浒传》做了总体的介绍。鉴于郑振铎先生身兼版画收藏家、美术史论家,对包括《水浒传》在内的插图本小说文献研究有着巨大影响,并且较具权威性,所以兹录于下。

《忠义水浒传》的明·嘉靖刊本,想来是没有插图的。《水浒传》之有插图,当自明·万历时代的诸种刻本开始。建安版的简本《水浒传》,是上图下文的。较晚期刻的《英雄谱》本,也是上图下文的。全页大幅的插图,似当始于万历十七年(公元一五八九年)的天都外臣序刻本。这个本子有清初的补刻的叶子,不知其插图是否属于原本所有。但那些插图,气势豪放,人物都重点突出,显得有中心,背景比较地不那末细致地表现出来,线条比较地疏朗,可看出不会是万历末期或启、禎二朝的所作,当然更不会清初的所作的。李卓吾批评的《忠义水浒传》,也有插图,是容与堂刻本,线条也很疏朗,人物形象,简捷有力。还有一种万历刊的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李氏藏本),也有插图一百幅,幅幅是精工细致的创作,可看得出是万历晚期的作品。后来杨定见刊本的《水浒全传》,添加了“田虎”、“王庆”的二十回,也就添加了插图二十幅;但除了这二十幅插图之外,其余的一百幅是完全袭用了这部万历末年的《忠义水浒传》的插图的,只是把每幅插图的页边上的篆文的四字标题,改为正书的七字回目而已。天启、崇禎之间,有钟伯敬评本《忠义水浒传》,其插图却别开生面,另有作风,也同样地显得虎虎有生气。及崇禎末,陈老莲的《水浒叶子》流传遍天下。绘写水浒英雄的画人们便很难脱出他的畴范之外。故清初金圣叹批刻七十回本《水浒传》,其插图便也成了重要英雄的人物图像了。

在以上那些有插图的百回本《水浒传》里,当然各有所长,但毕竟要以李氏藏的这部

万历末年刻本的《忠义水浒传》的插图最为精工。现在就用这个本子重印出来。如有可能,别的本子的插图也将陆续印行,以供比较研究。

在这洋洋洒洒的一百幅的《水浒传》插图里,正和《水浒传》所描写的英雄形象和社会生活相同,它们也详尽地、工致地刻画了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的变化,插图作者的现实主义的作风,是不愧成为那绝代大创作的《水浒传》的偻伢的。把它们插附在《水浒传》的卷首,乃是“锦上添花”之举,乃是“相得益彰”之作。这里面当然有不少战争场面,但绘写社会生活的场面却更多。明代和宋代,为时相距不太远,同是封建社会的生活,变动也不会很大,故虽是明代万历晚期的画人们之所写的,却想来和水浒时代的社会生活情况是不会有太大的歧异的。我们把这一百幅的插图,作为封建社会的生活写照,想来是不会有错误的。有一小部分神异斗法的故事画,却可以“存而不论”,但其实,也便恰好表现了封建时代里的有那末样的迷信和幻想的存在。在王进、史进、鲁智深和林冲的故事里(第二回—第十二回),在“智取生辰纲”的故事里(第十四回—第十六回),在宋江杀阎婆惜的故事里(第十八回—第二十三回),在武松的故事里(第二十三回—第三十二回)以及其他“金戈铁马”的大段讲话里,或正面,或侧面,或一般地绘写,或旁敲侧击地刻画,无不把那个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人民的如何受官僚地主恶霸们的欺诈、掠夺、被侮辱、被压迫者们的如何告诉无门,不得不铤而走险,造成“官迫民反”的局势,栩栩如生地表现在一百面的尺幅的版画里。这一百幅的大规模的插图,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败笔,个个人物是生气勃勃地,所有的背景,包括华屋茅亭,长川大山在内,都出之以熟练的手笔。那个大画家(或几个)可惜不曾留名下来!也可能就是出于徽派刻工们之手。他们的一丝不苟的刀法,正体现了插图作者的传神之笔。像这样地大气魄的一百幅的插图,是古来所少有的。作为单独的钜册的版画而存在,完全有其必要。在那里,在多种多样的绘刻之工里,在多种多样的封建社会生活的刻画上,我们的艺术家们,特别是版画家们,和历史家们会寻找

出很多的有用、有益的资料出来的。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郑振铎跋于保加利亚·瓦尔纳市的黑海之滨。时正狂风吹过万树之巅,海涛怒号,如万马奔腾。^①

这篇序文完成于郑振铎率团访问保加利亚期间,恰如写作时的外部环境,作者难掩心中对版画的热爱,激动之情溢于纸上。不过,郑振铎有可能为了准备此后10月份赴布拉格讲学而携带不少资料,^[4]换言之,我们不能排除这篇序言的写作是“有备而来”,而非临时在黑海之滨聆听海涛怒号的“缘情”而作。郑氏如数家珍般胪列诸种插图本《水浒传》,语势之强似乎带有不容置疑的信心。但言之凿凿的背后,却另有隐情。

二

首先,容与堂刻本的《水浒传》插图是两百幅,而“天都外臣序”的插图本《水浒传》仅有九十六幅插图,前者是每一回前置两幅插图,后者却将插图全部放在卷首,也就是说,后者插图是对前者的挑选,“谁抄谁十分明显”。此外,还有多处证据表明“天都外臣序”本的插图是“按容与堂本的插图仿刻出来的”。^②这一观点并非仅仅是马幼垣一人所持,王古鲁同样认定容与堂刻本《水浒传》不仅早于“天都外臣序本”,更早于郑振铎所执着坚持《水浒传》最早的版本,即郭勋刻本。^③然而,郑振铎在“《水浒全传》序”以及“《忠义水浒传插图》跋”中,一口咬定所谓的“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不仅早于容与堂刻本,而且认为“全页大幅的插图,似当始于万历十七年(公元一五八九年)的天都外臣序刻本”。既然“不知其插图是否属于原本所有”,为何肯定“不会是万历末期或启、祯二朝的所作,当然更不会清初的所作”?如此推崇这样一个问题重重的版本,且在其他著述中也未加以充分的证明,其初衷着实令人费解。

与郑振铎大约同辈的学人,比如鲁迅、孙楷第

等,对插图本《水浒传》版本的搜集、整理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鲁迅所首创《水浒传》“简略”、“繁缛”的分类方法,至今都被学界沿用,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列举了六本“现存之《水浒传》则所知者”,尽管并未注明是否有插图,但没有郑振铎所说的“天都外臣序”的插图本《水浒传》。而且,鲁迅一再强调“然今所传《水浒》《三国志》等书,皆屡经后人增损,施罗真面,殆已无从复见矣”,并引用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对郭勋本《水浒传》的评定,赞同郭勋本为当时所能见到最早的《水浒传》,“原本《水浒传》今不可得。”^{[5](P.147)}鲁迅之所以没有谈及郑振铎所偏爱的“天都外臣序”的插图本《水浒传》,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其目力不及后者。

孙楷第先后出版了《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杂出版社1932年版)、《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北平图书馆1933年版),其所见插图本《水浒传》甚多(包括现存与佚失)。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孙楷第记录了插图本《水浒传》的版本情况:

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存明翻嘉靖本,有清朝补版。正文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有图。

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首天都外臣(汪道昆)序。^④

孙楷第先生对一百卷一百回“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的介绍稍显粗糙,尽管他鉴定这是对嘉靖年间版本的翻刻,而且同样有清朝的“补版”,但没有详细说清楚清朝所补充的是书中的版画(图像文本)还是小说(语言文本),这就使得郑振铎“天都外臣序”插图本《水浒传》早于容与堂版的观点更加模棱两可。郑振铎坚称“天都外臣序”插图本早于容与堂版的主要根据是插图的风格,诚如他所言,“那些插图(“天都外臣序”本中的插图——引者注),气势豪放,人物都重点突出,显得

① 郑振铎编:《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81-884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② 马幼垣:《从挂名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的插图看该本的素质》,《水浒二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11-423页。需要说明的是,马幼垣误认为“天都外臣序”中的版画是100幅,但实则仅有96幅。不过,这一不确切的技术性统计瑕不掩瑜,他善于从版画及其与小说语言文本之间的关系发现“天都外臣序”本存在的问题,功不可没。关于这一问题研究方法的效率,也比王古鲁、马蹄疾等人略胜一筹。马幼垣是通过考察小说文本与插图的关系来进行插图本《水浒传》文献研究的首创者,可参见其《嵌图本〈水浒传〉四种简介》(《汉学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本文主要借鉴马幼垣的文献研究方法。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中,有孟繁仁撰写的《水浒传》内容提要与版本述略。孟繁仁先生便注意到了“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版画“标五十叶,实存四十八叶,计九十六幅,系万历原刻本所无”这一常人忽视的细节。详见《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第342-35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③ 王古鲁:《“读水浒全传郑序”及“谈水浒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或参见苗怀明编著:《王古鲁小说戏曲论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9-199页。

④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外二种)》,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2-136页。需要说明的是,“一‘叶’即两‘页’”。

有中心,背景比较地不那末细致地表现出来,线条比较地疏朗,可看出不会是万历末期或启、禛二朝的所作,当然更不会是清初的所作的。”从风格角度固然可以大约为艺术断代,但这绝不是最准确的方法,原因很简单:后世艺术家完全可以临摹、仿制前代版画,仿古的水平不难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按照目前考古界以及书画鉴定界的通用方法,是通过技术(如碳十四测年法、印泥或墨迹中的成分及含量等)考察物品的年代及其真伪,至于“天都外臣序”插图本《水浒传》的文献信息,我们稍后将做出专门考证,但对郑振铎观点全盘接受的学者大有人在。

比如当今版画研究界的知名学者周心慧,就把“天都外臣序”本以及容与堂刻本中的版画,视为“并驾齐驱”的两套系统。他对前者版画的描述非常简单,“图单面方式,上镌图题,画面疏朗醒目,背景不事雕琢,以人物活动为主,绘镌俱工。”这里既没有指出石渠阁补充刊刻了哪些地方,也未对郑振铎观点有任何疑问:“郑振铎先生《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收图著称刊于万历十七年,则这个本子就是现今所能看到的刊刻时间最早的《水浒传》版画。”相对于仅用了 229 个字便完成了对“天都外臣序”插图本《水浒传》的介绍,周心慧却用了 509 个字对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的情况做了详细说明。我们并非对周氏“鸡蛋里挑骨头”,而是可以通过他对这两个版本文献的不同整理,发现其中的问题。

首先,容与堂刻本的版画上留下了刻工的信息,所以周心慧就此对刻工吴凤台、黄应光的其他镌刻作品做了拓展说明;与此相反,由于他不知道“天都外臣序”本的版画刻者为谁,所以在对后者的简介中,没有类似的拓展说明。

其次,周氏在分析容与堂刻本中的版画风格时说,“容与堂本《水浒》版画,画面疏略,背景鲜明,人物突出”,“黄应光的镌刻,圆润而不失劲挺,古拙中更见秀雅,是各种刀刻技艺浑然一体的完美结合,不仅不失画家墨线之原意,而且通过木刻的韵味有所提升;若论人物形象塑造之生动与多姿多彩,是古本小说版画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古代木刻画技艺达于巅峰的标志性作品。”^[6](PP. 137-138) 看似如此详实的分析,实质上与“天都外臣序”本的版画风格到底有多少出入呢?“天都外臣序”本的版画“绘镌俱工”与容与堂插图的“各种刀刻技艺……不仅不失画家墨线之原意,

而且通过木刻的韵味有所提升”、“画面疏朗醒目”与“画面疏略”、“背景不事雕琢”与“背景简明”这两种评价性话语之间未必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之所以两种版画风格描述前后有粗略、详细之别,盖因于周氏欲表达前者的“最早”以及后者的“最成功”和“巅峰”的地位而已。

再次,按照常理,周心慧不会不知道“天都外臣序”本与容与堂刻本中的版画有雷同的部分,但他却并未对这两种版画做出对比分析,而且前者绝非完全意义上的“背景不事雕琢”,后者也并不是“背景简明”。如图 5(“天都外臣序”本版画)、图 6(容与堂刻本版画)那样,前者的背景竟然比后者还要繁复:图像右上角斜出的柳树及其蔓长的枝条,扈家庄旗帜的边框颜色,还有图像左下角代表梁山泊一方的旗帜与兵器等。而这种情况分别出现在《水浒传》的“一丈青单捉王矮虎,宋公明两打祝家庄”、“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以及“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等三回的回目图中。可以说,“天都外臣序”本与容与堂刻本中的插图版画,既有画面人物与情节内容上的增删,也有背景上的差异,不可一概而论。^[7](PP. 411-423)



图 5 《水浒传》(天都外臣序本)“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三

周心慧在其 1988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中,曾经提到过“天都外臣序”插图本《水浒传》:“《水浒》是我国最著名、拥有最广大读者群的长篇小说之一。该书著藏的最早刻本,为嘉靖间刊徽州汪道昆序《忠义水浒传》。此本是否有图,因笔者未见传本,不敢妄言。郑振铎先生提及此本,说是‘想来是没有图的’,亦未见真



图6 《水浒传》(天都外臣序本)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实。”^{[8](P.46)}但是,如此含糊的说明,与他十余年后出版的《中国版画史丛稿》中对“天都外臣序”插图本《水浒传》介绍如出一辙。所以,我们只能作出如下的推测:要么周心慧仍旧没有看到这部《水浒传》(或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石渠阁补刻本);要么就是唯郑振铎马首是瞻,以至于这位后学从来都不敢“妄言”。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吴晓铃曾就“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撒过“弥天大谎”:“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引者注)藏本有字迹漫漶处,余曾见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本,版刻较佳。今所知海内外仅此二本。”^{[9](P.27)}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芝大有的天都外臣序本只是七十年代得自北京图书馆的胶卷,拍摄所据者正是北京图书馆的石渠阁补刊本。北京图书馆所制胶卷,品质向来不高,往往原书字句尚能辨认而胶卷却模糊不清,因此得了胶卷而仍需要复核原书是时有之事。这套胶卷也不例外,漫漶程度较原书变本加厉”,这就等于说吴晓铃“替天都外臣序本发明了一套另本”。^{[10](P.409-410)}这种不严谨的学术态度固然值得商榷,但如果将吴晓铃的“造假”视为对其师郑振铎所一直重视的“问题重重”的“天

都外臣序”本《水浒传》的辩护,也许就不难理解了。因此,这一版本的《水浒传》早于容与堂刻本的证据不足。

总而言之,无论“容与堂本”与“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插图的关系有无得以厘清,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水浒传》作品整理与文献研究方面执牛耳的地位都不可撼动,没有他的辛劳工作,今人的研究也不会如此便利。但是,如果能够从版画图像的结构分析入手,并立足于插图与小说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考察,那么,郑振铎先生的这一疑惑,似乎也就有了相对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 [1]郑振铎.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2]纪德君. 百年来《水浒传》成书及版本研究述要[J]. 中华文化论坛,2004(3).
- [3]郑振铎.“水许全传·序”[A]. 施耐庵、罗贯中. 水许全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 [4]陈福康. 郑振铎的最后一次出国[J]. 世纪,1998(6).
- [5]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A]. 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6]周心慧. 中国版画史丛稿[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 [7]马幼垣. 从挂名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的插图看该本的素质[A]. 水浒二论[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8]周心慧. 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M]. 北京:学苑出版社,1988.
- [9]吴晓铃. 答客三难[A]. 吴晓铃集(第一卷)[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 [10]马幼垣. 所谓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尚未发现第二套序本[A]. 水浒二论[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责任编辑 南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性分析^{*}

崔志胜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在价值基础、价值内容和价值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核,从总体上规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培育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精神文明建设; 统一性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16-05

2011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这就是说,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来讲往往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战略性意义主要体现为:精神文明建设有助于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然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习近平在谈到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辩证关系时曾明确讲道:“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

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1](P.163)}当前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必须从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出发,充分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不断增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内涵,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均是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出的重要科学命题,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其内在关系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相互的关系,二者互为前提,互为基础。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核和灵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所在,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发展的重要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形式,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

^{*} [基金项目] 2014 年度河南大学基础科研业务费新兴交叉及特色学科培育项目“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三次转型’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研究”(项目编号:xxjc20140025),2015 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生成与现实培育研究”(项目编号:2015-ZD-108)。

[收稿日期] 2015-11-10

[作者简介] 崔志胜,男,河南濮阳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

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基础、价值功能、价值内容及价值目标等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第一,从价值基础来看,两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为指导。正确的价值观是以科学世界观和相关真理为基础和理论前提的。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体系作为指导和基础,任何价值观的培育都是无本之木,都会成为空中楼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同样要有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体系作为基础和前提。作为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高举的一面旗帜,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个方面。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从根本规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第二,从价值功能来看,两者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广泛性与先进性的统一,既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又兼容并蓄,尊重包容差异,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在全社会形成思想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一系列内涵明确、联系紧密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思想、价值理念构成的整体。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把中国共产党的远大理想同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结合起来,把中国精神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观的基本要求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行为规范结合起来,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规范和动力。同样,精神文明建设也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内容,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其中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P.367)}因而,思想道德建设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第三,从价值内容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涵盖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最核心的一些价值理念,而这些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上积极倡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坚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2](P.367)}。同时,在社会上大力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此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在社会上“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2](P.369)}第四,从价值目标来看,两者都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高价值取向和目标,表现在现阶段就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就在于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群众。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也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根据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由上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相互关系,且在价值基础、价值功能、价值内容及价值目标等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正是由于这种辩证的相互关系和内在的一致性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前提和基础。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尤其是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对文化建设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是新时期发挥其对精神文明建设引领作用的前提基础。作为科学的价值观和思想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价值导向、价值整合、激励、凝聚、规范和教育等功能。一是对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管是对于个人的成长,还是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来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揭示了人生的目的和人生最大的价值意义,明确了人们奋斗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有利于人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二是对社会力量的整合与凝聚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价值整合和凝聚功能。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激荡、交融,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日趋多样化,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呈现出广泛性、复杂性和深刻性的特点,不少人的思想观念出现困惑和盲从,甚至导致理想破灭和信仰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先进性与主导性等特点使它能够有效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充分协调不同社会群体、阶层的利益关系,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摩擦和冲突,使社会成员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从而把人们的智慧和力量紧紧凝聚、整合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勇于创新、坚强有力的统一整体,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共同的思

想道德基础。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坚持集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尊重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要求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相结合,把权力与义务相结合,形成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利益关系。三是对社会成员的教育和规范功能。从本质上讲,价值观教育是指一定社会的阶级或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要求通过教育的手段对其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施加影响,并最终构建与本阶级或集团利益相符合的价值观体系的过程。价值观教育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占据着十分关键的地位。在我国,价值观教育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承担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建设和创新的重要任务。其主要内容是要对社会成员进行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等,主要目的是要使全体社会成员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信心和决心,实质就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同时,对社会成员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关键是要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工作。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3](PP.9-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只有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成为人们内心深处的信仰,才能充分发挥其指导社会实践的功能,并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不断体现着自己的价值,实现自身的发展。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具有很强的价值规范功能,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和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主导和引领作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了精神文明建设要追求和实现的根本性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对于推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

作用。其中,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指导意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整个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和实现目标。近代以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国家富强一直都是人们追求的梦想。然而,在贫困积弱、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具有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性质的近代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只能是一种空想。对此,毛泽东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缺一不可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4](P.1080)这就是说,要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第一步就是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才能顺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价值理念明确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为推动社会的有序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奠定了深厚的价值基础。个人层面的价值观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理念,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基本准绳,为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精神文明的根本,在精神建设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同时,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培育。

首先,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氛围。通过精神文明建设能够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同时也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系列价值理念深入人心。尤其是通过精神文明的各种创建活动促使人们积极参与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享受到精神文明发展的各项成果,并在这个过程中切身体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带来的身心上的愉悦,情感上的升华,思想上的提高,从而不断加强自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

其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为人们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马克思曾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PP.118-119)这就是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离不开这个主体。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并身体力行地积极践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句空话。同时,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素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不竭源泉。正如毛泽东在 1942 年 5 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4](P.860)既然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主体,那么,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素质状况就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

价值观的培育工作能否顺利地深入推进。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则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文化和道德素质的关键所在。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方面。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繁荣发展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事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6](P.2057)},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素质,为人们身体力行地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

再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不断提高人们的政治素质和民主意识,使人们广泛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践中,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列宁在1921年10月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时曾明确指出,要建立苏维埃的经济,群众光能够识字是不行的,必须大大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他说:“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不断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务必要能提高文化水平。应当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提高文化水平,应当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写本领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7](P.196)}“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7](P.200)}这就是说,一个文盲是不可能有效参与政治生活并参加国家管理的,要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大力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会带来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和政治素质的提升,从而使他们有效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在这方面,精神文明建设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社会主义“四有”公民,有利于人们政治素质和民主意识的提高,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

最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促进党内优良作风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坚强的政党支撑。党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促进,互为条件和基础。党风问题不仅关系到党的建设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气问题。党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的带动力和引导力上,优良的党风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毛泽东曾指出:“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8](P.4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风建设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关键所在。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2]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二)(1992年10月-1997年9月)[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光 翟)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视角下的民主党派职能研究

谢从戎¹ 沈 骅²

(1.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福建福州 350003;

2. 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 江苏苏州 215009)

[摘 要]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两个概念不同,前者体现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及各主体之间的相对平等地位。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而民主党派与这三类社会治理多元主体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得民主党派可以在打造、促进合格社会治理主体这一进程中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即进一步促进和推动政府部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大力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和履职实践、影响和引导加入民主党派的公民个人。

[关键词] 社会治理; 多元主体; 民主党派; 职能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21-04

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公民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社会治理这一概念与社会管理之间有着根本区别,后者突出政府的角色和定位,视社会为政府的管理和实践对象,甚至有的时候更为狭义地将社会管理仅仅理解为维护社会稳定,如此社会管理很容易表现为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习惯于包揽一切社会事务,扮演“全能型选手”。而社会治理则更强调不仅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行为主体,以及多元主体之间形成密切的、平等的网络关系,进而把社会管理看作是各主体之间的合作过程,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原先由国家和政府承担的社会事务正在越来越多地由各种包括 NPO 和 NGO 在内的社会组织和公民自愿团体等来承担,社会更日益呈现出公民社会的特征。

一般来说,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可以分成三类: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这三类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承担着不同职责,彼此合作、互相

协调,为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长治久安而共同努力。而从目前现状看,社会治理的这三类主体无论是从理论观念层面,还是实践操作层面,都很难说已经是合格的社会治理主体。由于民主党派与上述三类社会治理多元主体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为民主党派在新时期承担的政治和社会职能提供了新的诠释框架,也就是说,民主党派可以在打造、促进合格社会治理主体这一进程中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

—

民主党派在我国属于参政党,这使得民主党派和政府部门有着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民主党派能够在执政党的领导下,促进和推动政府部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成为合格社会治理主体之一的进程。

握有行政公权力的政府部门无疑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中地位最为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削弱国家力量的强度,另一方面又产生出对另一类国家力量的需要”^{[1](PP. 15-16)},因此政府部门在社会治理各主体中必然居主导地

[收稿日期] 2015-10-11

[作者简介] 谢从戎,女,福建古田人,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

沈 骅,男,江苏苏州人,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位。目前的政府部门尚难以称为完全合格的社会治理主体之一,这主要表现为自1949年以来,我国建立起一种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领域,还是教育、医疗、就业等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政府部门都握有大权,成为全能型政府,集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于一身,这使得政府部门形成了大包大揽的父母官心态、为民作主心态,在经济领域则体现为设置了种类繁多、环节复杂的各种行政审批,如此时间一长,就形成各种各样的部门利益,权钱交易、权力寻租也就应运而生、愈演愈烈。

而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和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一的政府部门之间有着直接和紧密的联系。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定位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将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2005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协商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指出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2007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又再次予以强调。如此,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就可以通过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促进和推动政府部门成为合格社会治理主体。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职能,体现在对国家政权的多种形式参与即“一参加三参与”。与此同时,民主党派还与执政党之间可以互相监督,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第一次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精辟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八个字。^{[2](P.278)}邓小平同志在1957年也强调过,对共产党的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就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尤其要扩大后者“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3](P.271)}。此后,这一原则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多次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成为执政党和参政党的一种常态关系

民主党派通过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可以有效促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使得政府部门主动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等原则,增强自信、信任社会,从而推动政府部门成为合格社会治理主体的进程。这主要是因为民主党派和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两者之间是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这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之间,有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同心共向、齐筑中国梦,双方不存在西方多党制下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彼此攻讦、互拆墙角的恶性竞争关系,双方的领导和合作、执政和参政的角色定位,得到了法律甚至是宪法层面的认可和保障,而且还有相关的制度规定,如民主党派以“一参加三参与”的方式,实现其全面参政职能,这使得执政党和民主党派两者间呈现出互相信任的良好合作关系。此外,民主党派有不少党员就在政府部门、包括政协、人大担任职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身体力行,逐步将政府部门打造为合格的社会治理主体之一。

二

民主党派既是现代政党,同时也属于社会组织,本身也是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有必要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和履职实践,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将自身打造为合格的社会治理主体之一。

政党和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党通常有完整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指导,拥有明确的政治主张、特定的政治目标,可以说是以执政为目标的政治组织。而社会组织的概念更为宽泛,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有意识结合起来的社会群体。我国的民主党派,从政治层面看如前所述是参政党,已经承担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政治功能,这是和一般的NPO和NGO等社会组织所不同的;再从社会层面看,民主党派同样也属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扎根于社会,其根本宗旨不脱于服务社会,不仅如此,从社会治理主体多元性的角度出发,民主党派要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服务社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民主党派承担更多社会 and 公共事务的实践活动,主要体现在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活动。可以说,社会服务是我国各民主党派的一个优良传统,民国时期很多民主党派的精英人物,都亲自开展和推动很多颇具影响的社会服务活动。例如黄炎培,早在1917年就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倡导教育与生活、生活与劳动不应脱节,此后数十年一直积极投身于中国的职业教育运

动,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又如作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和民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4](P.284)}30年代就创办晓庄学院,抗战胜利后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教师义务讲课,同时还在南京创办乡村医院,既出钱出力,又募捐筹药,农民可以免费就医。

如今,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正在进入到一个利益更加分化、群体更加多元的新时期,社会服务对作为社会组织的民主党派来说,其重要性更加凸显,要以直接服务社会为已职,发挥出民主党派服务社会的独特优势。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亟需来自其它地区的帮助,民主党派作为全国性的社会组织,既义不容辞,又有着组织方面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完全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直接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尽一份力,如农工党多年以来在贵州毕节所作的科技扶贫工作,就是这种直接服务的典型。而东部沿海地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利益诉求越来越趋向多元化,民主党派可以根据自身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人们的实际需要。民主党派向社会公众提供的这种具有直接性的社会服务,对民主党派自身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和提高民主党派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亲和力,改变民主党派在普通民众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民众中默默无闻的现状,使得民主党派能为更多人所了解和知晓,进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民主党派,这对于作为现代政党的民主党派的自身发展和前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作为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参政党,民主党派向社会公众提供社会服务也是为配合、帮助执政党,因为社会服务同样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职责。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由一个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党,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就成为执政党的本质属性。由于经济和社会建设千头万绪,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又复杂万变,因此执政党需要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更好地共同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

这里,有必要稍稍分析一下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职能与社会服务职能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如前所述,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政治职能之一,主要从理论层面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建言献策。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渐渐将重心落在了社会民生领域,这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民主党派对群众和所代表一部分阶层呼声的一种回应。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是调查研究,主要工作成果是提出相关报告、建议和提案等,关注的问题不仅包括微观层面的问题和现象,也包括宏观层面的问题和现象,可以说具有一种间接性和理论性,而民主党派开展的社会服务则直接解决群众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取得相应的社会效益,可以说具有一种直接性和实践性。当然,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社会服务有利于推动参政议政,通过实践能够更好更及时地发现群众所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形成参政议政的材料和依据,同时能够更好地跟踪和落实参政议政的成果;参政议政同样有助社会服务的展开,通过调研能够更清晰地呈现社会服务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紧迫之处,更能通过参政议政引起政府部门的更大关注,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扩大社会服务的规模 and 影响。要之,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两者可以互为配合、互为促进,两者之间的紧密结合,有利于作为参政学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作为社会组织的民主党派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其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职能。

三

在现代社会中,公民个人同样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而民主党派作为现代政党和社会组织,对公民个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可以对加入民主党派、成为党员的公民个人施加影响,促进其进一步成为合格的社会治理主体之一。

当前,民主党派的成员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换代,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学历高、知识层次高,对新观念、新思想接受快,很多人有留学的经历,有较强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较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同时,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由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熟悉通过网络获得信息和知识,因而思想活跃,信息灵通,有创新意识。但是,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因为没有经历过复杂形势的考验,缺乏与中国共产党同甘共苦的经历,在多元的现实环境

中,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状况也出现了多元化倾向。究其原因,有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有来自国内、国外的,也有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等等,总之多元化的变革因素影响了党员们的思维模式、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

民主党派针对党员群体的思想建设主要体现在政治信仰和政治观念层面,通过塑造和推广民主党派的核心价值观念,了解和熟悉民主党派悠久历史,促使加入民主党派的党员形成政治共识,形成共同的政治自觉性、政治使命感和政治坚定性。所谓政治共识,就是指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的基本理念、秩序安排和实践策略等与政治体系有关的信念和规则的认可。就民主党派而言,基本政治共识体现为三个认同,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认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道路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认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全体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而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那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搞多党制、两党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述政治共识,是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和奋斗目标,也是民主党派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历程中取得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共同认可,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要求,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强国之路。可以说在我国,具有坚定和共同政治信仰的党员,是成为合格社会治理主体的前提条件。

除此之外,作为党员的公民个人要成为合格的社会治理主体之一,还有必要确立明确的法治观念。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归纳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般认为,其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这一概括当然是精僻的,但可以补充的是,“法治”不仅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

同样也是对现代社会合格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诉求之一,其重要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社会,不仅掌握政权的执政党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行使公共权力,参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依法参政议政,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在法律框架下开展各类赢利性和非赢利性活动,如我国1982年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公民个人更要具备法律观念,不仅要守法,更要懂法、知法、用法,要有借助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解决各类争端的鲜明意识。党员之间的思维模式、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甚至有分歧冲突,这并不重要,但大家都要有遵守法律、依法处事的法治观念,这才是最重要的。显然,只有具备较强法律意识和素质的公民,再加上爱国、诚信等,才可能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治理主体之一。

正因为如此,民主党派和广大党员可以携手共进,既通过政治学习、党史教育帮助广大党员形成坚定的政治共识和政治信仰,又通过建设学习型政党,不断提高民主党派成员自身素质,尤其是提高全体党员的法治意识和观念,并培养和促进党员确立牢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并使得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上进一步生根开花,成为更多普通民众的共识。长此以往,当讲法治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当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成为大多数人的道德立足点,就意味着组成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公民个人正在越来越成为合格的社会治理主体之一。

[参考文献]

- [1][美]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陶行知.陶行知文集[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光 翟)

视差关联下的蒲鲁东与马克思

——重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的本质”概念

周秋明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1840年法国学者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揭橥了人的三层级“社会性”: 交感、平等、公道, 结合1845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人的本质”的诠释, 阅读者可以构拟出文本观念之间的视差关联: 马克思提出“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维度, 是经由反省、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观呈现的, 而蒲鲁东的“社会性”分析恰与费尔巴哈哲学具有明显同质性。此外, 德文《提纲》取用蒲鲁东文本中同一法文词汇“总和”, 也遗下后者作为背景激发的可能空间。

[关键词] 蒲鲁东; 人的本质;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视差; 构拟

[中图分类号] B5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25-04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者卡尔·马克思的深度探索, 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凝集了作者对于德国“同仁”摩西·赫斯(Moses Hess)、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不同程度的借鉴、超越。然而标志马克思在学术思想领域走向完全独立、成熟的第一步, 则在随后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 亦即恩格斯称道“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P.213)}所论定。

究《提纲》其十一条的思想独立性、成熟度, 阅读者可从多重角度阐释, 但无论如何不容疏忽的一点是: 马克思在第六条中首次指认“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例如弗·伊·列宁——由于他对此的重视——便这样说到: 《神圣家族》提及“实物是为人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 是他对他人的关系, 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3](P.52)}, 这一段叙述“极有特色, 因为它表明马克思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这样

说的话)的基本思想——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4](P.13)}。

新思想来源于新地平的开拓, 因为后者提供了思辨与实践问题的新视域。以往我们对于《提纲》中“人的本质”概念的“社会关系”维度, 主要是从直接语境——德国古典哲学的清算来论述, 至多根据马克思写作《提纲》前后的文本之间承递关系, 声称是其“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哲学解悟”^{[5](P.367)}。笔者兹将抽离主体性解读, 提供一种新视角, 发掘、构拟与马克思同时期的法国学者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 - Joseph Proudhon)和《提纲》的特殊象征关联。

一、人猿相揖别

1840年《什么是所有权》(Qu'est - ce que la Propriété ?)出版, 该书日后被马克思称为蒲鲁东“最好的著作”^{[6](P.613)}。但是, 我们可以从1865年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之邀所作《论蒲鲁东》一文, 完整地洞悉两种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

[收稿日期] 2015-08-10

[作者简介] 周秋明, 男, 江苏镇江人,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

的根本差异:前者具有明显的历史感,并对现实形态进行批判;后者陷于意识形态的抽象之中,并且批评只是指向概念。

如果仅仅固执于文本的直白“言说”,其思想“书写”的开放性或许就会被封闭。尽管由于《什么是所有权》的主体部分(第二、三、四章)政治、经济分析话语的含混、矛盾,不能给予马克思积极、实质的理论支撑,却并不意味着该书的潜在背景意义(尤其从读者的角度)也告阙如。事实上,在第五章(末章)“正义和非正义观念的心理学的解释”的第一部分,蒲鲁东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性”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与马克思“天才”《提纲》的(决非单纯“外在”的)关联。

关于“人的本质”概念的思考,是一个亘古悬疑的话题。踪随 1840 年蒲鲁东的解释路径,为探讨人、兽之间智慧的界限,他揭橥了人的三层级“社会性”:第一、交感的吸引力;第二、平等的正义性;第三、差异的人道化。

交感,是出于同类的本能,所以群居动物也照样具备。平等则是理性的考量,人在协作中存身发展,故而衍生了一视同仁的需要。动物界固无平等的观念,却似乎不乏正义性,当然“除了保护它们的崽子,结群猎取和掠夺食物、共同防御以及有时作个别的援助以外,它的内容与其说是积极的行动,还不如说是消极的预防”^{[7](P.251)}。

最后(在蒲鲁东看来),造成人与禽畜泾渭分别的根本是前者的“人道”(humanitas)。那是一种承认人的才能、禀赋差异的“公道”,它“知道怎样不让任何人感到羞辱而把等级、德性和才能区别开来:这就是社会同情和普遍的爱的合理分配”^{[7](P.255)}。换言之,便是根据对方的不同才干确定自己的情感立场,蒲鲁东的具体规划是:对强者给予尊敬、对弱者付与帮助、对相当者互以友谊。

正是这种对差异性的默认,反而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正义”,因为尊敬拒斥了奴役,帮助填补了鸿沟,友谊建立了亲近。蒲鲁东认为,“人道”源自人们之间复杂、内含差异和分化的联合方式,相对禽畜彼此简单、无差别的联合方式,或许有无差异性的情感才是确立人、兽界限的最终因素。

再考察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学理研究,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 1879 年《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严谨的治学作风使得他一直在思想层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1845 年《提纲》第六条的“社会关系”维度,实际上只是提供了阶段性而非终极的诠释。即便如此,初创期的“萌芽”将让我们领略马克思同其早年论友蒲鲁东之间的文本性关联。

二、气象两相高

学界公认,1845 年春于布鲁塞尔写成的《提纲》是一份标志马克思理论成熟的文献。根据文本的互文性阅读,我们会发现其所以言“成熟”,不在政治立场(早先一、二年便已明确)、亦不在核心思想(尚待一、二年构建基础),而是由于获得了独立方法论的自觉性。

所谓“独立”,即是舍弃支撑者的引向;称述“自觉”,当对先前理路重新审视。《提纲》的重大价值就在于:马克思通过反省四十年代初期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以降所持“人本主义”抽象逻辑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影响,首次正面批判了这一思潮的认识论、人性观。

第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潮的“直观”认知得到马克思的彻底扬弃。新的唯物主义将认识对象视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2](P.54)}的各种要素,这就隐含了历史主义的方法。从此,抽象概念(范畴)的客观性论证丧失了合法性,因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2](P.55)}。

第二,“人本主义”思潮的“个体”人性遭遇马克思的“关系”置换。费尔巴哈以抽象的个人为前提,虽然也意识到社会整体的话语平台之根本性,却只能从“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即空洞的社会维度探讨问题。马克思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P.56)},据此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则构成“人的本质”,从而展示出全新的视域——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维度。

蒲鲁东与此的关联就在于:前述三层级的“社会性”正落入费尔巴哈式社会维度的窠臼。基于本能的交感的吸引力难道不是“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精神因素吗?看看蒲鲁东的举例

吧：“吃奶的孩子把每一个男子当作爸爸，把每一个女人当作奶妈；每一个活着的生物在被剥夺了同类动物的往来时，竭力想找一个和他同过孤独生活的伴侣。”当他继续喋语：“这种程度的社会性是在我们看到一个和我们同类的生物时从内心产生的一种吸力”、“它可能是彼此都有的，但不能互相沟通”^{[7](P.245)}，岂非与费尔巴哈托出的“内在的、无声的”人性殊途同归？

对于平等的正义性，蒲鲁东认定是普遍的人性：“如果没有平等，无论商业、工业或农业的任何协作都是不能想象的”，“侵犯协作关系就是侵犯正义和平等。你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于整个人类”^{[7](P.248)}。可是，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看来，产业的协作恰是人类实践的客观需要，平等和正义的概念难道不是从这样的实际要求之中酝酿的吗？与其将平等视作内蕴的人性，不如说它是人和外界的交往活动产生的诉求。

《提纲》第六、七两条指出：费尔巴哈把“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即“感情”视为“人的本质”，而忽视了“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2](P.56)}，这样的批评对于蒲鲁东仍旧适用。脱离了实践及其需要的平等概念是抽象的，将这样的概念赋予人，也就使人由感性、具体的个人变成苍白、抽象的个人。以平等为普遍性的个人只能是现代生产（协作工业）和交换（商业经济）“关系”的结果，他不过是现代“社会形式”里所涉“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蒲鲁东郑重呼吁：“哲学在从对上帝的观念中把迷信归诸上帝的人类情欲删去以后，还须从其中把我们那些由于深厚的敬意而赋与上帝的德性一并删去”^{[7](P.258)}。这不禁令人想起，一年后（1841年）费尔巴哈发表《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在剥去宗教的神学面纱的同时，指认了宗教的人本学本质：当“人们使感情成为宗教的主要东西以后，基督教的曾经是非常神圣的信仰内容，就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了”^{[8](P.39)}。

在蒲鲁东，最高级别的社会性（即差异的人道化）划清了人、兽关隘，宽宏、感激和友情“是单一感情的三种不同的色调，我把这种感情叫做社会的公道或社会的相称性”^{[7](P.255)}。这种感情虽没

有被装裱成宗教，但是参读费尔巴哈的阐述：“你相信爱是上帝的属性，因为你自己也在爱；你相信上帝是一个智慧的、仁慈的存在者，因为就你自身来说再也知道有什么比仁慈和智慧更好的了”^{[8](P.49)}，不也是观照蒲鲁东的心声？不也和他一样，将教义中至上的“正义、公道和爱”交还同类之间的“社会情感”^{[7](P.258)}吗？二者难道没有抹上同样的伦理底色？回看《提纲》第四条：“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2](P.55)}，马克思何止单单“言说”费氏，分明“书写”出两位学者的共同事业——建立在抽象人性观之上的爱的唯物主义。

他们关于爱的哲学（蒲鲁东的“社会情感”、费尔巴哈的“宗教感情”），多半只有语辞上的区别。当蒲氏说：这种情感“是我们的辨别能力和理想化能力的混合产物”^{[7](P.256)}；费氏说：“人的本质”要求“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那“就是世界史的枢轴”^{[8](P.350)}，根基都不外马克思所批评的：“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2](P.56)}。对“人的本质”概念的探究，（生产实践、交往关系中）具体个人的社会维度之遮蔽，来自历史感的缺失，更源于对“理想化”爱的“独立”推崇。

三、一痕沙

上节对三层级“社会性”的剖析，已然表明蒲鲁东与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概念上的哲学同质性：生物学的自然主义、抽象范畴塑造的个人、爱的情感升华。经由对以费尔巴哈为主要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提纲》便在我们的阅读中构拟了蒲鲁东与马克思的思想视差关联：蒲鲁东作为材料的给予者、马克思作为能动的扬弃者。

在真实性不能确定之时，构拟具有内部解析和实际运用方面的重要价值，例如失传古音的拟测等。这里形成的视差亦是如此：避开字面的实存，发掘文本之间的观念联系，也可以说是搁置作者（“言说”者）的主体性，建立读者（“书写”者）的象征界。当代法国文本学巨擘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提出：“被说出或被记录下的言语，即字母”，“总是敞开的。它从不属于它的作者”，“这个能指在我之前独自地说着一切，远比我

以为要说的多得多”^{[9](P.322)}。在他的视野里,我们只有做创造性的“书写”者,才能收获更丰。

不过,蒲鲁东有可能在1845年马克思的真实视域之中吗?依据《提纲》:“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2](P.54)}、“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2](P.56)}、“旧唯物主义”^{[2](P.57)}诸语,似乎并没有否定这一可能性的空间。

然而,这并非正面、肯定的回应。通过文本的直面,我们可以察觉和指明的一点是:原文为德文的《提纲》,在第六条阐述“人的本质”应当被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das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总和”一词兀然在马克思的笔下变成了法文 *Ensemble*。如果我们再引入法国作者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里的一段话:“人是一种过着社会生活的动物。社会意味着各种关系的总和,总之就是体系”^{[7](P.240)},其原文(*L'homme est donc un animal vivant en société. Qui dit société dit ensemble de rapports, en un mot système.*^{[10](P.176)})中也采用 *ensemble* 一词,至此《提纲》出现法文词汇的“偶然性”解释或许就要被削弱其说服力。

笔者无意假设由一个词汇虚拟的直接“言说”的场景,但是在马克思的主体轨迹中,包含《什么是所有权》在内的法国学者的哲学文本作为不在场的背景、习得性无意识的自然“激发”,作为思想

沙尘的卷入留痕,则是目前可以提供的一种粗略的诠释。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4] 列宁. 列宁全集(第55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5]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法]蒲鲁东. 什么是所有权[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8] [德]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9] [法]雅克·德里达. 书写与差异[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 [10] P. - J. Proudhon. Qu'est - ce que la Propriété ? [M]. Paris: 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1867.

(责任编辑 光 翟)

无敌之阵里的新故事^{*}

——论贾平凹的《怀念狼》

张晓琴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通过一个知识分子高子明的视角讲述一个与狼有关的新故事。表面看来,小说似乎在写生态,实际上则充满了隐喻与象征,现代文明就是一个无敌之阵,带来了生命的萎顿,当狼彻底消失后,人也被异化,变成了人狼。贯穿小说始终的是作者对于来自民间大地的生命力和文化的肯定,以及对于现代文明的隐忧。

[关键词] 《怀念狼》; 生命; 叙事; 民间

[中图分类号] I206.7;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29-04

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中举了那个著名的“狼来了”的故事来说明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紧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1](P.4)]新世纪之初,贾平凹却讲了一个全新的“狼来了”的故事,并让狼真的出现,实在是一个关于狼的故事的新讲法。

自古至今,有关狼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贾平凹之所以选择狼,“正因为狼是以一种凶残的形象存在于人的印象中,也恰恰是狼最具有民间性,宜于我隐喻和象征的需要。人是在与狼的斗争中成为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了惶恐、孤独、衰弱和卑鄙,乃至死亡境地。怀念狼是怀念着勃发的生命,怀念英雄,怀念着世界的平衡”^[2]。《怀念狼》的故事发生在商州,讲故事的人“我”,却是个从大城市到商州的知识分子高子明。小说一开始,高子明对城市生活产生了十二分的厌倦,“岂

止是商州,包括我生活的西京城市,包括西京城里我们那个知识分子小圈子里的人人事事,任何题材的写作都似乎没了兴趣”^①。所有的景象都呈现出城市人生命的萎顿。“清晨对着镜子梳理,一张苍白松弛的脸,下巴上稀稀的几根胡须,照照,我就讨厌了我自己!遗传研究所的报告中讲,在城市里生活了三代以上的男人,将再不长出胡须。看着坐在床上已经是三个小时一声不吭玩着积木的儿子,想象着他将来便是个向来被我讥笑的那种奶油小生,心里顿时生出些许悲哀。”最悲哀的不是这些,而是“气仍是不打一处地来,但我该骂谁呢,无敌之阵里,我寻不着对方”。这是一个无敌之阵,是一次没有敌人的战斗。贾平凹有意无意间道出几个字:“我寻不着对方”,人没有对方就失去了向上的力量。在一个寻不着“对方”的世界里,生命就只能继续走向萎顿,“我的生命也从此在西京坠落下去”了。“是狼,我说,激起了我重新对商州的热情,也由此对生活的热情,于是,新的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部生态文学研究”(项目编号:09XZW014)。

[收稿日期] 2015-12-23

[作者简介] 张晓琴,女,甘肃靖远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① 所引小说内容皆出自贾平凹的《怀念狼》,作家出版社,2000年。

故事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发生了”。于是,一个无敌之阵里的新故事开始了。

这个新故事是有关生命的萎顿的故事。小说中人与狼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内容。狼是凶残的,它们居然可以攻陷城池。在商州南部,“匪乱和狼灾毁灭了一个县城,而其中的某个家庭遭受了悲惨的命运,翻开商州南部各县的志书,这样的例子几乎随处可找。”“我”的舅舅傅山就是一个世代受狼所害的家族的后代,他怀着一颗复仇的心当上了猎人,并且成为一名出色的猎人——商州捕狼队队长,半生杀狼无数。但舅舅在四十二岁时失去了捕狼的权利,担任起了普查商州狼的数量的任务。失去了打猎权利的人竟然同时得上一怪病,精神萎靡,浑身乏力,视力减退,脚脖子手脖子发麻,日渐枯瘦。所以,当傅山遭到一只狼的羞辱后,终于再次穿起了猎装,背上猎枪,带上猎狗和护身纸符出门,准备再次去一趟商州真正的狼窝看看,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接下来的故事可简单概括为:傅山打死了商州境内仅存的十五只狼,却比此前更加萎顿,最后和故乡的人一起变成了人狼。

“上帝创造了人的同时也创造了众多的生命,若上帝的子孙们都死了,上帝将不再护佑我们。人的生存不能没有狼,一旦狼从人的视野中消失,狼就会在人的心中依然存在。这部小说肯定是隐喻和象征的,隐喻和象征是人的思维中的一部分,它最易呈现文学的意义。”^[2]显然,《怀念狼》中的狼具有强大的隐喻功能。狼曾经是人在自然中的敌人,有狼时,人的生命力是相当旺盛的,有狼,人在自然中就有了“对方”,一旦狼灭绝,人就生活在一个无敌之阵里,生命力自然日渐衰落,最后被异化,彻底萎顿了。贾平凹笔下人与狼的复杂关系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派与老虎 Richard Parker 的关系极为相似,当然,这只老虎也是个隐喻。人一旦孤独地存在于世界,生命力便会退化。大自然的生物链一旦破坏,人作为其中之一员生存必定受到影响。《怀念狼》中不止一次出现因为狼的减少,黄羊的数量增加后对庄稼的严重破坏,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在这个时候,人们就会想起狼的好处,想着“狼怎么就不来吃了这些祸害”。

对于狼来说,生态系统的恶化使它们的生存困难重重,而对于人来说,没有了狼,就没有了对

手,没有了对手,就没有了英雄,小说中的傅山当猎人时是出色的,受人尊敬的,是真正的英雄。但狼越来越稀少,竟然成了商州的保护动物,于是,傅山的英雄身份的存在意义被彻底解构,他的精神马上溃败下来,这个为狼而生的人竟然遭到了狼的嘲弄。开始寻找狼后,傅山其实是开始了重新确立自己英雄身份的过程,他终于打完了商州境内最后的十五只狼,这时,他真的无狼可猎了,与雄耳川人一起变成了人狼。一个英雄就此不但失去了英雄身份,更失去了做人的可能。

贾平凹关注的不只是人类的生命的萎顿,还有自然中各种生命的退化。“我”听了大熊猫繁殖的艰难后大为震惊,首先想到了狼,接着就想到了人,人类有一天会不会也沦落到这种境地呢?“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一种恐惧,加入了大熊猫生产基地的施德的小组,并详细地记录了一只名叫“后”的大熊猫的生产过程。贾平凹花了大量的笔墨像科学家一样对大熊猫的生产进行了观察记录式的描述,他借专员之口说:“大熊猫之所以成为国宝,就是因为它逐渐失去了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缺少性欲,发情期极短,难以怀孕,怀孕又十分之九难产。你想想,现在人越来越多,森林覆盖面积越来越少,原本对狼的生存带来了致命的危机,若要继续捕猎下去,终有一天狼也会同大熊猫一样的,所以我们颁发了禁止捕狼的条例。”雷达说:“整个九十年代,贾平凹都在思索生态问题,他的人物无不处在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这双重危机之中。”^[3]显然,在贾平凹看来,生命萎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贾平凹此前的商州系列小说塑造出一个文学的商州世界,《怀念狼》中却以一种毁灭性的姿态呈现出一个生存与精神双重困境的商州。这种对现代文明的警惕与沈从文极为相似。沈从文自称乡下人,贾平凹自称农民,在与李遇春的对话中,贾平凹说:“沈从文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在文体,至于文化立场,则是我能理解他,认同他。”^[4]这种文化立场包含了对现代文明的排斥和对传统文明的留恋。

新的故事里还包含了捕狼队所到之处,野物要么闻风而逃,要么纠集报复的一幕幕壮烈又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原本是在民间传颂,现在却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我”的亲眼所见。故事中所有的生灵都拥有人一般的灵气,“我”顺手掐掉一株

月季花茎,那整个月季剧烈地摇动,断茎变粗变黑,盛开的花朵紧缩,花瓣一片一片脱落下来。商州人祖祖辈辈痛恨的狼也有报恩之心,它们力所能及及报答自己的救命恩人老道士。而相比之下,世上的有些人却丧失了为人的善良与人性。《怀念狼》中有两个动物形象贯穿始终,一个是傅山的狗富贵,一个是烂头的猫翠花,它们非常有灵性。富贵与主人一样,不打猎就萎靡不振,一打猎就精神抖擞,能看主人的眼色行事。一个细节是,傅山要离开,烂头却不想走,富贵用嘴叼了铺盖卷就走。而翠花总能在主人头痛时给主人挠头,安慰主人,当狼藏在缸里时,翠花能及时发现,避免灾难的发生。

小说中的人和动物可以相互幻化。这样的观点在贾平凹此前的小说中出现过。《废都》中的智祥大师夜里静坐禅房忽有觉悟,自言道如今世上狼虫虎豹少,是狼虫虎豹都变了人而上世,所以丑恶之人多了。《怀念狼》中的狼变成杀了四十八个半人的尤文,变成推自己的孩子撞车诈钱的郭财,最为奇幻的是,他们死后又可以复归为狼。傅山杀死二号狼时,它的魂又附入人体成为新的婴儿,一出生就浑身是毛,嘴里还长着牙。不但狼和人可以互相幻化,其他的生灵也同样可以与人互相幻化。小说中让人难忘的是山区集市上,一个美丽的金发女人叩谢傅山的情节。在山区的四月是没有桃子的,金发女人却从怀里掏出两个大而红润的桃子谢傅山。傅山一时想不起她是谁,却因为一根断了的中指想起这个女人是一只金丝猴,曾经被傅山救过,变成一个女人来报答他。“我”不由感慨:“这次进商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太多,但令我思维发生改变的莫过于野兽是可以以人的面目出现。”这呼应了“我”在小说一开始对生命的追问:“万事万物都是有着生命和灵魂吗?遂想:所谓的灵魂本来是什么?奶奶生前常说的轮回又是什么?……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都平等,我这一世是人,能否认上一世不是猪吗,而下一世呢,或许是狼,是鱼,是一株草和一只白额吊睛的大虎。”

说到“我”,不得不说贾平凹在《怀念狼》中的叙事立场问题。“我”是个知识分子,讲新的故事的人是“我”,“我”却以知识分子的叙述视角传达出一种民间的生命观和对现代文明的隐忧。“我”

的生命力不旺盛,脸上胡须很少,在城市里还好,“我”的妻子喜欢白净的男人,但“我”自己不喜欢,并且为未来城市里的男人不会长出胡须而悲哀。到了商州山区,“我”因为没有胡须遭到山民们的嘲笑,“我”第一次为我的奶油面色和没有胡子感到了羞耻。有关胡须的不同看法也是个隐喻,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不同,也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的不同。“我”与舅舅傅山在许多事情上的不同观点其实是知识分子与民间两种话语系统的不同,我带舅舅看流星雨的时候,“我”只是把流星雨当作一种千年不遇的自然奇观来看,并且拍摄照片,傅山却紧张地发抖,在他看来,“天上一颗星,地上就要死一个人的,这么多的星星在落哩,这是要发生什么灾难吗?”“我”在疑惑中想,天上的星星在这个时候雨一样落下,预示着一种什么灾难呢?“这是舅舅他们神经质了呢还是我们身心麻木?!”紧接着,“我”果然看到了接二连三发生灾难,果然死了许多人。

事实上,“我”对民间的生命力和民间文化的喜欢是显而易见的。最初和穆雷,也就是烂头认识时,烂头大声叫嚷的说话劲让我喜欢。后来,当烂头带着猫加入行动时,烂头为自己的猫的名字费了神,最后给这只母猫起名叫翠花。富贵和翠花是厮配的,虽然没有生猛的气象,但民间俗味很浓,凭这一点,“我”越发喜欢烂头了。“我”喜欢的就是烂头身上的民间俗味,这也是知识分子对民间的偏好。“我”想了解狼时,就抱回了一堆有着狼的故事的小说。重读《聊斋志异》的一些章节,读鲁迅的《祥林嫂》、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却遭遇到了来自舅舅的狼皮的异样动静。“我”想给商州山区最后十五只狼拍照立档案,但最终没有成功。当然,“我”也看到了民间的残酷与血腥,割活牛肉吃的,喝蛇血的,甚至卖淫赌博的。“我”跟着舅舅回到与我的血脉有关联的舅舅的故乡雄耳川,最终却因为和故乡的人对狼的观念不一致而遭到了驱逐。“我”从民间学来了一首葬礼上的孝歌,贾平凹在书里把这首孝歌用简谱的方式写了下来,并在老道士死后唱给了老道士。“为人的在世喂,哎什么好喂,说声死了就死了,亲戚的个朋友都不知道哎……”悲凉的调子反复回旋,使得这部书不仅仅是一个怀念狼的故事,更是一个对逝去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哀悼的故事。哀悼人也就是

唱孝歌的人其实是一个向往民间却又不能回归的知识分子,“我”回雄耳川的失败经历就是知识分子无处可去的隐喻。

隐喻之外,贾平凹在这部书中更多运用了魔幻的叙述手法。一个具有魔幻性质的符号是金香玉,舅舅的金香玉来自红岩寺里的老道士,而老道士的金香玉则来自狼,他救过狼,狼为报恩就送金香玉给老道士。小说中动物与人的变幻、动物寻常的灵性、山里埋了多少的古时军队的喊杀声仍然时时作响、老道士与狼的和平共处、狼的感恩、相机关键时刻莫名其妙地出毛病……无一不具有魔幻性质。“必须承认,从题材的选取、思路的转换、意境的独特、人物的怪诞、情事的奇异以至在文字的运用上,《怀念狼》都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3]贾平凹欲借狼来匡时济世,拯救人类,这是一种抽象精神的呼唤,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某种魔幻的气质。

贾平凹借魔幻的手法让“狼来了”的故事以新的面目上演。“我的记忆深处出现了在上小学时读过的那篇《狼来了》的故事,是一个放羊的孩子在高高的山上恶作剧地喊:狼来了——”这个故事里,狼真的来了,它们原本可以躲进深山老林里更安全的地方,但是,它们来到了雄耳川,以一种自杀式的悲壮姿态,引来人类的杀伐,全军覆没。这是全书的结局,也是全书的高潮部分。雄耳川人对狼的恐惧与期盼,狼和人双方的仇恨与斗争,天

上下起了疯狂的大雨,而人却不停止对狼的猎杀,狼变幻成老者,变幻成配种站的猪,但最后无一幸存。“我”也在子夜时分离开了雄耳川。这个时候,再也没有狼了,“我”要为狼建立档案而成为了不起的摄影家的幻想破灭了,将在省城里更加百无聊赖了。“舅舅从此将真真正正地不是了猎人,同施德主任他们一样,他活着的意义又将在哪里呢?这个时候,在我的心里,我也感觉到在舅舅的心里,我们都是在真切地怀念狼了。”在小说结尾处,“我”像古老的“狼来了”的那个故事里的孩子一样呐喊,不同的是,那个孩子喊的是“狼来了——”,而“我”喊的是“可我需要狼!我需要狼——”。

[参 考 文 献]

- [1][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A]. 文学讲稿[M]. 申慧辉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 [2]廖增湖. 贾平凹访谈录——关于《怀念狼》[J]. 当代作家评论,2000(4).
- [3]雷达. 长篇小说笔记之五——贾平凹《怀念狼》[J]. 小说评论,2000(5).
- [4]李遇春,贾平凹. 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贾平凹访谈录[J]. 小说评论,2003(6).

(责任编辑 刘敏慧)

世人对元稹生平的误解

吴伟斌

(江苏古籍出版社, 江苏南京 210036)

〔摘要〕 元稹一生,在唐代及对后世的影响都十分深远。但世人对元稹的诗文及其生平,解读常常十分随意,因此也存在诸多误读与误解,如伪造白居易的《论请不用奸臣表》、胡说白居易与元稹“隙终”云云,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关键词〕 元稹; 生平; 诗文; 误读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33-08

笔者近年在撰著《元稹考论》《元稹评传》与编著《新编元稹集》的过程中,发现元稹的诗文及其生平常常被误读被误解。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篇文稿,仅仅是我们近期推出的二十多篇拙稿之一,意在就教于当今的智者与贤达。

一、《论请不用奸臣表》的真正作者绝不是白居易

长庆元年,当时有人为了坐实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元稹排挤裴度的所谓罪行,特地借用元稹生前死后都是最要好朋友白居易的名义,伪造了一篇《论请不用奸臣表》的奇文,笔者不敢断章取义,故而全文过录,共同欣赏:

臣某言:臣闻主圣臣忠,圣主既明,臣辄献至忠之诚,上理国之典,下去邪之疑。伏望陛下纳臣之谏,则海隅苍生兵屯咸偃。无大臣之谏则国必败,有大臣之谏则国必安。非元稹之愆,其事有实,亦不虚矣!矫诈乱邪,实元稹之过。朝廷俱恶,卿士同冤。裴度论议之谋,陛下已令奖度之勋。不允所请,理已为乖。今陛下含忍不为窜逐,处之台司,同议国典,天下人心无不惶战。何执元稹之言,居度散司之职?且同议裴度,今功业今代一人,卿侯士庶无不同惜。今天下钦度者多,奉稹

者少。陛下不念其功,何忍信其奸臣之论?况裴度有平蔡之功,元稹有器轩之过。东都留守诚即清闲,大劳之功,不合居于散地。伏望陛下圣恩照明,并无矫言,伏乞追裴度别议宠荣。臣素与元稹至交,不欲发明,伏以大臣沈屈,不利于国,方断往日之交,以存国章之政。臣等职当谏列,不敢不奏。谨奉表以闻,无任兢迫战切之极。瞻望回恩,天下同庆(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文苑英华》卷六二五)。

顺便说明一下,《文苑英华》在卷六二五中,以“论请不用奸臣表”为题,分别编入裴度弹劾元稹的《论请不用奸臣表》、《第二表》以及署名“白居易”的《同前》三文。而《旧唐书·裴度传》有“继上三章,辞情激切”(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旧唐书》卷一七〇)之言,然而查阅现存古代文献,裴度弹劾元稹的奏表,只有《论请不用奸臣表》和《第二表》两文,始终未见第三文。我们以为:所谓的“白居易”《论请不用奸臣表》,肯定是出自裴度同党之手,所谓的“继上三章”,不完全是出自裴度一人所为,也应该包括这一篇奇文在内,一共三篇。史传“继上三章”的记载虽然不误,但表达不清,容易引起后世读者的误会。

撰写《论请不用奸臣表》作者的用意十分清

〔收稿日期〕 2015-12-09

〔作者简介〕 吴伟斌,男,江苏吴江人,原江苏古籍出版社编审,主攻唐代文学研究。

楚,那就是竭力劝说唐穆宗重用有“大劳之功”的裴度,“乞追裴度,别议宠荣”;不让元稹“处之台司,同议国典”,而是应该毫不犹豫地“窜逐”元稹。作为一名“职当谏列”,亦即拜领皇禄的朝廷官员,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已经是严重的失职,更为可笑的是无视元稹与白居易至死不渝的友谊,竟然敢冒用白居易的名义,胡说什么“臣素与元稹至交,不欲发明,伏以大臣沈屈,不利于国,方断往日之交,以存国章之政”。据《旧唐书·白居易传》,长庆元年前后,白居易先后任职司门员外郎、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旧唐书》卷一六六),与“职当谏列”的左右拾遗、左右补阙没有任何关系,而造假者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胡说白居易“职当谏列”。造假者用心之恶毒使人愤恨,而他們所用伎俩之拙劣又令人捧腹。

正因为如此,所以宋人彭叔夏《文苑英华辩证》云:“白居易《请不用奸臣表》:按:《表》言元稹尚居台司,裴度为东都留守事。又云:职当谏列。然元白交分,始终不替。方元倾裴时,白亦不在谏列,而本集亦无之。”(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文苑英华》卷六)

《文苑英华》也在“白居易”此文之后引述他人之言云:“元白交分,始终不替。方元倾裴,白不应有此论列,《集》固无之。光谓君直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古有行之者,则此奏亦不为过,但白非其人也。与元稹二表俱非是,当以《唐书》为正。”(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文苑英华》卷六二五)而所谓的“元稹二表”是指《文苑英华》卷六二五之《论裴延龄表》以及紧随其后的《同前》,亦即《又论裴延龄表》,均署名“元稹”。其实“二表”是冒名“元稹”而弹劾德宗朝奸臣裴延龄之作,编者的粗疏于此可见一斑。笔者曾在《文学遗产》1986年第5期发表《元稹与永贞革新》一文,文中已经论及“元稹二表”同样是冒名之作,此不重复。

无独有偶,还有一篇千古奇文:《李德裕相公贬崖州三首》也是冒用白居易之名,虽然诽谤的对象不是元稹,但无中生有的手法则完全相同。其一:“乐天当任苏州日,要勒须教用礼仪。从此结成千万恨,今朝果中白家诗。”其二:“昨夜新生黄雀儿,飞来直上紫藤枝。摆头撼脑花园里,将谓春光总属伊。”其三:“田园不解栽桃李,满地唯闻种

蒺藜。万里崖州君自去,临行悵悵欲冤谁?”(文渊阁《四库全书》之《麈史》卷二《诗话》)

宋代王得臣所撰《麈史》,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为“其间参稽经典,辨别异同,亦深资考证,非他家说部惟载琐事者比”之作,其卷二载后人的驳斥云:“令狐先生曰:唐白傅以丞相李德裕贬崖州为三绝句,便不免世人訾毁。予以谓诗三百皆出圣贤发愤而为,又何伤哉!后尝语于客,会安陆令李楚老翘叟在坐上,曰:‘非白公之诗也!白公卒于李贬之前。’予因按唐史,会昌六年白公卒,是岁宣宗即位。明年改元大中,又明年李贬。盖当时疾李者托名为之,附于集。诗曰:‘……’予观其词意鄙浅,白为杂律诗讥世人,故人得以轻效之。”(文渊阁《四库全书》之《麈史》卷二《诗话》)

《渔隐丛话后集》亦云:“会昌之初,李文饶用事,乐天适已七十,遂致仕,不三年而没。嗟夫!文饶尚不能置一乐天于分司中邪?然乐天每间吟衰病,发于咏叹,辄以公卿投荒僇死,不获其终者自解,余亦不鄙之。至其闻文饶谪朱崖,《三绝句》刻核尤甚。乐天虽陋,盖不至此也。且乐天死于会昌之初,而文饶之窜在会昌末年,此决非乐天之诗。岂乐天之徒、浅陋不学者附益之邪?乐天之贤,当为辨之。苕溪渔隐曰:‘余以《元和录》考之,居易年长于德裕,视德裕为晚进。方德裕任浙西观察使,居易为苏州刺史,德裕以使职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卑礼见。及其贬也,故为诗云……然《醉吟先生传》及《实录》皆谓居易会昌六年卒,而德裕贬于大中二年,或谓此诗为伪。余又以《新唐书》二人本传考之:会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政,六年卒;李德裕大中二年贬崖州司户参军,会昌尽六年,距大中二年正隔三年,则此三诗非乐天所作明甚!但苏子由以谓乐天死于会昌之初,而文饶窜于会昌之末,偶一时所记之误耳!’”(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三)

《韵语阳秋》亦云,“白乐天作《八渐偈》云:‘苦既非真,悲亦是假。’则世间悲欢人,我必能忘情。始宪宗欲以乐天为刺史,王涯以资浅为言,遂得江州司马。及涯败,作诗快之,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句。李德裕于乐天不见有隙,德裕贬崖州,亦作三绝快之……盖尝以唐史考之,乐天卒于会昌之初武宗时也,而德裕之贬乃在宣宗大中年,则德裕之谪,乐天死也久,非乐天

之诗明矣！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文渊阁《四库全书》之《韵语阳秋》卷二〇）《诗话总龟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之《诗话总龟》卷一五）也有同样的记载，不再重复引录。

也许，白居易生前已估计到他人会如此作贱他与元稹之间这种真挚的友情，估计到有人会千方百计造假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故他在晚年亦即会昌五年所写的《白氏长庆集后序》里详细介绍了自己文集的卷次以及收藏五处的情况，最后郑重地声明：“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会昌五年夏五月一日乐天重记。”（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香山诗集》之《白氏文集自记》）

《论请不用奸臣表》、《李德裕相公贬崖州三首》今天不见于《白氏长庆集》，白居易的严正声明充分说明：《论请不用奸臣表》、《李德裕相公贬崖州三首》是彻头彻尾的伪作，不仅不可信从，而且应该从这两篇作假的奇文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清元稹、李德裕对立面的卑劣嘴脸。如果他们真正掌握了元稹勾结宦官、李德裕飞扬跋扈的过硬证据，完全可以拿出真凭实据，举奏元稹的罪恶和李德裕的恶罪，又何必以如此卑劣的手法假名白居易来诬陷元稹与李德裕呢！

二、“元白隙终”是史实还是诬言

孙光宪《北梦琐言·白太傅墓志》：“白太傅与元相国友善，以诗道著名，时号‘元白’。其集内有诗挽元相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后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洎自撰《墓志》云：‘与彭城刘梦得为诗友。’殊不言元公，时人疑其隙终也。”（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北梦琐言》卷六《白太傅墓志》）

类如的记载又见《唐语林》（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唐语林》卷六《补遗（起德宗至文宗）》），文字虽然不尽相同，但“元白隙终”的结论则与《北梦琐言》相同。

事实究竟如何？且不论白居易情真意切的《唐故武昌军节度使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七〇），也不谈声泪俱下《祭微之文》（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六九），笔者请再以元稹病故之后白居易的部分诗歌为例：《哭微之二首》，其一：“八月凉风吹白幕，寝门廊下

哭微之。妻孥朋友来相吊，唯道皇天无所知。”其二：“文章卓犖生无敌，风骨英灵歿有神。哭送咸阳北原上，可能随例作灰尘。”（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二七）《寄刘苏州》：“去年八月哭微之，今年八月哭敦诗。何堪老泪交流日，多是秋风摇落时？泣罢几回深自念，情来一倍苦相思。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二六）《览卢子蒙侍御旧诗多与微之唱和感今伤昔因赠子蒙题于卷后》：“早闻元九咏君诗，恨与卢君相识迟。今日逢君开旧卷，卷中多道赠微之。相看掩泪情难说，别有伤心事岂知？闻道咸阳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三六）《醉中见微之旧卷有感》：“今朝何事一霑襟？检得君诗醉后吟。老泪交流风病眼，春筵摇动酒杯心。银钩尘覆年年暗，玉树泥埋日日深。闻道墓松高一丈，更无消息到如今。”（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三九）《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三五）《闻歌者唱微之诗》：“新诗绝笔声名歇，旧卷生尘篋笥深。时向歌中闻一句，未容倾耳已伤心。”（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三一）《微之敦诗晦叔相次长逝岿然自伤因成二绝》，其一：“并失鸛鸾侣，空留麋鹿身。只应嵩洛下，长作独游人。”其二：“长夜君先去，残年我几何？秋风满衫泪，泉下故人多。”（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三一）《感旧序》云：“故李侍郎杓直，长庆元年春薨；元相公微之，太和六年秋薨；崔侍郎晦叔，太和七年夏薨；刘尚书梦得，会昌二年秋薨。四君子，予之执友也。二十年间，凋零共尽，唯予衰病，至今独存。因咏悲怀，题为《感旧》。”诗云：“晦叔坟荒草已陈，梦得墓湿土犹新。微之捐馆将一纪，杓直归丘二十春。城中虽有故第宅，庭芜园废生荆榛。篋中亦有旧书札，纸穿字蠹成灰尘。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四人先去我在后，一枝蒲柳衰残身。岂无晚岁新相识，相识面亲心不亲。人生莫羨苦长命，命长感旧多悲辛。”（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三六）《哭刘尚书梦得二首》一：“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同贫

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贤豪虽歿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三六）元白的友谊是“隙终”，还是“始终如一”，相信读者从上面所引的诗歌中，不难得出自己的准确结论。

荒谬之论，其实前贤已经一一批驳。如《白香山诗集》书后所附《白文公年谱·（开成）三年戊午》：“有《醉吟先生传》，《北梦琐言》云：‘白公与元相友善，集有诗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洎自撰《墓志》云：与彭城刘梦得为诗友。不言元公，时人疑其隙终也。’按此非《墓志》语，乃《醉吟传》中语。时元之亡久矣！其言与僧如满为空门友，韦楚为山水友，皇甫朗之为酒友，皆一时见在人，则其于诗友，自不应复及死者。又尝为《刘白唱和集序》，且与刘书云：‘微之先我去矣！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此尤可证公与元同升科第，俱负直声，中岁复俱蹇连，晚而元挠节速化，得罪清议，公独始终如一。二人贤否，固不可概论，而其交情死生不渝。观《香山寺记》，尚欲结他生缘，风谊之美，可厉薄俗。‘掩泪伤心’之句，旨意甚哀，而或者臆度疑似，乃有隙终之论。小人之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香山诗集·年谱》本）

又如《唐宋诗醇·览卢子蒙侍御旧诗多与微之唱和感今伤昔因赠子蒙题于卷后》：“早闻元九咏君诗，恨与卢君相识迟。今日逢君开旧卷，卷中多道赠微之。相看掩泪情难说，别有伤心事岂知？闻道咸阳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唐宋诗醇》卷二六）其后评云：“清空一气，直从肺腑中流出，不知是血是泪，笔墨之痕俱化。”（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唐宋诗醇》卷二六）又云：“汪立名曰：‘《北梦琐言》云白太保与元相国友善，以诗道著名，时号元白，其集内有《哭元相》诗云：相看掩泪俱无语等句。洎自撰墓志云：与刘梦得为诗友，殊不言元公，人疑其隙终也。按此语在《醉吟先生传》中，非《墓志》也。’”（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唐宋诗醇》卷二六）传未曰：“于时开成三年，先生之齿六十有七，则是微之歿久矣！其所谓如满为空门友，韦楚为山水友，梦得为诗友，皇甫朗之为酒友，皆就当时在洛之人而言，非

该举平生也。且公晚年哭微之作甚多，有《梦微之》诗云：‘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又《闻歌者唱微之诗》云：‘时向歌中闻一句，未容倾耳已伤心。’感悼凄怆，如在初歿。隙终之语，岂不大谬耶？又考史传，皆作‘白少傅’，即公诗内止有‘少傅官停’语，并无称太保者，不知何所本也。”（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唐宋诗醇》卷二六）

《历代诗话》对此也严加驳斥，一一列举史实，可谓不容对方置喙：“余谓不然。按元写白诗于阆州西寺，白写元诗百篇，合为屏风。又守浙东，白守苏台，置驿递诗，往来谓之诗筒。其有诗云：‘有月多同赏，无杯不共持。’又元《上令狐楚书》云：‘某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诗，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盖欲以难相挑耳！’又白《序刘禹锡诗》云：‘予与元微之唱和颇多，尝戏言：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性情，播扬名声，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又白在洛，元过之，以二诗别去：‘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又云：‘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未几死于鄂，白哭之曰：‘始以诗交，终以诗诀。弦笔相绝，其今日乎！’据此，则两人交情，白头如故。即白之序刘，犹言与元为文友诗敌。且云：垂老遇刘，未尝独厚于刘也，其自志亦偶及耳！何言隙终，以诬前哲？”（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历代诗话》卷五〇《交情》）

三、白居易《哭诸故人因寄元九》中的“元九”是“元八”之误

白居易有《哭诸故人因寄元九》，诗云：“昨日哭寝门，今日哭寝门。借问所哭谁？无非故交亲。伟卿既长往，质夫亦幽沦。屈指数年世，收涕自思身。彼皆少于我，先为泉下人。我今头半白，焉得身久存？好怀元郎中，相识二十春。昔见君生子，今闻君抱孙。存者尽老大，逝者已成尘。早晚升平宅，开眉一见君。”（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一一）本诗摘自马本《白氏长庆集》卷一一，又见《四库全书·白香山诗集》卷一一、《四库全书·全唐诗》卷四三四，诗题均作“哭诸故人因寄元九”。

白居易诗云：“好怀元郎中，相识二十春。”诗

中的“元郎中”究竟是谁？是元九稹吗？不错，元稹在元和十五年五月九日至长庆元年二月十六日之间曾任职祠部郎中、知制诰臣，确实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元郎中”。而元稹与白居易相识于贞元十九年（803），下推“二十春”，应该是长庆三年（823）。在长庆三年之前，元稹前后历职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同平章事，长庆二年六月五日，元稹出任同州刺史，同年八月转任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并且带着“御史大夫”的荣衔，白居易怎么还可以以“元郎中”这样职级较低称呼元稹？这个“元郎中”肯定不是元稹，排行“元九”也肯定有误。

白居易诗又云：“昔见君生子，今闻君抱孙。”长庆元年（821）的夏天，元稹与小妾安仙嫔所生的儿子元荆，也是元稹当时唯一存世的男性子女不幸病故，诗人有《哭子十首》为证，其六：“深嗟尔更无兄弟，自叹予应绝子孙。寂寞讲堂基址在，何人车马入高门？”（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九）其七：“往年鬓已同潘岳，垂老年教作邓攸。烦恼数中除一事，自兹无复子孙忧。”（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九）到了长庆三年，元稹膝下尚无子息，既然不见元稹“生子”，又何来元稹“抱孙”？而且，元氏家族的祖宅在长安的靖安坊，从来没有入住过长安的“升平宅”，“早晚升平宅，开眉一见君”云云，也应该与元稹风马牛不相及。

白居易诗题中的“元九”，应该是“元八”之误，宋本、那波本之《白氏长庆集》不误，题作《哭诸故人因寄元八》，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笺校》已经改正^[1]（PP. 602-603）。元八即白居易的朋友元宗简，字居敬，排行八，故常常被人称为“元八”，家住长安升平里。白居易《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居敬姓元名宗简，河南人，自举进士，历御史府、尚书郎，讫京亚尹，凡二十年。”（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六八）白居易另有《浔阳岁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员外》（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一七）、《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绝句（时方与元八卜隣）》（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一五）诸诗，元稹《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中也有元宗简的踪影：“七字排居敬，千词敌乐天（侍御八兄，能为七言绝句。赞善白君，好作百韵律诗）。”（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一二）元稹与白居易的诗篇，自然是最有力

的证据。

白诗作于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忠州刺史任，而“好怀元郎中，相识二十春。昔见君生子，今闻君抱孙。存者尽老大，逝者已成尘。早晚升平宅，开眉一见君”数句，正是白居易与当时尚存人世的元宗简的对话，长庆二年（822）春天元宗简病故。从元和十五年（820）算起，以“二十春”逆推，白居易与元宗简相识应该在贞元十六年（800）。我们疑元宗简的进士及第也在贞元十六年，与白居易同时及第，因而相识。白居易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之诗句，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宋人曾慥《类说》、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元代盛如梓《蔗斋老学丛谈》、清人觉罗石麟《山西通志》、清人刘昞《陕西通志》、清人汪立名《白香山诗集·年谱旧本》、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均有记载。根据白居易本人的诗句，与白居易一起及第的共有十七人。徐松《登科记考》贞元十六年条下仅仅录有十一人及第名单^[2]（P. 531, P. 532, P. 533），尚缺漏六人，疑元宗简即在《登科记考》缺漏的六人之中。

四、白居易《松树（和元微之）》的题注为后人妄加

据《全唐诗录》卷六五，白居易有诗篇《松树（和元微之）》，诗云：“白金换得青松树，君既先栽我不栽。幸有西风易凭仗，夜深偷得好声来。”（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全唐诗录》卷六五）从题注看，白居易这首“松树”诗，应该是酬和元稹的；而白居易“夜深偷得好声来”之句表明，白居易与元稹比屋而居，隔墙为邻，而这显然不符元稹与白居易的生平。那末，又该如何理解白居易这首诗篇的确切含义呢？

元稹确实有《松树》诗，作于元和五年贬赴江陵途中，元稹《松树》：“华山高幢幢，上有高高松。株株遥各各，叶叶相重重。槐树夹道植，枝叶俱冥蒙。既无贞直干，复有冒挂虫。何不种松树？种之摇清风。秦时已曾种，顛顛种不供。可怜孤松意，不与槐树同。闲在高山顶，樛盘虬与龙。屈为大厦栋，庇廕侯与公。不肯作行伍，俱在尘土中。”（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元氏长庆集》卷一）元稹“不肯作行伍，俱在尘土中”的诗句，表明是一首励志的诗篇，与白居易的讽咏栽种松树的休闲诗篇《松树》不是同一意境。

其实,对元稹的《松树》诗,白居易确实也有和篇《和松树》,诗云:“亭亭山上松,一一生朝阳。森耸上参天,柯条百尺长。漠漠尘中槐,两两夹康庄。婆娑低覆地,枝干亦寻常。八月白露降,槐叶次第黄。岁暮满山雪,松色郁青苍。彼如君子心,秉操贯冰霜。此如小人面,变态随炎凉。共知松胜槐,诚欲栽道旁。粪土种瑶草,瑶草终不芳。尚可以斧斤,伐之为栋梁。杀身获其所,为君构明堂。不然终天年,老死在南冈。不愿亚枝叶,低随槐树行。”(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二)元稹原唱十韵,白居易唱酬十四韵,句数不等,这在古人,自然也包括元稹与白居易的唱酬中极为常见,不足为奇。元白两诗,虽然韵数不等,但意境相接,同为励志的诗篇,应该是一组唱酬诗篇。

而《全唐诗》卷六五所录白居易《松树(和元微之)》那首,其实是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绝句(时方与元八卜邻)》中的一首,前面三首依次是《看花屋》:“忽惊映树新开屋,却似当檐故种花。可惜年年红似火,今春始得属元家。”(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一五)《累土山》:“堆土渐高山意出,终南移入户庭间。玉峰蓝水应惆怅,恐见新山忘旧山(元八旧居在蓝田山)。”(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一五)《高亭》:“亭脊太高君莫拆,东家留取当西山。好看落日斜衔处,一片春岚映半环。”(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一五)而《松树》是第四首:“白金换得青松树,君既先栽我不栽。幸有西风易凭仗,夜深偷得好声来。”(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一五)与《全唐诗》所引《松树(和元微之)》一字不差。四首组诗浑然一体,组成完整的意境。其余《白氏长庆集》、《白香山诗集》、《万首唐人绝句》、《全唐诗》均同《白氏长庆集》,只有《全唐诗》,舍弃了《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绝句(时方与元八卜邻)》诗题和其余三首,单独将《松树》选入《全唐诗》中,这本来也无可非议。不应该的是在白居易诗篇诗题“松树”之后,毫无根据加上“和元微之”四字,把元八宗简误为元九稹了,张冠李戴,使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绝句(时方与元八卜邻)·松树》成了酬和元稹的诗篇《松树(和元微之)》,应该予以辩证,以明元稹白居易两人的

生平。

五、白居易《元稹可太子左谕德依前入蕃使制》中的“元稹”并非元九稹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五一有《元稹可太子左谕德依前入蕃使制》一文,文云:“敕:通事舍人元稹,东宫之有谕德,犹上台之有骑省也。清班优秩,所选非轻。朕前遣使臣,往修戎好,以稹言信行敬,命为介焉!扬旌出疆,反驾奔命。有所啓奏,多叶便宜。乃知得人,可以卒事。故加是命,以宠劝之。可太子左谕德,依前入蕃使。”(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五一)

《白氏长庆集》卷五一中这篇文章出自白居易之手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文题与文中的“元稹”究竟是不是白居易最亲密的朋友元九稹,还是同时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人?留给读者诸多疑问,应该给予认真的考辨。

第一,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通事舍人十六人(从六品上,通事舍人,秦谒者之官也。掌宾赞、赞受事,隶光禄勋。晋置舍人、通事各一人,隶中书。东晋曰通事舍人。隋因晋制,置十六人,从六品上,又为通事谒者。武德初,废谒者台,改通事谒者为通事舍人,隶四方馆,属中书省也)通事舍人掌朝见引纳及辞谢者,于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引以进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节。凡四方通表,华夷纳贡,皆受而进之。凡军旅之出,则命受慰劳而遣之。既行,则每月存问将士之家,以视其疾苦。凯旋,则郊迓之,皆复命。凡致仕之臣与邦之耆老,时巡问亦如之。令史十人,亭长十八人,掌固二十四人。”(文渊阁《四库全书》之《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视“通事舍人”之职责,元稹一生未列“通事舍人”之职,其行踪也从未见其出使他国,这是否定此“元稹”非彼“元稹”的最主要理由。

第二,这篇文章是制诰文体,应该是白居易任职知制诰时所作。而考白居易从事知制诰之职的时间有二:一是在元和初。元和二年十一月五日,白居易被召入翰林,奉诏试制诰五首,白居易《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等五首(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贤院召赴银台候进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试制诏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谦奉宣,宜授翰林学士。数月,除左拾遗)》(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四七)可证。元和五年五月五日,

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白居易因母亲陈氏亡故,退居下邳守制。这段时间,元稹不可能以“通事舍人”的身份出使吐蕃: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因母亲郑氏亡故,守制在家,不可能外出为官,更不可能出使他国。元和三年十一月除服,元和四年二月拜监察御史,三月七日出使东川,五六月归来分务东台,直至元和五年三月贬任江陵府士曹参军。这段时间元稹历职清楚,时间衔接紧密,元稹没有出使他国的时间。二是在长庆初。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白居易拜职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十月十九日,转中书舍人。至长庆二年七月,除杭州刺史。这段时间,元稹也不可能以“通事舍人”的身份出使吐蕃:长庆元年二月十六日,元稹从祠部郎中、知制诰臣改拜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同年十月十九日,改拜工部侍郎。长庆二年二月十九日,元稹以工部侍郎的身份拜职同平章事。同年六月五日,出贬同州刺史。这段时间元稹同样历职清楚,同样时间衔接紧密,元稹没有任职“通事舍人”之记载,也根本没有出使他国的可能。而且,“通事舍人”只是“从六品上”的中下层官职,与元九稹所历祠部郎中知制诰臣、中书舍人和翰林承旨学士以及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品位悬殊,不可同日而语。据此,白居易本制诰中所涉及的“元稹”,应该不是白居易最亲密的朋友、被时人称为“元才子”与“元白”、曾经拜职宰相的元稹,而是另外一个同时又同名同姓之人,拜请读者注意区别,不要混为一谈。

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笺校》编年《元稹可太子左谕德依前入蕃使制》文:“作于长庆元年(八二一)至长庆二年(八二二),长安。”^{[1](P.3007)}《白居易集笺校》笺注:“元稹:与居易之挚友元稹同名,当为另一人。”^{[1](P.3007)}虽然没有列举理由,但结论与我们意见相同,应该采信。

冀勤先生将本文与白居易《论元稹第三状》等一起收录在《元稹集》的附录之中,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白居易的《元稹可太子左谕德依前入蕃使制》应该与元九稹有关^{[4](P.938)},但《元稹集》同时文末有按语:“《唐书》本传,元稹未尝官通事舍人,亦无人蕃事,顾学颢认为原本此处疑误,并称岑仲勉谓唐有两元稹。”^{[4](P.938)}《元稹集》按语意见可供参考。既然如此,冀勤先生为何还要将与元九稹毫

无关系的白居易《元稹可太子左谕德依前入蕃使制》一文收入《元稹集》之中呢?

六、《留别微之》的作者不是张籍而是白居易

《张司业集》卷五录有《留别微之》诗一首,诗云:“千时久与本心违,悟道深知前事非。犹厌劳形辞郡印,那能趁伴着朝衣?五千言里教知足,三百篇中劝式微。少室云边伊水畔,比君较老合先归。”(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张司业集》卷五)

《张司业集》非张籍亲自主定,最早的编者是南唐升元元年(937)北宋乾德二年(964)间的张洎,诗集名为《木铎集》,计有十二卷。后人汤中又加以辑补,得四百四十九首。历经数人之手,偶有他人之作掺杂其间,也不足为怪。

《留别微之》除见于《张司业集》卷五外,冀勤先生1982年版《元稹集·附录》采录《留别微之》,也归入张籍名下,注明采自中华书局《张籍诗集》卷四^{[3](P.759)}。将不是张籍的诗篇归于张籍,应该是失于考察;而更不应该的是,2010年版《元稹集·附录》先在“张籍”名下录入《留别微之》^{[4](P.884)},然后在“白居易”名下录入《留别微之》,两首诗篇一字不差,却又分别归属于张籍和白居易,既互相矛盾^{[4](P.921)},但却又不作任何解释。

其实,《留别微之》应该是白居易所作,分别见《白氏长庆集》卷二四、《白香山诗集》卷二七、《文苑英华》卷二八八、《全唐诗》卷四四七、《瀛奎律髓》卷二四亦归名白居易,并在诗末评云:“白(居易)诗自然,五六(句)何其易之至也!此苏州病告满去时诗。”(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瀛奎律髓》卷二四)这是白居易宝历二年(826)九月自苏州刺史因病归洛阳之前所作。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笺校》编年本诗作于宝历二年之苏州刺史任^{[1](P.1686,P.1687)},我们以为可以采信。

文渊阁《四库全书·张司业集》误白居易之篇为张籍之诗,中华书局版《张籍诗集》、《元稹集》又前后承误,希望读者不要采信。

七、新版《元稹集》的偶误与失察

白居易有《戏和微之答窦七行军之作依本韵》诗,诗云:“旌钺从囊鞬,宾僚礼数全。夔龙来要地,鸛鹭下辽天。赭汗骑骄马,青蛾舞醉仙。合成江上作,散到洛中传。陋巷能无酒?贫池亦有船。春装秋未寄,漫道有闲钱。”(文渊阁《四库全书》之

《白氏长庆集》卷二四)

这一首诗是白居易所作,诗题有两个:《白氏长庆集》、《白香山诗集》、《全唐诗》作“戏和微之答宴七行军之作依本韵”(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白氏长庆集》卷二四);《宴氏联珠集·宴巩诗》题作“微之见寄与宴七酬唱之什本韵外勇加两韵”(文渊阁《四库全书》之《宴氏联珠集》卷五)。诗篇内容大致一致,仅仅只是诗题的不完全相同而已。

而诗篇的内容则大致相同,仅仅“礼数”与“情礼”、“辽天”与“寥天”、“鹄鹭”与“鸳鹭”、“陋巷”与“穷巷”、“有闲钱”与“足闲钱”的区别而已,而表达的词意则基本一样,应该只是版本有异的同一首诗篇而已:“旌钺从囊鞬,宾僚情礼全。夔龙来要地,鸳鹭下寥天。赭汗骑骄马,青娥舞醉仙。合成江上作,散到洛中传。穷巷能无酒?贫池却有船。春装秋未寄,漫道足闲钱。”

而冀勤先生《元稹集附录·白居易》分别以“戏和微之答宴七行军之作依本韵”、“微之见寄与宴七酬唱之什本韵外勇加两韵”为题,同时过录在九二三页和九二五页^[4](P. 923, P. 925)。给人以两篇诗歌的错觉,故特地撰文指出,以免误导读者。

应该说明一下,先出之1982年版《元稹集》不误,而后出的2010年版《元稹集》反而出错。一般来说,初版疏忽出错,第二版应该加以纠正。而现在的情况却倒过来了,确实有点很不应该!

其实,《瀛奎律髓》的题目又有不同,是“微之

见寄与宴七酬唱之什本韵外加两韵”,与《宴氏联珠集》所引诗篇内容仍然基本一致,仅仅只有“亦”与“却”之不同,同样应该只是版本的不同而已:“旌钺从囊鞬,宾僚情礼全。夔龙来要地,鸳鹭下寥天。赭汗骑骄马,青娥舞醉仙。合成江上作,散到洛中传。穷巷能无酒?贫池却有船。春装秋未寄,漫道足闲钱。”(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瀛奎律髓》卷四二)《白氏长庆集》、《白香山诗集》、《全唐诗》与《宴氏联珠集》、《瀛奎律髓》诗题不同,是《宴氏联珠集》、《瀛奎律髓》根据自己的体例框定题目的结果;个别诗文内容的不同,仅仅是诸本的版本不同而已,把它们作为两篇作品是《元稹集》的偶误与失察所致。

白居易唱酬元稹的《戏和微之答宴七行军之作依本韵》与白居易的《微之见寄与宴七酬唱之什本韵外勇加两韵》其实只是同一首诗而已,并非是诗篇内容不同的两首诗歌。

[参考文献]

- [1]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2](清)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冀勤.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冀勤.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责任编辑 南山)

《盛成台儿庄纪事》之《前线通讯》非盛成所作

蒋成德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编辑部, 江苏徐州 221018)

[摘要] 《盛成台儿庄纪事》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全书包括《徐州慰劳报告》《台儿庄血战记》和《前线通讯》三个部分。据《编辑说明》介绍:前两个部分是根据盛成手稿排印,第三部分“收录了作者在台儿庄前线采写的通讯,这一部分原稿为印刷字体,都是当年在有关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根据内容,编辑给这部分内容拟加标题‘前线通讯’”。这就是说,前两个部分是按手稿排印的,故是盛成的作品。唯有第三部分《前线通讯》原稿是“印刷字体”,是“发表过的文章”,标题是编辑给“拟加”的,而非盛成自己定的。那么,这部分的“前线通讯”是否盛成自己的作品呢?从“通讯”所述时间来看,它不是盛成的。据考证,它的原作者是臧克家。

[关键词] 盛成;《盛成台儿庄纪事》;《前线通讯》;臧克家;《津浦北线血战记》

[中图分类号] I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41-04

《盛成台儿庄纪事》于2007年出版。全书包括《徐州慰劳报告》《台儿庄血战记》和《前线通讯》三个部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说明》对这三个部分介绍说:第一部分“徐州慰劳报告”是作者到台儿庄前线慰劳的经历和见闻,标题是作者原定的,“这部分主要是作者手稿,应为首次出版面世”^{[1](P.1)};第二部分“台儿庄血战记”等,“因较多字迹难以辨认,基本图表无法复原等原因,以原稿影印的方式呈现给读者”^{[1](P.2)},其中“我军与敌军各兵团组成情况笔记”“敌军兵力分布情况笔记”等是盛成的手写体;第三部分“收录了作者在台儿庄前线采写的通讯,这一部分原稿为印刷字体,都是当年在有关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根据内容,编辑给这部分内容拟加标题‘前线通讯’”^{[1](P.2)}。

以上三部分,前两个部分都是按照原稿的手稿排印的,故是盛成自己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唯有第三部分《前线通讯》原稿是“印刷字体”,是“发表过的文章”,标题是编辑给“拟加”的,而非盛成自己定的。那么,这部分的“前线通讯”是盛成“在台儿庄前线采写的通讯”吗?是盛

成自己的作品吗?从“通讯”所述时间来看,它不是盛成的。既然不是,盛成为什么要把它和自己的手稿放在一起呢?

一、盛成在1938年4月初没有去徐州

《前线通讯》共收12篇文章,写作者在台儿庄大捷后到前线采访,与李宗仁、白崇禧、孙连仲、池峰城、张金照等将官以及士兵和老百姓的交谈。文章有日期,没有月份,但从内容上看是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的1938年4月,那么,有了月份,日期就好说了。《前线通讯》的第十二篇《徐州现况》说,作者是“(四月)四号早晨我离去武汉赶赴徐州”的^{[1](P.241)},然后在不同的文章中记述了从徐州到台儿庄采访的逐日活动。

到了徐州的第二天,恰恰是前方胜利消息一日数传的时节,怀着一腔狂烈去拜会李司令长官。(《李白两将军亲赴前方》)

“到了徐州的第二天”大约是六号,因当时打仗的原因不能当天到。又“第二天晚上八点钟,司令长官部有电话来”(同上),这是“到了徐州第二天”后的第二天,当是四月七号左右。然后就有准确的日期了。

[收稿日期] 2015-10-26

[作者简介] 蒋成德,男,江苏阜宁人,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编审。

夜半时,车停在车辐山站上了。这天是八号。次日清早,汽车把我们送到了离车辐山车站二十(十八)里路的一个小村落(杨楼)中。(《李白两将军亲赴前方》)

十日,火车耕开了黑暗。(《李白两将军亲赴前方》)

十日午后,……去访此次血战台儿庄的名将——卅一师池峰城师长。(《徒步韩佛寺访池师长》)

十一号的早晨,一串马蹄把我带到了台儿庄南站,我寄身的那个卧车载着我的行囊开回了徐州。(《再吊台儿庄》)

十二号那天二十六军的何参谋对作者介绍台儿庄的战斗情况时说道:

昨晚(十一号)又下令,……(《何参谋长按地图纵谈全盘战局》)

十三日,夜宿陈庄……次日十时,敌机四架轰炸我某村炮兵阵地……与阎群缓步运河堤上……我们从运河堤上走回来时二十七师的于秘书拍着我的肩膀……“台儿庄一走好吗?”……“好,三吊台儿庄去!”(《三吊台儿庄》)

从台儿庄回到陈庄,……第二天一早司令长官叫了我去……午饭后我向他辞别……当我们回到别来八日的徐州城时,……(《告别司令长官》)

这一天从台儿庄回徐州的时间是十四号。

以上是《前线通讯》的作者在4月4日到4月14日的全部活动情况。

那么,从4月4日到4月14日这一段时间,盛成有没有到徐州到台儿庄呢?答案是没有。盛成在4月份确曾去了徐州,但不是这一段时间。盛成是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国际宣传委员会的代表奉命去徐州劳军,时间是(1938年)4月17日到5月4日。17日先到郑州^{[1](P.18)},21日始到徐州^{[1](P.22)},24日到前线台儿庄慰问献旗^{[1](P.44)},25日返回^{[1](P.50)},26日到徐州^{[1](P.50)},28日参加徐州文化人在奎光阁宴谈^{[1](P.51)},29日陪史迪威见池峰城师长,晚上宴请外国记者^{[1](P.62)},30日参加战地记者开会^{[1](P.63)},5月1日,参加徐州举行的劳动节^{[1](P.82)},5月2日见李宗仁露辞行之意^{[1](P.90)},5月3日到司令长官部辞行^{[1](P.91)},5月4日早晨乘车离徐州回武汉^{[1](P.93)}。

以上是盛成在《徐州慰劳报告》中所记。

《前线通讯》的作者是4月14日从台儿庄回到徐州的,而盛成是4月17日从武汉出来的,这在时间上地点上也接不上,在《前线通讯》之《徐州现况》中作者说:“在一月的末梢,我曾在徐州勾留过一些时日。”这里的1月是1938年的1月。又说:“去年(按指1937年)十二月底由西安来徐州时……”查《盛成回忆录》等著作,盛成在1937年底并不在西安,在1938年1月也并没有到徐州。但在1937年12月6日,“由郑州到徐州,再到武汉”^{[2](P.107)}。

从《前线通讯》与《徐州慰劳报告》各自所述时间的相错,以及其后时间、地点的相异,且盛成在《徐州慰劳报告》中也未提到在4月4日到4月14日曾到过徐州,由此可以肯定,《前线通讯》不是盛成的作品。

二、《前线通讯》是盛成为自己写作而收集的材料

据《盛成台儿庄纪事》的《编辑说明》,《前线通讯》原是印刷体,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盛成台儿庄纪事》一书没有注明这些文章的署名,没有注明发表于哪些报刊,以及具体的时间,因而也就不能确定文章的真正的作者是谁。

既然这不是盛成的作品,那么,盛成何以要把它与自己的放在一起呢?

如前所述,盛成4月17日离开武汉,5月4日返回武汉,仅十天后,5月14日,盛成即在武汉华中里103号楼上完成了他的《徐州慰劳报告》,并亲自用毛笔手写了书名,在《盛成台儿庄纪事》一书中同时还有作者附收的一些当年各界开展抗敌活动的相关文件,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告同志书》《一个划期的文化人座谈会》《修正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组织条例》《李司令长官之约法七章》等等,因而,也可以断定被编辑“拟定”为《前线通讯》的文章应是盛成为自己写作《徐州慰劳报告》和《台儿庄血战记》所收集的材料。这两部手稿不仅参考了《前线通讯》,而且还参考了其他人的文章,如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1](P.33)},百虑《昨日之台儿庄》,“王西彦注被毁灭了台儿庄居民有一万三千人,房屋有二万间”^{[1](P.47)},陈符其《台儿庄之战》,长江《台儿庄经过》^{[1](P.141)},周鼎华《火网上的台儿庄》^{[1](P.146)},陆诒《两总长访问记——胜利前夜的台儿庄》^{[1](P.159)}等。还有的

引用文章注明了所发表的报纸与日期,如《台儿庄歼灭暴敌》载《大公报》4月9日第3版,《纪念鲁南大捷》载《大公报》6月8日第2版,《峰县东北的前线》载《新华日报》4月24日第2版等。

所以,盛成能在返回武汉后的短短十天内即写出《徐州慰劳报告》与《台儿庄血战记》两部手稿,除了亲身前往台儿庄视察与将士民众交谈外,如果没有大量的辅助材料,是不可能这么快就写成的。何况书里还有一些具体的数字、各路部队的具体活动,这些仅凭耳闻而无案头资料是难以详述的。

三、《前线通讯》的原书名是《津浦北线血战记》,原作者是臧克家

《前线通讯》既然不是盛成的,那么是谁的呢?根据查证,原是臧克家的。它的原书名也不叫《前线通讯》,而是《津浦北线血战记》。

臧克家在1938年4月初,应李宗仁之邀,到台儿庄前线作战地记者。据臧克家的回忆录所述:臧克家在1937年底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的徐州,因李宗仁没有马上安排其具体工作,旋即由徐州到西安,然后想去延安,但没过几天,因未收到延安的电报,而徐州抗敌青年军团成立,欲其迅速返回徐州,于是即从西安回徐州,“因为新年临近,火车上乘客极少,空空洞洞。刚离开不多天,又回到徐州,真可谓去来匆匆了”^{[3](P.686)}。臧克家在徐州一直呆到1938年2月上旬。

这一段与前面所述“去年(按指1937年)十二月底由西安来徐州”,“在(1938年)一月的末梢,我曾在徐州勾留过一些时日”正好是相吻合的。

臧克家在1938年的3月份在武汉也没有呆多久,忽然接到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的邀请函件,臧克家去见韦,韦永成“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台儿庄正在作战,请你赶快回前方去,写点报道文章,鼓舞军心,也鼓舞民心。’”^{[3](P.690)}于是,臧克家即“搭上北去的火车,……时间是四月初,台儿庄战事正紧张”^{[3](P.691)}。以后即是《前线通讯》中所述的时间、人和事了。臧克家后来说:“在这有名的大会战场——台儿庄,紧张、兴奋而又欢乐地度过了十多天,静了下来,写成了《津浦北线血战记》这样一本报道小册子。为了赶时间,趁热劲,我在四月二十二日向李宗仁告别,到武汉去出版这本书。”^{[3](PP.691—692)}可见,臧克家原定的书名即是《津浦北线血战记》,而不是《前线通讯》。根据

《津浦北线血战记》后面所说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写起,二十一日完成,时津浦北段第二次大战伊始,徐州可闻炮声。”^{[4](P.340)}很快,这本书就在1938年5月由生活书店出版了。张惠仁评价该书说:

这是抗日战争开始后最早出现的一本反映抗战伊始中华民族儿女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浴血战斗的具体场面的介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小册子。它记录了台儿庄大会战的情况。^{[5](P.113)}

臧克家的《津浦北线血战记》与《盛成台儿庄纪事》之《前线通讯》,不仅书名不同,且篇目与篇序也不尽一样。《津浦北线血战记》共17篇,比《前线通讯》多了5篇,即“四、《吊台儿庄》,六、《屈处长谈台儿庄血战经过》,十五、《诗的尾声》;附录一、《五十九军官长谈临沂歼敌》,附录二、《追述临沂大血战》”。在排序上,《津浦北线血战记》的开头两篇是:“一、《津浦北线会战的意义》,二、《徐州现况》”,而《前线通讯》则是将这两篇放在第十一、十二。至于中间各篇的排序也不尽相同。所以,《前线通讯》各篇由于排序与原来的《津浦北线血战记》不同,故在时间上往往接不上,有些凌乱,不如《津浦北线血战记》的每篇都按照时间而各自有序。在段落文字上,差异也较大。如在《隆隆炮声中走马访孙总司令及黄张师长》一篇,《前线通讯》中比《津浦北线血战记》少了一页多,即从开头的“带着个饿肚皮跑到北站里许的陈庄去找阎站长……”到“……一看便可以明白是什么人的手笔”,共750余字。且本篇结尾的一段文字也多有出入。又如《徐州现况》一文后,在《前线通讯》中则比《津浦北线血战记》少了三段文字。原文是:

后方巩固,前方自然会稳定。将士在火线上杀敌,后方的人员在发动民众做他们的后盾。军民合力,前后方呼应灵活,才可以发挥最大的伟力去歼灭敌人。

敌机虽然常光临,但司空见惯的铁鸟,已不足以予人以过分的慌乱与不安了。

十天以前徐州给我的印象是平静而严肃,而今随着前线的胜利它又转入了紧张,兴奋。^{[4](P.289)}

再如《三吊台儿庄》中的“与阎群缓步运河堤上”,臧克家的是“与阎君缓步运河堤上”^{[4](P.328)}。

盛成的《台儿庄血战大事表》里也有引用臧克

家材料的地方。如在记我军击毁敌人坦克的数量时即引用到“一共是四辆,三辆在一边,那一辆远远地躺在北面。(臧克家)”^{[1](P.147)}这一段即出自臧克家《津浦北线血战记》第四篇《吊台儿庄》:“我们立脚在麦田中三辆坦克车的一边了。一共是四辆,那一辆远远地躺在北面。”^{[4](P.295)}

在一份手迹中有一句“余偕臧君克家遄赴前线,督战巡视台儿庄”^{[1](P.128)},因未署名不知是谁“偕”臧克家,但肯定不是盛成,手写的笔迹与盛成的笔迹也并不一样。还有盛成收有27师师长黄樵松的一帧照片和一封手写的信,此信写于1938年4月7日台儿庄前线,臧克家的《津浦北线血战记》第十三篇《三吊台儿庄》明确记叙道:“我们从运河堤上走回来时,二十七师的于秘书……他把一张地图,黄师长的一张照片和亲手的题句交给了我。他说,‘七十里路,马子跑得我一身大汗,为了送给你这份礼物。我们的师长以得不到与你一见为憾。他很爱好文艺,这篇字是自作自写的,小凳子做了书桌’。”^{[4](P.329)}黄樵松的题句是这样的:

强暴的飞机大炮坦克打不开我们血肉筑成的长城——台儿庄,敌寇所恃的机械化的壁垒和毒瓦斯的恶魔营阵,卒被我们用大刀手榴弹前仆后继的死拼战术冲得粉碎而溃败了!

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铁证,我们要在这现实底下,再接再厉的拼去干去,一直干到失地收复,民族复兴为止!

黄樵松

二七.四.七

于台儿庄前线^{[1](P.132)}

黄樵松于1948年起义未果,以身殉国,他的这张照片和手迹赖盛成的书而保存了下来,因此是弥足珍贵的。

另臧克家的《津浦北线血战记》原还有一篇序和两篇附录《五十九军官长谈临沂歼敌》和《追述

临沂大血战》,是《前线通讯》所没有的。全书的写作时间,书尾记道:“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写起,二十一日完成,时津浦北段第二次大战伊始,徐州可闻炮声。”^{[4](P.340)}这很重要的一句话《前线通讯》里也没有。书写成后的第二天,臧克家为了“把个人在前方眼看耳闻的一些惊心动魄的事实向大家来个忠实的报告”^{[6](P.807)},即向李宗仁辞行到武汉联系出书了,李宗仁为他的书写了长篇题句。

盛成的《徐州慰劳报告》与《台儿庄血战记》不同于臧克家的《津浦北线血战记》的是当年没有出版,后来随着盛成辗转了60年,漂泊了三大洲,直到盛成先生逝世后,于2007年才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据其手稿的复印件整理加工出版。由于编辑未能审慎查对,故把臧克家的《津浦北线血战记》中的十二篇文章误收入书中。现作考证,当还其原来的面目。

虽然,《前线通讯》非盛成所作,仅就其《徐州慰劳报告》与《台儿庄血战记》两部分,《盛成台儿庄纪事》一书的价值同样也是不可低估的。

[参考文献]

- [1]盛成.盛成台儿庄纪事[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
- [2]盛成.盛成回忆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 [3]臧克家.回忆录[M]//臧克家文集:第4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
- [4]臧克家.津浦北线血战记[M]//臧克家文集:第5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
- [5]张惠仁.臧克家评传[M].北京:能源出版社,1987.
- [6]臧克家.津浦北线血战记·序言[M]//臧克家文集:第6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刘敏慧)

《大宪章》时代约翰王专制探源

姜 守 明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 要] 专制主义在英国最早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初的约翰王统治。自从 1215 年《大宪章》问世以来,迄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八个世纪,但八百年前约翰被迫签署这部封建法律文件的历史背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回溯那段既扑朔迷离、又惊心动魄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清约翰,一个看上去志向高远、雄心勃勃,实际上任性自私、急不择途的封建专制君王的本质。

[关键词] 英国;《大宪章》;约翰王;专制主义

[中图分类号] K5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45-06

专制主义,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产生于中世纪末期、近代早期的社会转型阶段,是以市民阶级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反对以专制王权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政治斗争的产物和表现。其实,专制主义在英国最早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初的约翰王统治。自从 1215 年《大宪章》问世以来,迄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八个世纪,但八百年前约翰被迫签署这部封建法律文件的历史背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回溯那段既扑朔迷离、又惊心动魄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清约翰,一个看上去志向高远、雄心勃勃,实际上任性自私、急不择途的封建专制君王的本质。要理解约翰王的专制主义,就离不开对 11-12 世纪,尤其《大宪章》时代王权与贵族关系、王权与教会关系的认识。

一、国王与贵族矛盾的激化

在中世纪英国的政治舞台上,国王和贵族虽然同属于一个阶级,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是以共同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但是他们也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因此,作为封建社会内部最活跃的两大力,国王和贵族的互动关系如何,很大程度上将影响着政治史的走向。

中世纪的英国王权,从发展轨迹来看,呈现出明显的马鞍形。诺曼王和安茹王早期,英国王权

的高起点是以诺曼武力征服和英王以强势的姿态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统治为前提的。1066 年,威廉实现对英国的征服后,从英国现实出发,推行并改进了从大陆带来的封建制度。为了强化诺曼王权,威廉一世强迫所有领主向他效忠。但是,各级领主为了谋取实际利益和竞争优势,纷纷筑堡垒,积聚起对抗王权实力的屏障,这在客观上构成了威胁中央集权的离心力。外来的诺曼王权能否得到巩固,诺曼英国能否长治久安,主要取决于英王与贵族和教会的关系。在诺曼征服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英国的贵族与王权进行了密切合作,同时还应该看到,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实际利益纷争。从“征服者”威廉统治后期起,少数大贵族与王权冲突的端倪逐渐显露,主要表现为:

其一,诺曼大贵族已经取代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在英格兰社会的优势地位,他们不仅有显赫家世和征服军功,而且封地庞大,又因不愿受王权的节制。那些地产多、势力大的伯爵,多位高权重,桀骜不驯,他们为突破朝廷的肘制,不惜铤而走险,率众闹事乃至反叛。威廉征服英国后,直接封授了跟着他南征北战的 170 多个诺曼底人^{[1](P.11)},那些附庸的附庸虽然在理论上必须效忠于国王外,但他们的不从和反抗现象却时有发生。

[收稿日期] 2015-09-10

[作者简介] 姜守明,男,江苏盱眙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其二,英国的封建政治体制形成时间较短,发育不充分,多受原始部落遗风的影响,王位嫡长子世袭制仍未牢固地确立起来,国王诸子女乃至血缘关系较近的皇亲国戚为争抢王位而冲突不断,导致贵族阶级内部分裂,甚至兵戎相见,酿成大规模内战。

其三,诺曼王权建立后,英国横跨英吉利海峡而治,由此带来了英法间长期的领土纠纷,这就为大贵族的内乱提供了温床。一些贵族政治上失宠后,多为一己私利,或为寻求新主人,或为觊觎王位,不惜叛离王权的控制,而贵族与国王间因冲突所造成的对立情绪,往往又成为下一波冲突的催化剂。

早期诺曼王权与大贵族间的矛盾,除了政治因素的作用外,经济因素的影响也非同小可。诺曼征服后,国王不仅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地主,而且推行封主封臣制,创造了一个以土地封授和服骑兵兵役为纽带的贵族阶级。与大陆欧洲“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原则相区别,威廉在英国实行“我封臣的封臣还是我的封臣”的封建原则,强调各级封臣都必须向国王表示效忠和提供一定数量的骑士兵役。从根本上来说,国王和封建贵族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国王作为贵族的头,只有切实地保障贵族阶级的经济利益,其军役钱物征调,乃至王权本身的存在,才会有可靠的保证。正因为如此,威廉一世采取恩赐的办法,免除了大贵族的部分税额。贵族通过交纳必须的贡赋和提供相应的兵役来支撑王权,在稳定的统治秩序中分享土地财富等经济利益。所以,贵族和国王本质上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共生关系。

作为最高封主和一国之君,英王往往会根据统治需要赐予大贵族一定的免税特权,他在行使封君权和向贵族征税时,也会有一定的限度,这就形成了惯例或定制,所以一般不会遭到异议和反对。但理论上如此,实际情况较常理可能更复杂。贵族多从巩固和扩大其个人利益出发,通常会寻求减少或规避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势必会招致国王的追究与惩罚;同样,国王在行使权力时,难免不超出封建习惯的许可,从而引起贵族的不满和抗争。诺曼朝后期,国王逐渐对贵族进行超出常规的经济攫取,导致王权与贵族的矛盾凸显。例如,威廉二世没收贵族的地产和重征封地继承金,目的是用经济手段惩罚反叛者,其政治意味显然大于经济意义。不过为了笼络贵族,亨利一世

于1100年发布《加冕宪章》(Coronation Charter),承诺他要恢复先王“忏悔者”爱德华和威廉一世之良法,革除威廉二世之弊政。对《加冕宪章》的意义,19世纪史学家梅特兰(Frederick Maitland)和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曾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作为《大宪章》的前身,开创了约束王权、反对专制的先例,是英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虽然诺曼王朝君主从经济上攫取贵族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说,还没有严重不可收拾的地步。斯蒂芬统治时期,王位之争和内战暂时掩盖了王权与贵族的经济矛盾。安茹朝建立后,贵族与国王的政治上矛盾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因王位之争和国王专权而加强。而在经济上,国王利用领主权攫取贵族的现象明显增多,其中之一就是征调封地继承金,“因为国王有任意征调封地继承金的要求,他能够将此方式作为政治武器来使用”^{[2](P.58)}。此举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且也是扼制与惩罚封臣的有力手段。这一时期,王权对贵族的经济攫取大体上较为温和,高额的强制性敲剥和贵族负债现象实不多见,贵族的封建经济收入也比较稳定;加之,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较为稳定,王权与贵族各阶层正进行密切的政治合作,双方即使有不可避免的矛盾,不至酿成整个统治秩序的危机。亨利二世统治时期,鉴于封建地产因买卖、继承、转让等因素遭分割、骑士役征调困难的状况,推行以盾牌钱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改革,允许部分封臣缴纳,免除他们每年对国王负担的40天军役,国王以盾牌钱招募军队。不过,安茹初期推行的一系列财政增收举措,以削弱贵族特权为代价,侵犯了封建习俗^{[3](P.227)},引起了贵族阶层的不满,积聚和恶化了双方的矛盾。1168年和1172年,亨利二世进行的土地调查和征税,不仅成为1173年一些贵族反叛王权的原因之一^{[4](P.386)},更成为日后贵族反叛约翰王的先兆^{[5](P.3)},预示着封建王权危机时代的来临。

二、国王与教会的权力之争

诺曼王朝建立后,威廉一世除了加强对贵族的直接控制外,还向英格兰教会施压,强化教会对王权的服从。与此同时,罗马教会通过克吕尼改革,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威信,而且推销教权主义,在整个西欧与世俗君主争夺统治权。在此背景下,英国的教俗势力间原先保持的合作关系出现

裂缝,冲突逐渐成为主流,双方的矛盾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主教授职权”之最高主权归属问题。册封主教、修道院长等教会贵族,是教俗权力之争的焦点之一。由于历史原因,大陆欧洲的主教、修道院长这些高级神职人员都是由世俗封建主扶植起来的,从墨洛温王朝到加罗林王朝,情况大致如此。11世纪后期,克吕尼修道院高级僧侣希尔德布兰,即后来的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反对教会世俗化,反对俗权干预教权;坚持主教应效忠于教廷而非世俗君王,主张教廷有权审理一切的教学上诉案,教皇有权控制各国的教会和废立国王。旨在加强教会权威的克吕尼改革,收回了传统上为国王控制的教会权力,形成了一个以教皇为核心的欧洲国际神权政治体系。不过在英国,诺曼王权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因而较一般大陆欧洲国家强大,在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中也占据优势。教权主义运动在英国不仅受到冷遇,甚至还遭到强烈反对^{[6](pp.30-33)}。威廉一世维持与教皇的表面合作,而在实际上,他不断强化对英格兰教会的控制。他坚持不经国王的同意,主教会议决定和教皇命令在英格兰不具备效力。在象征教会最高权力的主教授职仪式上,他总是亲手将象征着权力的指环和权杖授予新任主教,并要求后者必须向他本人行臣服礼。威廉二世在位时期,受教权主义持续强化的影响,英格兰教会日益增强了对王权独立的倾向。在主教任职问题上,亨利一世因与教皇达成妥协,此后英王渐渐对教会让渡了属于世俗君主的传统权力。

其二,教俗法庭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中世纪时期,欧洲的教会和世俗社会的关系复杂,教权与俗权的界限模糊,双方在教俗法庭的司法管辖权问题上经常发生冲突在所难免。教会法庭与世俗法庭的司法管辖权的发展,往往呈现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英王斯蒂芬统治时期,因无力与教会争权,不得不于1136年4月签署一份皇家宪章,给予教会法庭对涉及教士诉讼的垄断性管辖权^{[7](pp.8-9)}。建立安茹王朝后,亨利二世借助于日益完善的普通法与教会法进行对抗,以应对不断膨胀的教会法庭管辖权。教士的司法豁免权(benefit)是教俗法庭间相冲突的最激烈问题。教会法庭宣称对教士享有管辖权,教士不受世俗法庭的司法管辖,而普通法法庭则坚持任何触犯普通法者都要接受普通法的审判。1155年,托马斯·贝

克特出任大法官,但他作为英王的重臣接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后,没有把王国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致力于维护教会利益,坚持教会法庭对涉及教士的诉讼享有垄断管辖权。1164年,亨利二世在克拉伦敦宫召开宗教会议,向主教们提出了王权高于教权的《克拉伦敦宪章》(*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旨在限制教会特权、抵制教会法庭的权力和教皇权在英国的限度。该宪章规定,犯罪的教士须在世俗法庭检举,在教会法庭审判后,仍须到国王法院审理并接受处罚^{[7](pp.12-14)}。此后,贝克特被迫流亡大陆欧洲。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的冲突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两个骄傲而忿怒人之间争吵的结果,实质上是君王和教会在争夺司法权。”^{[9](p.51)}不过后来,国王被迫撤销了违背教会法精神的《克拉伦敦宪章》中两个有争议条款,就是不但允许教士在没有国王许可情况下可以自行离开本王国,而且承认教皇可不经英王同意在英格兰行使教谕的权力。此后,英王不再阻止国人向罗马教廷上诉,对教士犯罪的审判权和判决权均归宗教法庭,世俗法庭只有事先确定犯罪者归属教界与否的权力^{[8](p.53)}。这样,教士在世俗法庭的诉讼豁免权获得了确认。

其三,封建权益特别是土地财产权问题。诺曼征服前,英格兰教会由于与国王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享有免除封建义务的特权。威廉一世建立诺曼王权后,遵循所有领主均为国王封臣的原则,将封建义务强加给领有土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但是,历代英王都觊觎教产。威廉二世没收了11座修道院和3个主教区的财产,还通过拖延主教任命来收取主教领地税款。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教会与英格兰君主处于短暂合作的状态。圣休伯特·华尔特作为大法官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曾先后效力于亨利二世、“狮心”理查和约翰一世。他跟随理查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侵,并积极谋划、赎回被俘的理查一世。理查王去世后,他帮助约翰顺利继位。在能干的华尔特主政下,即使约翰丧失了许多在大陆欧洲的领地,国内仍然保持了良好秩序。

华尔特死后,围绕着坎特伯雷大主教人选问题,教俗间又爆发了新的冲突。根据惯例,由于王权处于强势状态,历代英王均成功地将其首席辅臣推上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宝座。然而,教皇英诺森三世异常强硬,他一反传统做法,既否定约翰举荐的亲信,又否定英国教会推举的人选,而是说服

在罗马的英国教士们重新选举他属意的红衣主教斯蒂芬·兰顿继任。约翰对此极为不满,遂援引威廉一世的做法,拒绝教皇敕令,将兰顿拒于国门之外。教皇则宣布对英格兰教会实施绝罚,命令其停止一切宗教活动,次年又开除约翰的教籍。作为再反击的手段,约翰下令没收效忠于教皇的在英教堂和修道院的财产,结果迫使大批教士逃往大陆欧洲。1209 - 1211 年,因与英诺森三世争权,他从英国教会掠夺了大约 2.8 万英镑的财产^{[8](P.57)}。有学者认为,从 1209 年到 1213 年,约翰从教产上取得的收入,较任何英国统治者都多,直到 16 世纪才被亨利八世打破^{[9](P.75)}。为了驯服英王,英诺森唆使法王菲利普二世(1165 - 1223)入侵英格兰,并鼓动英国贵族反叛。约翰迫于外患与内忧的压力,只得被迫承认教皇对英国的宗主权。他不但接受兰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还公开承认自己为教皇的臣属,归还教产,每年向教廷缴纳 700 镑贡金,即所谓的“彼得便士”(Peter's pence)。这样,当初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向威廉一世提出而未果的要求,现在都兑现了。此后,许多领主的地产均以各种名义,转移到了享有特权的教会名下,教会俨然成为了各级领主规避封建义务的保护伞。从本质上说,英王放弃了对英格兰教会的最高权力,甚至在名义上也将整个英格兰的最高主权让与教皇,教权主义在英格兰达到了顶峰。

三、约翰王的任性、残暴与专制

中世纪时期,英国王权步入低谷的起点是理查一世统治的十年。为了追逐骑士的光荣梦想,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十字军东侵和保卫祖先的海外领土上,因疏于朝政,致使贵族反叛势力抬头,由此给法王插手国内事务和觊觎英国的大陆领地提供了机会。听说他的弟弟约翰与法王勾结叛乱后,理查只得缩短其东征时间,匆匆回国。他全力恢复他在被囚期间(1192 年 12 月至 1194 年 2 月)失掉的海外领地,并击败了卡佩朝最伟大、也是最有野心的君王,素有“奥古斯都”之称的菲利普二世。然而,理查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不幸中箭身亡。从此,英国王权开始跌入中世纪的低谷。

由于理查没有留下合法的子嗣可以继位,约翰和他的侄儿布列塔尼公爵亚瑟(Arthur of Brittany)为了争抢王位,几乎酿成一场兵戎相见的战争危机。约翰在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他起初并没

有成为继位的希望,而是在渡过了一场危机之后,于 1199 年 4 月登上王位的。年仅 12 岁的亚瑟是约翰的兄长杰弗里的遗腹子,效忠于法王,并根据长子继承制原则,对安茹王位提出权利要求。在安茹、曼恩、土伦和布列塔尼,亚瑟获得了重要贵族的支持。但是,约翰除了有理查的临终遗嘱外,他的优势还在于获得了母后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彭布罗克伯爵马歇尔(William Marshal)、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尔特(Hubert Walter)以及等几位最有权势的男爵的全力支持。

作为安茹朝的第三代君主,约翰继位之初,而且始终面临着一个最大挑战,就是法国的王权走向强大、法王摧毁安茹帝国的野心。尽管理查一世已于 1199 年和法国了达成为期五年的停战协议,但菲利普二世利用约翰立足未稳,企图夺取亨利二世的遗产诺曼底。1200 年 5 月,双方又订立《勒·戈莱特条约》(Treaty of Le Goulet),旨在解决英格兰的安茹君主对法国领土的权利要求问题。据此,法王正式拥有 1190 年代从理查手中夺取的几小块位于诺曼底边境地区的领地;英王为大陆地区的安茹领地须向菲利普支付两万马克继承税;布列塔尼公爵必须尊重英王,视约翰为自己的上级领主。作为交换条件,约翰同意断绝和布伦及佛兰德尔伯爵的联系。法国始终将佛兰德尔伯爵视为自己的传统对手^{[9](P.60)}。尽管约翰认为他与法王达成妥协是一次重大胜利,但事实上,该条约是菲利普蚕食安茹帝国野心的一部分,更何况约翰为那笔庞大的继承税还不得不向其封臣额外征收,其影响将会波及遥远的英格兰北部地区。最近几十年间,北方居民一直享有免税特权,如果英王突破先例,那他们随时都可能投靠敌苏格兰。这是任何安茹君主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由于法王的野心,更由于亨利二世的不肖儿子们及感情不和的妻子的背叛,安茹帝国已开始土崩瓦解。像理查一样,约翰决心维护祖上留产,可他是恶名在外,而且也是时运不济。他仅靠向法王让步和牺牲其臣民利益来达到目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一方面,英国的海外领地法国人觊觎已久,法王绝不会满足于一个《勒·戈莱特条约》所获得的那种细微的胜利,他得寸进尺,势将收回英国在大陆的全部领地;另一方面,虽然约翰额外征税不一定立刻吓跑支持他的贵族,可是如果他把随意向其臣民征税当成解决王室财政的重要手段,额外税变成了经常税,那么就会激起他们

的反抗。约翰在处理自己婚姻问题上的失策,给法王制造了再度干涉英国事务的机会,并促使英国贵族开始质疑约翰的统治能力。

约翰不仅能力有限,而且品行也不敢让人恭维。虽然他曾接受过良好教育,跟着著名法官格兰维尔(Ranulf Granvill)学习政府管理事务,还向马歇尔学习骑士技艺,学到了关于统治与战争的知识,但他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的个性缺陷,让这些令人尊敬的师长们蒙羞。难怪孔令平先生评价说,约翰“身上集中了安茹家族的一系列毛病:虚伪、自私、残暴和一意孤行”^{[10](P.116)}。关于约翰的品行,仅从他对待婚事的轻率态度上即可洞见一斑。

1174年,约翰七岁时与两岁的富有女继承人伊莎贝尔(Isabelle of Gloucester)订婚,15年后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由于亨利一世是他们共同的曾祖父,他们之间是禁止结婚的血亲关系,这桩未得到教皇赦免的婚姻,未能给约翰带来合法的子嗣。1200年,约翰提出离婚并获准,但他不但拒绝归还伊莎贝尔的嫁妆,还准备与葡萄牙公主喜结连理。他又临时变卦迅速迎娶了一名12岁的新娘。她是昂古莱姆伯爵的千金,既年轻又漂亮,且和约翰的原配同名,也叫伊莎贝尔。借助于这桩婚事,约翰可以加强对阿奎丹的控制,因为伊莎贝尔“所继承的那份地产可以帮助约翰把他的帝国的南北两个部分联成一片。而这样一件看起来非常明智的婚约,却导致了诺曼有丧失。”^{[11](P.56)}原来,已和伊莎贝尔订了婚的拉玛尔舍伯爵休(Hugh X of Lusignan)正准备迎娶,现在竟被约翰横刀夺爱。于是,他伙同他兄弟厄伯爵拉尔夫(Ralph of Eu)向法王告状。菲利普不仅支持诸侯叛乱,而且还帮助亚瑟图谋英国王位。他要求约翰前往巴黎,就其没收拉尔夫的多处地产、罚没休的领地拉玛尔舍等事作出应讯,约翰拒不听从召唤。1202年4月底5月初,他还以不履行封臣义务为由作出裁决,没收约翰在大陆上的全部封地作为惩罚。至此,约翰在《勒·戈莱特条约》中取得的那点微不足道成果已付之东流,同时还招致了一场与法国的战争^{[9](P.62)}。

战争初期,约翰率军迅速围攻米勒博(Mirebeau)城堡,俘虏了亚瑟、沙特勒奥特子爵、吕西南的杰弗里等叛军首领,以及数百名法国人。他把亚瑟囚禁在下诺曼底的法莱斯(Falaise),把亚瑟的22名主要支持者遣送到英格兰西南部的康瓦

尔。一个多月后,他们全部被饿死在多塞特的科孚(Corfe)城堡中。1203年春,亚瑟被押往鲁昂,随后就突然失踪了。几乎所有证据都表明,约翰必须为亚瑟的死负责,一些同时代人宁愿相信约翰在发酒疯时刺杀了自己的侄儿^{[9](P.63)}，“且将其尸体掷入塞恩河”^{[12](P.159)}。在诺曼底和安茹,亚瑟被杀不仅使人感到恐惧,更使人失望、进而走向反叛。此时,曾以闪电般行动突袭米勒博城堡的男爵布里奥斯(William de Briouse),对约翰杀侄的举动耿耿于怀,远离宫廷而退隐了。虽然法国战事还在进行,约翰已无心恋战,他不得不于1203年底退回英格兰,并于第二年没收了向菲利普宣誓效忠的诺曼底贵族的领地。这样,战事失利、诺曼底陷落、封臣叛乱等一系列事件,在沉重打击了约翰威望的同时,导致那些在海峡两岸均拥有地产的贵族被迫作出艰难的抉择:要么继续效忠约翰以保住英格兰封地,要么投靠法王以维护法国地产。1205年4月,彭布罗克伯爵为保住其位于朗格维尔的荣誉领地及诺曼底其它地区的财产而倒向菲利普,约翰再失一位重要辅臣。此后,恢复失地就成为约翰后期压倒一切的奋斗目标。

约翰自继位以来,一直致力于巩固安茹帝国的统治,但实际效果极为有限。到目前为止,他在治国理政方面基本上乏善可陈,除了教权主义盛行和法国中央集权加强这些因素的肘制外,其个人能力也着实不能让人恭维。不管怎样,有几个绰号始终围绕着他,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对这位生不逢时、心高命薄的君主统治能力的最好注脚。亨利二世和埃莉诺育有八个子女,威廉在五个男孩中为长,他三岁时就夭折了。其他四个男孩,亨利、理查和杰弗里三兄弟皆受封土地,约翰因年少而独无,便有了“无土王”(John Lackland)的称呼,虽然他后来获得了爱尔兰的封土;在与法王的斗争中,因丧失大片海外领地,又被称为“失土王”(John Lostland);在1200-1205年对法战争中因一系列的军事失利,再获“软剑王”(John Softsword)的绰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软弱不经世事的约翰,他在对付那些背叛和落败的政敌时,又表现极端残暴的一面,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恶名。除了谋杀亚瑟和饿死亚瑟的20名追随者外,约翰之恶名远扬,还与他追杀布里奥斯的暴行相联系。由于布里奥斯拒绝重新效忠于王室,约翰遂发出灭杀布里奥斯家族的毒誓,并于1210年亲征爱尔兰。后布里奥斯辗转流亡法国,

于1211年因穷困潦倒而死;布里奥斯的妻子玛蒂尔达和小布里奥斯落入国王之手,后被饿死在温莎城堡的地牢中。

自从诺曼底沦陷的那天起,约翰一直在积蓄力量,想为自己洗耻,夺回失地。收复失地,此心可鉴。然而,知易行难。战争是靠物质力量来支撑的,要对法开战就必须有殷实的府库作后盾。在反对法王的斗争中,“查理激起了臣民对他的忠诚,但查理的品质却无法博得这种忠诚。暴行劣迹早已让约翰声名狼藉,先前的许多支持者已经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加之如前所述,教皇及教会又迫使他俯首称臣,现在他能动员起来与法王较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已相当有限。不过为筹措更多的对法战争经费,他不顾封建习惯法的约束,任意没收封臣的领地;他践踏一切习惯和成例,额外增加捐税;他不仅将目标指向犹太人和贵族,甚至也对骑士和市民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财政措施和任性严厉的统治手段,加之对法政策的失败,进一步激起了英国社会的不满和公愤,贵族们已经无意再对国王妥协。此时,约翰如果有几个精明强干的辅臣在身边,或许可以给提出适当的施政建议,或许可以充作贵族们发泄不满的挡箭牌,而不至于让他自己直接暴露在那些心怀不满的北方贵族面前。但是,约翰已经成了孤家寡人。

1213年8月25日,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贵族集会上,兰顿大主教大声朗读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以表达他们对王权专制的抗议。一年以后,大半来自北方的贵族拒不向约翰交纳兵役免役税。1215年初,他们在斯坦福(Samford)武装集会,不久,教会、骑士和市镇也有代表参与其中^{[12](P.161)}。由于国王和贵族的矛盾已不可调,兰顿和威廉·马歇尔以1215年1月出现、2-3月修改的《无名自由宪章》(*Unknown Charter of Liberties*)为蓝本,放弃有一些激进的条款,草拟了

相对温和的《大宪章》(*Magna Carta*),藉此与国王谈判,以避免内战的发生。已经意识到失败的约翰,不得不于1215年6月15日和男爵代表在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Runnymede)草地举行会谈,6月19日在《大宪章》(修订本)上签字画押。

[参考文献]

- [1]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 [2]Sidney Paint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feudal Barony* [M].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80.
- [3][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 [4]W. L. Warren. *Henry II*[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5]Thomas K. Keefe. *Feudal Assessments and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Under Henry II and His Sons* [M].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6]Norman F. Cantor. *Church, Kingship and Lay Investiture in England, 1089 - 1135*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 [7]G. B. Adams and H. M. Stephens (eds.). *Select Document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Z]. London: Macmillan, 1924.
- [8]阎照祥.英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9][美]迈克尔·V. 亚历山大.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10]蒋孟引.英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1][英]安东尼娅·弗雷泽.历届英王生平[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 [12][美]C. 罗伯茨, D. 罗伯茨.英国史(上册)[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

(责任编辑 光 翟)

论英国孤立主义外交的特点

——基于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的分析

高建芝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英国有着悠久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并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具有了自身的特殊性。A. J. P. 泰勒在《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一书中,多处提及英国孤立主义外交,并且表达了自己对这项政策的独特理解,概括起来就是:英国孤立主义外交具有欧洲地区性、与体系结构互动、相对性、不断强化以及与英国的全球战略密切相关。

[关键词] 英国; 孤立主义; A. J. P. 泰勒; 《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特点

[中图分类号] K5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51-05

A. J. P. 泰勒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欧洲近现代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有着很高的造诣。泰勒一生著作颇丰^①,其中《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就是其代表作品之一。该书讲述了从 1848 年欧洲革命至 1918 年《布列斯特和约》(The Brest-Litovsk Treaty)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十四点”原则期间欧洲的外交斗争。泰勒以欧洲列强之间的外交斗争作为研究重心,分析了“均势外交”在欧洲列强之间博弈的作用,他还在文中多处提及英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并且阐述了对这项政策的独特理解。本文将以太勒的视角,探究英国孤立主义外交的特点,以使我们对这一外交政策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一、“光辉孤立”与欧洲均势

“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概念最先由加拿大财政部长于 1896 年 1 月提出,他认为,英国的“孤立”事实上是“光辉的”。“孤立”是一种对于其他列强刻意地选择态度,即“孤立”是一项政

策。^[1]随后英国海军大臣戈申(Goschen)于同年 2 月 26 声称,“我们的孤立不是软弱的孤立或给自己带来蔑视的孤立。它是一种故意选择的孤立,是在任何情况下可以按自己意愿采取行动的自由”^[1]。此后,“孤立”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一项“政策”说出和写下来。1898 年 3 月 13 日,张伯伦(Chamberlain)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如果孤立政策,迄今为止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政策,就应该在将来继续保持”^[1]。3 月 29 日,张伯伦与德国驻英大使哈茨菲尔特(Hatzfeldt)考虑建立英德同盟时明确地提出了“孤立政策”。英国直到 19 世纪末才将孤立主义作为一项政策明确地提出来,并成为日后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依据,那么,这项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英国孤立主义外交具有明显的地区性特点,即局限于欧洲。英国推行孤立主义外交的对象是欧洲列强,并且围绕它们进行政策的调整。首先,英国是一个欧洲国家,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其尤其注重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其次,欧洲均势影响着英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每当欧

[收稿日期] 2015-10-02

[作者简介] 高建芝,男,江苏淮安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 泰勒的代表作品主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英国史(1914-1945)》(English History 1914-1945)、《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欧洲外交中的意大利问题(1847-1949)》(The Italian Problem in European Diplomacy, 1847-1949),等。

陆发生重大的局势变动,英国往往无法独善其身,虽然英国是一个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但其薄弱的陆上力量决定了它无法对那些破坏欧洲均势的大国作出实质性地打击,因此,一直以来英国坚持的原则是:如果英国没有一个大陆上的盟国,就绝不可能有效地对一个大陆强国采取行动。^{[2](P.245)}再次,英国的安全需要欧洲均势。泰勒曾说:“英国的安全依靠两个因素——海上霸主地位和欧洲均势。”^{[2](P.303)}海权是英国作为强国和开展海外贸易的保障,但是前提条件是欧洲均势的维系。作为一个主导性海洋国家,英国一直是欧洲均势最雄辩的保护者,对它来说“欧洲均势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英国在海洋世界中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前提”。^{[3](P.85)}当欧洲均势得到维持的前提下,英国可以置身欧洲事务之外,专心海外扩张,这为其推行孤立主义外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洪邮生教授在《试论英国对欧孤立主义传统》一文中写道:“英国维持欧陆均势,不是为了称霸欧洲,而是为了能抽身维护海外殖民霸权。”^[4]

泰勒认为,大陆均势构成了欧洲体系结构,欧洲列强互动所构建的体系结构,使得英国无法脱离于体系结构而单独行事,英国的行为会受到欧洲体系结构的影响。当欧洲均势能够保证的前提下,英国可以自由地推行孤立主义外交,当欧洲均势受到威胁时,英国又不得不回归欧洲,恢复均势。19世纪末,面对德国对欧洲均势的威胁,英国对其战略进行了调整,基辛格(Kissinger)认为,英国从19世纪末开始的战略调整,即通过与竞争对手、俄达成谅解,以外交手段保卫英帝国的海外利益,减轻自己的负担,这种调整有担心德国成为英国地缘政治威胁的意味,但是当时主要还是针对特定的事态,即欧洲均势的失衡。^{[5](P.188)}泰勒以摩洛哥危机(The Moroccan Crisis)为例,认为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危机,它对英国对外政策的调整至关重要,之前英国利用体系结构的稳定性服务于帝国扩张的利益,但此后英国却是宁可丧失某些帝国利益,来维系体系结构的稳定性,泰勒说:“虽然,从摩洛哥到波斯,帝国利益仍需重视,但至此往后这些利益需适应同欧洲列强关系的整个结构,而不再如过去一样,由这些利益来决定同列强的关系。……现在英国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作出让步以加强均势”^{[2](P.438)}。

二、孤立主义的相对性

英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绝

对的,它具有相对性的特点。自德国统一以来,欧洲形成了以德国为中心的新均势,英国不仅对此不去反对,反而表示了欢迎。1875—1878年的东方危机,起初英国主张所有列强能够保持克制,不去干涉土耳其内政,以免破坏欧洲均势。1875年7月31日,在俄土战争爆发前夕,迪斯累里(Disraeli)说道:“为什么英国身处孤立状态?那是因为英国决定支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6](P.64)}。德比(Derby)伯爵也表示:“自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起义以来,英国政府已表明不赞成其他列强在外交上干涉奥斯曼帝国的事务。”^{[6](P.73)}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看似尊重土耳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实上,只不过是英国在欧陆推行孤立主义外交的一种方式而已。当俄土战争的结果威胁到英国在海峡与君士坦丁堡的利益时,英国遂一改之前的不干涉政策,转而谋求与奥匈帝国合作,迫使俄国放弃一些战争成果。东方危机前后,英国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不干涉到积极介入的转变,这正是其孤立主义外交相对性特点的最好印证。

英国与法、俄两国的矛盾使其关注与德、奥两国的关系,英国认为德、奥在欧洲牵制法、俄可以保证欧洲均势,这样自己就可以放手进行海外扩张,因此,它对1879年的德奥同盟(The Dual Alliance)表示欢迎,并说后者是“令人非常高兴的好消息”^{[2](P.266)}。泰勒分析认为:“在德奥同盟诞生之前,英国人不得不带头在巴尔干反对俄国,现在他们却可以把这个差事交给奥匈帝国,相信到头来德国将不得不出来支持奥国,从今往后,德国将为英国打仗,而不是倒转过来”^{[2](P.266)},正因为如此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对此表示欢迎。

柏林会议(The Congress of Berlin)后,欧洲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欧洲列强纷纷将国内积聚的资本投放到海外,这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欧洲列强的注意力。这一时期,英国人奉行科布登主义(Cobdenism),不愿在大陆中介入。泰勒说:“在1864—1906年之间,没有一个英国政治家去考虑派遣远征军去大陆的问题。英国的政策完全是以欧洲以外的利益为依据的。”^{[2](P.284)}英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强化了孤立主义外交的推行。然而,1885—1887年的东方危机又使我们看到英国孤立主义外交相对性的特点。为防止法、俄接近,英国与奥匈帝国、意大利签订了两次《地中海协定》(The Mediterranean Agreements),英国需要奥、意两国帮助其反对法、俄,但是它又不愿承担军事义

务。在签订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时,索尔兹伯里坚持:“像英国这样一个议会制国家,不能陷入束缚自己的责任中”^{[7](P.68)}。第二次地中海协定签订后,索尔兹伯里告诉女王:“这是我们议会制度所能允许的最接近于同盟的一种关系”,它对于“避免危机是非常必要的”^{[8](P.111)}。泰勒也说过:“这个协定是比英国在和平时期签订过的任何协定都更接近于同一些强国结盟的文件,并且比20年后同法国或俄国签订的任何协定都更为正式。”^{[2](P.321)}20世纪初,当英国与法、俄分别缔结协约后,它同样未明确给两个盟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英国这种需要盟友帮助,却不愿承担缔结同盟义务的做法,明显地体现其孤立主义外交相对性的特点,用罗斯伯里(Rosebery)的话来解释,就是英国“既要享受大陆同盟体系的恩惠,又不冒险成为同盟中的正式成员”^{[9](P.160)}。

三、孤立主义的不断强化

有些人认为,随着欧洲列强之间结盟体系的逐渐构建,倍感孤立的英国会逐步放弃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但是在泰勒看来,至摩洛哥危机前,英国孤立主义外交非但没有淡出历史,反而得到了强化。

19世纪最后20年,英国与法、俄之间存在尖锐的利益纷争,英国时常借助三国同盟(The Triple Alliance)的力量平衡来自法、俄的压力,这使英国经常卷入欧陆列强错综复杂的外交斗争之中,然而,随着法俄同盟(The Franco - Russian Alliance)的建立,欧陆形成了以法俄为一方,三国同盟为另一方的均势,英国因此有了置身欧洲事务之外的机会,事实上,正是在这一天英国的“孤立”开始了。^{[2](P.352)}

当英国将“光辉孤立”作为一项政策推行后不久,就遇到了1898年9月至1899年3月,英、法为争夺非洲殖民地,爆发的法绍达危机(The Fashoda Crisis)。泰勒认为:“法绍达危机,是英国‘光辉孤立’政策的胜利。”^{[2](P.382)}泰勒的理由是:由于英国建立了强大的海军,主宰了地中海,控制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不但使其不再担心法俄同盟对自己的影响,而且也使两次地中海协定所达成的英、奥、意三国协调,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泰勒认为:“法绍达使‘光辉孤立’更加牢固”^{[2](P.382)}。

在法绍达危机期间,英国依其强大的海上力量,最终赢得了危机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但巩固了

英国在埃及的地位,强化了在地中海区域的主导权,而且还开启了英法缔结协约的窗口,正如瑞克(T. W. Riker)所说:“当然,1899年的协定并非是蕴含战争病菌的所有现存困难的一次调整。它未提及英国在埃及的地位,这可能仍然是两国讨价还价的主题”,但是“结果将是英法协约(The Entente Cordiale)”^[10]。

英法协约看似是英国放弃孤立主义,转而走向承担盟约义务的道路,但是泰勒却并不赞同,他认为:“在英法协约诞生过程中,不是英国急于寻找盟友,而是法国。……改变完全是在法国方面,其动机是日益迫近的远东危机”^{[2](P.412)}。泰勒提到的远东危机是指日、俄之间的战争危机。1902年1月,英日缔结同盟条约,法国担心即将到来的日、俄纷争有使英、法两国都牵涉其中的危险。那么,英日同盟(The Anglo - Japanese Alliance)是否就标志着英国放弃孤立主义外交呢?泰勒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说:“英日同盟对俄国在满洲的地位不构成威胁,最多使俄国的进一步扩张更加困难一些罢了。这一盟约也不是标志着英国终止孤立,反而是更加证实孤立。”^{[2](P.400)}因为在远东地区有了日本对俄国的牵制,法国不会为了俄国远东地区的利益而同英国发生对抗,因此,在英国看来,欧洲均势是可以得到维系,孤立主义外交也将继续推行。泰勒认为,英法协约并不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英国目的在于将埃及和摩洛哥不再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主题,“它增进了而不是终止了英国的孤立”^{[2](P.413)}。泰勒还表示,20世纪初,虽然英国海上霸权面临来自德国的挑战,但是随着俄国在远东的失败,与法国实现了和解,远东又有日本的支持,英国自身加快建造舰队的速度与规模,因此“此时英国享有的海上霸权,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孤立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达到了顶峰”^{[2](P.426)}。

英国孤立主义的强化直到摩洛哥危机时才得到改观。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说:“我们必须能自由地去援助法国,抑或采取旁观态度。……如果事先没有做好军事计划,我们就不能及时支援它。”^{[2](P.438)}从格雷的话语中我们会发现,他的前一句话意在表明英国有着对外政策充分的自由度,后一句话暗示英、法进一步合作的意向,格雷在坚持英国孤立主义外交和承担同盟义务的选择上,表现出了些许转变的迹象。泰勒对格雷的话语也作出了自己的

评析,他认为:“已经被忽视了四十年的‘欧洲均势’重新主宰了英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德国的每一个行动都被认为是对大陆霸权的争夺”^{[2](P.438)}。英国回归欧陆,关注大国之间的外交博弈,置身其中进行协调,表明英国正向承担盟约义务的方向上迈进,但是这个过程最终完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四、孤立主义与英国的全球战略

英国的孤立主义外交与其全球战略紧密相连。英国曾被誉为“世界工厂”(Workshop of the World),英国人普遍认为,通过自由的商品交换,英国将获得无限的和不断增长的世界财富的主要份额。^{[11](P.17)}当时盛行的科布登主义强化了英国人的认识。英国人需要欧洲均势与和平,只有欧洲均势与和平得到保障,自己才可以将精力放在海外自由贸易上,大多数英国政治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较少出口,增加进口,减少隐形收入,损失人力、运输等。维系和平对于像英国这样的经济体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11](P.17)}英国这种全球性的战略地位使得它的外交政策虽然核心在欧洲,但是不会局限于欧洲,当欧洲和平与均势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英国可以超然于欧洲之外,大行孤立主义外交。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说过:“与其他列强相比,英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利益。”^{[11](P.18)}

英国对自己全球战略的考虑,推动了孤立主义外交的实施,反过来孤立主义外交又促进了英国的全球性扩张。但是至19世纪后期,英国国力开始衰退,全球战略也受到欧洲众多列强的挑战,其中以法、俄、德与英国的矛盾较为突出。英国需要欧洲均势与和平,这样它的全球战略才可以得到保证。一方面,英国与三国同盟成员接近,以平衡来自法、俄方面的威胁。1887年的两次地中海协定,英国拉拢德国承担反对法、俄的责任,“这意味着‘三皇同盟’(The Three Emperors' League)遭到致命地打击,还使意大利、奥匈帝国乃至德国与英国一同保卫海峡地区”^{[7](PP.99-100)}。后来,英国与德国进行了长时间的结盟谈判,其目的也是如此。另一方面,随着德国势力崛起,英国又对自己的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保罗·肯尼迪认为:“当众多关键区域同时需要帝国政府承担义务时,必须考虑哪些地区拥有优先权,哪些地区必须让步,……如果英国过多地关注某一地区,它将无力保

护其他地区”^{[11](P.18)}。

为了应对因国力衰退所带来的困境,在远东地区,英国通过与日本缔结同盟条约以及后来续订盟约的方式,保证了自己在远东地区和印度的利益。在北非地区,英国与法国达成殖民地分割协议,确保自己对埃及的主导权,巩固通往东方航线的安全。在中亚地区,在法国的帮助下,英国又与俄国达成妥协,对此有人这样评价法国在英俄协约(The Anglo-Russian Entente)缔结过程中的作用,“由于法国的安全是建立在与俄国同盟以及与英国协约的基础上,只要在它的旧有盟友与新近朋友之间有着冲突的危险,法国人就十分痛苦地关注该体系可能的危险。因此,法国人不遗余力地促成英俄达成共识,以消除这一危险”^[12]。“在1907年,是法国而非英俄,真正希望创建三国协约(The Triple Entente)”^{[13](P.203)}。

英国与日、法、俄关系的变化,体现其全球战略调整到以欧洲为中心与维持欧洲均势的轨道上来。然而,我们不应夸大英国与法、俄的协约关系,也不能说英国已经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泰勒认为:“协约主要是解决分歧而不是发展成为一种同盟”^{[2](P.445)}。英国与法俄的协约是脆弱的,如果在三国缔结协约过程中,德国能够保持沉默,那么“三国协约”可能很快会瓦解。^{[2](P.446)}1908—1909年发生的波斯尼亚危机,刚好就印证了泰勒的判断。波斯尼亚危机期间,虽然三国协约已经建立,但是英国仍致力于推行孤立主义外交,时任英国驻俄大使尼克尔森(Nicolson)曾对格雷说:“我认为对于我们而言不管这种微妙的问题将更为明智。我们采取的任何步骤可能会被误解,在此危急时刻是不吉利的。……最好让奥、俄两国内阁自己解决它们的分歧,无论如何都不要牵涉我们自己……”^{[14](P.362)}

五、结语

通过对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一书的分析,我们对英国孤立主义外交的特点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首先,英国的孤立主义外交与欧洲均势的体系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欧洲均势体系为孤立主义外交提供结构性的保障,反过来体系结构也在束缚孤立主义外交的执行;其次,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有明显的欧洲特征,欧洲是其外交的焦点;再次,英国的外交在“孤立”与“介入”之间总是存在相对性,它随着欧洲均势与和平的变化

而做出调整;最后,孤立主义与英帝国的全球战略紧密相连,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推动英帝国的全球扩张,使其赢得巨大的利益,但是随着全球战略的回缩,孤立主义最终又回归欧洲。英国在海外利益上作出的让步并不是它放弃孤立主义传统,在一段时间内,反而标志着孤立主义的强化。

[参 考 文 献]

- [1] Christopher Howard. The Policy of Isolation [J].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67(1).
- [2]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 – 1918) [M]. Great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3] 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3.
- [4] 洪邮生. 试论英国对欧孤立主义传统[J]. 西欧研究, 1992(3).
- [5]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 [6] Lord Robert Montagu. *Foreign Policy: England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M].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77.
- [7] Colin L. Smith. *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tinople* (1886 – 1891) [M]. London: Amen House, 1957.
- [8] C. J. Lowe.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m: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 – 1902) (Vol. 1)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9] Gordon Martel. *Imperial Diplomacy: Rosebery and the Failure of Foreign Policy* [M]. London: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0] T. W. Riker. *A Survey of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shoda Crisis*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29(1).
- [11]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 – 1945 (Eight Studies)*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4.
- [12] Olga Crisp. The Russian Liberals and the 1906 Anglo – French Loan to Russia [J].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61(93).
- [13] Gerald David Clayton. Britain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Missolonghi to Gallipoli [M].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71.
- [14] G. P. 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 – 1914 (Vol. V)* [M]. London: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28.

(责任编辑 光 翟)

从克拉伦斯公爵之死到博斯沃思的硝烟

——论约克王朝的衰亡

刘诗苑

(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9)

[摘要] 1471-1483 年是英王爱德华四世在位的黄金期。在这期间,英格兰看似从玫瑰战争中前期的混战中恢复了祥和的局面,但实际上,宁静表象的背后隐藏着约克王朝巨大的统治危机。1483 年,爱德华四世去世,继位的爱德华五世及其弟随即被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囚禁于伦敦塔中。背负篡位之名的理查三世统治英格兰仅仅两年后,即于 1485 年战死在博斯沃思。约克家族的迅速覆亡反映了当时英格兰国内复杂的贵族派系斗争也折射出英格兰在中世纪行将结束之时的时代特性。

[关键词] 约克王朝; 玫瑰战争; 理查三世; 克拉伦斯公爵; 博斯沃思

[中图分类号] K5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56-06

约克王朝(1461-1485)是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的旁支,其统治正处于英格兰贵族们为了王位混战不堪的玫瑰战争时期。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的矛盾和仇恨由来已久,而约克家族一直以来就认定兰开斯特家族对英格兰的统治为非法,其理由一是 1399 年兰开斯特的亨利·博林布鲁克弑君篡位,将“上帝册封”的君王理查二世推翻。但是论血缘关系,兰开斯特家族是金雀花王朝的旁支,第一代君王亨利四世也是爱德华三世的直系后代;其二,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针对统治者的叛乱大多持续十年之久或更长,天生的极端保守心态使得英格兰的民众在约翰王之后很少且不愿意质疑王室的合法性与统治。绝大多数英格兰人坚信涂过圣油的国王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1](P.132)} 约克家族所谓针对王位合法性的指责透露出的只不过是他们对权力的欲望,同时也反映出亨利六世的软弱无能。导致玫瑰战争爆发的根源已有部分文章对其进行过讨论,本文则拟对爱德华四世 1471 年重登王位后,约克王朝由胜到衰的 12 年历史进行简单的梳理,进而对约克家族

衰亡的原因及当时的历史状况作简要的探讨。

一、克拉伦斯的乔治之死

克拉伦斯公爵全名为乔治·金雀花,是第三代约克公爵理查·金雀花的幼子,英王爱德华四世是其兄长,1461 年爱德华四世继位后他便获得了公爵头衔。乔治天性傲慢,固执己见,素来对自己的兄长爱德华四世怀有偏见。巴内特战役后,乔治见其岳父沃里克伯爵大势已去,遂重新归顺爱德华四世。国王顾及亲情,十分大度的赦免了乔治之前针对王室的叛行。

自 1471 年起,乔治通过各种巧取豪夺跃居为英格兰西南地区的首富,但是贪婪的克拉伦斯公爵从来克制自己对于财富的追求,恰逢“国王制造者”沃里克伯爵谢世,乔治对他所遗留下来的大量地产垂涎三尺。同时盯上这份地产的还有国王的另一位弟弟格洛斯特公爵的理查,为此,兄弟二人争吵不休甚至准备大动干戈,爱德华四世为了维护王室的稳定不得不介入乔治与理查的争吵。就爱德华四世的个人情感来说,格洛斯特公爵的理查自玫瑰战争爆发起始终伴随国王左右,多次在战场上

[收稿日期] 2015-09-21

[作者简介] 刘诗苑,男,湖北咸宁人,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为爱德华四世出生入死,早已与国王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乔治之前的所作所为一度让爱德华四世无比头疼,其与沃里克伯爵勾结试图取代爱德华四世的军事行动更是让国王愤怒不已。但是国王还是强迫自己在两位王弟面前作出了自觉公正的决定,根据爱德华四世的判定,“理查及其妻子安娜取得这些贵重地产的半数。但为了安抚乔治,爱德华四世为之提供了艾科斯特及附近均线的额外土地作为补偿。”^{[1](P.222)}除此之外,国王还设法让理查将掌礼大臣的头衔让给了乔治,以表示国王对弟弟的重视。

但乔治傲慢的个性以及长久以来对爱德华四世积蓄的仇怨和嫉妒使得他不会对国王有任何心理上的感谢与让步。尤其是巴内特战役前沃里克伯爵曾许诺乔治,如果杀死爱德华四世,那么乔治将取而代之成为约克王朝新的君主,计划失败后,乔治的国王梦碎,这使得他对于兄长的仇恨与嫉妒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爱德华四世对理查更加宠爱有加,“在此后几年里,只要国王首肯理查在北部扩张权力与财富,乔治就会提出相应的要求,而不论是否合理。”^{[1](P.222)}再者,爱德华四世也隐约感觉到乔治对于自己王位的觊觎,很快,国王与克拉伦斯公爵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乔治与爱德华四世之间矛盾的爆发始于1477年4月的一次突发事件,这一年,克拉伦斯公爵的妻子伊莎贝尔死于怀孕。爱妻的离世让脾气本就乖戾的乔治变得更加暴躁和为所欲为。而乔治与伍德维尔家族之间的矛盾也因为乔治的不理智而显露,乔治自兄长爱德华四世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结婚起便一直对伍德维尔家族的崛起不满,“公爵认为,由于王后和外戚得势,自己受到的伤害不比其他贵族少。外戚荣华富贵,自己却前途未卜。”^{[2](P.366)}这一次,乔治更是胆大妄为的对伍德维尔家族的远亲安卡雷特·特维尼霍进行污蔑与人身攻击,他认定特维尼霍毒死了伊莎贝尔并强行控制法庭对特维尼霍进行判决,判决过后便将特维尼霍处死。遇此厄运的还有数名与伍德维尔家族有联系的当地人。

爱德华四世是英格兰中世纪一位重视国家司法建设的国王,历来反感贵族对于国家法律和法庭的干涉,对于干涉法庭审判的贵族,国王是毫不

手软的。乔治不仅仅在司法程序上触犯了国王的底线,他长期以来对于王位的觊觎也使得爱德华四世确信王弟有谋反之心,国王必须做出及时的应对措施。1477年5月,爱德华四世下令逮捕克拉伦斯公爵乔治并将其投入伦敦塔中。最初,国王在等待弟弟的觉悟和忏悔,但是已经失去理智的乔治在法庭上公然咆哮宣扬伊丽莎白王后不是国王的合法妻子。乔治对王后的污蔑让伊丽莎白及伍德维尔家族极其不快,如果不对乔治斩草除根,两个王子的合法性将受到流言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伊丽莎白王后在对乔治的判决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乔治自身的狂妄与数度口出狂言使得国王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弟弟送上死亡之路。1478年,乔治被控干涉司法及诽谤国王,判决死刑。

据大卫·休谟的《英国史》记载:“克拉伦斯被定罪后,国王对御弟的唯一恩惠就是,准许他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他在伦敦塔内被一桶马姆齐白葡萄酒淹死。异想天开的选择说明公爵对这种饮料情有独钟。”^{[2](P.386)}对于乔治的死亡原因,大卫·休谟的考证并非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乔治死于这种独特的方式,尽管英国史学界相当部分人对酒桶淹死这一说法持以肯定态度。克拉伦斯的乔治之死尽管带有有很大的谜团成分,但可以确信的是,公爵必须为自己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也有研究表明伍德维尔家族在乔治之死中扮演了国王身边那一批最极力于怂恿之事的角色,该研究还证明克拉伦斯公爵的倒台是伍德维尔家族一系列联姻的必然结果。^{[3](P.80)}

克拉伦斯的乔治之死让爱德华四世彻底铲除了危及王位的威胁,但乔治之死给约克家族带来的影响绝对不仅仅只是扫除了一个叛逆者和试图篡位者这么简单,伍德维尔家族在这次事件中几乎获得全胜,与爱德华四世一样,伍德维尔家族开始沉浸在所谓的和平之中。但这个家族长期以来的贪婪、掠夺与专横已经让许多贵族心生不满,而乔治之死更让大小贵族认为,国王可以为了外戚的权益处死自己的亲生弟弟。要提到的是,乔治的死分裂了约克家族的内部团结。尽管有传闻,将乔治溺死在马姆齐甜酒中的人就是格洛斯特公爵理查。也许,此时的理查对乔治的死是否产生

过一定的震撼与罪恶感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伍德维尔家族的不满和敌视已经是有所加剧。这一切的危机都隐藏在爱德华四世强大的个人能力背后,在适当的时候,危机终将浮出水面。

二、爱德华四世的统治危机

通常认为自1471年起,直到1483年爱德华四世去世,约克王朝进入了最稳定的12年。在这期间,国王有足够的时间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他的才能,当然,爱德华四世的确做到了。首先,颇有经济头脑的爱德华四世设法将王室的财政权收归己有,而在兰开斯特王朝,王室在财政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这与兰开斯特的君王们喜欢将土地赐给宠臣有着直接的联系。加之战乱丛生,贸易与关税收入大为减少,王室不得不通过依赖议会来改善财政危机。爱德华四世还致力于对司法系统的振兴与完善,主张司法公正,反对贵族干涉法庭。曾是兰开斯特派的约翰·福特斯特爵士评价爱德华四世在司法上所做出的努力,他认为国王赐予给英格兰人的,比任何英国国王都多,英格兰人可以享受自己的财产,生活在更为确定的正义之下。上帝知道,这种正义英格兰人已经失去很久了。^{[1](P.220)}

史学界对爱德华四世的评价大都集中于英俊、颇有谋略以及较强的个人控制力等字眼。罗伯茨兄弟与比松合著的《英国史》中评价爱德华四世:“爱德华四世是一个非常不可能将王权恢复到以前优势地位的人。他是一个高大英俊、和蔼可亲、懒散放纵的年轻军人,酒、女人和华丽的衣服是其最大的嗜好。”^{[4](P.236)}大卫·休谟则评价说:“年轻国王胆略过人,活力充沛,轻进果锐,心如铁石,察察为明,故而不为温情所动,恣其勇武,以历报怨。”^{[2](P.357)}而最近的一本关于爱德华四世的传记描述这个国王为:爱德华是一个极具军事天赋且勇往直前的战士,但是他那极不情愿在法作战的行为使得他并不能在英格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武士国王中占有一席之地。^{[5](Chapter 8)}

从上述评价中不难发现,爱德华四世尽管可以称作是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一位明君,但和他的祖先长腿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相比较,这位年轻的君王是轻率和鲁莽的。“爱德华一朝的荣耀随着内战结束。即使在内战中,他的荣誉也受

到血腥、暴行和残酷的严重玷污。此后,他的精神似乎沉溺于怠惰和逸乐,他的一切举措由于轻率和缺乏远见而破灭。”^{[2](P.387)}

克拉伦斯的乔治之死给爱德华四世的统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从表面看,乔治之死绝除了国王的后患,但实际上,克拉伦斯公爵的倒台,最大受益者是伍德维尔家族,而最大的受害者正是约克家族和国王自己。其一,乔治遗留下的大部分地产被伍德维尔家族逐渐占有,这与爱德华四世随意的慷慨解囊不无关系,造成了其他贵族对爱德华四世的不满;其二,乔治之死使得爱德华四世觉得高枕无忧,他开始沉溺享乐、暴饮暴食,不到几年曾经强壮的身体便变得体型肥胖、孱弱多病。

爱德华四世的统治危机随着他迅速衰退的身体机能而开始显露出来。1483年3月,国王据称是在一次户外活动中受凉。^{[6](P.59)}年仅41岁的爱德华四世此刻却经受不住任何折腾,随后国王病情逐步恶化,此时的国王才清醒的意识到他的王国即将要面临的问题——他的合法王位继承人爱德华王子才十二岁。鉴于此点,爱德华四世的遗嘱中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格洛斯特公爵理查为摄政王。而爱德华四世不知道的是,至少在大部分的贵族眼中,伍德维尔家族已经臭名昭著,树敌颇多,连一向稳重的格洛斯特公爵都多次在公众场合指责王后家族的阴谋。与此同时,各方贵族势力都明白,爱德华国王将不久于人世。国王健康的时候,其较强的个人能力还能保持王朝的稳定,一旦爱德华四世驾崩,约克王朝潜伏的政治危机将随时爆发出来,“但国王一去世,短暂而虚伪的和解就走到尽头,党派的猜忌又重新爆发。他们所有人都分头向格洛斯特公爵示好,希望博取他的恩宠和友谊。”^{[2](P.390)}

1483年4月,爱德华四世驾崩,他十二岁的长子爱德华继位,是为爱德华五世。年幼的国王无法控制即将失控的王国,随着局势的逐渐恶化,爱德华五世注定将失去父王留给他的神圣的王冠。此时的理查已经获取了王国的最高权力,本一直保持忠诚与中立的公爵决定“从此之后不再保持中立。没有任何公义和人道的原则能约束他逾分的野心,他着手为自己谋求王位。只有毁灭太后及其家族,他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2](P.390)}这一

点在理查与黑斯廷斯勋爵的斗争中体现的淋漓尽致^①。

从5月至6月,格洛斯特公爵将爱德华五世及理查王子先后拘禁在伦敦塔内的王室寓所,理查篡位的野心至此完全暴露出来。为了证明自己篡位的合法性,理查在对待爱德华四世与伊丽莎白王后的婚姻问题上,说出了与早已谢世的克拉伦斯公爵一模一样的话。他声称兄长爱德华四世在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结婚之前,与艾琳娜·巴特勒女士订过婚。这样一来,爱德华五世将被视为私生子而失去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实际上,并没有确凿的资料与证据证明理查所说的一切,格洛斯特公爵只不过是借助这一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理查为自己篡位的行为寻找合理性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对黑斯廷斯勋爵的胜利已经足够让作为全英格兰公敌的伍德维尔家族沮丧,但光明正大的篡位让本可以欣然接受贵族们拥戴的理查渐失人心。更糟糕的是,拘押在伦敦塔的两位王子最终不知去向,引发了王子死于理查三世的谋杀的传闻^②在整个英格兰的盛行。“1483年9月中旬,伦敦已经谣言四起。即便在那个嗜血的年代里,谋杀一位广受人们爱戴的国王的儿子,依然难以宽恕。中世纪的国王有义务根据基督教教义,遵守法律,为臣民提供正义。如果理查确有罪过,他将因自己的罪行及错误失去臣民的忠诚。”^{[1](P.238)}1483年6月27日,理查如愿以偿在威斯敏斯特加冕,但约克王朝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三、凋零在波斯沃思的白玫瑰

尽管兰开斯特王朝的直系后代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约克家族与伍德维尔家族的互相倾轧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是出自兰开斯特王室远亲的玛格丽特·博福特女士。玛格丽特心里很清楚,仅凭自己是兰开斯特王室的血统不足以让自己的儿子亨利·都铎来要求英格兰王位,她在等待最佳

时机。而理查三世此时要面临着接踵而至的危机,正如史料中所记载:“两个王子被谋杀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使约克派土崩瓦解。白金汉公爵曾经是理查三世的盟友,在英国西部掀起了一场反抗理查三世的运动,但很快被镇压。白金汉也受到了中世纪英国最极端的惩罚,被斩去首级。白金汉反抗的目的是将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铎推上王位,而这位伯爵此时成了理查三世最可怕的敌人。”^{[4](P.247)}

白金公爵反抗理查三世的运动亨利·都铎也参与其中,按照约定计划,亨利·都铎将率战舰登陆英格兰,但是由于受风暴影响以及担心理查的埋伏,亨利并没有登陆。“这次起义虽然失败,却暴露了人们对理查的不满,同时为亨利赢得了声誉。亨利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流亡者一下子成为反理查阵营的首领,不仅兰开斯特的旧部纷纷投靠,许多约克派的贵族也前来归附。亨利的势力迅速壮大,而理查三世的王位却被严重地动摇了。”^{[7](P.109)}上帝惩以约克家族的打击不止如此,1484年到1485年,理查三世的唯一子嗣爱德华王子与爱妻安妮相继离世,理查三世为了再次获得王位继承人不择手段,宣布将与爱德华四世的长女伊丽莎白结婚。这一计划使得理查三世身边的人也开始反感他,理查三世却依旧未察觉到自己已经孤身一人。

大卫·休谟所著《英国史》中有一段精彩的描绘:“不过,理查德面临的主要危险,不在于公开敌人的热枕,而在于伪装敌人的背叛。除了诺福克公爵外,没有几个显要贵族真正拥戴他的事业,所有这些人假装积极效忠,仅仅为了待机背叛和抛弃他。”^{[2](P.406)}在战场上倒戈的诺森伯兰伯爵与斯坦利勋爵显然就是休谟所描述的这一类人。理查三世一直对斯坦利勋爵的忠诚持以怀疑态度,最大的原因便是斯坦利勋爵是玛格丽特·博福特的丈夫。但是理查三世确信自己能取得斯坦利勋爵的支持源于勋爵与白金汉之间的仇恨,白金汉于

^① 关于格洛斯特公爵理查与伍德维尔家族的黑斯廷斯勋爵的斗争,详情可见迈克尔·V.C. 亚历山大著《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一书,227-233页。

^② 一份记载声称于1674年对伦敦塔进行的一次维修中,人们在楼梯间底部挖掘出两副骨架,正好是历史上记载的王子遗体埋葬地点。20世纪30年代基于两副骨架所做的医学研究表明,遗骨分别属于12岁与9岁的男性,这与两位王子失踪时的年龄相符。尽管如此,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杀死塔中王子的就是理查三世,后世相当一部分的研究表明,被怀疑杀死塔中王子的不仅理查三世一人,还有白金汉公爵、亨利七世。

1483 年被处死后,为了取得斯坦利勋爵的信任,国王对勋爵进行赏赐,“期间,仅从白金汉继承人处罚没,并转赐斯坦利的地产一项,就达到岁入 700 磅。原属白金汉的头衔—英国元帅也落入斯坦利囊中。此外,他还跻身成为十五位嘉德骑士之一。”^{[1](P.247)}可是理查三世的拉拢行为并没有获得斯坦利勋爵真正的忠诚。1485 年 8 月上旬,博斯沃思战役前夕,被逼无奈的理查三世逮捕斯坦利勋爵的儿子作为人质来要挟。此举虽让斯坦利勋爵答应为理查三世而战,但是头脑清醒的斯坦利勋爵明白,一旦理查三世击败亨利·都铎,接下来国王要处置的人就是勋爵自己,故勋爵决定在战场上伺机而动。

1485 年 8 月,亨利率军登陆威尔士,在威尔士与当地首领雷斯·托马斯的部队汇合,进而进攻英格兰。8 月 22 日,这场对英国历史具有转折点意义,影响深远的战役在博斯沃思的原野爆发。关于战役前后的详细情况国内外均有相当多的著作对其进行过仔细的分析与讨论,笔者将不对其进行展开论述。由于诺森伯兰伯爵与斯坦利勋爵的倒戈,理查三世最终力战阵亡。战役结束后,理查三世的王冠在战场上被斯坦利勋爵找到,随即,勋爵将王冠戴上亨利·都铎的头顶,以白玫瑰为纹章的约克王朝至此在博斯沃思的原野上凋零。

长期以来,理查三世一直被描绘为一个驼背的暴君、一个嗜血的道德沦丧者。这是对真实的理查三世不公的评判。后世对于理查三世的印象最早来源于都铎时期托马斯·莫尔的《理查三世传》,莎士比亚的戏剧《理查三世》更是让驼背、丑陋、残暴成为了理查三世的代名词。大卫·休谟也将理查三世描绘成驼背暴君:“可以肯定,理查德并不缺乏勇气、才干、品质,但这些都不足以补偿他谋取王位的危险先例和作恶谋杀的扩散性范例。理查德国王身材矮小,驼背,表情严厉,所以他的身体和精神同样畸形。”^{[2](P.407)}不过,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科学复原表明,理查三世他五官端正,身材并不矮小,唯一和古代史书及戏剧的描绘吻合的是理查三世患有严重的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可能会导致略微的驼背。至于暴君一说,则有可能是都铎时代对理查三世的刻意丑化。

四、约克王朝衰亡之因

约克王朝的衰亡有其必然的原因与偶然的因

素,更与当时英格兰所处的时代的特性分不开。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国内复杂的贵族派系斗争是造成兰开斯特王朝与约克王朝相继短命灭亡的根本原因。自理查二世去世后,英格兰的政治生活基本处于混乱与斗争之中,两大金雀花旁支为了王位与财富互相攻伐,而约克家族内部不断出现的内讧,尤其是克拉伦斯的乔治与爱德华四世的对立斗争极大地削弱了约克王朝的统治基础。

如果可以从玛格丽特·安茹的坎坷命运折射出兰开斯特王朝晚期的政治动荡及玫瑰战争爆发的复杂因素,折射出英国民族国家孕育形成中的历史归属感及传统政治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反女性思想。^{[8](P.84)}那么同样作为女性的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王后的命运沉浮也能说明玫瑰战争的残酷。同时,这位女性的一生陪伴着约克王朝的兴衰到都铎王朝对英格兰的专制一统。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王后的凄惨后半生也能看出在那个藐视女性的年代,非法婚姻、使用巫术、私生子等无中生有的恶名随时都可以扣向任何一位女性。当然,伍德维尔家族长期的专横与贪婪也是导致约克王朝迅速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爱德华四世的英年早逝是约克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尽管由于健康恶化等偶然因素导致国王还在壮年的时候便撒手人寰,使得年幼的爱德华五世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但这其中,爱德华四世放纵、贪图享乐等性格缺陷是主因。而理查三世的篡位与篡位后等一系列的所作所为则是导致约克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15 世纪的英格兰向变态封建社会的转变折射出了英格兰封建军事制度的变异,处于这一时期的玫瑰战争正好反映出了这一点:“分期领取报酬并订有终身契约关系的家丁私臣取代了因领受封土而与封主结成权力和义务关系的封臣和骑士……但这个变异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只是到了红白玫瑰战争时才演变成一个明显的结果:封建骑士军事制度已经到了尽头,战场的主力是按照契约发放军饷的职业家臣队伍。”^{[9](PP.83-84)}这种制度被称为“变态封建主义”,它使早期封建社会的无政府倾向死灰复燃,这样的倾向使得土地的长期使用得不到保证。而“变态封建主义”下的私人军队总是被操纵者们利用来反对周边邻居甚

至政府。^{[10](P.569)}在波斯沃思战役中,左右战场胜负的诺森伯兰伯爵与斯坦利勋爵的部队都是各自的私兵,他们不再按照传统的中世纪的封君封臣义务来为君王效忠,这也决定了两位贵族倒向谁,谁的胜算便高一筹。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那么变态封建主义的发展与英格兰封建军事制度的变异则是导致约克王朝灭亡的间接原因,同时也是英格兰在15世纪晚期的时代特性之一。

约克王朝的灭亡是玫瑰战争结束的标志,传统史学观点一直将约克王朝的灭亡、都铎王朝的建立作为英国近代史的开端。有的史家则把这个时间往前推到1471年,认为爱德华四世的第二次登位更有意义,作为英国近代史开端的都铎王朝是在爱德华四世打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4](P.236)}玫瑰战争的纷乱历史刻画出了无数鲜活的、令人嗟叹的人物脸谱,而约克家族三兄弟传奇的故事注定将在史书上留下浓厚的一笔,以待后世细细品味那金戈铁马一样的乱世情怀。

[参考文献]

- [1][美]迈克尔·V.C.亚历山大.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英]大卫·休谟.英国史II[M].长春:吉林出版社,2012.

- [3]M. A. Hicks.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Wydevills in Yorkis Politics to1483[A]. Charles Ross,ed. *Patronage: Pedigree and Power in later Medieval England* [C]. Gloucester: Alan Sutton; Totowa, N. J: Rowman and Littlefield,1979.
- [4][美]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R.比松.英国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5]David Santiuste. *Edward IV and the Wars of the Roses* [M]. Barnsley:Pen&Sword Military,2010.
- [6]Dominic Mancini. *The Usurpation of Richard III*[M]. trans. by C. A. J. Armstrong.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 [7]蔺志强,郭灵凤.从里奇蒙德伯爵到亨利七世——都铎首君述论之一[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
- [8]李家莉.从玛格丽特·安茹王后的命运看玫瑰战争爆发的原因[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 [9]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 [10][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西欧中世纪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光 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探析

潘国红

(江苏省启东市人大常委会, 江苏启东 226200)

【摘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受战争、认识等诸多因素影响,各苏区在较长时期内均存在较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处理党与政权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并积极予以实践,使党政关系从混乱趋至稳定。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关于党政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对我们今天研究如何理顺党与人大关系不无裨益。

【关键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央苏区; 苏维埃政权; 党政关系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62-05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由城市逐渐转入农村,走上了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道路,并在所辖区域进行了“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11月彭湃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后,苏维埃政权在各起义暴动地区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苏维埃政权机关实行议行合一原则,既是权力机关,又是执行机关。苏区的政党制度为一党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苏维埃政权之间,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如何妥善地处理好党政关系,这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中国共产党重视这一问题,针对当时各苏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提出了正确处理党与政权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并积极予以实践,使“这一时期的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混乱到稳定的发展过程”^{[1](P.42)}。研究这一时期的党政关系,对当代党政关系的改善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

各级苏维埃政权是与国民党政权根本对立的实行工农兵民主专政的政权,共产党看到了国民党一党专制包办政府的弊端,于是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反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但是,受战争、认识等诸多因素影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缺乏执政经验,照搬了苏联的党政关系模式,误解了“党的领导”的本质含义,以至较长时期各苏区均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

党几乎包办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工作,苏维埃政权形同虚设。1928年11月,毛泽东即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党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府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2](P.73)}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中央苏区的两个组成区域赣西南和闽西苏区,以党代政现象突出,政府仅仅照转党的决定,例会不正常,也不计划工作。1931年9月20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党包办一切的作风下,群众遇事要问党,政府解决了似乎靠不住,一切要问党。……一切政府和群众的问题由党直接解决,因此,苏维埃工作的建立,群众团体的独立工作,简直没有苏维埃和群

【收稿日期】 2015-08-12

【作者简介】 潘国红,男,江苏启东人,江苏省启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众团体,只是变成了执行党的命令的机关”^{[3](P.491)}。另一方面,有的苏区党部由反对党包办政府的一切工作,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江西苏区“机械的了解由反对对党的包办而变为对党的一切不管而只顾到党的本身工作”^{[3](P.492)},对苏维埃的工作完全不管。湘鄂赣边区党组织对党包办一切的错误矫枉过正,“就是苏维埃的工作,党全不过问,党与苏维埃形成了一个对立的形势,好象苏维埃工作与党不相关的一样,若问一问苏维埃的工作,党全不知道”^{[4](PP.212-213)}。

党团组织难以发挥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作用。“党团”指的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会、农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中所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的一种称谓(中共七大以后,“党团”逐渐被“党组”一词所取代)。党不能直接发号施令于苏维埃政府,而是通过各级政府中的党团来贯彻自己的指示,指导和监督政府工作,这是党政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然而,当时各级苏维埃政府中的党团组织不健全,难以发挥作用。赣西南“各级政府的党团都不健全,不能解决问题,大小问题都要党部解决,因此形成党部代替了政权,所以有些地方群众对党部还比对政府的信仰好”^{[3](P.259)}。闽西苏区“党与政权闹不清楚,政权中没有党团组织。闽西政权机关多系党员包办,因此没有党团之建立,党与政权混在一起”^{[3](P.16)}。有些苏区尽管在苏维埃政府中建立了党团组织,但党团与党部的关系没有理顺,要么党团没有自己独立的工作能力,凡是依赖党部解决,要么党团不服从党部的领导,与党闹独立,没有发挥党团在苏维埃政府中应有的作用。^{[5](P.61)}

苏维埃干部不是由群众直接选举,而大多是党委派或指定,党也可以随便予以撤换。由于当时残酷的反“围剿”斗争,苏维埃的选举运动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推行,党决定候选人的名单,照例提交代表大会形式上表决通过,“没有首先由各革命团体提出候选委员名单,发动选民开展讨论和审查”^{[6](P.463)}。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改选中,党指定候选人,强迫选民通过的现象非常严重。以至许多被选举的人不能胜任其所担负的工作,也得不到群众的信任。^[5]在政府任职的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而没有非党员的群众积极分子。另外,对政府干部,“党可不经群众路线而自由调动,因此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独立系统的建立就成了具

文,苏维埃法令的执行、群众团体上级决议和通告之执行,全视地方党部之负责人为依据”^{[3](P.491)}。更为严重的是,党派往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并不都是优秀干部。“苏维埃政权的选举运动,未曾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有些地方党部不愿把忠实能干的同志派到地方苏维埃中工作,而时常派些所谓‘受处罚’、‘成问题’的同志去干这些‘党外’工作,以致形成有些不了解的同志们把去苏维埃政权中工作看成处罚之一种办法的现象”^{[7](P.621)}。由于派往政府工作的干部是有问题而无能力的干部,许多优秀干部不愿意去政府机关工作,委派去了的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难以履行政府工作职责。

苏区形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原因极为复杂。从客观上分析,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是按照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模式建立起来的,苏联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党政关系模式,也被移植到中国。另外中国共产党是苏维埃的缔造者,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群众遇事愿意找党组织解决,许多本该由政府出面完成的工作,由党包揽了。而主观原因是把党领导苏维埃政权,错误地理解为党包办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忽视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够独立开展工作的苏维埃政权,忽视了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建立党团组织,以至于形成了苏区“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严重现象。

二

混乱的党政关系,使苏维埃政权沦为党的附属品,加剧了党政之间的冲突,同时也降低了苏维埃的威信,造成了群众与苏维埃的隔膜,影响了苏维埃对群众的革命动员能力。为了解决苏维埃政权运转中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就如何处理党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在理论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决定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的代表大会,要求各苏区在筹备这一会议的过程中,认真做好健全苏维埃组织,推选大会代表及改造苏维埃政权等工作,对党政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调整。

党必须坚持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政权的建立是为了执行执政党的意志,完成执政党的任务。苏维埃政权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为了进一步完成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历史任务。因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活动都围绕党的历史任务而运转,党在政权系统中处于领导地位。毛泽东一开始就把党的正确领导看成是红色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要紧的条件”^{[2](P.50)}。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确立了

党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原则,指出“苏维埃政权之正确的组织是要以党的坚固的指导为条件的”,“党随时随地都应作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而不应限制自己的影响”^{[8](P.248)}。为加强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1931年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这是苏维埃政权贯彻、执行党的方针的领导机关。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建设决议案》规定:“苏维埃首先必须坚决拥护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并与共产青年团取得密切的联系,用全部力量来执行党所指出的任务,实现党所提出的工作,为党的路线与主张而坚决奋斗。”^{[9](P.643)}在实际工作中,从党对苏维埃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的领导,到对苏维埃政府的法规制度的制定、政治方向的把握以及人员组成和日常工作的指导、督促、纠正,无不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

党的领导通过苏维埃中的党团来实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政党组织,而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党与苏维埃政权权力来源不同,各自的职能不一样,党与政权不能混同。党对苏维埃的领导,是一种政治领导,一种思想领导。党不能直接发号施令于苏维埃政权,党的决议、指示和各种政治主张,应经过法定的程序,变为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和决定,通过在苏维埃中的党团,得到具体地贯彻执行。为规范党与苏维埃之间的关系,中共中央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伊始就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指导。早在1928年3月,中共中央第37号通告指出:“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组织在暴动以前为暴动指挥机关,在暴动胜利以后为政权机关。苏维埃一经建立,所有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一概取消,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苏维埃是直接之民众政权,苏维埃的组织必须经过群众大会或者代表会议选举,绝对禁止由党部指派式之组织。代表中须尽可能的引进非同志参加。”^{[8](P.69)}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在各处苏维埃中,均应有党团的组织,经过这些党团,经过党员所发的言论,表示党对苏维埃工作上各种问题的意见”。“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应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8](P.248)}。针对有些苏维埃政权中党团组织不健全、党团与党部的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1930年7月20日,中央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中对党领导苏维埃的方式再次强调:“苏维埃是工农群众政权组织,与党绝对不

能相混合,党在政治上是领导苏维埃,但在组织上不能直接指导和命令苏维埃,党只能运用在苏维埃中的党员起党团作用,实现党的领导。”^{[10](P.176)}为建立经常的党团工作,必须健全苏维埃政权中的党团组织。中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凡党员3人以上,应成立党团。党团得选举党团干事会,由同级党部批准。党团干事会选举书记主持工作。党团在处理 and 决定自身问题和日常工作时有自主权。当党部与党团意见不一致时,双方应重新讨论,共同研究,形成决议,党团应执行该决议。等等。采取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党能够抓住党团,党团能够抓住政权,政权能够抓住群众,从而真正建立起一个党——党团——政权——群众的领导体制,以推动革命动员工作的开展。^{[1](P.44)}

严格划分党与苏维埃政权的职能和工作系统。早在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2](P.73)}对那种执政党与苏维埃“合并”的高度集权现象,中共中央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了解党的领导作用,党包办一切的理论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理论的遗毒:各级党部对于党的领导作用的了解,是非常模糊而不正确的。”^{[3](PP.636-637)}中共中央要求必须划清执政党与苏维埃之间的界限,“苏维埃是工农兵劳动群众的政权机关,党对苏维埃不能命令它。……党应有正确政治路线去领导它”^{[3](P.277)}。周恩来要求:“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11](P.40)}张闻天指出:“今后党对于人民大众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领导,必须经过人民大众自己的政权系统来实现,今后对于阶级敌人的各种斗争,也必须使用国家合法的机关来合法进行。”^{[12](P.59)}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各苏区在筹备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时,加强了制度建设的力度,纠正“党”与“国”不分、党包办一切的工作方式。像《闽西苏维埃政权组织法》、《修正闽西苏维埃政权组织法》以及《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法》等,都是这一时期颁布的。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了《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对各级苏维埃的组织原则、工作范畴、苏维埃与群众团体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党

要求党与政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身份:“凡关于一切土地、军事、经济、文化、肃反、改善人民生活等均须由苏维埃政府切实负责执行,而不能由党代替,党只是决定关于这些工作之重要政策和检查苏维埃党团的工作。”^{[13](P.83)}在闽西根据地,党要求:“一切权力要集中于苏维埃,苏维埃是群众最高的指导机关,一切工作要归于苏维埃,斗争的策略,政纲的规定,红军赤卫队的行动,经费的收支,以及一切工作,都在苏维埃讨论和执行。”^{[14](P.156)}

苏维埃机关干部由党培养和推荐,经过代表选举产生。民主选举本身就是党政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唯有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才能使苏维埃成为代表群众意愿的真正的政权机关,得到群众的拥护,也能真正地实现党对政权的领导。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苏维埃既不能像上海市民会议那样“仅仅根据上层组织的代表集合”,也不能像广州苏维埃那样“实际上只是革命委员会而非苏维埃”,而“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8](P.403)}。鉴于苏维埃干部不经群众选举而大多是党委派或指定,苏维埃与群众关系存有隔阂的情况,各苏区根据中央要求,在筹备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以实现苏维埃政权的改造。1932年2月17日,中央政府指示江西省苏:“苏维埃选举运动,这一个运动的实质是改造各级苏维埃,建立强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权,……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热烈的参加选举运动,很积极的选举他们最好的分子到苏维埃来当代表,这样才能达到各级苏维埃的真正改造。”^[15]根据这一指示,各苏区开始陆续地推动选举运动的开展。政府任职的干部,党不是任命或指定苏维埃机关的干部,而是为苏维埃机关培养和推荐优秀干部,经过定期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由选民投票选举产生,出任国家机关的领导。党提出的候选人“一定要以群众所信仰而有斗争历史的为标准”^{[16](P.122)},出身不好,犯了错误,难以胜任苏维埃工作的党员干部应召回。为使党提出的候选人在苏维埃的选举中当选,党应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让群众了解候选人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工作能力强,能为群众谋利益,群众自然投票选举党提出的候选人。同时注意选拔大批非党员的工农积极分子,特别是非党劳动妇女和青年工农出任苏维埃政府的委员,以改造苏维埃委员的结构。从1931年11月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成立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先后组织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由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实现了乡、区、县、省四级苏维埃政府的改选,使苏维埃政权更加接近群众,更加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革命动员能力大大增强。对此,1934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自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各级苏维埃在其组织与工作上是有极大的进步与成绩。苏维埃的组织是比较的充实了。吸收来参加苏维埃的工农积极分子是大大的增加了。……基本苏维埃(乡苏市苏)的工作是比较以前深入了,……苏维埃的工作方式是有了相当的改善,所有这些都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更进一步认识苏维埃是工农自己的政权机关,所以,苏维埃能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进行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革命斗争”^{[17](P.79)}。

三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创立,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次尝试。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关于苏维埃,不管名词是否妥当,但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用于资产阶级国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国家。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种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11](P.161)}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党与政权关系的基本原则并积极予以实践,这是我党处理党政关系的最初尝试,这一模式基本上被以后各个时期所沿袭,为后来的执政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人大制度建立以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人们的思想认识一直存在这样的误区,把党对国家的领导理解为党组织直接掌握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党委垄断了许多本应属于人大及其他国家机构的权力,党委通过各种方式干预人大事务、发号施令,影响了人大职权的行使,削弱了人大的地位,人大一定程度上成了人们戏言的“橡皮图章”、“花瓶摆设”。苏维埃政权建设过程中关于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对我们今天研究如何理顺党与人大关系不无裨益。

党与人大的关系,是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处理好党和人大的关系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关键,也是党探寻执政规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要进一步明确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质。《中国共产党党章》对“党的领导”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大工作中

坚持党的领导就是“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要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党对人大是“尊重和支持”、“建议和推荐”、“保证”其依法履行职权，而不是凌驾于人大之上，对人大发号施令。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要依法界定党与人大的关系。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要通过宪法和基本法的明确授权，规定党对国家的领导权，界定领导权的范围、内容，设定领导权的边界，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为科学构建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提供权威的制度安排。要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人大制度，加强人大履职能力建设，推进人大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和干部任免权等法定职权落实到位，使人大真正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家权力机关，成为人民群众表达意愿、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通道。

〔参考文献〕

- [1] 杨会清. 革命动员视角下的党政关系调适——以土地革命时期为中心[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0(4).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 江西档案馆,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 中央

- 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 [4] 湖南省档案馆, 等.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5] 谢以彪. 论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党政关系[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003(12).
- [6] 江西省档案馆. 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 [7]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8]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 [9]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 [10]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 [11]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上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12] 张闻天. 张闻天文集(第4卷)[C].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 [13] 湖南省档案馆.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辑)[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14]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 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续编)[Z].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 [15] 选举运动与合作社——中央政府指示江西省委的一封信[J]. 红色中华, 1932-02-17.
- [16] 江西省档案馆.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17] 韩延龙, 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4卷)[Z].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责任编辑 光 翟)

亢旱中的城市生活管窥

——以 1934 年江南市民消暑方式为例

张 帆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 要] 1934 年江南区域长时间高温少雨, 酷热笼罩下的城市居民根据自身情况, 因地制宜, 通过各种方式消暑避暑。有祛暑效果的凉饮蔬果和冰激凌等西式冷点大受市民欢迎, 公园和山水名胜给市民提供了良好的消暑空间, 部分富裕阶层还选择旅行的方式到青岛等地避暑, 工厂、机关相应调整上班时间, 市民的穿着更加清凉透气。政府对于市民消暑则给予了支持, 加大对冷饮的卫生检查力度, 延长公园开放时间, 放宽对公共场合衣着的要求。生活于“前空调时代”的江南市民们所采取的消暑方式, 既呈现了一幅近代中国城市生活画卷, 也为节能减排导向下的当今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 1934 年; 亢旱; 市民生活; 消暑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67-06

纵观人类历史, 社会分层是普遍的现象, 特别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 情况复杂的国度, 社会分层是无可讳言的, 城市居民无论在居住环境还是自身生活水平, 整体上要优于乡村居民。正如美国的人类学者所言: “分层社会 (stratified society) 是指社会里的人们按等级被划分开, 并被列入不同的社会阶层或层次中, 他们并不平等地享有用来支撑生活、影响力和声望的基本资源。较低阶层的成员一般比那些较高阶层的成员拥有较少的资源、较低的地位和较少的权力。”^[1](P263)] 普通乡村民众如何在亢旱成灾的 1934 年江南生存^[2](PP. 47-54)] 灾民如何被救济^[3](PP. 111-116)] 学界已略有讨论, 但这场重大旱情中, 城市居民如何度过炎炎酷暑, 之前却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历史原是由多面向组成的, 想要努力还原 1934 年江南亢旱场景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借鉴, 就需要将目光投向场景内尽可能广的区域。消暑, “消”是消受的意味, “消受”夏天, 于炎炎烈日中寻找一种纾解和惬意。关于“前空调时代”市民消暑方式的记录, 生动反映了民国时期城市日常生活片段, 亦为近

代社会史料留下了片羽吉光。

1934 年, 黄梅时节江南旱, 自 6 月入夏以来直到 8 月盛暑, 在长达 3 个月的时间中, 以江南区域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区域连日艳阳高照。时在浙江杭州的丰子恺先生记录下当时的气温: “清晨六点钟, 寒暑表的水银已经爬上九十二 (华氏) 度。……天气很热, 前几天清晨八十九度, 正午升到九十九度。今天清晨就九十二度, 正午定然超过百度以上。”^[4](P353)] 与浙江毗邻的上海市, 7 月 12 日的气温达到 41.2 度, 8 月 25 日攀升到全年最高点 42 度, 至 8 月 31 日, 55 天中, 最高气温大都在 35 度以上, “出现了上海自设立天文台 63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5](P441)] 上海街头“柏油路一点一点的由硬性而转变到软化, 一点一点儿由软化而成了熔化。”^[6](P12)] 此时恰居住于上海的鲁迅先生, 在其 7 月、8 月的日记中关于气温的记录, 有 48 天记录“热”, 尤其是 7 月 10 日至 14 日, 连续记录为“大热”。^[7](PP. 460-470)] 江南诸城似乎都在这无尽的酷暑中昏昏沉沉。

犹如处于蒸笼之中的市民, 纷纷选择消暑避

[收稿日期] 2015-08-12

[作者简介] 张 帆, 男, 河南郑州人,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暑的办法,通过摄入适时的消暑饮食、流连于避暑空间、调整工作时间等方式抵消酷热、寻求清凉。不同市民阶层,因其财力、年龄、身份等差异,消暑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这些消暑避暑方式中,隐隐然又呈现了市民对社交、炫耀、娱乐、休息等方面的倾向。本文拟从消暑饮食、消暑空间、工作时间与穿着调整等几方面对1934年江南地区市民的消暑生活做一窥探,并概述政府与社会对市民各种消暑方式的应对和观感,以求教于方家。

一、消暑饮食

1. 传统消暑饮食

暑热时节,食用有降温消暑作用的饮食,这一习惯在传统中国由来已久。宋代诗人杨万里就曾作诗云:“帝城六月日卓午,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8](P936)}展现了宋人暑热时节享受冰食消暑的场面。

酸梅汤是传统的江南饮料,炎炎的夏季,加了冰的酸梅汤给高温中的市民送来点滴清凉。也正因为冰镇酸梅汤的物美价廉,市民似乎不分阶层,都可以开怀畅饮。在林徽因女士的笔下,较为艰辛讨生活的挑夫,在1934年的夏季也耐不过酷热,肯花钱饮一杯,“酸凉的一杯水,短时间的给他们愉快”^{[9](P37)}。水果也是市民喜爱的消暑美食,其中最为受欢迎的大概非鲜甜多汁的西瓜莫属,买几个放在水井中,过不了多久拿出来就口感清凉。西瓜深得市民喜爱,因此需求量多,一时间使上海西瓜“售价突飞猛涨,价格之高,为最近数年中所罕见。最上等者每担需售至七八元以上,中等货品亦在四五元左右”^[10],让水果行老板喜不自胜。

2. 西式冷点

相较于贫富皆宜的酸梅汤,冰激凌作为西方传入的新鲜冷食,价格上虽然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却也并非高不可攀。20世纪20年代后,现代化的大批量生产的食品厂,如益民四厂前身沙利文、可的牛奶公司、屈臣氏等在上海陆续建立,批量生产的冷饮开始走进市场。冰激凌也是从那时开始,逐步去掉了过去专属于上等阶层的奢侈标签,广泛进入上海的洋烟纸店、网球场、跑马场、电影院及咖啡馆^{[11](P4)},为一般市民所熟悉。1934年夏季的上海、南京等地,市民对冰激凌的消费大大增加,价格较为便宜汽水等冷饮则销量更盛,一时间城市里各餐馆、茶室、咖啡店纷纷辟出“饮冰室”,做起了冷饮的生意。报纸更对这股冷饮风潮推波

助澜:“有冷气管的电影院倒可以去看看,有电风扇的咖啡馆也可以去谈,同样有避暑设备的跳舞厅更可以去耍耍,自然,冰结涟(冰激凌),冰冻汽水果物之类是不可少的。不然,就辜负了这现代的都市文明了。”^[12]

以1934年7月9日一天的《中央日报》为例,在总共11则食品类的广告中,有9则都是诸如“上海酒楼增设冰室,各种冷食”,“月山公司兼设宏丽咖啡室,各色滋美冷食”,“妙机百货公司高尚饮冰室,鲜橘冰淇淋、熟水刨冰,消暑却热清凉止渴,冰淇淋大、小桶二、一元,即叫即送”^[13]等关于冷饮冰食的广告。商家是懂得逐利的,如此纷纷下本做广告,正是因为当时市民对冷饮的需求,使得“各饮冰室莫不利市三倍。因此各小本商人,均作投机营业,咸辟室售卖清凉食物,各街路巷坊,无不比比皆是。”^[14]不管是坐在饮冰室中,吹着风扇,喝冷饮吃雪糕,还是举着一杯冷饮边走边吃,都能给暑天带来一丝凉意。就连理论上不能自由行动的军训学生也都纷纷请“茶房们拿了汽水,冰淇淋,冷面出入”^[15]。

冷饮供应骤然增多,汽水印花税随之大增。以上海为例,“据征收汽水印花税职员谈,上年夏季,统共征收汽水印花六万余元,而未届夏季一月中,竟获收汽水印花税五万余元,足见其营业之激。”^[16]冷饮销量的大幅提升也引起了卫生部门的注意,南京的卫生事务所便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卫生条例,加大了针对售卖冷饮场所的检查力度,“在夏季防疫期间,指派卫生稽查一人,专负管理及取样检验之责。所有清凉饮料店均须有本所许可证。兼营刨冰者,须用本所核准制造之熟水冰刨制,其用生水冰或天然冰者,一经查明,即行严罚。至各厂制造之熟水冰,每星期抽查一次;生水冰及冰淇淋,每二星期抽查一次。汽水按照牌号随时查验。一面印制‘制造冰淇淋及刨冰应遵守事项’分发,并招集各大清凉饮料店负责人谈话,详示应注意各点。”^{[17](P258)}以1933年与1934年两年夏季清凉饮料检查对比为例(见表1),可以看出1934年的检查品种、检查规格、检验数量、单个样品检验次数等数据上均有明显提高。

二、消暑空间

1. 都市公园

1934年夏季的江南各城市火伞高张,空调前身的冷气机才刚刚问世,只有极个别人有福享用。

当时还算是新科技产品的电风扇面对酷暑难以发挥效力,让人感慨似乎天意难违,坐于室内“电风扇咕咕的转动,浑身的汗珠还是从毛孔里向外的攒冒,一颗颗珠粒似的,洁净的面巾,经了几次的揩拭就起了汗臭的异味,寒暑表的线条慢慢儿从上升起,电风扇已渐渐失去凉意,吹来的风,也带些热气了!”^[18] 报人龚德柏有一奇招避暑:“日伏

水缸中,仅露肩背,缸之四围,杂陈香烟瓜果,冰激淋之属,撰文见客,皆在于此。”^[19]可毕竟整天端坐水缸中的奇人还是少数,对于大部分市民来说,室内既然无法安坐,出门走走似乎是避暑消夏的一个较好手段。城市中的公园给了愿意走出家门漫步徜徉的市民一个很好的去处。

表 1 1933 年与 1934 年两年夏季清凉饮料管理统计表^{[17] (P259)}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取样	检验	劝告	警告	取样	检验	劝告	警告
生水冰	0	0	0	0	7	7	0	0
熟水冰	3	3	0	0	13	20	2	3
冰淇淋	0	0	0	0	159	159	31	85
汽水	18	18	0	0	3	4	0	0
共计	21	21	0	0	182	190	33	88

“公园”一词由来已久,据《魏书·任城王传》记载,任城王澄“明黜陟赏罚之法,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20] (P473)},此处的公园,指的是官家或贵族园林。近代意义上“公园”一词的用法,据日本学者白幡洋三郎的考证,是 1865 - 1866 年,由日本在与驻日西方人交涉修筑公园事项时,率先“将‘Public Garden’翻译成‘公园’”^{[21] (P191)},并在日语汉字中逐步固定下来,1877 年之后已经开始广泛使用,随后此一用法从日本传回中国,这大概是汉语“公园”一词意义转变为近代公园意味的开始。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新兴市民游乐公共场所,大部分公园在设计时都考虑了夏季避暑功能,往往在建造时加入了水与绿树等消夏元素,也因此成为市民最愿意流连的消夏场所。上海的吴云梦的想法颇能代表一部分市民的想法:“天气是这样容易使人出汗,坐在家中一刻也不能舒服,空间的微风渗杂着暑热的扑在人身上,一些也感不到凉爽的意味。坐卧的家具似乎内藏着火坑,浮起一层热意。要在这样烦热的天气找一个比较凉爽的处所,我的思念终于投在‘到公园去’的计划上。这提议应声得到我表妹的同意,我们乘便带了些编织物去消磨那有闲的时间。那是个充满着法兰西风的公园,游人是非常的众多,层层的风吹来,青香的花草气掩盖了可厌的暑气。眼前的景物展开着一种织巧的淡雅的朗爽的美化,使人常有不尽的眷恋。”^[22] 正如吴云梦文中提到的那样,市民到公园避暑,极少是单独去的,吴邀请表妹结伴同

去,还带上编织物到公园中编织,既在清香花草气中消解浓浓的热意,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社交活动,在这消夏过程中增进了她与表妹之间的情谊。

在 1934 年的顾家宅公园,作家“椋”以文人敏感细腻的眼神观察身边的同样来公园消夏的市民:只要是园里的一株树,稍微遮着一点太阳光,树底下都坐满了人。在这消夏的人群中,一位中国太太站起身与熟人寒暄;一位罗宋太太在拿面包喂孩子吃;一群外国小孩子,在树下玩泥沙;“当中草地上,横七竖八躺满的都是人;也有三五成群的,讲着笑着,也有一对一单的,在环着倚着”^[23]。显然,公园中市民的社交意味也很浓,他们要么是消夏又亲子,要么是结伴闲谈或者期望结识新朋友,年青的恋人们也成双成对借着消夏来公园恋爱。当然,或许有些男女亲热的稍显热烈,也或许是因为观察者过于保守,总之,一些人不咸不淡地告诉要去公园纳凉的朋友,进了公园“许多男女之间的活剧,会在你的眼前不断地一幕一幕的展开。”^[24]对于记者来说,公园中人山人海,则是一处获得新闻素材的好地方,和消夏的市民聊上几句,了解市民的想法,也许多一个朋友,也许又能得到几条所谓街坊秘闻。“湖州人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在这一个树木森森,空气鲜洁的一座中央大公园中,扶老携幼的坐在石凳上,谈论湖州的故事”^{[25] (P76)},高温酷暑中,晚饭后游园的市民更多,《大公报》在湖州采访旱情的记者,正是去这座公园与人攀谈,探寻湖州当地人对旱情的感受:“每

晚七时至九时,仕女如云,游人至伙。记者亦品茗于园内,执游人而绪语家常。”^[26]南京市民更可在五洲公园和第一公园中选择,“晚餐后,成对爱人,或偕娇妻爱子赴五洲公园,扁舟一叶,荡漾湖心,赏月谈心,神仙亦羡。或赴第一公园品茗,且饮且谈,并有露天电影之放映,复可悦目。”^[27]并且因为来公园消夏的市民很多,入夜后也迟迟不愿出园,公园管理方向市府提议延长公园开放时间,市府也从善如流,于7月中旬宣布“各公园于夜间十二时后,仍继续开放,任人入园休憩。”^[28]

2. 山水名胜

江南的城市总各有几分值得骄傲的水光山色,这些城内及周边的山水名胜也成为市民的消夏选择。南京的秦淮河、玄武湖,苏州的太湖、虎丘,杭州的西湖,都成为当地市民蜂拥而至的消夏场所。以玄武湖为例,“因为有湖风,所以比较别的地方,总得风凉些。”^[29]不过因为“玄武门于午夜还照常要锁,时间则受其限制;因之这热闹也只在下午以至黄昏的时分”。^[24]而没有关门之虞的秦淮河则成为入夜后市民继续享受凉爽的空间,“非至东方破晓不作归计。”^[27]西湖在杭州的受欢迎程度比秦淮河之于南京还要高,公园大多还要缴费入园,西湖则任人游玩纳凉,惠而不费,“每晚到了八点以后,一般民众,都走向西湖滨第一地公园,或第六公园去游息,沿湖边草地、木椅、石凳,满坑谷的坐着乘凉,拥挤得连走路都困难”。^[30]太湖也给了市民同样的消夏空间,时人描述“于兹酷暑之际,泛舟太湖品名冷香阁,一领湖风清幽,一观虎丘庄严,减令人暑气全消。”^[31]商业发达的上海,因离海滨不远,在1934年的夏季,市民更可乘轮渡到海滩,换好游泳衫涌向海边,“男女们的面庞上都露出丝丝笑意,一壁抚摸着肌肤,很庆幸地将受海水的洗礼。”^[32]旅行社也从酷暑天气中发现了商机,专门推出消夏游,“备专轮夜游浦江,计四小时,社员每人收洋一元,非社员每人收洋一元二角。”^[33]这也给上海市民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消夏方式。

3. 旅行避暑

徜徉于绿树成荫的公园,漫步于城中山水名胜,已经算是不错的消夏享受,而财力更为充裕的阶层,则可以选择花销巨大的旅行避暑方式,他们从本身酷热的江南离开,来到相对凉爽的地区,如庐山、莫干山、普陀等地,而其中最受欢迎的莫过

于青岛。青岛“全年五至十月之夏令时期,海洋性气候之特性极为显著”^[34](P66),也正因其相对凉爽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便利的交通、现代化的城市规划以及广阔的海滨浴场,民国年间的青岛便享有“东方瑞士”的称誉,成为富裕阶层的避暑首选。在当年亢旱的夏季,青岛气候与众不同,“最高热度,未超过九十五(华氏)度。”^[35]这当然赢得了有实力旅行避暑者的青睐,顾维钧、朱家骅、宋子良、宋子文、许世英、颜惠庆等要人均前往消夏,上海“招商局之青岛班普安轮最为拥挤,各级舱位,于船未到沪时早已预售一空。”^[36]“沿海的海水浴场,更引人入胜,每日游泳于海水内者,曷止千万,因为温暖的海水,细软的沙滩,使人心快神怡。善游泳者逐波追浪,不善泳者潜浮低走,海水浴日光浴两美并臻,每届夕阳西下,游人多流连忘返。一到晚间,沿海的咖啡店里,送出幽扬的乐调,男女游侣,徘徊于海滨滩头,的确富有诗意。”^[37]众多避暑中外游客的到来,也极大促进了青岛当地的经济,在9月温度稍降避暑潮消减以后,青岛市旅游机构曾大概统计过青岛夏季的旅游收入,“本夏党政商学各界,来青游览者,不下三千余人,其他欧美人士,各国海军共约四万余人,每人平均消耗二百元。计全市各业当可吸收游资一千万元。”^[35]这一大笔由避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于当地经济、商民生计,裨益良多。

三、公共生活中的时间与衣着

1. 时间调节

富裕阶层可以旅行避暑;有闲人士能够品冷饮于饮冰室,徜徉于公园,泛舟于湖上,但一般的工厂员工、公务机关工作人员却不能不忍受酷暑。可随着酷暑的延续,为员工身体健康着想,也为员工能够在办公时间专心工作,还是有部分工厂调整了上班时间。以上海虹口、闸北、南市租界各区缫丝厂为例,在酷热环境中劳动的女工纷纷出现中暑情况,各厂“因天热而减少工作时间者”^[38]颇多,有些工厂甚至只工作半日。

各地机关单位也纷纷开始调整上下班时间,以期避开在最热时间办公。浙江省府便使用提早上班和缩短工作时长的办法来削减下午上班时间,“以日来炎热,决二十八日起,下午停止办公,上午六时至十二时照常办公。”^[39]南京的中央政府机关在7月份开始实行半天工作制,“上午照常办公,下午停止,但三时后,派人轮值。”^[40]江苏高等法院

第二分院也规定“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每日上午八时开始工作,至午后一时,则行休息。”^[41]后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正午时分气温已经难以承受,便又将上班时间整体提前一个小时,“提早于上午七时开始办公,而以午刻十二时停止。俾全院推检以及办事人员,得提前一小时休息,以避溽暑。”^[42]同时调节办公时间的还有交通部上海航政局,“将办公时间,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底止,改为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二至四时,仍为六小时,并不缩短。”^[43]

2. 衣着变化

酷热的气温中,市民对于公共场合夏衣的选择,往往以透气清凉为主。林徽因写于1934年的名篇《九十九度中》,文中人物刘太太出门受着当时的高温,便懊恼自己穿的太不合时宜:“今天这件绸衫下摆仍然不合式,领也太小,紧得透不了气,想不到今天这样热,早知道还不如穿纱的去。”^{[9](P36)}小说中的刘太太如此想,现实中的都市少女则身体力行地穿起了短袖和裙子,青春少女穿行于都市的街道,颇吸引一些青年男子的目光,又叫保守的文人感叹:“街头上露骨的肉诱惑,不知道麻醉了多少的血气未定的青年。”^[44]至于男性,夏季的衣着更随便一些,不扣上衣扣子者有之,干脆不穿上衣者亦有之,因为恰逢当年的新生活运动,袒胸赤膊颇与新生活要旨不合,因此各城市初夏时还对赤膊出现在公共场合者予以规劝。例如苏州警察局为“整理市容,改良风俗”,就派警士在公园巡逻,严禁赤膊者进入,一有发现,“随时查禁”^[45]。但赤膊者越来越多,屡禁不绝,且又只能规劝不好处罚,在一些城市,政府索性就对公共场合赤膊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开禁不纠了。徐州市公安局专门传令各分局,对街巷露宿、店员赤膊等行为解禁一个月,徐州新生活促进会代理主席曾万钟也表示“暂时停止取缔市民整装运动,因在炎暑气候,殊难苛责衣纽整齐。”^[46]

在1934年江南区域的亢旱中,城市居民所受到的威胁远小于居于亢旱成灾之农村的乡民。近代中国的乡村经济处于低潮,感慨农村破产、亟需拯救之声不绝于耳,相比于靠天吃饭的乡民,市民无论是身处的环境还是自身对灾害的抵抗性都要高出不少。同样的高温少雨天气,乡民已深受其害,甚至沦为灾民;而对于多数市民来说,亢旱只对他们日常生活有一定影响,没有威胁到生存。正因为如此,市民们并不过于恐惧亢旱带来的负

面影响,而是选择适合自身的方式来消解这种影响,很多市民在力所能及情况下还响应政府和社会慈善力量的呼吁,纷纷捐款捐物参与对灾民的赈济。从消夏饮食的摄入、消夏空间的选择和消夏生活节奏的调整,都可以看到市民做出的种种应对。政府也采取了顺应和引导的态度,对于冷饮的需求量激增的情况,相应加大了食品卫生检查的力度;对于公园人满为患的情况,增派巡逻人员,延长公园开放时间;对于公共场合衣着问题,也予以适当放宽,这些都对市民更好的度过炎炎酷暑起到了积极作用。“历史学是一门析分和展现的学科,任何一种展现都是作为分析员的史家为了突出人类生活的某些经验和某些属性而进行的抽象”^{[47](P103)}。关注1934年亢旱中的江南,以“前空调时代”市民们多种多样的消夏避暑方式为中心,管窥近代城市居民生活状态,既可呈现出一幅别样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也为节能减排导向下的当今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 [1][美]哈维兰(Haviland, W. A.),等.文化人类学:人类的挑战(原书第13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 [2]黄庆庆.从1934年旱灾看民国时期的巫术救荒——以申报为中心[J].古今农业,2010(3).
- [3]张帆.民间赈济:一九三四年浙江旱灾中的甲戌全浙救灾会[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5(1).
- [4]丰子恺著.丰陈宝,丰一吟编.丰子恺散文全编[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 [5]夏东元.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1900——2000)[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
- [6]陈嘉震.大上海的热景[J].良友,1934-08-15(92).
- [7]鲁迅.鲁迅日记(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8][宋]杨万里.荔枝歌[A].[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2)[C].北京:中华书局,2007.
- [9]林徽音(即林徽因).九十九度中[J].学文月刊,1934-05-01(1).
- [10]西瓜来货畅旺[N].申报,1934-07-16(21).
- [11]程乃珊.冰激凌——永远年轻的情怀[A].老上海,旧时光[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 [12]陈子展.挥汗读书[N].申报,1934-07-20(14).
- [13]食品类广告[N].中央日报,1934-07-09(02).

- [14] 饮冰室均营业鼎盛[N]. 中央日报, 1934-07-09(02).
- [15] 星南. 谈暑期军训[N]. 申报, 1934-07-11(08).
- [16] 酷热中汽水营业激增[N]. 申报, 1934-07-13(12).
- [17] 南京市卫生事务所. 南京市卫生事务所工作报告(1935年出版)[A]. 张研, 孙燕京. 民国史料丛刊(747)[C].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9.
- [18] 周子欣. 热[N]. 申报, 1934-07-14(12).
- [19] 龚德柏避灾威坐水缸中见客[N]. 盛京时报, 1934-08-10(06).
- [20] [北齐] 魏收. 魏书(2)[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1] [日] 白幡洋三郎. 近代都市公园史: 欧化的源流[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
- [22] 吴云梦. 到公园[N]. 申报, 1929-07-14(21).
- [23] 槐. 热浪袭沪——古家宅公园速写[N]. 申报, 1934-07-21(15).
- [24] 曙山. 热在南京[N]. 申报, 1934-07-20(14).
- [25] 陈果夫. 行政[A]. 陈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 陈果夫先生全集(C).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1.
- [26] 浙北旱灾湖州踏查纪[N]. 大公报, 1934-08-11(04).
- [27] 天气酷热中之形形色色[N]. 中央日报, 1934-07-09(02).
- [28] 市府昨召开各机关会议[N]. 中央日报, 1934-07-18(02).
- [29] 闲话玄武湖[N]. 中央日报, 1934-07-25(02).
- [30] 盛夏的西湖[N]. 中央日报, 1934-07-13(03).
- [31] 泛舟太湖消酷暑游罢虎丘饮冷香[N]. 盛京时报, 1934-07-28(06).
- [32] 定九. 海滨的夏[N]. 申报, 1934-07-14(12).
- [33] 经济旅行社举行纳凉浦江夜游[N]. 申报, 1934-07-13(13).
- [34] 中国市政协会青岛分会. 青岛指南(1947)[A]. 张研, 孙燕京. 民国史料丛刊(836)[C].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2.
- [35] 青岛避暑统计吸收游资一千万[N]. 盛京时报, 1934-09-09(06).
- [36] 连日奇热离沪避暑者众多[N]. 申报, 1934-07-15(13).
- [37] 此地独凉青岛成了桃源仙界[N]. 盛京时报, 1934-07-27(06).
- [38] 各工厂已减开半工[N]. 申报, 1934-07-14(12).
- [39] 昨日各地仍奇热[N]. 中央日报, 1934-06-28(02).
- [40] 中央各机关一日起下午停止办公[N]. 申报, 1934-06-30(03).
- [41] 天时酷热两法院变更办公时间[N]. 申报, 1934-06-30(14).
- [42] 苏高二分院提早暑期办公时间[N]. 申报, 1934-07-16(16).
- [43] 航政局提早办公时间[N]. 申报, 1934-06-30(14).
- [44] 一震. 夏季[N]. 申报, 1934-07-14(12).
- [45] 赤膊游公园有碍观瞻, 王局长令饬查禁[N]. 苏州明报, 1934-07-14(06).
- [46] 公安局解膊赤露宿禁令, 新运会亦停止取缔整装[N]. 中央日报, 1934-07-18(03).
- [47] 小田. 构建整体社会史的学术使命[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1).

(责任编辑 光 翟)

1903—1905年盛宣怀与山西矿权的交涉

苏芝军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 山西阳泉 045200)

[摘要] 20世纪初,业已攫取山西矿权的英国福公司为扩大侵略权益,要求清政府借款赎回其在建的道清铁路。盛宣怀抓住契机,在谈判中挟路迫其修改晋矿章程。他顶着英国公使干预的压力,力争将此交涉限制于商务谈判,最终以签订合同的方式挽回了山西制铁权和部分煤铁矿权。他在交涉中提出的“控制矿地”、“抢占先着”的思路也为后来的山西保矿运动所践行。

[关键词] 1903—1905年; 盛宣怀; 山西矿权; 英国福公司; 交涉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73-04

晚清以来中国各项利权相继受损,其中路权矿权受损尤为严重。清末围绕路矿权的争夺,中外之间进行了频繁的交涉。20世纪初期的十年是中外矿权交涉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拟对1903—1905年中英交涉山西矿权这一事件进行详细考察,从而分析中方在此次交涉中的策略及成效。

一、盛宣怀与英国福公司交涉的背景

1. 中方力图挽回已失的矿权

1898年5月清廷批准《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议定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山西孟、平、潞、泽等五属地煤、铁、煤油各矿尽入英国福公司彀中。

1901年抚晋的岑春煊准备开发山西矿利时,却发现《章程》已构成山西自办矿务的最大障碍。他主张将原定章程妥加修改,只准其在指定一二处矿地内开矿,以免笼统。继任山西护抚的赵尔巽也设法抵制福公司,他恢复了山西商务局并拨款设立丰晋矿务总公司,筹办章程五属之外各地区的矿务。当时受委办理山西矿务的姚文栋指出:“夫胶威旅大,譬犹身躯受伤,至平孟泽潞,则害及心腹矣,此当早筹补者也。”^[1](P.1430)]为此他建议外务部未雨绸缪,尽快修改晋矿章程。但山西方面的努力和拟议徒托空言,在中国积弱的形势

下清廷并未采纳实行。外务部和商部也希望尽力收回已失矿权,主张采取审慎持重的办法,以正当的手段合理的途径达到收回矿权的目的。1902至1904年外务部、矿路总局和商部先后几次制定矿务章程,欲将外资办矿置于中国矿章的管辖之下,并依据法律限制外国矿权扩张,收回违法违规的外国矿权。但因外国获得矿权的条约大都是在总理衙门或外务部的主持下将草约改定并奏准的,他们以此坚称矿约具有国际协定的性质,不受中国国内法律的约束。这种依据法律挽回矿权的手段成效显然不彰。

2. 福公司意欲移累于中国

1898年福公司在与山西签订《章程》后不久,又获得了河南的开矿权。为便于运销河南产出的煤炭,福公司1902年开始修筑道清铁路(泽州至道口即泽道铁路的一部分)。在道清铁路修筑一半时,福公司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福公司哲美森厂一二三号等矿井已经耗费巨资但因技术原因迟迟没有正式投入生产。^[2](P.47)]此时福公司增募的1900年山西矿股未曾招够,其同时既要开办煤矿又要修筑铁路,财力捉襟见肘。而泽道铁路只许专运煤铁,不准运输客货,修成后全路收入必然短绌。福公司唯恐养路之费无所着落,急欲将此

[收稿日期] 2015-08-08

[作者简介] 苏芝军,男,山西阳泉人,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讲师。

铁路改为中国借款卖票,以补其阙。便请英国公使向中国外务部提议“将此路归并(大清)铁路总公司办理,以建筑费作为借款”^{[3](P.2)}。

1903年6月,英使萨道义应福公司之请向清廷外务部提出:将已经开筑的道清铁路归并盛宣怀督办的铁路总公司办理,由中国向福公司借款,发行债票,而仍归福公司代为修筑。^{[4](P.2757)}福公司意图迎合中国收回路权的愿望,省下筑路资金以全力办矿,同时依旧把持铁路的营运,此可谓所谋者既急且贪。但外务部想乘机收回此路,并与卢汉铁路联通以收指臂之效。6月13日电令盛宣怀妥善筹划此事。8月又令盛宣怀与福公司总董哲美森商定泽道路借款详细合同。

二、盛宣怀交涉山西矿权的经过及结果

1. 关于制铁权和运铁权的争持

1903年10月哲美森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盛宣怀在上海商谈中国赎回泽道铁路的细节。会谈中盛宣怀发觉福公司“从前只言运矿,现闻意在设厂炼铁”。他认为中国借巨款替福公司修筑运矿铁路,转使其腾出资金速成煤铁矿,夺我铁厂利权,对中国铁政影响巨大,必须设法补救。于是向福公司提出“只准开矿不准设厂”的要求,后因实在难以禁阻,又提出待泽道铁路“路成开车之后至少缓办铁厂十五年”^{[5](P.1355)}。哲美森断然拒绝,表示只订借款赎路合同,不议他事,并扬言要请英国公使向清廷施压。

福公司因路本不敷致难开矿,其谋求向中国出售道清铁路有迫不及待之势,盛宣怀认为中方完全可以挟此迫其就范,因而提出“因路而及矿”的策略(即挟路以改晋矿矿章)。在10月25日寄外务部商部函中他提出中国同意借款赎路的三项条件:其一,“此路运矿车价须比他项客货酌加两倍”;其二,“国家应得红股若干,分沾矿利”;其三,“只准开矿不准制铁”,因合同题目内有制铁二字,“准其运铁至通商口岸设厂熔炼。”^{[6](P.740)}其中后两项内容即是要修改晋矿章程。外务部对盛宣怀的提议表示支持。福公司对此坚决反对。11月英国公使照会外务部,抗议盛宣怀提出三项条件故意拖延掣肘,要求返回北京在外务部商订借款赎路合同。外务部应盛宣怀要求拒绝了福公司的要求,但迫于外交压力还是电令盛宣怀“速设法与哲(美森)妥商”。盛宣怀切中福公司急欲售路要害,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决定以逸待劳,坚持将内地不准设制铁厂订入合同,并电复外务部“福公

司急欲售路,必须将此内地不准设制铁厂订入合同,以资补救。……在我不可匆忙也”^{[5](P.1358)}。

盛宣怀以逸待劳拖延谈判进程的策略,一方面是为迫使急于出售道清铁路的福公司就范,另一面还在为山西控制矿地争取时间。早在1902年盛宣怀即在《请设勘矿总公司折》中提出“控制矿地”以实现“权自我操”的主张。1903年11月15日致山西巡抚张曾敷的电文中即指出自己派员与福公司商议以拖延时间,是“为缓福(公司)开办之期”,他督促张曾敷设立勘矿公司收买铁矿山,免为福公司所占。1904年初,盛宣怀提出了“凡办交涉必有所挟,方能使人就范”^{[5](P.1369)}的思路。他指出原章程第十七款规定“添造分支铁道接至干路不请公款”,而今福公司请我国借款一百五十万镑,为其专造运矿的泽道支路,这已经严重违背原章程,论理我们可以将原章程中损失较大者藉此修改。但晋矿章程在五年多前已经签订,现如今“殊难翻异,只可就款设法补救”,他电函山西巡抚张曾敷在批准界内将铁矿由官方筹款,借华商之名赶紧收买,“我若不能就枝路挟其改矿章,惟有自收铁山足以挟之”^{[5](PP.1367-1368)}。

随后在与福公司多次磋商中,盛宣怀坚持索矿务红股十五万镑并禁止内地制铁,福公司方面则坚持只议路不议矿,双方相持不下。1月22日盛宣怀提出新的方案:第一,将福公司原议借款一百五十万镑减至一百万镑,中方不再提取矿务红股;第二,泽道运脚须总公司核定;第三,矿局运进之物只运开矿机器及修理厂所需之件,运出之货只运矿质。三端商妥,余可仿照正太商订。^{[6](P.743)}第三条只准运出矿质是不准生产和运送铁制品的委婉表达。可见,盛宣怀的态度是红股、运脚尚可协商,但对内地制铁之事坚决不允。

福公司则坚称外务部已经应允泽道铁路仿照正太路,而今将正太合同绝无之事叙入泽道路章程,与原议不符,又请英使照会外务部加以恫吓。盛宣怀答以“道清路原合同声明不请公款,今半道欲请中国担保借款,福公司业已违约”^{[5](P.1340)}。针对英使的屡次恫吓,盛宣怀一面告知福公司代表此事系商务,可以继续商讨,毋庸再向英使晓舌;另一面复电外务部“或请仍照晋豫原合同,毋庸再供公款,或请改派晋豫巡抚与彼续议”,以退为进迫使外务部不要干预谈判。见外交干涉未能奏效,2月哲美森对盛宣怀的新方案进行修改,大意为:甲、筑路之费款分已成和未成之路,立两项

合同。乙、运脚价由双方公道协商。丙、车路运铁事,开矿合同第十七款有转运该省煤铁字样,故不能立不准运铁之约。福公司能否制铁另是一事,若福公司无权制铁,则合同无庸写不准载运字样;若福公司有权制铁,则铁路应准其载运。^{[6](P.744)}福公司坚称其享有制铁权,但泽道铁路与之无关,可以暂且搁置,届时再行商酌定夺。对此盛宣怀指出:合同标题虽然有制铁二字,但详细条款并无制铁内容,转运煤铁仍是生货。现在合同中注明只准运矿质和开矿机器,本属事后补救,虽然福公司所辩有理,但过此以往,恐怕再无商酌机会。因此请外务部坚持拒绝英使萨道义的干扰,以杜后患。

2. 围绕“中国自设镕化厂”的周旋折冲

为及早解决山西制铁问题,应盛宣怀之邀,山西巡抚张曾敫派员赴沪与哲美森谈判以阻止其设厂制铁。在一个多月的争辩中,哲美森一直以英国公使的要求为由,坚持福公司享有制铁权。外务部3月12日致电盛宣怀:“哲谓开矿另是一事所论尚属近理,现定路章可不必提,应俟该公司请办晋矿时由山西商务局再与磋磨。”^{[5](P.1384)}外务部显然是受到英国强大的外交压力,要求盛宣怀放弃“禁止外国内地设厂制铁”的谈判。

盛宣怀虑及如果一再迁就,恐将来更无补救之法,所以他并未遵从外务部的指令,而是另辟蹊径,思得一补救晋铁之策。次日盛宣怀复电外务部:“现与哲议:晋省出铁之所,或就近铁路之所,中国国家自设镕化厂,允将福公司铁砂交由国家镕化厂炼成铁砖,以便易于火车装运。”^{[5](P.1384)}按照此种策略,英国福公司享有开矿之利,中国尚可保守制铁权,设立炼铁厂的时间、规模等各项事务皆由中方把握。而外国在华内地设厂也不会因此而开端。哲美森急于达成道清路借款赎路协议,答允可以商量。盛宣怀见有望迫福公司就范,便电请外务部不必干涉谈判。外务部表示赞同,并指令盛宣怀要定明中国此铁厂并非专为福公司而设立。盛宣怀深以为是,他认为如果山西能收买铁矿山“自炼自铁,而福公司铁砂不过带炼,倘能办到如此,铁利尚可挽回。”^{[5](P.1388)}

盛宣怀派员与哲美森商谈自设镕铁炉厂,福公司初意不允,而是希望按照道清铁路方法,中国借款,英方代办,工程师等由英方聘任,铁厂仍归英方管理经营。这本质上仍然是中国出钱办厂,英国福公司掌权管理,因而被盛宣怀断然拒绝。盛宣怀提出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方案:“一、晋省出

铁之所,或就近铁路之所,中国国家自筹资本,设立镕化厂,允将福公司铁砂交由国家镕化厂炼成铁砖,以便易于火车装运,二、镕化之费彼此商订公道之价,该厂如实系自己需用之煤及焦炭,倘愿向福公司购买,须订一额外价值比外卖之价略减,福公司尽先供用,该厂既设之后,国家须时常保全妥当合用,而福公司除国家允准外,不得将铁砂寄往别处镕化,或别法销用,三、该厂及日后推广之厂,均系中国国家物产,该厂督办大臣应遴用合适化铁工司,如届时中国尚无称职之人,应向外国选聘。”^{[5](P.1387)}4月初的谈判中,哲美森要求在以上三条方案中加入:英方指定地段设立镕化厂,并由福公司绘造估算,在需要时可在别处设立融化分厂。福公司铁矿应尽先镕化。把向外国选聘改为向英国选聘。^{[1](P.1435)}并要求添加“以上所载三端之外原订晋豫合同别无更改”字样。这实质上仍然是要求中方出钱英方掌权。所以盛宣怀断然拒绝,告以“除末句外国选聘允改英国选聘外,余不能动。”而“晋豫之权未便越俎,镕化厂三条应作泽道借款专条一起签押”,哲美森应允候英电再来定议。^{[5](P.1389)}

英国公使便再次向外务部施压,要求按照哲美森会添各节补入,并谓原定晋豫合同别无更改。无奈外务部只得在字句上加以斟酌修改,并电令盛宣怀酌核妥议。面对英使的一再干扰和外务部的妥协退让,盛宣怀顶住压力,向外务部陈明利害,并指出“此系商务,无所用其强勒,哲面议本已允洽,只恃英使护符,故为尝试,得步进步。”为救前弊防后患起见,他电请外务部“仍推归敝处,与晋省办矿之人未能再让外人。”^{[5](P.1394)}

在盛宣怀的坚持下,福公司终于做出让步,一个多月后制铁权终于挽回。6月中旬,又议定铁矿由中英合办。草案主要内容为:第一,中国与福公司合办山西铁矿及需用之煤矿与炼焦炉,以五成为度。第二,中国自筹资本设立镕化厂。第三,镕化费用彼此商定公道之价。第四,该厂系中国国家物产,如需外国化铁师,应向英国选聘。^{[5](P.1415)}

3. 争取合办煤矿的往复交涉

外务部对达成的四条草案基本满意,但仍希望将福公司独办之煤矿争回到合办。山西巡抚也向外务部提出同样的要求。盛宣怀认为合办煤矿所需资金太巨,中国恐难以办到,但仍愿意争取各矿均合办。早在争取中国自办铁厂和铁矿合办之时,盛宣怀就要求山西及早收买铁矿山,挟以谈

判。此时要想合办煤矿而又缺乏资金,盛宣怀决定继续使用这一方法,让山西绅商收买产煤矿地,作为谈判筹码,并在将来以地入股,作为合办煤矿的资本。1904年7月22日盛宣怀致电山西巡抚张曾敭,要求其在山西勘购矿地,力争上游。

8月5日,盛宣怀与哲美森再次进行谈判,焦点即是合办煤矿。哲美森拒绝合办煤矿,声称:“铁矿已合办,再要煤矿合办,中国未免占便宜太过”。盛宣怀坚持“煤矿独办不能行”。谈判未果。盛宣怀又试图从收购福公司股票入手,先私下询问哲美森买回合同需用之费,哲美森索要二百万镑。^{[1](P.1443)}后又托意大利洋行向福公司原办人罗沙第探询,想以商人出名收买,以使福公司未来所获的利润,不至外溢。罗沙第的答覆是请中国“密收股票二十万镑,通扯约照原价如能买到五十万,利权便得一半,晋铁便得四分之三”^{[5](P.1444)},盛宣怀认为如此最好,但中国实在难以筹集如此巨款,只好作罢。9到11月,英国公使多次催促签约,盛宣怀坚持厂、矿、路同时定义。又经数月磋商,福公司不堪持久拖延,而中方也无力扛负英方巨压,1905年4月,双方达成妥协,在附定四条中添入“煤矿如亦愿合办届时由商务局与福公司再行商议”字样。至此盛宣怀认为已经达成力所能及的最好结果。在1905年4月中旬盛宣怀与豫抚、晋抚会奏的《泽道铁路议订福公司合同折》中说:“彼既因矿而及路,我即就路而制矿,羁轭之法,议就原订之孟、平、泽、潞四属内所有铁矿暨炼铁合同之煤,并炼焦炉统由中国合股开办,仍由国家自设熔化厂,凡各矿所出铁砂,均须官厂冶炼成铁,方准由火车装运。并声明所指各处煤矿如亦愿意合办,由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再行商议,挽晋省已失之利,防铁路溢运之权,内外协力,前后争持已及三载,实已无可再争。”^{[7](P.829)}

7月3日盛宣怀与哲美森签订了《中英道清铁路借款合同暨行车合同》和《拟设山西熔化厂并合办山西潞泽平孟矿务合同》,后者收回了山西制铁权和部分煤铁矿利权。正如李恩涵先生所言,这是“中国在筹谋挽回晋省矿权的努力中,第一次具体的收获”^{[8](P.229)}。至此,历时三年的道清路借款与修改山西矿章的交涉终于完结。

三、结语

20世纪初,面对山西已失矿权,清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束手无策。英国福公司为获取最大利益,可谓绞尽脑汁,不择手段。作为道清铁路

谈判代表的盛宣怀身怀爱国之心,不畏艰难,主动“代为谋划,思所以迎拒之道”,将挽回山西矿权之事纳入自己的谈判中。他深知在国势衰微之际,中方不可能通过政治交涉获利,所以竭力将此事限制在商业谈判范围内,力争减少福公司借助官方力量的干预。从最后的交涉结果来看,他的这一谈判原则是可取的。

此次交涉达到了修改晋矿章程的目的,还应归功于盛宣怀采取了恰当的策略——因路而及矿。深谙谈判之道的他提出了“凡办交涉必有所挟,方能使人就范”的思路,利用福公司急于出售道清铁路以回笼资金的时机,迫其在修改晋矿章程的问题上就范,最终获得成功。这种挟路以迫对方修改矿章的做法,其实质是一种商业上的绑定消费。在当时政治经济处于弱势的情况下盛宣怀能用此方法虎口夺食,充分展现了他在商务交涉中的聪明智慧。

盛宣怀在与福公司交涉的过程中还提出“控制矿地”、“抢占先着”以实现“权自我操”的积极防御策略,并且积极筹建保矿组织——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帮助山西筹集资金,选派矿师勘矿。这些客观上为后来的山西保矿运动作了必要的准备。盛宣怀在与福公司的交涉中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审慎把握细节,不畏艰难,勇往直前,为挽回山西矿产利权做出了极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王玺,李恩涵.矿务档[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
- [2]薛毅.英国福公司在中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 [3]张研,孙燕京.道清铁路卅周年纪念[A].民国史料丛刊[C].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 [4]许同莘,汪毅,张承荣.光绪条约[Z].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 [5]盛宣怀.愚斋存稿[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 [6]吴伦霓霞,王尔敏.盛宣怀实业函电稿[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
- [7]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 [8]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责任编辑 光 翟)

汉画像石所体现的汉代勇战尚武精神评析

朱 鹏 彭恒礼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开封 475001)

[摘 要] 汉朝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关戾,对于汉民族的形成,汉文化的奠基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汉画像石是研究两汉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之一。汉画像石中表现勇战尚武精神的图像数量众多,大致可以分为战争图、训练图、军械图,展现了汉朝人积极昂扬、开拓进取的风貌。汉代的军事需要及军功制度共同促成了当时人们的勇战尚武精神。

[关键词] 汉朝; 汉画像石; 战争; 尚武; 军功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77-04

汉朝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关戾,对于汉民族的形成、汉文化的奠基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吕思勉在《秦汉史》中说“自来治史学者,莫不以周、秦之间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会组织言。实当以新、汉之间为一大界。”^{[1](P.1)}“以民族关系论,两汉、魏、晋之间,亦当划为一大界。”^{[1](P.3)}秦二世而亡,汉承秦制,成为神州大地上一个运祚达四百余年的大一统的强盛的封建帝国。当汉之时,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北方匈奴的崛起,直接对汉政权和汉民族的存续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孙子兵法》中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国之军备向来是历朝历代极为重视的事情。而汉帝国在民族保卫战争和对外扩张过程中所逐渐完善的军功制度和积极昂扬的崇战尚武精神对汉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则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重视军功的观念和积极昂扬的崇战尚武精神在汉画像石中有着很多生动而形象的反映。

作为研究两汉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之一的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汉代大

多没有留下名字的民间艺人雕刻在墓室、棺槨、墓祠、墓阙上的以石为地、以刀为代笔的石刻艺术品,被誉为“敦煌前的敦煌”。它产生于西汉、盛于东汉,魏晋之际仅有个别实例,故称汉画像石。汉画像石的表现内容丰富,涵盖了汉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很多方面,其中表现尚武精神与征战封爵等内容的画像是重要的题材之一。

一、汉画像中表现勇战尚武的图像类型

汉画像中能够表现崇战尚武精神的图像数量众多,形式不一。笔者在此将这些汉画像大致分为三类:战争图、训练图、军械图。

1. 战争图

胡汉战争图是汉画像中比较重要的一类,目前出土的胡汉战争题材的汉画像已有五十多幅。^[2]学者们对这些汉画像意义的解读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这些汉画像是表现所在墓主人生前的军事经历;其二认为这些汉画像石的内容未必是墓主人的亲身经历,而是表现特定的背景或涉及特定的事件;其三认为这些汉画像并非真实反映墓主人生前的战功,而是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认为,胡汉战争图的意义有二:一是用来象征扫除升仙或进入死后世

[收稿日期] 2015-08-25

[作者简介] 朱 鹏,男,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彭恒礼,男,河南洛阳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民俗学博士。

界旅途上的障碍,二是用来歌颂死者“武”的一面,符合允文允武的官员典型。^[2]



图 1

图 1 是一幅山西离石的汉画像石画像。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上层的装饰纹之外,共有五人五马和一匹骆驼,图像清晰可辨,保存完好。这应该是一幅汉军俘获匈奴敌兵凯旋而归的图像。前行的三骑兵手持长矛或者是长戟类的兵器,气宇轩昂;而后面的两骑兵则没有长矛类的兵器。前行三骑兵头著平形的冠帽,而后随的两骑兵则头著尖形冠帽,且帽后有飘带。《匈奴墓葬简介》中有“画像中骑兵、射士的尖帽后又一突起,呈现飘带状”的描述。

这幅汉画像只有一个独立的画面,或许不能够完整描述胡汉战争的情形。图 2 是山东出图的一幅汉画像石图像,画面共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战斗场面,根据所著尖冒可以判断右逃两骑为胡兵,由“身着紧身短袍,外披齐腰铠甲,袍袖短小”的特征可以判断后四人为汉军两骑兵和两步兵。前行胡兵回头搭弓回射,企图阻止汉军追兵,而后面的胡兵已被追至的汉军刺中,仰面落马之状清晰生动;中层为献俘场面。四位汉军士兵将俘虏的两位胡兵带到了长官面前。左侧跽坐前倾的是长官,后立为侍卫。长官面前跪拜的是参与战斗的汉军一士兵。跪拜士兵的身右应该做介绍的长官门吏,双手后指之状栩栩如生。后面依次为双手背缚的两位胡兵俘虏和三位汉军士兵及一匹战马;下层则是兵士们以狩猎来训练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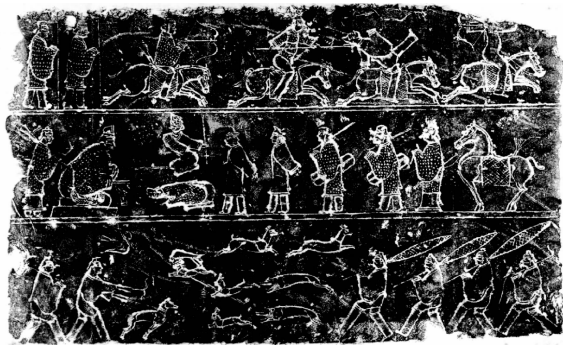


图 2

汉画像中的战争图主要为胡汉战争图,但除

此之外还有一些镇压叛军的战争图。如图 3,武氏祠前石室西壁汉石“交战”画像,第三层,刻绘的是水陆攻占图,中央桥面上有辆盖系四维的辎车,车上一人执刀作战;右边有“贼曹车”、“游击车”、“功曹车”,左边有“主簿车”、“主记车”,还有骑吏、步卒,皆手执兵器作攻杀之状。^{[3](P.56)} 这幅汉画像石可以说是描绘政府军消灭叛军的画面。



图 3

2. 训练图

汉代是一个尚武的时代,频繁的对战争对军队的素质要求很高。为此,军队在没有战事的时间多以训练为主。当时的军事训练项目有射箭、骑术、蹴鞠、技击、拳勇、蹴张、扛鼎等等,这些训练项目在和平时期,一些兵器和军事人物,随着其功能意义的变化也逐渐走入民间,成为具有防护、保护、震慑功能的民间实用工具。在汉画中主要表现为用于防护功能的各种持器械武士门吏、武库、门神、蹴张等。

蹴鞠。汉代军事训练项目,刘向《别录》中说:“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演练之。今军士无事,得使蹴鞠”。后来汉代民间也非常流行蹴鞠,陕北画像石以及河南登封启母阙上的蹴鞠图就是例证。

射箭。射箭的历史非常悠久。西周时把射箭列为六艺之一,一直到汉代都是男子必须掌握的礼仪技能项目,也是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之一。汉画中表现最早的射箭画面是南阳汉画馆所藏后羿射日图,而其它射箭多表现于车骑出行、田猎、骑射奔牛等画像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射箭方式为弋射,如出土于南阳市靳岗乡的汉画像弋射图(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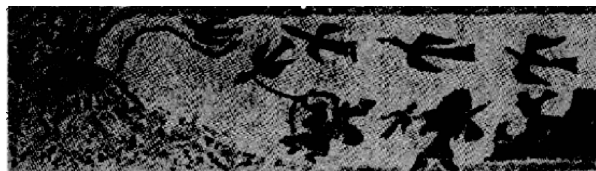


图 4

射箭不仅流行于中原地区,而且流行于西北等边疆地区。《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中说:“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于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4](P.2594)}



图5

技击,是一种持械(枪、戟、剑等)相搏训练。汉代技击流行于上流社会,还经常有技击比赛。汉画中这样的题材也很多,如河南南阳市麒麟岗汉墓出土的技击图(图5)、南阳市熊营汉墓出土的格斗、刺虎图,唐河针织厂汉墓出土的击剑图等。

角力,也叫拳勇,是汉代流行的徒手相搏的训练活动。角力不仅较量力,而且讲究技巧,主要形式有摔跤、手搏。河南登封汉画像石墓出土的摔跤图,图中两人窄袖束带,头戴角形帽,作摔跤状。南阳汉画石中的手搏图,描绘三个武士徒手搏击的状况。画中右二人皆头梳高髻,身着长衣,挽袖,腰间束带,弓步亮掌,正在搏击。左一人亦头梳高髻,身着紧身衣,跃步,亮双掌,注目其右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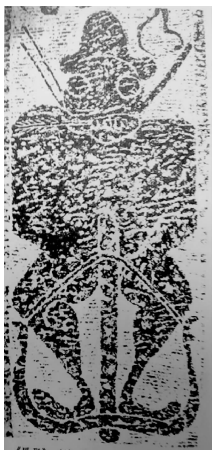


图6

蹶张。材官头戴冠、鼓目、露齿、嘴咬紧矢、两足踏弓,两手上弦,形象凶悍。《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张。”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师古曰:“今之弩,以手张者曰擘张,以足踏者曰蹶张。”^{[4](P.1839)}如图6,是一幅河南南阳的汉画像石拓本,武士脸带面具,头顶高帽,身材健壮,口含簇矢,脚蹬弓臂,双手上弦。画面显示出武士的

力量之美。



图7

扛鼎。古代到汉代都是军事训练项目,汉代流行于民间。徐州汉画馆藏一“练力图”画像石,图中七人用各种方法练力,其中一人便是两手执鼎耳,把鼎翻举过头顶。南阳出土的乐舞百戏画像石(图7)中有一壮汉袒上身,左手摇鼗,右臂平伸,上置一大壶,正在耍弄,壶体形较大,且须平衡,无大力气不行。

3. 军械图

武库,汉画像中专门存放兵器的地方为武库。这类题材的画像也有很多,如出土于南阳市英庄汉墓的武库图(图8),画中有三弩三钺,插立于兵器坐、架之上,另有二方形箱子,应为有存箭簇之类小型兵器之用。



图8

出土于南阳市白滩汉墓的武库(图9),画中兰锜上并排放置矛、戟、盾、甲衣等兵器。地面上有三犬守卫,三只猛犬或卧、或蹲、武欲跃出。三犬皆竖耳悉听,似有情况发生。



图9

出土于四川成都曾家包画像石墓上的兰锜,图中一开口架,上有二根竖木,木上有挂钩,下有长方形座架,此即兰锜。自上而下放置的兵器有叉、戈、矛、环首刀、弓、弩、箭、箭箠、盾。《文选·西京赋》云:“武库禁兵,设在兰锜”。李善注:“刘逵《魏都赋》注曰:‘受他兵曰兰,受弩曰锜’”。张铤注:“兰锜,兵架也,陈列于甲第之门,若今戟

门”。河南唐河织厂汉墓等也出土有武库图。

二、汉代勇战尚武精神形成的原因

汉代勇战尚武精神形成的原因并不是单方面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当时的军事需要和军功制度,两者的相辅相成、相互结合共同促使了这种积极昂扬的精神的形成。

1. 军事需要

汉王朝自建国伊始便面临着来自匈奴的威胁,这在史书中有着大量的记载,如《汉书·文帝纪第四》载:“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击匈奴。”^{[4](P.125)}“六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胡。”^{[4](P.114)}

著名的“白登之围”只是汉王朝与匈奴长期对战的一个开端,这个失败而且耻辱的开端也影响到汉王朝初期对于匈奴的和亲政策的制定。然而随着汉王朝休养生息的政策产生效果,久经战乱的凋敝民生得以恢复,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武帝时期,汉王朝在强盛的国力支持下改变了对匈奴退让求和的政策,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汉书·武帝纪第六》载:“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4](P.147)}“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上郡,杀略数千人。”^{[4](P.148)}“五年春,大旱。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4](P.148)}“秋,匈奴入代,杀都尉。六年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三千余级。”^{[4](P.149)}自此之后,终汉一朝汉族都基本对匈奴保持着军事的主动权。

除汉匈战争之外,还有一些平叛战争,比如汉高祖刘邦时期的剪灭异性功臣的多次战争、汉景帝三年的七国之乱等。汉朝的频繁战争无疑使汉族自上而下做好战争的准备,经历战火的洗练。所以军事需要成了汉王朝养成勇战尚武精神的重要因素之一。

2. 军功制度

只有频繁战争而没有完备的军功制度是难以激发人民保家卫国、投身战场的热情的,更难以形成人民勇战尚武的精神。汉朝的军功制度,主要是继承前朝并发展完善的军功爵制。“所谓军

功爵制,是指按军功(也包括事功)赐予爵位、田宅、食邑和封国的爵禄制度,是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而建立的一种封建等级制度,它与西周奴隶制下的世袭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制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军功爵制度下,不论身分贵贱、地位高低,所有臣民都有可能按其军功大小获得相应的爵位和利益,故又称因功赐爵制。”^[5]

《汉书·张冯汲郑传第二十》载:“上(汉文帝)以胡寇为意乃复问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赏爵,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空言也。”^{[4](P.2016)}从这段冯唐对汉文帝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以军功封赏对于激励兵士用于战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因军功得到特别的荣誉封赏的,如《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载:“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气,上书自请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国,以军功赐天子旗。”^{[4](P.2103)}汉代典籍中记载的因军功被封侯封爵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如《后汉书·窦融列传第十三》载:“融早孤,王莽居摄中,为强弩将军司马,东击翟义,还攻槐里,以军功封建武男。”^{[6](P.623)}《后汉记》卷六载:“恂兄弟及兄子姊子以军功侯者八人。”卷十三载:“秉弟夔,壮勇有气力,以军功拜都尉。”这些丰富的实例无疑说明了在汉朝因军功而受封赏的普遍存在。军功可得爵赏的军事制度有效地保证了人们勇于参战的热情,也成了汉朝人形成勇战尚武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 吕思勉. 秦汉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 朱浒. 汉画像胡汉战争图的叙事性研究[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3).
- [3] 俞伟超. 山东汉画像石[M].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 [4]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5] 张蓉芳,高荣. 朱绍侯先生与军功爵制研究[J]. 史学月刊,2005(10).
- [6] [南宋]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责任编辑 光 翟)

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研究述评

高志勇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 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作为近代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近二三十年来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特别是在其内涵与流变方面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本文在分析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期对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中的政治性与民族性问题做一番论述。

[关键词] 近代中国; 文化; 文化民族主义; 述评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81-04

在中国近代社会改革与革命的时代思潮以及争取民族独立呼声的趋势下,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一种,有其兴起的现实社会基础与思想根源。关于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得到了不少学者的青睐,研究的深度、力度也在不断的加大,研究成果也是层出不穷,并逐渐系统化、理论化。然先前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存有一定的缺陷。本文拟就在对前期研究成果的分析基础上,对前期研究的成果在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内涵诠释以及流变两个方面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表述自己对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两点思考。

一、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定义诠释

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民族主义本身一样,学者之间对其定义或者内涵的界定并没有形成一致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不仅在于不同的学者对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思路、研究角度存在着差异,而且不同的研究者对文化民族主义所持基本立场也是大相径庭。此外,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的现象,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有它本身兴起、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加大了其内涵的界定的复杂性。但是,即使在内涵界定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国内学者还是对其内涵展开了一系列

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纵观先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内涵界定,就国内学者而言,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并带有强烈的原教旨主义。青海师范大学的郭洪纪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基本属于一种自我封闭的民族意识,强调国家的地缘性及族体的亲合性。他在文化民族主义这个自我封闭的民族意识伦理建构下,进一步指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性除“保留部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某些特征”外,还“深为本土性的宗教文化系统所囿限”^[1]。郭洪纪的这种观点带有很强的普遍性。然而,就文化民族主义的保守性而言,笔者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其本身的民族性在里面。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近代社会思潮是近代社会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对改革或革命一种思想文化上的回应,它本身无保守与激进之分,只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对改革或革命的主张程度不同而已,或者说是他们进行变革的方式不同,而他们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

二是从历史本身出发,根据中国近代变革的社会背景去重新阐述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内涵,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

[收稿日期] 2015-11-02

[作者简介] 高志勇,男,河北邯郸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代。在近代中华民族危机的情形下,伴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东传,主张文化救国成为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思潮。这样,在文化救国思想的牵引下文化民族主义逐渐兴起。因此,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对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界定必然带有一定的历史性和社会性。郑师渠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主张在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在对文化民族主义内涵阐述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了文化民族主义本身所兼有的强烈的政治目的性。“作为对西方政治与文化侵略的回应,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同时并兴,是合乎逻辑的。”^[2]如同第一种观点,既不能笼统地说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也不能把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目的性过分的夸大。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就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传入的,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必然要求它带有一定的目的性。

三是从文化本意去阐释文化民族主义,做一种整体性的把握,给予一种正面性的评价。北京大学钱雪梅教授对此做了系列性的研究,她指出文化民族主义是指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她认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尊重和平等,多元民族文化和平共生;强调各民族文化按自己的道路成长和发展,”“它是自由的、平等的、开放的及和平的。”^[3]钱雪梅的这种理解抛开了近代社会变革下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救国思潮,而是从中性的角度去分析文化民族主义包括什么内容,其核心思想在于什么,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与现实作用。在中性价值判断下,对文化民族主义在文化本意上做了恰当的阐释。

四是从现代化这一近代社会的发展主线去界定文化民族主义的内涵。孟凡东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是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他指出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根本诉求在于:“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建立在民族文化复兴基础上的民族意识复兴。”“主张在灌注时代精神和融会世界文化的基础上,推动民族文化民族国家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现代化。”^[4]把文化民族主义同现代化相结合,并把现代化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目的进行论述,也是对概念定义的一种新的尝试。但是,他的这种“现代化”主线下的文化民族主义阐释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因此,在论

述时难免会过于强化他的目的性,进而陷入狭隘性的泥潭,而忽略它本身所具有的广泛性。

二、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流变

关于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流变,如同文化民族主义内涵的界定一样,不同的学者有其不同的时段划分。其中对于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的时间定位更是纷杂多乱。

1. 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时间定位

一种思想的兴起有其本身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作为近代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一大主张——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在近代社会变革的潮流下历史发展对本身的需求。然而,对于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于何时,学者们也是有诸多的时间定位,并未达成一致。纵观先前研究成果,关于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时间界定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兴起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安交通大学张菲教授认为:“我国文化民族主义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外族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冲击和入侵下而产生的本能反应。它萌芽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5]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产生于甲午战后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并存的背景下。”^[6]第三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萌发“于19、20世纪之交,经过‘国粹’和‘新民’两大思潮的交互催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导向下逐渐成形。”^[7]总而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是近代社会变革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在文化危机意识增强下,以挽救民族危亡,以追求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是近代中国从“物质救国”到“制度救国”再到“文化救国”在理论层面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升华,是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侵略的一种反击。

2. 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

一种思想或者思潮一旦兴起,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除去它本身的发展需求外,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选择。对于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大致经历了戊戌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前后三个时期。对于此观点,史学家郑师渠教授对各阶段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形态分别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戊戌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初露头角。”“文化民族主义集中表现为保教”;辛亥革命时期“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

刻的危机。”“五四前后,中国文化的自创性问题第一次被响亮的提出来。”^[2]第二种观点是从时间序列上分析近代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演进,而将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分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及后五四四个阶段。具体来讲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一个形态是“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排拒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渗透而倡导‘保教’。”;第二个形态是“20世纪初年,以国粹派为代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爱国存学’。”第三个形态是“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的出现以及‘中国文化复兴’、‘拯救西方’等口号的提出。”第四个阶段是“后五四文化民族主义主要有两个明显的活跃期:一是30年代中期,二是抗日战争时期。”^[8]第三种观点是,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它萌发于19、20世纪之交,经过‘国粹’和‘新民’两大思潮的交互催生,在‘新文化运动’的导向下逐渐成形。”^[7]

纵观这三种观点,其划分的依据都是在近代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内对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是依据对文化上认识的重要性而做的一种划分。

三、对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些认识

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社会背景下,致力于民族救亡的仁人志士在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时期的“自强求富”,再到“维新变法”与“革命”,再到“文化救国”。这一切的近代革新要求无不充斥着国人志士的思想。随着西方文化入侵的不断加剧,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的呼声也在不断加大,这样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变成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而影响了几代人。在“文化救国论”思潮的驱使下,一批文化流派兴起,比如:学衡派,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等等。诚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言:“进入20世纪后,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9](P.74)}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一旦诞生,它本身就带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这是近代中国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时代背景下的一种必然。

1. 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性

毋庸置疑,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是在民族

危机的刺激下出现的,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种历史必然。在危机意识下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这本身具有合理性。强烈的政治目的性有其积极的一面,正如钱穆所说:“惟有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然后可以复兴中国之民族。”^{[10](P.184)}邓实更是指出:“亡人国也,必也灭其语言,灭其文字,以次灭其种姓,务使其种如坠九渊,永永沉沦。”这些言论,在民族危亡的情形下,无不具有强烈的震撼感,以感召时人,唤醒时人的革命意识、抗争意识来保家卫国,保国保种。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强烈的文化自卫意识固然有其合理性,然就是在这种合理性意识下的扩张,它的非理性意识也在泛滥,其危害比其合理性意识更强大,更容易误导国人。在这种非理性意识的驱使下,钱穆就曾说:“中国文化,无疑为世界现文化中最优秀者。”^{[12](P.7)};“将来的世界,正要中国文化来领导。……中国文化可以救世界。”^{[13](P.130)}而以“文化救国”自居的梁漱溟,更是直呼:“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事,乃不会有的事。”^{[14](P.333)}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意识,然先前的研究者却认为:“这不是狂妄自大,也不是病态心理,更不是文化自恋情结,而是对中国文化真切体悟的一种文化认同”;“是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梁漱溟把道统(民族文化之统)的延续与光大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道。”把这种非理性意识趋势下的文化主张,称作为“对中国文化真切体悟的一种文化认同”,一种“安身立命之道”,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一种思想在非理性意识的趋势之下,其危害性之大是不敢妄测的。好比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它本身也是在民族主义驱使下非理性发展的结果,最终的结果是二战的爆发。因此,一种思想一旦在非理性意识的驱使下,蔚然成风,带来的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并且这种破坏性影响是长久的,后几代人的思想必受此种非理性意识文化主张的误导。

2. 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强烈的民族性掩盖了时代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其实质就是近代中国“主位文化”因西方“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也就是所指的文化本土运动。不管是“主位文化”还是“客位文化”,它们本身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都具

有本民族的特性和它本身的时代性。就其文化的民族性而言,主要是指对特定民族文化心理的最高程度的抽象,是一种文化与不可替代的独特规定性和不可通约性。而文化时代性是指社会群体文化的存在具有时代特征,代表着时代特色,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随着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蔚然成风,不少先哲士人却只是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而刻意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其著作之中无不充斥着民族文化优越的论调。从早期的国粹派保存“国粹、国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再到“动静文明,物质精神文明”等等论调的泛滥。这其中虽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客观上却夸大了东西文明之间的民族差别,而忽略东西文明之间的时代差异。其中,梁漱溟更是发出惊人的呼声:“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孰不知,在当时的情况下,近代先哲连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哪些都没有弄清楚,“国粹”,“国魂”到底指什么还没有个具体的定数,这种时代差下的文化复兴,也必然走向失败。

纵观中国近代史,我们可知近代的中国是个落后的国度,这种落后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更表现在于精神层面。不少保守、守旧思想不断地以捍卫传统,保守民族国粹自居不断地向新式文明发起冲击。这不仅减缓了近代中国革新的步伐,更是在精神文明层面给国人制造出一种迷雾。传统的精华固然要守,然一味地求守以排斥西方先进文明,这本身就是缘木求鱼的做法。用文化民族性去夸大“国粹”的魅力,而刻意地去贬低东西文化之间的“时代差”,最终结果只能是在寻求近代中国文化的出路上继续迷失方向。

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一种表达,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是“本位文化”在“客位文化”的冲击下形成的一种“文化救国”与“文化复兴”运动。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利于民族凝聚力的积聚,以开展“文化救国”。但是,在民族性的驱使下,这种运动很容易陷入一种非理性的“文化自卫”。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不在于它在“文化救国”上有多大的号召力,而在于如何处理“本位文化”与“客位文化”的关系,如何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促进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的新生。一种思潮能否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产生重大影响,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和近代中国社会时代课题相融合以及融合的程度如何。因此,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没有发出它本有的力量,盖其原因,主要在于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在非理性意识的驱使下,过分强调了它的政治目的性与民族优越性,而过于忽略如何处理“本位文化”与“客位文化”的关系问题;即两种文化的时代差问题;忽视了如何使传统文化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近代化”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郭洪纪.文化民族主义的缘起及主要特征[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
- [2]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J].历史研究,1995(5).
- [3]钱雪梅.文化民族主义刍论[J].世界民族,2000(4).
- [4]孟凡东.20世纪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三大核心诉求[J].北方论丛,2007(3).
- [5]张菲.近现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评析[J].学术论坛,2003(3).
- [6]陈旭.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之辨[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 [7]张淑娟.文化民族主义渊源研究[D].吉林大学,2004.
- [8]杨思信.近代文化民族主义论略[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 [9][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10]钱穆.国学概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
- [11]李良玉."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J].徐州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 [12]钱穆.文化与教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3]钱穆.灵魂与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15]周良发.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探微[J].运城学院学报,2011(1).

(责任编辑 光 翟)

试论释省常西湖莲社之特色

——以《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①为中心

黄文翰 陈元锋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摘要】 淳化元年(990),杭州昭庆寺寺主释省常,始结莲社于西子湖畔,终真宗朝凡三十余年不衰。本文依据近年新见的《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同时征引相关文献史料,从参与者的身份、莲社的活动、莲社的环境、莲社的政治性四方面,对省常西湖莲社特色作一初探,以期窥见宋初士大夫“轩冕其身,林泉其心”的文化心态之一斑。

【关键词】 宋初士人; 释省常; 西湖莲社; 入社诗

【中图分类号】 G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85-04

一、一百士人襄盛举

宋初净土结社风行,尤以江浙为盛。除省常于淳化元年(990)在杭州所结的西湖昭庆寺莲社外,颇知名者还有:天台学僧遵式于至道二年(996)在明州宝云寺起建的念佛会、大中祥符六年(1015)知礼的延庆寺念佛施戒会、祥符八年(1017)遵式法嗣本如的台州东掖山承天寺白莲社等。但是,没有哪一个莲社可以做到“贵有位者,闻师之请,愿入社者十八九”^{[1](P.264)}、“于是乎钧台上列,宥密近臣,文昌名卿,玉署内相,琐闼夕拜,谏垣大夫,纶阁舍人,卿寺少列,郎曹应宿,仙馆和铅,曲台礼乐之司,延阁著述之士,殿省春坊之俊,幕府县道之英,凡若干人,莫不间发好辞,演成盛事”^{[2](PP.209-210)}的。

并非丁谓、孙何溢美,省常的西湖莲社中,的确有相当数量的一批地位颇高的参与者。智圆在《故钱唐白莲社主碑文》中揭橥道:“由是宰衡名

卿,邦伯牧长……预白莲之倡者,凡一百二十三人”^{[3](P.312)}。仅就《相国向公诸贤入社诗》残本所收入社的九十人的官衔来看,尚书以上者就有八人(平章向敏中,参政李至、王化基、王旦、苏易简,副枢陈尧叟、钱若水,工部尚书李至、礼部尚书宋白)。作为一个民间宗教组织,能获得士大夫如此广泛的参与热情,前此无闻,后此亦复少见。

当然,除了拥有众多的入社士人外,省常莲社同样也吸引着僧人与普通信众的参与。其数为“八十高僧,一千大众”^{[2](P.209)}。

二、血书经卷与投诗

作为宗教社团的莲社,念佛、坐禅、讲经、诵经自属平常之举。省常的西湖莲社之所以卓尔不群,异出于众社之中,自有其特殊的活动足以吸引社员加入。释省常七岁即出家,十七受具足戒。“理行谨严,修心贞素”^{[3](P.312)}。结莲社以《华严净行品》为据,为此不惜自刺指血,和墨写《净行

【收稿日期】 2015-10-16

【作者简介】 黄文翰,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陈元锋,男,山东招远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①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9年版)介绍了韩国所藏《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残本。此残本的《相国向公诸贤入社诗》保存了当时90位士大夫的入社诗。为避繁琐,凡本文引诗不标出处者,均据《稀见唐宋文献丛考》第137-153页金程宇校录的《相国向公诸贤入社诗》。

品》一千份分施众人。“每书一字,必三作礼,三围绕,三称佛名”^{[4](P.410)}。《净行品》的字数约在三千,一千份就要书写三百万字。这无疑是一件颇费时间、精力的事情。更应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人血中杂质较多,且久置颇易变质、凝结,可知省常每次书经,必得重新刺血和墨。近代净土高僧印光,曾在《复弘一师书》中,专门谈到过刺血写《华严经》的不易。“若不抽筋,则笔被血筋缚住,不能写矣。古有刺血写华严,以血筋日堆,塑成佛像,有一寸余之高者”^{[5](P.148)}。

省常作为一位如此虔敬的佛门弟子,以常人难以做到的大愿大行,感召着士大夫们加入到西湖莲社中来。^①以苏易简的入社为例,其于淳化二年(991)九月,接到了郑生从会稽带来的《净行品》,并得知省常于西湖结莲社的事后,“即摄衣稽顙而报之曰:彼上人者果能立是见解,成是功德,予当布发以承其足,剝身以请其法”^{[6](P.314)}。淳化四年(993),苏易简以“净行弟子”的身份,寄上了自己的入社诗,以为“香火皈依会有缘”的凭证。

另外,省常从皇皇百万言的《华严经》中,选择三千字的《净行》一品,作为结社的理论依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招引士大夫入社计的。《净行品》乃文殊菩萨应智首菩萨之问,宣说如何在一切时、事、处,清净三业,从而“获一切胜妙功德”的一品经文。“文殊所说的种种净行,由‘菩萨在家’、‘孝养父母’、‘妻子集会’等说起,对浸润于儒家文化、遵循儒家伦理的士大夫有很大的亲和力与摄受力,尤为对机”^{[7](P.99)}。

省常淳化元年(990)于杭州施经,苏易简次年便在相隔两千里的汴京得到了经本,足见省常结社消息传播之速。其通过刺血写《净行品》分施众人,以吸引士大夫入社的目的,可以说较好地实现了。

除去一百二十三位士大夫,省常莲社成员还有“八十比丘、一千大众”。其血书的《净行品》多达千份,显然施经此举,并非单独针对招引士大夫入社而为。在施经同时,省常还采取了寄诗的方式招引社员。而寄诗的对象,则完全是士大夫们。许多士人在入社诗里,都透露了省常寄诗相招的信息。刘师道有“莲社高僧旧出尘,好诗相寄许相

亲”、裴庄有“白莲社结浙江皋,社主诗来诱我曹”、康戡有“结缘传宝偈,招士寄清吟”,不一而足。省常的诗作,虽然今日无缘得见,但通过宋白《大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碑铭》里“内学之外,为诗甚工,汤休、皎然,不相上下”^{[4](P.410)}的记载,以及士大夫们入社诗里“好诗相寄”、“寄清吟”、“丽藻新词传北阙”(李堪)等语之推许,也可从侧面反映其诗歌的艺术成就绝非泛泛。

省常敏锐地洞察到,作为具有文人雅好的士大夫们,通过以诗歌酬唱作为入社依凭的方式,能够很好地契合他们的文化好尚与精神追求,从而最终达到“今旧相右丞河内向公首缀风骚,相继百数……拂当世之云天,萃钜儒之竹素”^{[8](P.97上栏)}、“珍重时贤乐香社,酬唱诗句满人间”(陆旷)的良好效果。为吸引更多士大夫入社,省常独具匠心地把入社贤达的入社诗作,写在一块块“诗牌”上,并悬挂于寺中碧玉、四观二堂之上,以供人们吟赏学习。“诗牌盈壁尽名贤”(张去华)、“粉牌多挂达官诗”(丁逊)便是对当时景象的绝好还原。省常此举,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创新,对吸纳更多士大夫入社、提高寺院知名度、扩大莲社乃至佛教的影响力,均有助益。也正是基于此,有的学者指出,“省常的西湖白莲社为目前可以考知的宋代最早的诗社”^{[9](P.129)}。一个知名的宗教的结社,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广泛参与者与影响力的文学的社团,这是省常莲社不同于宋初其他莲社的独特风貌。

三、西湖山水助净缘

“钱塘山水,三吴、百越之极品,而西湖之胜又为最。环水背山二百寺,据上游而控胜概者,今常师所栖之寺曰昭庆者也”^{[1](P.264)}。省常莲社的所在地,可以说占尽了“东南第一州”的好风光。入社士大夫对此多有记录。如姚铨的“竹冷侵灯焰,溪闲度磬音”、李建中的“楼高湖色平,湖上问山名。半日杉松寺,满帘风雪声”、艾仲儒的“楼当列岫窗含翠,寺枕澄湖路少尘”,不一而足。

西湖莲社的幽美环境,引得那些终日身居庙堂、尘网牵缠的士大夫们歆羡不已。他们纷纷投诗入社,希望有朝一日,得以真正徜徉于西子湖畔,结社修心,饱览余杭的佳山胜水。如宋湜写于

① 祝尚书《宋初西湖白莲社考论》(《文献》1995年第3期)一文认为,省常的刺血书经,“表现了他的宗教狂热,同时以此惊世沾名,原不足道”。该文又见收于氏著《宋代文学探讨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418页。祝先生此论似非持平。有学者曾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详参刘方《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变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汴京的“夜船修疏孤灯尽，雪屋安禅瀑布邻。我有挂冠前约在，此生应得似遗民”、崔宪作于抚州的“波光寒隔越，山色翠连吴。借问非才者，堪为弟子无”、方演寄自南康军的“路穿松影苔钱润，门枕湖光柳线匀。定约乘轺寻此境，预愁才不似遗民”，余不具列。

在少数能够亲身参与莲社、当面问道省常的士人的作品中，那种对西湖山光水色的热爱，以及对自己得以躬逢胜会的喜悦之情，就更加跃然纸上了。知杭州军府事的净行弟子张去华就写道：“野鸟散来闻磬韵，白云飞尽见茶烟。看经每坐松间石，洗钵常临竹下泉。讲处异花飘席上，斋时饥猓集阶前。经声远出岚光外，霞片高飞塔影边。岩溜夜闻清梦寐，岭梅寒谢浸漪涟。非时雷电生阴谷，欲雨虹蜺饮暮川。草疏砚中涵岳影，捣衣石畔贴苔钱”。这段景色描写，可以说是《相国向公诸贤入社诗》所存作品中，篇幅最长同样也是最精彩的一首。“伊余自愧非名士，到此尤欣睹胜缘”，面对西湖旖旎的自然风光，张去华不禁感慨道：“因悟有为能几许，岂于浮世苦忙然。日高食退暂援笔，聊续群公净行篇”，入社之意拳拳。

四、莲社友朋互夤缘

省常的西湖莲社自淳化元年(990)结社始，三十余年不衰。当孙何于咸平四年(1001)撰写《白莲社记》时，西湖莲社刚刚走过它的最初十年。《记》中记载了早在咸平四年前就已入社的贤达二十余人^①。贵者如向敏中、苏易简、宋白、钱若水、王旦等人，都较早地成为了社员。他们的聚合使得省常西湖莲社的影响力大增。士大夫只要入社，就意味着挤进了一个清贵尊荣的圈子，得以有机会与朝彦贤达相呼游从。这是士人们所乐意为之的事。

仅就孙何《白莲社记》中比较确定的人社贤达，对他们之间的过从，择取数人，略考如下。淳化二年(991)，庐州比丘尼道安告大臣徐铉与妻甥姜氏私通，事连“(向)敏中妻父”^{[10](P.9553)}张去华，去华以是遭贬。宋白因为“素与去华厚善，遂出为保大军节度行军司马”^{[11](P.12999)}。又，宋白曾三知贡举，太平兴国五年(980)登第的苏易简、八年

(983)登第的王禹偁，都是他的门生。宋白于兴国八年为翰林学士，门生苏易简继于雍熙三年(986)入翰林。座主门生同为内制，一时士林荣之。苏易简有《赠翰林学士宋公白》以纪其事：“天子昔取士，先俾分嫖妍。济济俊兼秀，师师麟与鸾。小子最承知，同辈寻改观。甲第叨荐名，高飞便凌烟。遂使拜宸坐，果得超神仙。迄今才七岁，相接承华轩”^{[12](P.48)}。淳化二年(991)，苏易简擢翰林学士承旨。十月，易简乞御书“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飞白赐之，挂于学士院厅额。苏易简会同秘书监李至等同僚往观。太宗“遣中使赐宴甚盛”^{[13](P.9172)}。翰苑诸公各有歌诗以纪之，宰相李昉等亦有诗作投赠。后结成《禁林宴会集》。又，淳化三年(992)苏易简与王旦同知贡举，次年又同知考课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王两人还是儿女亲家。王旦二女儿嫁给了苏易简之子苏耆。真宗即位不久，钱若水以母老辞枢密院事。真宗向他询问近臣中的可用之才。若水郑重推荐王旦说：“旦有德望，堪任大事”。^{[10](P.9544)}在此之前，钱若水就曾表达过他对王旦的赞美与敬重。“钱若水有人伦鉴，见旦曰：‘真宰相器也。’与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耸壑，栋梁之材，贵不可涯，非吾所及。’”^{[10](P.9543)}。王禹偁素来喜欢奖掖后学。淳化初，禹偁曾荐王旦为转运使。梁颙青年时代从王禹偁学，“禹偁大加器赏”^{[14](P.9862)}。丁谓“少与孙何友善，同袖文谒王禹偁，禹偁大惊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始有此作”^{[10](P.9566)}。李昉之子、宋白门生李宗谔，大中祥符二年(1009)曾副丁谓为昭应宫修宫使，五年(1012)又曾副丁谓为真州圣像迎奉使。

《记》中入社贤达间，或为同年同僚，或为姻亲眷属，或为座主门生，或为旧知密友，或为先生后学，关系错综复杂。然而，这仅仅是加入到省常西湖莲社的一百二十三位士大夫中的冰山一角罢了。有学者指出，这些人物“大多数相互之间有着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而在政治上，也往往是可以相互帮助”^{[15](P.55)}。从这个角度考察省常的西湖莲社，就不难做出“这一结社是真宗朝当权者公认的集会”^{[16](P.137)}这个判断。

^① 孙何《白莲社记》所记的人社贤达，均未直书名字，而是以官职、郡望指代。学者对此多有考辨。可参祝尚书《宋初西湖白莲社考论》、刘方《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变迁》第48-54页、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第134页、吴树虚《大昭庆律寺志》（杭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7页。比较确定的人社贤达有：向敏中、钱若水、王旦、吕祐之、梁灏、王化基、张去华、朱昂、李宗谔、李至、宋湜、王禹偁、宋白、苏易简、丁谓、孙何等。

五、结语

通过对释省常西湖莲社之特色的初探,我们可以约略窥见宋初士人“轩冕其身,林泉其心”的特殊文化心态。省常的莲社里,不仅有一百二十三位士大夫,同时还拥有“八十比丘、一千大众”的社员。西湖莲社既是文学性的、政治性的,同时,也具有它宗教性的原初面目。只不过,就士大夫入社动因的维度来说,前者的吸引力也许要更大一些。

〔参考文献〕

- [1] 丁谓. 西湖结社诗序[A].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第10册)[C]. 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2] 孙何. 白莲社记[A].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第9册)[C]. 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3] 智圆. 故钱唐白莲社主碑文[A].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第15册)[C]. 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4] 宋白. 大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碑铭[A].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第3册)[C]. 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5] 印光. 印光法师文钞(第1册)[M]. 成都:巴蜀书社,2015.
- [6] 苏易简. 施华严经净行品序[A].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第8册)[C]. 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7] 黄公元. 浙江净缘[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 [8] [高丽]义天集. 圆宗文类(卷二十二:钱易《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总序》)[A]. 续藏经(第二编,第八套,第五册)[C]. 未公开出版.
- [9] 金程宇. 稀见唐宋文献丛考[M]. 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0] [元]脱脱,等. 宋史(第27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1] [元]脱脱,等. 宋史(第37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2] 傅璇琮,等. 全宋诗(第2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13] [元]脱脱,等. 宋史(第26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4] [元]脱脱,等. 宋史(第28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5] 刘方. 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繁荣与变迁[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16] [日]池泽滋子. 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光 翟)

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的动态空间场景^{*}

王寅寅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凤阳 233100)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其生存于民俗文艺的环境之下。而这种传统文化的环境在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建设进程里也在急剧恶化。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依存于独特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能够尽显其本身的活态性。这种活态性的体现除了依靠“人”的活态媒介作表达之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的小品与场所空间上也有突出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的小品与场所空间所体现出景观物象的可移动性、短期时效性、间歇性和临时性等特色,这些特色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活态流变的特性和内涵。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 活态性; 时效性; 民俗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89-05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中的文化空间或文化场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示的辅助物质,并非独立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之中。从促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的现象中,固态化的景观文化空间或文化场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现象的重要组成要素,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的辅助物质的小品和空间场所单独系统的归类。由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的活态媒介中的人与辅助物质元素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只有特定的文化环境和物质因素才能孕育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1](pp.21-24)]比如在年俗文化中,百姓们敲锣打鼓在龙王的庙宇祭拜请神,场景热闹非凡,引人入胜。如若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现象中缺少了物质因素,抛开制龙头的传承人所制作出的巨大而精美的龙头,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场景的韵味显然就失去了大半。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小品——同一静态空间中的活态性特质

高淳县的抬龙活动也俗称舞龙,舞龙活动在正月十五那一日会把龙王搁置龙王庙内以“坐堂”的静态形式供人观赏,正月十八越村串巷,白天龙身被轮流奉于村中各户人的家里,到了下午每家会把龙聚齐接上,至傍晚便开始以人作为主要的动态媒介载体进行舞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舞龙活动直到最后一场,除龙头、龙颈、龙尾外,其余部分均烧掉,保留的龙头、龙颈、龙尾则会重新放回龙王庙中。活动所使用的龙王造型极为讲究,龙头部均用优美绸绦缝糊,且工艺精细。龙头头冠正面及侧面分别扎饰几十个形象生动的折子戏主角及历史人物典故,人物均扎成立体式,内容有“白蛇传”、“野猪林”、“牛郎织女”、“天仙配”、“福禄寿三星”、“珍珠塔”、“文武状元”、“刘海戏金蟾”、“八仙庆寿”等。龙角亦装配别致,彩球、彩

^{*} **[基金项目]** 安徽科技学院校级社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ZRC2014373),安徽科技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计划风景园林学(项目编号:AKZDXK2015B01);安徽科技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计划农业资源与环境(项目编号:AKZDXK2015A02)

[收稿日期] 2015-12-20

[作者简介] 王寅寅,男,江苏铜山人,安徽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

带披挂形成舞盘时间的飘拂流动线条,而龙身共有42节,连头带尾共44节。这种庞大造型的图示化表达形式,体现出非物质文化景观辅助物质较高的观赏性和装饰性。龙王在庙中与其他庙宇建筑中的景物不同,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其他寺庙供奉的神像比较,龙王在静止于庙宇的内部空间里被人供奉时,所体现的非物质文化景观现象具有短期时效性。这种特性亦存在于龙王在外部非物质文化景观环境中,以人的媒介载体进行活动的时空里。由于具备这种短期时效性的景观现象,其相对于普片意义上不可移动的寺庙景观造像是具有活态性特质的。龙王所活动的静态与动态场景要依据民俗节日里的时间顺序进行,所以其存在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两种环境现象之中,便是以静态方式存在于静态的建筑内部空间,以动态的活动方式存在于外部的景观空间之中。我们也可将这种相对具动态化特性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单体视作祭祀景观,而高淳县将舞龙活动这种祭祀性动态景观作为传统继承下来,追溯其历史,距今已有800多年。



图1 高淳县薛城花台与阳江镇供桌组图

除了龙王为装饰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单体,自古高淳的另一大非物质文化景观是搭建戏台与唱戏活动。高淳的古戏台遍布城乡,有相关依据可寻的古戏台有48座,保存完好的古戏台里有4处是省级文保单位。不过现在的古戏台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实用功能,如今高淳地区主要以搭建临时戏台的形式进行唱戏活动。这种临时戏台被称为“草台”,它是为了唱戏而临时搭建。从春节前直到农历三月中旬,高淳县各地普遍会搭建草台,邀

班唱草台戏。高淳草台戏就是在村头开阔地带临时搭建的戏台上唱戏,草台有木结构和竹结构的,现在也有钢架的,等春节期间多天的演出结束后,戏台便随之一同拆掉。营造它的特殊之处是相对于古戏台形式更为简易,搭建工期短,时效快,材料拆装易于储存和搬迁,皆可长期循环使用。

由于高淳人搭建戏台的传统具有300多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即便是草台的搭建,也讲究实用与美观,很有技巧,所以草台又称之为“花台”。以春节期间高淳县薛城镇邢氏祠堂对面唱戏的花台为例(图1),该花台是用钢架与木饰面混合构建的临时戏台,占地约210m²,台底高170cm,台面宽1300cm,进深1600cm,台沿口正对观众的一面围有祥云、蝙蝠与寿字纹样的白底彩图,台口上方以多层彩色幕帘装饰前后空间的关系。在戏台中间,用彩屏分隔前后台,戏台屏风的中央绘有寿字与寿桃和福、禄寓意的葫芦莲花等各式戏剧祥物衬景。台中背景所绘制内容为金銮殿屋宇内金色蟠龙装饰的四门八柱与龙椅彩画;台顶是一幅幅彩画排吊;有四个出进场的彩门,上书“出将”、“入相”字样。虽然花台的营建简易且是临时的,这种短期时效性的戏台不比古戏台的装饰丰富多样。也不会像建筑那样静止于一处地点,但这种传统非物质文化手工遗产营造的景观空间,关键是手工业文化的意境表达,抛开简单的景观视觉对比层面的研究,其形成的根源更多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民间文化现象的影响。

相对于静态形式的古戏台建筑,花台的临时性与移动性也是相对于长期静态空间的一种动态化的场景,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景观的构建过程,也是非物质文化景观空间的动态空间和重要的物质辅助场所。花台空间的式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高淳戏曲历史文化的思考与延续,并且以具体的景观空间形态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过往古戏台形态与过往精神文化生活的追忆。

除了较大型的龙头和花台,此类相对动态化的非物质文化景观空间,在民间年俗文化中还有许多形态更小巧,和简易度更高的景观物象。高淳县阳江镇在正月初五这天有着“接龙王”的传统活动,这天抬龙王的村民会越村串巷到各家各户

和大小商铺门前舞龙赐福,各户门前正中都会摆上供桌(图1),桌上供三碟团子或者糖包子,三杯糖水,两包红纸包裹的米切糕,户主上香点烛,烛台下压着印有龙和“人寿年丰;吉祥如意”对子的红色纸符以迎接龙王的祝福。在非物质文化景观空间环境里,供桌以及桌上的贡品,这些可移动式的物件,是利用空间组合的方式来营造迎接龙王来临的祭拜景象。而这种可移动的动态化组合,相对于静态的室内空间是相对具有活态性空间特质的。

上述单体景观物象也可以看作是非物质文化景观的典型景观小品,它们都具有可移动亦可静止的活态性质,而场景做相对动或静的形态表达,都体现着人们对景观场景的精神崇拜。无论是龙王、花台或是供桌,这类活态化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小品在民间民俗文艺中所产生的图式和文化表达,及其有关的制度、礼仪、崇拜、禁忌等等,是早期氏族社会和城邦社会遗留的历史产物,其所具有的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空间特性仍将长期、广泛地存在于本地区的社会情境中。而与高淳县抬龙、薛城花台唱戏等非物质文化景观动态场景性状类似的,还有大巷村双龙、跳财神、东坝大马灯、桡溪跳五猖、阳江打水泐、砖墙叠罗汉、舞狮子、河蚌灯、送灯等非物质文化景观。

二、非物质文化景观的活态化媒介——“人”的媒介载体

非物质文化景观动态化空间场景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依托人作为媒介载体进行景观活动。非物质文化景观现象的生发,大部分内容都需要通过人的活动展示出来,使得受众感受其特有的文化内涵。景观场景生发的过程中往往会有受众与传达者的互动,或是受众对现象展示进行参与。例如语言交流、祭拜的行为或场景移动路径的动态跟随。非物质艺术文化场景中的表演者在表演环节里,传唱会受到受众的鼓掌或赞叹,场景中单单只有表演者也是乏味的,而这些动态景观场景是物质化景观所不具备的。以正月初六高淳县薛城镇邢氏祠堂的对面,为纪念邢氏祠堂的修缮完成而举行的唱戏活动为例,从唱戏前的祭祖敬香仪式开始直至唱戏活动的全部展示过程里,观众

形成人潮景象,始终对剧团表演者簇拥跟随,云集一时。此段时空的剧团表演者或是观众,皆是非物质文化景观动态化场景的主要媒介载体,不断地对景观场景进行着表达和迁移(图2.1)。



图 2.1 高淳县薛城花台与阳江镇供桌组图



图 2.2 高淳县大巷村双龙组图

高淳县舞龙的式样很多,有抬龙、康龙、板龙、双龙、单龙等,每一种舞龙的形式都属于典型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动态化空间场景。以大年初一下午在高淳县砖墙镇楼下村舞双龙的调查现场来分析(图2.2),大巷村双龙首先由舞龙的村民从村外进入村内,双龙颜色分别为黄色和青色,黄龙代表丰收富裕,青龙代表风调雨顺。青龙在前黄龙随后,两条龙头的前方都有举龙旗的旗手和挑龙灯的老人,龙灯上写有“安定”、“如意”、“团结”、“徐”和“大巷村双龙”等文字,龙旗上也写着“国泰民安”等字样。锣鼓手跟随在双龙之后吹奏锣鼓,吹奏锣鼓的师傅由六七个人组成,一般年岁较大。舞龙头和龙珠的人是较年轻有力量 and 经验丰富的师傅。双龙进村之后会挨家挨户进行舞龙的仪式表演。双龙每进入一户后,黄、青双龙先并排停止,黄龙在左青龙在右,龙头对于此户正门前方。旗手、鼓手、挑彩旗和挑龙灯人围于一旁,此刻户主人会拖出果盘或香烟一一给舞龙队伍敬上,接着青龙先完全钻入此户厅堂内,青龙钻出厅堂之时

此户人家将在门口准备好的炮竹燃放,钻出厅堂后紧接着黄龙再钻入厅堂舞动后再钻出,双龙在此户门前齐舞并相互盘旋、舞姿振奋,村民男女老幼围观欢呼,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双龙舞蹈完毕之后将继续由青龙带头进入下一户人家,每家每户皆如此进行。由此可见,双龙景观的至始至终都是以移动行走方式的动态行为做空间场景表达的。逢年过节舞龙的风俗,且具有全国性。龙也是一种移动的景观图腾,利用这个图腾在空间场景中做活态性的行为表达,人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生活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生活安康。

调查组人员除选择了长芦杨家抬龙、大巷村双龙和薛城花台唱戏三项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做深入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动态场景研究之外,在县内对与其相似的景观环境“跳财神”进行了田野调查(图2.3)。民间传说正月初五为财神的生辰,所以本日最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活动的就是“跳财神”,商家们都在正月初五请过财神之后再开始正式营业工作。跳财神亦称接财神,正月初五的清早会有表演的传承人装扮为财神的模样,手中捧着元宝,头戴乌纱,身穿红袍,有锣鼓手敲锣打鼓跟随,扮演财神的舞者跟随锣鼓的节奏到每家每户门前独舞,挨门挨户散发红纸印的财神像。这种动态场景寓意着招财进宝,也是为了朝拜四方。



图 2.3 高淳县跳财神

三、非物质文化景观动态场景的植物

生发非物质文化景观场景的原因除了以辅助器具和“活体”媒介做动态的表达之外,与相对静态的“活体”也有着生发的关联性,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根源是来自于植物,尤其是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农耕文明发展过程中催生出劳动生产者对农作物崇拜的场景物象,这种崇拜意象的场景物象更多的映射出人们对于收获的企盼。在乡土空间的人居环境中,植物祭祀包括了一部分农业文化元素组成的祭祀环境空间与农作植物元素的图腾崇拜意象,另外一部分原因源自人们对地域性植物的利用与融合关系。

植物崇拜生发的景观空间如其他活态性的景观环境一样都具备了非物质文化景观的内涵,而这一类非物质文化景观环境的运用可以更好的促使城乡发展规划达到良好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的科学要求,也可以提高现代农业观光旅游产业的建设质量,加速产业的多元与转型,将非物质文化景观特色融合到现代服务型农业环境中建设农业特色旅游景观,在学科内突出文化传承性原则、地域文化原则以增进其独特性来提高经济价值。^{[2](P.5)}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景观若作为文化产业,其承载着多种的社会功能。不可回避的是,资本本性在于运作获得最大利润。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景象渗透到各个国家和地区,以至于知识性经济和文化产业在不断开发和走向市场核心位置的同时,市场追求快速的效率抛弃了文化本身,使资本收益成了评价事物的主要标准,缘由在于文化知识的市场全然跟随以资本作对话的模式,而这种模式使文化产业的正确发展失去了以文化本身为导向的良好栖息地。

反观现下的文化旅游市场的生存状态。长远看,地区旅游业盲目的规划与开发具有其文化破坏性。在我国旅游经济发展迅猛情势下,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追求精神领域的满足,非物质文化景观正是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供给旅游者精神文化层面的更高需求。在现实情境中,往往未得以推向市场和未被经济利益化的非物质文化景观留存地区,具传统延续性的文化现象保持的较为完整。例如苏南地区高淳县的经济水平,确实比周边其他地区县要稍弱和缓慢一些,但正是由于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比率在同一个空间环境下属于较为平衡的状态,本地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得以保存了较多原生态的内容,这种社会状态下的经济和文化的成长过程是可以相互消长促生的。而苏锡常或南京城市的经济开发与建设较早较迅速,某些具有相同渊源的共性文脉和景观现象可能早已无存。有些地区的村镇会整个迅速的被迁掉,导致大批村镇的农民向城内与周郊

进驻,村镇里的民俗文化很容易也被铲除。与此类似的现代化城市推进方式,对村落文化具有相当的破坏力,若使村落消失,文化的断层即无法寻根。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仍然不够。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动态空间场景形式曾经普遍存在并且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里占据重要地位,而生发深刻影响的民俗艺术文化环境也在被汹涌的城市建设所逐步吞噬消亡,封埋于历史中。然而,在各民族部分地区仍保留至今的传说、风俗习尚、节日活动和民间工艺等民俗文艺中,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仍不时地有所显现。^{[3](PP.185-186)}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2月30日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讲话中提出,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的魅力。……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民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综合运用大

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4](PP.160-162)}

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不仅仅发扬了自己的文化习俗,而且也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文化建设,进而衍生出更丰富的文化形式。很多投身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展示和传承工作的组织虽说是自发性的,但其有较强的组织性,当中的参与者包括了地方的自愿者、能人、有钱人、名人、官员和老人,也有担任村民的代表和村民的小组长。传承的成员现在有很多也包括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所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保护的基金,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的研究也步履维艰。因此从现实出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个研究系统纳入社会体系进行观照,是学界保持研究现实感的主要路径。

[参考文献]

- [1] 牟延林,谭宏,刘壮.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2] 顾小玲. 新农村景观设计艺术[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 [3] 罗汉田. 庇荫——少数民族居住文化[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南山)

概念整合视角下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的隐喻认知解读

魏梦婷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69)

【摘要】 隐喻是诗歌构成的基本且重要的因素。诗人运用隐喻来激发读者的思考、想象以及个人情感;另一方面,隐喻也可以帮助读者使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本文将 Fauconnier 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用于弗罗斯特诗歌两大主题,即生活与绝望,提出了三种隐喻解读网络:“自然即生活”网络、“事件即情感”网络,以及“生活”和“情感”两大网络的结合构建,着力探讨了弗罗斯特如何运用隐喻创造了一系列的意象和读者如何利用自身的认知能力解读诗歌中的隐喻。

【关键词】 概念整合理论; 诗歌; 罗伯特·弗罗斯特; 隐喻

【中图分类号】 H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94-05

诗歌中充满了隐喻,因而诗歌被称为隐喻式语言,可以说诗歌与隐喻是互为依存的关系^[1]。因此要准确的解读诗歌,就必须要从隐喻的理解入手。近几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不断发展,隐喻理论不断扩张,使得人们对于隐喻的理解也在进而加深。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隐喻本质上是一种思维和行为现象”,并在其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了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即 CMT)这一术语。换言之,隐喻是概念系统中从一个认知域“源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目标域”的跨域结构投射。它的提出使隐喻突破了以往的修辞学特性^[2]。可是,这一理论也有其局限之处。第一,它主要关注一些常见且传统的隐喻,所涉及的范围较窄。第二,尽管 Lakoff 在书中提到了隐喻生成重要的一步——映射(mapping),但他并没有提到映射所需的原则和标准,也没有解释哪些概念隐喻是最恰当、最容易被理解的。因此,所谓的“双域隐射”对于一些非常规隐喻意义的生成没有给出合理的解读。

一、概念整合理论框架

人类对于隐喻的使用是带有大量主观意图的,因此新奇隐喻随之产生,例如漫画、新造词句、

广告等等。为了弥补概念隐喻的不足,Fauconnier 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即 CIT)。随后 Turner, Grady, Coulson 等人不断发展这项理论^[3]。概念整合是人们进行思维和活动,尤其是进行创造性思维和活动时的一种普遍的认知过程,包括建立相互映射的心理空间网络,并以各种方式整合成新的空间^[4]。他把 Lakoff 的“双域隐射”改进成了由四个心理空间构成的“四维映射”,并使之运用于隐喻的意义构建。在他看来,隐喻是思维中概念整合的认知现象之一。

在概念整合理论中,Fauconnier 提出了“心理空间”(mental space)这一术语,并把它看成是人类进行范畴化和概念化等思维过程的媒介,认为它是人们在思考和交谈时,为了达到当下的理解和行动目的所建构、通过框架和认知模型所形成的认知结构^[5]。“心理空间主要指小概念包,主要为当下的临时语言交际服务,有时可能仅是一种瞬息间的知识”^{[6](P.125)}。心理空间的提出旨在研究语言中的间接指称和隐含指称现象。不可否认的是,该理论对于解释其它很多复杂的语义和语用现象也是行之有效的^[7]。一个完整的概念整合网络包括四个部分:两个输入空间(Input 1, Input

【收稿日期】 2015-10-20

【作者简介】 魏梦婷,女,江苏南京人,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2)、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一个合成空间(Blending Space)。两个输入空间中的部分结构进行跨空间映射,而这些输入空间的共享成分又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构成类属空间。此外,输入空间中的成分和结构又被选择性地投射到合成空间中。在第四个空间里,通过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和扩展(elaboration)这三种认知操作形成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把两个输入空间的成分组合到一起,并建立起两个空间之前都不存在的新联系,进而解读隐喻的意义构建。从这个意义上看,运用概念整合理论,我们可以从认知的角度探讨通感隐喻,分析并证实这一现象是否体现在人类的认知上。通感隐喻可以帮助人们从认知的视角来正确认识世界,从而推进语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8]。此外,由于诗歌中的隐喻具有原创性、跨域性、超常规性等特征,其意义构建过程和推理机制更需要借助较为复杂的多空间投射机制来解释^[9],因此概念整合理论相较于概念隐喻理论能更恰当、充分的阐释诗歌中的隐喻精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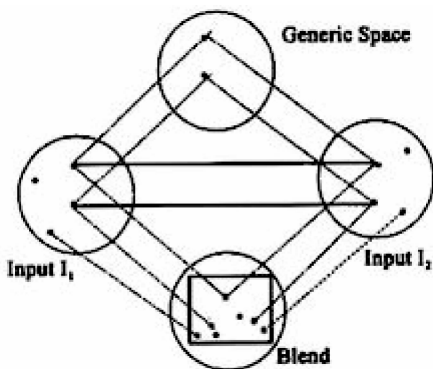


图1 概念整合图示

二、罗伯特·弗罗斯诗歌中隐喻框架的分析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由于他创作的诗歌自然天成,田园气息浓厚,因此人们尊他为“自然诗人”^[10]。在他的诗歌中,大部分在自然中出现的事物都有其特殊的隐喻含义,并且他也非常擅长用一些简单微小的事物,例如风、花朵、动物等,去隐示深刻的情怀。在他看来,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和人类找到相似点,因此用动植物去暗喻人类是他诗歌中一种常见的描述手法,进而使得人类所有的快乐和痛苦都可以在大自然中找到对应。他认为自然可以反映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理,是社会结构的象征。另一方面,

他的一生无比坎坷,年幼时就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成年后妻子孩子相继离世,家庭的不幸也使他的一生充满着悲观的情绪。因此纵观他的诗歌,主要呈现出两大重要的主题:生活和绝望。笔者试图在概念整合理论的框架下,选取三首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对这两个主题中的隐喻网络进行分析。

1. “自然即生活”隐喻网络

弗罗斯特创作了许多和生活有关的诗歌,而在这些诗歌的中,诗人常常通过自然环境来暗示其自身周边的生活处境,例如,在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一诗中,诗人通过雪夜里一场旅行中的种种来暗示生活的开始或结束,进而出现了“自然即生活”这一隐喻网络。

Whose woo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though;
He will not see stopping here
To watch woods fill up with snow.
My little horse must think it queer
To stop without a farmhouse near
Between the woods and frozen lake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He gives harness bells a shake
To ask if there is some mistake.
The only other sound's the sweep
Of easy wind and downy flake.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在这首诗歌当中,作者描述了在雪夜发生的一次小事件。作为一个旅行者,诗人被丛林中的美景所吸引,他想驻足观赏,可头脑却敦促他赶紧前行,因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似乎是一首赞誉雪夜之美的诗歌,但其中却隐含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两个输入空间分别是“旅途”和“生活”。在这两个空间中,有四个方面被突显:未完成的旅途、继续前进的承诺、被树林吸引和睡眠。根据“自然即生活”这一隐喻网络,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分别合成的概念是:未来的生活、责任、诱惑和死亡。首先,“miles to go”告诉读者诗人的旅途还未完成,他只是暂时停留。另一方面,也暗示出他的生命同样尚未完结,未来的日子依然

有路可走。其次,尽管诗人被雪夜的树林美景所吸引,但他依旧承诺要前行,这是他继续下去的动力,说明诗人认为他有义务努力去实现目标,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第三,诗人用“lovely, dark and deep”形容雪夜的美景,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但这决不仅仅是对景色的描写,它更类似于生活中那些容易使我们转移注意力的种种诱惑,并且这种诱惑和之前的责任结合在一起,使得诗人无比困惑,他想停留,可又被困于自己的承诺,此时,马儿的铃声唤醒了他,让他明白在休息之前必须要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第四,在最后两句中,弗罗斯特写到“*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根据“自然即生活”这一隐喻网络,在旅途中的睡眠就意味着生活的结束或生命的终止,一方面,死去的人可以被认为是诗歌中那些因旅行的极度疲惫而长时间睡眠的人;另一方面,睡眠和死亡都是处于黑暗和沉静之中的,这可以在第八节的“*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一句中有所体现。(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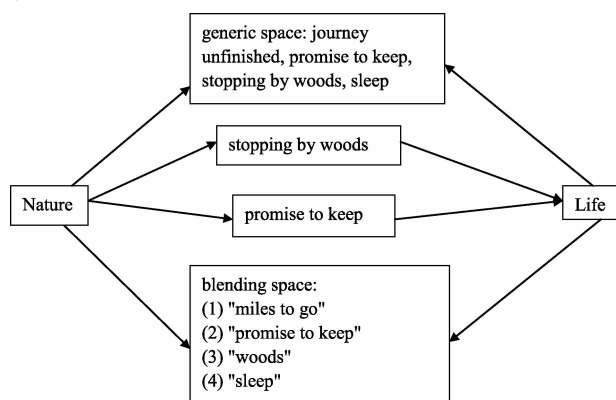


图2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的概念整合图示

2. “事件即情感”隐喻网络

弗罗斯特还有一些诗歌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生活深刻隐含的态度,特别是他遭遇困境之时。他用了各种隐喻反映自身的悲哀和困惑,而暗示这些隐喻的通常是在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事物,这也是很多评论家认为弗罗斯特是一个害羞而又伟大的诗人的原因。在 *Design* 一诗中,他通过对蜘蛛的描写使得自己的哀愁跃然纸上。

I found a dimpled spider, fat and white,
On a white heal-all, holding up a moth
Like a white piece of rigid satin cloth—
Assorted characters of death and blight
Mixed ready to begin the morning right,
Like the ingredients of a witches' broth—

A snow-drop spider, a flower like a froth,
And dead wings carried like a paper kite.
What had that flower to do with being white,
The wayside blue and innocent heal-all?
What brought the kindred spider to that height,
Then steered the white moth thither in the night?
What but design of darkness to appall? —
If design govern in a thing so small.

在这首诗歌中,诗人用动物隐喻人类,描写了蜘蛛、花朵和飞蛾共存的场景。但这首诗的隐喻表现手法极为特别,因为与其他的隐喻网络相比,它更为抽象,也就是诗人通过对一个事件的描述暗示一种情感,并且与其他诗歌不同,因为该隐喻的解读需要两个合成空间的共同作用。

在第一个输入空间中有两个部分:蜘蛛和花朵。类属空间是颜色以及蜘蛛和花朵的活动。通常是黑色的蜘蛛在这首诗中变成了白色,暗示出它是似乎是虚弱且微不足道的,就像生活中一些好似纯洁而又无辜的人类。而这种通常的“黑”与虚构的“白”所形成的巨大差异则揭示了蜘蛛的邪恶内涵。相反,花在此诗中被定义成了通常的白色,这象征了除了上述人群之外的那些本色人群。两者颜色相同,蜘蛛才可以隐匿在花朵之中进而杀死飞蛾,因为它知道花相较于其他事物,对飞蛾的吸引力更大。由这个场景可以推断出,“白色”在该诗中,从一种纯洁无暇的颜色转变为充满杀机的黑暗之网。蜘蛛和花朵构成了一种事件,当所有因素进行整合之后,读者可以得出一个合成空间,即自然和动植物的天性准确设计出了一个场景,也就说上帝,作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掌控者和设计者,他是确实存在的,这是第一个输出空间。在接下去的几句中,诗人继续写到“*What but design of darkness to appall?*”,蜘蛛杀死了飞蛾,上帝的设计毁灭了生命,通过对蜘蛛愚蠢的追逐和飞蛾无助的被捕,诗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仁慈的上帝要让世间存在种种的不幸与阴暗?从这个角度来看,白色的蜘蛛其实是无辜的,它只是上帝邪恶设计的棋子,因此它无法抑制自己的猎杀本性,这是第一个合成空间。但同时它也可以被看成是第二个输入空间(见图3),因为诗人同时暗示读者,如果没有上帝,所有生物都会拥有自由,正如社会会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样,我们无力与社会规则相抗衡,唯一能做的只有遵守社会给予我们的设计,并成为其中的一员。从这个

意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无尽的沮丧和失落,这是第二个合成空间(见图4)。这种惆怅同时体现了作者的绝望,在社会规则的掌控下,死亡也许是逃离这种设计的最好办法,否则人的一生将永远无法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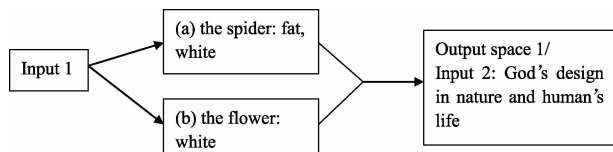


图3 Design 概念整合第一步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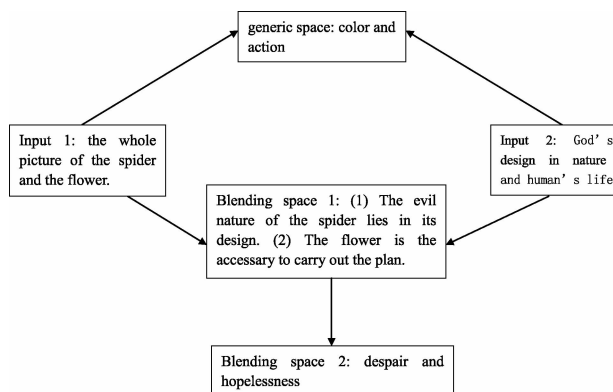


图4 Design 概念整合第二步图示

3. “生活”和“情感”两大隐喻网络的结合构建

与 *Design* 一诗类似, *Desert Places* 中同样有“事件即情感”这一隐喻网络,在此之中,诗人除了将动物比喻成社会中的人,还巧妙的运用天气营造氛围。诗里他没有在树林里驻足,而是短暂的看了一眼被大雪覆盖的田野和周围的树木。但和 *Design* 相比,它的隐喻概念整合需要两个隐喻网络的共同构建:“自然(荒野)即生活”和“事件即情感”。

Snow falling and night falling fast, oh, fast
In a field I looked into going past,
And the ground almost covered smooth in snow,
But a few weeds and stubble showing last.
The woods around it have it—it is theirs.
All animals are smothered in their lairs.
I am too absent-spirited to count;
The loneliness includes me unawares.
And lonely as it is that loneliness
Will be more lonely ere it will be less—
A blanker whiteness of benighted snow
With no expression, nothing to express.
They cannot scare me with their empty spaces

Between stars—on stars where no human
race is.

I have it in me so much nearer home

To scare myself with my own desert places.

在该诗中,弗罗斯特描绘了几处景色:雪、动物、野草和星星,这几种事物共同构成场景,形成类属空间。首先,大自然充满活力,可雪却覆盖了自然界的颜色 and 美感,抹杀了生物体独有的个性,并且寒冬亦会杀死动植物,如此天气使得自然死气沉沉且毫无趣味。换言之,雪就像那些会消散生活中一切愉悦的事物,因此,雪被用来体现一种加速自我身份丧失的催化剂和一种无助的情感。第二,由于寒冬的到来,动物们都在自己的巢穴中,它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冬眠。大雪的覆盖和动物的消沉共同构成了荒野这一具体的场景。在这里,作者用动物暗喻成那些孤立在社会网络之外的人,暗示生活中缺乏朋友和必要的社会联系,就犹如荒野一般。接下来弗罗斯特写到“*But a few weeds and stubble showing last.*”,似乎野草并不害怕大雪,并企图冲破雪的重压,它们则表现了那些勇于和社会孤立相抗衡的人。但野草和茫茫大雪相比,显得太微弱,因此这些人也一样不能完全的获得最终胜利。最后,诗人提到了星星间的距离之大,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相比,这就与前面孤立无助的生活对应了起来。这四种事物共同结合投射到生活这一概念之中,诗人通过对被白雪覆盖的荒野的描述,展现了一种孤立无趣的生活环境,这是第一个合成空间。此外,整个场景暗示出诗人的悲哀。当人心情沮丧时,不会去注意到周围的世界,也不会观察到自然之美。故而一个被大雪覆盖的荒野与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有很大的相似点,这也恰当的展示了诗人绝望无助的情感,这是第二个合成空间(见图5)。

三、弗罗斯特诗歌中隐喻网络的特点

综合对上述三首诗歌,利用概念整合理论所做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有时对于隐喻的理解需跨越单一的句子或者语法,包含在全篇之中,读者必须读完几句甚至是全篇诗歌才能体会其中的意味,笔者将这种隐喻形式称为意象隐喻(*Image Metaphors*)。

在认知语言学中,意象(*image*)指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图画。从诗歌分析的角度来看,意象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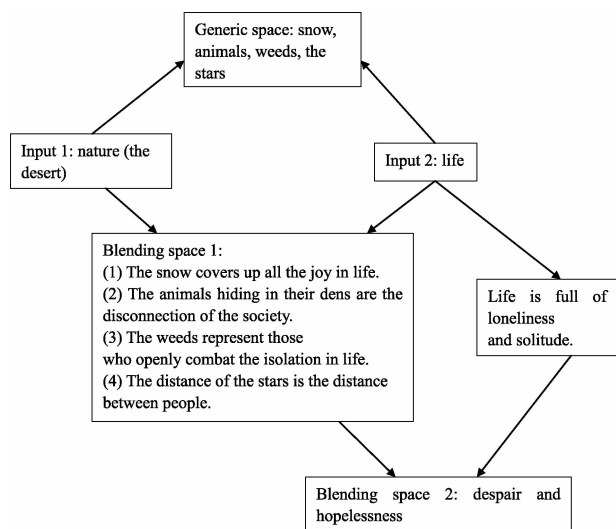


图5 *Desert Places* 的概念整合图示

通过一种或几种特定的事物来表达作者的感情。在弗罗斯特的诗里,意象包含着人类的认知经验,反映人与自然不断的互动。我们有着天性和意识去与外界相互影响、作用,因此人类的认知能力可以决定隐喻的创造、推理和解读。意象隐喻巧妙的将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使不同概念具体化,读者可以通过自身经验和概念整合,理解出全诗的隐喻含义。

以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为例,在这首诗中,诗人描绘了一副完整的图画,在途中他偶遇一处雪夜的树林美景,接着他停下,仔细欣赏周边的一切,并逐渐沉醉其中。最后在马铃铛的唤醒下,他决定继续旅途,以实现自己的诺言。通过心理投射,我们可以得出诗的中心思想,尽管在生活中有许多诱惑,可我们必须摒弃诱惑,不断前进,才能实现自己的承诺。在概念整合下,读者将相关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心理图式,才能得出了“自然即生活”这一隐喻网络,而它贯穿了全诗的各句,进而帮助读者完成全篇的理解。

隐喻在诗歌中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描写手法,占有重要的地位,诗人们用隐喻表达思想、抒发情怀。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心智基础,因此如何准

确的识别、分析隐喻成了解读诗歌关键的一步。本文着眼于弗罗斯特诗歌中的两大主题,结合三首诗歌,以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石,探讨了在诗歌中三种隐喻网络的理解,并且提出了贯穿全诗的意象隐喻,希望在今后的英文诗歌教学中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 [1]侯艳芳. 从意向性视角看诗歌隐喻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J]. 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11).
- [2]王林海,刘秀云. 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多模态隐喻性语篇的解读[J]. 外语电化教学,2013(154).
- [3]Dirven, R. *Major strand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A]. In F. J. Ruiz de Mendoza & M. S. Pena Cervel.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ernal Dynam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2005.
- [4]林宝珠.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心理空间网络体系构建[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 [5]彭新竹. 从概念整合理论管窥学科整合趋势[J]. 外语学刊,2013(5).
- [6]Fauconnier, G., & Turner, M. *The Way We Think——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 New York: Basic Books,2002.
- [7]朱嫣然,郑燕. 多模态隐喻的概念整合分析[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 [8]王晶芝,朱淑华. 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的雪莱诗歌通感隐喻探析[J]. 外语学刊,2013(3).
- [9]李良彦. 概念整合理论关照下的诗性隐喻认知研究[J]. 外语学刊,2012(5).
- [10]张贯之. 罗伯特·弗罗斯特:友情情感下的挽歌与其诗歌创作的尊严[J]. 外国文学,2013(9).

(责任编辑 南山)

国内外语需求分析研究述评

刘 连 营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 要〕 本文基于近 40 年的核心论文检索,对国内外语需求分析进行综述,从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两方面,分析国内外语需求分析研究的特征与趋势:研究重心的转移与需求分析方法视角多样化等。

〔关键词〕 国内; 外语需求分析; 述评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099-04

引言

课程设置的合理与否必须基于正确的需求分析。^[1]国外需求分析由 Hutchinson 和 Water 等西方学者所倡导,距今已有 40 年。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20 世纪 90 年代,顾定兰从需求分析出发论及大学英语教学转轨。^[2]王海啸、倪传斌、刘治和陈冰冰等研究者介绍外语需求相关理论、述评及探讨需求与课程设置、个性化大纲制定、教学关系等。本文试图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综述。^{[3][4][5]}

一、外语需求分析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尚未统一界定“需求”分类。Hutchinson & Water 提出需求分为目标需求和学习需求。^{[6](P.59)} Brookfield (1988) 认为需求分为规定需求 (prescribed needs) 和意识需求 (felt needs)。^[7] Brindley (1989) 和 Robinson (1991) 提出客观需求 (objective needs) 和主观需求 (subjective needs)。^{[8][9](P.8-9)} 束定芳 (2004) 认为需求分析分为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10](P.20)}

需求分析 (needs analysis or needs assessment, 有时简称“NA”)指通过内省、访谈、观察和问卷等手段对需求进行研究的技术和方法。^[11]需求分析广泛应用到外语教学至今已经四十多年的历史,从最初的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至学术英语 (Academic English)、商务英语以及英语各类课程等,并应用到普通英语 (GE) 的教学领域中。^[12]国外学者大都立足于学习者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师和管理者对课程需求理解的体现,有一定的局限性。^[5]

二、国内外语需求分析

在外语需求分析理论研究中,国内学者均将关注度放在外语需求分析的具体内容上。虽然,近十年来,国内外语需求分析理论方面的研究学者不断增加,但与国外相比,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研究学者数量较少,起步较晚的问题。^[11]笔者在中国期刊网检索 1974 年至 2014 年期间学术论文,结果涉及外语类 12^①种主要期刊的相关研究成果 31 篇。

表 1 国内外语需求分析研究的内容和数量

内容	理论研究				实证研究				
	理论介绍	相关性	述评	需求	教学	课程	培养	技能	教材
数量	2	7	2	2	3	6	2	5	2

〔收稿日期〕 2015-11-10

〔作者简介〕 刘连营,男,江苏连云港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① 外语类 12 种主要期刊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外语研究》《外语界》《现代外语》《外语学刊》《外语电化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山东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Foreign Language World*。

1. 理论研究

如表1所示,外语需求研究31篇,其中理论研究11篇,实证研究20篇。理论研究涉及需求定义、分类等基础理论介绍、需求分析与外语教学、大纲制定、课程的设置等关系以及对于需求分析的述评。首先,从社会需求、市场需求的视角出发,顾定兰(1998)阐释大学英语教学转轨与翻译教育的衔接皆基于社会需求(市场需求)。^[2]接着,王海啸、管春林和倪传斌和刘治等具体介绍国外需求理论,如需求分析模式——目标情景分析和目前情景分析;基于社会、学生、教师和教学管理者需求模型探讨个性化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设计;需求分析在设置经贸英语专业课程中的必要性;外语需求理论的六大特性:核心性、层次性、可分性、可测性、变化性与多维性。^{[3][13][4]}陈冰冰对国内需求分析以及国内外外语需求分析研究进行综述,便于更为详实了解国内外外语需求分析研究走向。^[5]陈冰冰从学生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大学英语需求分析模型。^[14]龚晓斌基于客观需求分析模型,尝试性提出“专业和/或兴趣主导”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定位。^[15]蔡基刚从学生需求、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需求出发,探讨大学ESP课程模式研究。^[16]陶丽和王腊宝基于国家需求、社会需求、教师需求和学生需求分析模型,探讨新一代的大学英语教材的编写。^[17]

2. 实证研究

国内第一篇实证研究论文由傅政等于2001年发表,该文分析并预测中国入世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及需求。^[5]赵庆红等基于英语学习者学习需求调查,指出教学改革的重点在于教学方法、课程设置、考试制度等。^[18]张蓓等基于英语专业和非

英语专业学生需求分析,就大学英语教材的文化内容进行研究。^[19]潘之欣基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调查分析,对英语听力技能进行研究。^[20]孙学涛等从社会需求(当前需求和未来需求)和个人需求(当前需求和未来需求)分析视角出发,调查分析理工科大学生对翻译能力的需求。^[21]王雪梅、陈宏志和王雪梅基于需求分析视角,对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进行探索。^{[22][23]}黄萍和郭峰从学生学习需求出发,研究国际物流服务话语能力需求。^[24]邓跃平等基于社会分析需求和学生需求,尝试构建按专业和分层次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25]蔡基刚基于学习者课程需求分析,试图提出一个适合我国高校的学术英语教学模式和方法。^[1]刘艳梅等基于学生需求分析,构建了包括六大类别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26]蒋艳等从学生需求分析出发,对新世纪大学英语后续课程进行研究探讨,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出路在于进行内容改革,实施基于内容的大学英语教学才能切实激发学生对大学英语课程的兴趣,继而提高教学质量。^[27]蔡基刚基于在校学生、学科专业教师 and 大学英语教师需求分析,针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专门用途英语提出建议。^[28]2014年,朱吉梅以需求分析为视角,探究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需求分析的实施情况。^[11]钱铭和祝珣等基于学习者需求,调研大学公共英语课程的设置。^{[29][30]}李娜等基于需求分析,尝试构建高校非英语专业研究生ESP口语教学设计框架。^[31]史兴松揭示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更为显性的社会需求。^[32]

三、研究走向

1. 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实证研究

表2 国内外外语需求分析研究时间分布

	98	01	02	04	05	06	09	10	11	12	13	14
理论研究	1		3		1	1	3	1		1		
实证研究		1		1		1	2	2	1	2	5	5

1998年至2010年期间的发表论文共7篇,其中理论研究10篇,实证研究7篇。该期间研究者重在理论介绍与探讨,如国外需求分析模型与需求分析核心性介绍(倪传斌等,2006)、基于社会需求的大学英语教学转轨和影响探讨(顾定兰,1998;吴启金,2002)、个性化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的需求模型分析(王海啸,2004)、需求分析在课程

设置中的意义和方法(管春林,2005)、国内外需求分析述评(陈冰冰,2009;陈冰冰等,2009)、大学英语需求分析模型的理论构建(陈冰冰,2010)、基于需求分析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定位(龚晓斌,2009)和大学英语ESP课程模式研究(蔡基刚,2012)。该期实证研究涉及到基于学习者需求的大学英语教材文化内容的调查研究(张蓓等,

2004)和大学生英语听力需求分析(潘之欣,2006)、需求分析视角下的商务英语情景教学(赵淑容,2009)和学生英语学习需求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赵庆红等,2009)。该阶段首先从社会需求角度(如:改革开放、中国入世等)探讨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但没有介绍或阐释国外需求理论。随着对国外需求定义、分析模型和外语需求核心特性等理论介绍(余卫华,2002;王海啸,2004;倪传斌等,2006),研究者开始将需求理论运用于对大学英语教学影响、课程设置等实证研究中。更为可贵的是,国内学者没有停留在国外需求理论介绍,尝试提出国内外语、大学英语需求分析模式(束定芳,2004;陈冰冰,2010)。

2011年至2014年发表论文14篇,理论研究仅1篇,实证研究13篇。研究者已经完全将需求分析重心转移到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涉及到课程需求分析(蔡基刚,2012;刘艳梅等,2013;蒋艳等,2013;祝珣等,2014;钱铭,2014);实证研究亦涉及到英语翻译能力、话语能力等外语能力的需求分析(黄萍等,2011;李娜等,2014;史兴松,2014);专门英语或英语教学的需求分析(邓跃平等,2012;蔡基刚等,2013;朱吉美,2014);基于需求分析探索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培养(陈宏志等,2013)以及大学英语教材的需求分析(陶丽等,2013)等。

2. 外语需求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1) 外语需求研究视角

外语需求研究若分为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就所搜集的文献而言,基于个人需求较多,而且个人需求大多来自于学习者(学生)居多。研究初期,顾定兰等探讨基于社会需求或目标需求视角(改革开放、中国入世等)对大学英语教学转轨、教学的影响。随着外语需求理论的介绍,国内研究者将研究视角由社会需求转向个人需求或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张蓓等,2004;潘之欣,2006;赵庆红等,2009等;陈宏志等,2013)。但也有研究者(蔡基刚等,2013;陶丽等,2013;朱吉梅,2014等)没有局限于学生个人需求出发,而是从学生、教师等多维度个人需求进行比较性的调查研究。

(2) 研究方法

随着实证研究的深入,调查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全面性,而且数据搜集更为快捷,数据分析更为详实。研究之初,该调查方法较为单调,以定量分析为主,如调查问卷(张蓓等,2004)。随后研究者采用了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如调查问卷

与访谈(黄萍等,2011;刘艳梅等,2013;陈宏志等,2013;朱吉梅,2014;李娜等,2014),调查问卷与SPSS分析软件相结合(赵庆红等,2009;祝珣等,2014;李娜等,2014;史兴松,2014),问卷的形式由纸质问卷升级为网上问卷(蒋艳等,2013),数据检索(孙学涛等,2010)和案例分析(赵淑容,2009)。但也有部分研究者仍然采取了调查问卷方法(蔡基刚,2012;钱铭,2014)。

(3) 调查对象

众多研究者根据研究的视角不同,调查研究的对象也不一样。但就所统计的数据而言,基本上是个人的需求之一的调查对象——在校大学生(张蓓等,2004;潘之欣,2006;蔡基刚,2012;钱铭,2014)。随着调查研究更为全面,具有比较性,教师亦列个人需求为调查对象(陶丽等,2013;朱吉梅,2014)。社会需求调查对象较为广泛,如用人单位、往届毕业生、相关工作人员或专家等(陈宏志等,2013;史兴松,2014)。

四、结论

就国内外语需求研究数量而言,需求分析实证研究逐渐增多,1974年至2010年,实证研究为41%。而2011年至2014年,增至93%。就研究内容而言,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初期的社会需求视角,更多是转向个人需求的相关研究,如课程设置、英语某种技能(如听力、阅读等)等,其中课程研究为重点,占25%。个人需求研究对象更为广泛,不在局限于英语专业本科生,拓展至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由学生拓展至学生与教师等。研究领域由通用英语转向专门英语和学术英语。目前国内该研究缺乏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课程的进展,需求分析研究会不断进行适时的、反复的分析。本文所搜集数据有限,未穷尽国内外语需求研究,所提出观点仅作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 [1]蔡基刚.“学术英语”课程需求分析和教学方法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2).
- [2]顾定兰.社会需求与大学英语教学转轨[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5).
- [3]王海啸.个性化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设计中的需求与条件分析[J].中国外语,2004(1).
- [4]倪传斌,刘治.外语需求的特性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2).
- [5]陈冰冰.国外需求分析研究述评[J].外语教学与

- 研究,2009(4).
- [6] Hutchinson, T. & A. Water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7] Brookfield, S. D. *Understanding and Facilitating Adult Learning* [J]. *School Library Media Quarterly*, 1988(16).
- [8] Brindley, G. The Role of Needs Analysis in Adult ESL Program Design [A]. In Johnson R. K (ed.) *The Second Language Curriculum*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9] Robinson P. *ESP Today: A practitioner's guide* [M]. Prentice Hall UK;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91.
- [10] 束定芳. 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11] 朱吉梅. 本科院校英语教学中的需求分析调查[J]. 山东外语教学,2014(5).
- [12] 陈冰冰,王欢. 国内外外语需求分析研究述评[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7).
- [13] 管春林. 试论需求分析在经贸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中的意义和方法[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3).
- [14] 陈冰冰. 大学英语需求分析模型的理论构建[J]. 外语学刊,2010(2).
- [15] 龚晓斌. 客观需求观照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定位[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8).
- [16] 蔡基刚. 基于需求分析的大学 ESP 课程模式研究[J]. 外语教学,2012(3).
- [17] 陶丽、王腊宝. 新一代大学英语教材的需求分析与反思[J]. 外语学刊,2013(6).
- [18] 赵庆红、雷蕾、张梅. 学生英语学习需求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J]. 2009(4).
- [19] 张蓓、马兰. 关于大学英语教材的文化内容的调查研究[J]. 外语界,2004(4).
- [20] 潘之欣. 大学英语听力需求分析[J]. 外语界,2006(3).
- [21] 孙学涛、马新英、王德军. 论理工科大学生的翻译能力需求[J]. 山东外语教学,2010(1).
- [22] 王雪梅. 从学术能力的需求分析角度反思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教育[J]. *Foreign Language World*, 2010(5).
- [23] 陈宏志、王雪梅. 基于需求分析探索我国英语专业研究生培养[J]. *Foreign Language World*, 2013(2).
- [24] 黄萍、郭峰. 大学英语教学的趋势:EGP 还是 ESP? [J]. 外语研究,2011(5).
- [25] 邓跃平、陈妍荣. 基于社会需求分析的大学英语按专业分层教学的必要性[J]. 外语学刊 2012(4).
- [26] 刘艳梅、朱慧敏. 基于学生需求分析的财经类高校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13(3).
- [27] 蒋艳、马武林. 新世纪大学英语后续课程设置研究(二)[J]. 外语电化教学,2013(152).
- [28] 蔡基刚、陈宁阳.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专门用途英语需求分析[J]. 外语电化教学,2013(153).
- [29] 钱铭. 普通本科院校大学英语课程学生需求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2014(2).
- [30] 祝珣、马文静. 课程设置的学习者需求分析[J]. 外语界,2014(6).
- [31] 李娜、胡伟华. “需求分析”理论指导下高校非英语专业研究生 ESP 口语教学设计研究[J]. 外语教学,2014(3).
- [32] 史兴松. 外语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社会需求分析[J]. *Foreign Language World*, 2014(6).

(责任编辑 南山)

数字故事

——改善大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的有效途径

吴 骏 杰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 要] 大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在近年虽已引起外语教师的重视,但如何实际有效地改善这一情况鲜有讨论。数字故事作为一种新型外语教学手段,对于促进学科内容学习发挥着积极作用。基于此,介绍了数字故事的概念与作用,并试图探讨外语教师应如何更好利用数字故事,从而提升大学生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

[关键词] 中国文化; 失语症; 数字故事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103-03

一、大学生“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

最新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规定,大学英语课程中应重视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不光是目标语国家文化,本国文化的外语表达能力也不容忽视^[1]。学好本国文化,对于学生的外语学习起着促进作用。提高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有助于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因为交际并非单方向的,而是双向互动。因此熟练掌握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以推广中国文化^[2]。但近年内,外语研究者们发现中国学生对外国文化相对熟悉,但中国文化却受到冷落,学生不能熟练使用英语以表达中国文化。学界将这种现象定义为“中国文化失语症”,该现象日益受到外语教师与研究者的重视。

2002 年,张为民与朱红梅曾调查了清华大学 126 名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得出了“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令人堪忧的结论^[2]。基于此,他们从大纲的制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取以及授课的方法等多个角度提出了意见与建议。蒋亚瑜与刘世文在 2005 年对集美大学 157 名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学生使用中

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远远达不到教学大纲的要求^[3]。对此,他们也提出改进此现状的建议,呼吁改变传统英语教学,重视中国文化。教师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正视中国文化的地位。

虽然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近五年来,“中国文化失语症”仍普遍存在于高校外语教学之中。肖龙福等人以山东两所高校的英语与非英语专业学生为对象,调查、对比了 168 名学生的文化表达能力,发现学生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明显,并且,该现象在非英语专业学生中更为严重^[4]。2015 年,胡晓榕对咸阳师范学院 100 名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 90% 的学生难以用英语流畅地介绍本国文化^[5]。对此她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两条重要原因:一是学生对中国文化缺少了解,忽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与积累。二是缺乏相应教材,高校英语教材中缺少中国文化的教材,所以呼吁补充、开发中国文化的英语素材,提高当代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程度。

由于在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阶段,师生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学、重视目标语文化教学,“中国文化失语症”仍是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虽然前人研究均给出了相关改进建议,但经回顾,大部

[收稿日期] 2015-12-30

[作者简介] 吴俊杰,男,江苏常州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分文献未提出相对具体的教学改进措施,仍停留在抽象讨论阶段,因此,针对此空白,笔者提出了利用数字故事以改善高校中国文化教学的措施。

二、开展数字故事活动以改善“中国文化失语症”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开始,数字故事不断吸引着国外研究者的目光,在2015年的第十三届Asia TEFL国际年会上,数字故事更是亚洲英语教师关注的重点教学手段,因为它对提升学生外语能力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数字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是一种将传统的讲故事艺术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手段,它融合了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网络等技术手段^[6]。通常以短小的2-5分钟短片为形式,呈现故事,但区别于普通视频,因为它对于故事性要求更高,侧重于表达制作人的内心想法。^[7]

具体而言,数字故事有以下促进作用:

首先,锻炼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在自编英文故事的前期过程中,学生需要查找各种课外资源,利用网络、图书馆、教科书等资源,丰富故事的内容。在此过程中,学生需要大量阅读中英文资料,潜移默化中提高其阅读能力与阅读的自主性。在撰写英文故事的过程中,学生需要确保所编故事在内容上、句法上没有明显错误,这也对学生的写作能力提出了要求。通过小组内部反馈、教师反馈等方法,学生不断完善故事,促进写作能力的发展。而在数字故事制作环节,学生需要在字幕、图片的基础上,加以配音,因此,需要不断朗读自编故事,达到流利程度。通过反复练习,学生在发音、表达流利度上都会有一定提升。

其次,培养学生的信息技术素养。《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指出,高校外语教学应充分利用计算机与网络等先进手段,辅助学生更好地提高自身外语综合能力与素养^[1]。因此,如何更好地在英语学习中融入信息技术,也成为了时下外语教师关注的重点。而数字故事的运用,正是在训练学生外语能力的同时,对信息技术能力提出了一定要求。首先,学生需要掌握搜索、理解、批判、选择、运用等能力,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网络时代中获得自己创作故事所需的材料。其次,在创作数字故事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掌握剪辑音乐、添加字幕与旁白等视频制作技巧。因此,数字故事的创作有利于提高学生信息技术素养。

同时,促进学科内容的学习。数字故事的创作可大致分为六大类:语法结构类、概念/功能类、

特定场景类、技巧类、任务类与内容类^[8]。本次活动中,数字故事的运用侧重于内容的教学,即中国文化的學習。事实上,利用数字故事促进中国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构建主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构建主义,意在强调学生作为学习主体,教师转为引导者、促进者的角色。通过给予学习任务,学生自我探索新知识,发挥创造力、批判力,解决遇到的问题,从而真正使学生发挥学习主动性与主体性。同时,构建主义也强调师生、生生合作,互相给予帮助与支持,不断构建新的知识。构建主义也强调信息资源的搜索与应用,随着中国大学的现代化,学科学习中融入教育技术已成为不容忽视的趋势^[9]。具体到数字故事的创作,学生在创作数字故事之前,需要搜集、阅读与整理大量相关资料,形成中国文化的内容输入。同时,通过师生交流、生生交流,学生得以丰富知识体系,拓展文化内容的知识。随之,以数字故事的形式,进行以中国文化为内容的创作,以英文形式输出中国文化。在创作过程中,对学生的英文表达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只有学生真正内化了相关知识,才能形成相应的语言输出。可见,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学生逐步输入、内化、输出中国文化,提升了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

综上所述,开展数字故事的创作,有利于在提高学生英语基础能力的同时,促进其信息技术素养的发展,对于提升大学生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数字故事应用设计

2015年9月至12月,笔者开展课外社团活动,利用数字故事手段,组织英语专业部分大一学生进行中国文化数字故事的制作。

1. 数字故事的主题

由于学校已开设“中国文化概况”课程,基于该课教材的基础上,教师列出了历史、文学作品、艺术、体育、教育、节日、餐饮、衣着、旅游、名人等十余项中国文化主题,学生从中选取一至两个感兴趣的话题,以小组形式讨论如何进一步细化题目。例如,中国的穿衣与配饰话题,可具体细化为特定朝代的服装、特定民族的服装、中西服装对比、不同职业服装的对比等方向。通过小组讨论与班级集体交流,学生得以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探究其感兴趣的话题。需要强调的是,教师在学生选题阶段,需确保学生选题的恰当性,避免题目过大或过小。

2. 创建作品

在确定题目与方向之后,学生进入创作阶段。具体而言,分为四个阶段:素材搜集、初稿反馈、实际创作、自我修改。首先,小组学生将利用网络、课本、图书馆等途径搜集不同材料,然后对小组收集到的素材进行阅读与筛选,选定创作所需的图片、视频、影评、文字等材料。

选定素材之后,小组首先以 word 或纸质方式描述将要创作的数字故事,教师组织全班对每小组的内容进入讨论,探讨故事的趣味性、易读性、精简度等,给出进一步改进建议。

基于教师与同伴反馈,各小组对故事加以修改,进入实际创作阶段。利用 iMovie、小影视频等软件,学生分工创建作品。需要指出的是,创作之前,教师应对视频编辑软件与步骤加以简介,亦或邀请技术人员辅助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需要掌握高超的视频制作技能,信息时代的学生已基本具备自我摸索软件的能力。本活动过程中,学生并未对视频制作产生太多困惑。即使遇到偶然的技术困难,学生通过讨论与网络搜索,也能顺利解决。因此,外语教师不应自身未熟练掌握相关制作技巧而放弃使用这一有效教学手段。

视频初步完成后,进入自我修改阶段。小组成员对创作的数字故事进行修改、完善,完成初稿。

3. 教师反馈与修改

初步完成之后,学生将视频发至教师邮箱,由教师进行反馈。在此阶段,教师就故事的内在连贯性、视频的起承转合、独白与字幕制作等方面进行评价,给予学生反馈信息,帮助学生进一步完善其创作。例如:一组学生介绍八大菜系,但旁白录制相对缺乏激情,难以呈现令人垂涎欲滴的感觉,因此,教师建议重新录制旁白,加入更多热情。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通过不断练习旁白,提高口语表达的流利度与自信心。因此,通过反复修改、完善,上交最终作品。

4. 分享与交流

作品修改完成后,组织学生开展数字故事交流会,学生上台演示自制的数字故事,并阐述制作过程中的心得与问题。同时,同伴对各自的作品加以评价。在此过程中,学生互相交流、探讨,为以后的数字故事创作积累经验。最后,学生对作

品进行投票,选出优秀作品,由教师在其他班级或年级进行展示、交流,促进其他学生积极参与数字故事的创作,以期改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

四、结语

数字故事作为一种新型的外语教学手段日益受到外语教师的欢迎,能够在提升学生外语能力的同时,培养信息技术能力,提高学习自主性,并且对促进学科内容的学习也起着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师生信息素养仍有待提升,并且缺乏数字故事制作的培训,加之教学设施设备的缺乏,如何更有效地开展数字故事以提升中国学生的文化表达能力,有待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S].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57/201011/xxgk_110825.html, 2007.
- [2] 张为民, 朱红梅.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2(S1).
- [3] 蒋亚瑜, 刘世文. 提高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方法与途径[J]. 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
- [4] 肖龙福, 肖笛, 李岚, 宋伊雯. 我国高校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状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0(1).
- [5] 胡晓榕. 地方高校英语专业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研究——以咸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为例[J].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5(3).
- [6] Hafner, C., & Miller, L. *Fostering learner autonomy in English for Science: A collaborative digital video project in a technolog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J].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2011(15).
- [7] 李颂. 数字故事: 一种新学习和表达方式——以“上海市女教师的故事大赛”为例[J]. 上海教育科研, 2011(3).
- [8] 周昱, 戚亚军. 外语教学之“情景小电影”设计制作理念[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1(19).
- [9] 丰玉芳, 蔡玲. 多媒体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综合课程研究性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11).

(责任编辑 南山)

从传统语法到构式语法的“漫漫长路”

赵利娟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传统语法和生成语法因为难以处理词汇语义与句法之间的关系,故出现了格语法。格语法把语义格的定义完全基于词汇关系,但语义格对表层句法的映射却并不可靠。框架要素因为是基于人类经验的,所以有相对较大的优势。框架语义学必然会对框架网络工程有相当的研究和推进,随之而来的则是构式语法,尽管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格语法和框架语义学,构式语法也并非完美。

[关键词] 传统语法; 生成语法; 格语法; 框架语义学; 构式语法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106-04

引言

构式语法与生成语法有不同的语言观,有不同的语言习得观和不同的语法构造观,研究不同的对象。从生成语法到构式语法经历了几个阶段和几种相互联系的理论。因为传统语法和生成语法无法处理词汇语义和句法之间的关系,格语法出现了,随后出现了框架语义学以及构式语法,它们三个一起构成了 Charles Fillmore 的三个不同阶段的三种语言理论。构式语法也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例如用构式语法来看汉语成语仿用。也有人试图将构式语法与生成语法相结合,试图在应用语言学的领域取得一些进展。对每个阶段不同理论的分别论述研究国内外学者早已取得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这个发展过程整体的研究和脉络梳理极少。本文将探讨由传统语法和生成语法到构式语法所历经的各个过程和不同理论,以及各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传统语法到构式语法及其与生成语法的结合研究

传统语法,历史悠久。然而在语言学研究,传统语法已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人们对传统语法的质疑也越来越多,传统语法逐渐被描述

为“主观主义”或“不科学”。Eddy Roulet 在他的著作《语言学理论,语言描写和语言学习》中,系统描述了传统语法的六大缺陷,及其对语言教学实践的影响。对此,上世纪 50-60 年代乔姆斯基创立了转换生成语法,生成语法的问世极大的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语言学理论。而近 20 年来,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构式语法则完善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不少学者都在这个领域进行了研究,使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国内外对构式语法和生成语法的研究很多,将二者相结合对外语教学进行的研究较少。构式语法与生成语法在一些基础概念上是有一致性的,例如两者都认为语言是一个认知体系,两者都寻求方法把各种结构联系起来生成新的表达,但两者有不同的语言观、语法构造观和研究对象。

生成语法认为语法是一个演绎系统,由演绎规则可推出数不清的句子,所以被使用较多的语言结构才是语言的核心,是生成语法关注的焦点,却忽略了不常用的结构和现象。构式语法不存在这样的区分,相反构式语法重点研究一些边缘的语言结构。构式语法和传统的生成语法并无高下之分,各有优劣,将两者相结合可以扬长避短给语言的研究带来全新的视角。

[收稿日期] 2015-12-30

[作者简介] 赵利娟,女,河南焦作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

二、生成语法三阶段

生成语法对定义词汇语义以及词汇语义与句法之间的关系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观点,可以笼统地划分为标准理论阶段、管约论阶段和最简方案阶段。

1. 标准理论阶段

标准理论阶段,动词根据句法特征可分为小类:及物动词(例如 miss),可以表征为[+ V, + __ NP]所以能够避免这样的错误: That boy misses。但这远远不够,例如 That boy misses acceleration。所以句法应对词汇语义有制约,即选择性限制。[+ V, + HUMAN __ - AB - STRACT]对 miss 的选择性限制排除了 That boy misses acceleration 之类的错误。但 *That boy misses deeply* 违反了两个条件,但却依然正确。故把句法定义为深层结构是不完善的。除了句法的缺陷,词汇语义方面也有问题。选择性限制是笼统地对词汇再分类,并未概括一个词汇的所有语义。That boy misses acceleration 不是个合格的句子,但 *That boy misses you* 却合格。

2. 管约论阶段

管约论阶段提出了题元角色。题元角色有不同的称谓,包括语义角色、语义关系、论旨角色等。题元角色主要是动词所表示的活动或事件中的相对恒定的参与者角色。角色由谓项指派,谓项与题元角色之间的关系是谓项与谓项所表达的活动或事件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Henry wrote a letter with that pen. 三个名词 Henry, a letter 和 that pen 都与动词 wrote 和介词 with 有关系。他们分别是动作的执行者、承受者和工具,它们的这些不同角色是动词所分派的,被称之为题元角色。所以题元角色就相当于一个语法成分,也就是一个名词或名词词组在句子中的语义角色。按照不同的语义角色,题元角色可以分为施事、受事、工具等。

题元角色由谓项指派,谓项与题元角色之间的关系是谓项与谓项所表达的事件或活动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它的性质是语义的而非句法的。论元则是指带有题元角色的名词性成分,论元同时具有语义和句法的属性。论元是题元角色的载体。每个动词都有特定的题元角色,每个题元角色能且只能分派给一个论元,每个论元有且只有一个题元角色。乔姆斯基在管约论阶段将词汇对句法的作用表述为映射原则。题元角色有很多优

势但也存在不足。管辖约束理论最终失去控制,失去了普遍语法的意义。

3. 最简方案阶段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是当今语言学的一大流派,该流派的最新观点是最简方案,代表作有《语言学理论最简方案》。80 年代,为了修补管约论中的弊端,语言学界产生很多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修补使得管辖约束理论原有的框架被改变。“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管辖理论”等在新方案中被放弃,乔姆斯基试图建立最简句法。最简方案相比于管辖约束理论有了显著的进步。首先它简化了语法系统的构成,只包含了语音形式和逻辑形式。其次最简方案简化了语法运作过程,只包含数据型的词库和计算系统两部分。同时最简方案还不够成熟,它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过大的词库造成了“大词库,小句法”的局面。合并和移动是计算系统主要的运作方式,但它只针对某些语言特征进行了解释,并未从本质上解释这些语言特征出现的原因。此外移动规则的合理性以及规则之间的优先性都并未给出很好的解决。最简方案依然处于理论阶段,词库过大,原则过简,缺乏实际操作,所以最简方案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

三、从格语法到框架语义学再到构式语法

传统语法和生成语法因为难以处理词汇语义与句法之间的关系,故而出现了格语法。从格语法到框架语义学再到构式语法是美国语言学家菲尔墨语言理论三个阶段。格语法把语义格的定义完全基于词汇关系,但语义格对表层句法的映射却并不可靠。框架要素因为是基于人类经验的,所以有相对较大的优势。而框架语义学必然会对框架网络工程有相当的研究和推进。与之而来的则是构式语法,尽管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格语法和框架语义学,构式语法也并非完美。

1. 格语法出现的背景及阶段

因为传统语法和生成语法难以处理词汇语义与句法之间的关系,上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中期格语法出现了。随后,70 年代中期框架语义学兴起,80 年代中后期构式语法兴起。框架语义学在构式语法兴起后并没有消退,稍后框架网络工程兴起,延续了框架语义学,而且框架网络工程与构式语法互相起了推动作用。

(1) 格语法出现的背景及其作用

传统语法的主谓等成分不能体现语义特征。生成语法则提出了主要基于动词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但却忽略了名词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在词汇语义与句法的关系上,传统语法和生成语法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得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语言学家菲尔墨提出了格语法的概念。格语法对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第二阶段的标准理论从句法语意关系方面进行了修正,着重探讨了句法结构与语意之间的关系。格语法认为用框架来分析句法结构要比转换规则方便很多。

格语法中的“格”不同于传统语法中的“格”。传统语法中,“格”指通过形态变化表示出来的名词、代词与句中其他词的语法关系。格语法中的“格”指底层结构中每一个名词与跟它有关动词之间的句法语意关系。菲尔墨用“格”这一术语来表示底层的句法语意关系。谁是做事者,针对谁做了事,做事后产生了什么变化,这些成分正是语义格。

(2) 格语法发展的两个阶段

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格语法由基础部分、词汇部分和转换部分三部分组成。基础部分由一系列基础规则组成。1996年菲尔墨提出了六种格:施事格、工具格、承受格、使成格、方位格和客体格,后来他又增加了受益格、原点格和终点格。词汇部分除了在词库中标明每一个词条在句法、语义和语音方面的特征外,他们的底层格的特征也需要表明出来,如house可标注上【+locative】,而thought应标上【-locative】。格语法中名词和动词的选择问题被称为词汇插入问题。词汇的插入取决于句子提供的特定的安排,即格的框架。当底层结构表达式提供的格框架与词汇中动词词条下标明的框架特征相符时就可以插入该词汇。格的转换部分采用移动、删除、插入、复写等方法,类似于转换生成语法的操作。

70年代中期后,格语法模式有了一些修改:格角色由底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之前还必须经过深层主语和深层宾语等语法关系的分配。这样每一个句子就有格角色和语法关系两个分析层面,这样一个句子的语义和句法现象就都得到了解释。

格语法自提出之后便引起强烈反响,但后来Fillmore不再对格语法进行研究,美国从事该理论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少。但不可否认格语法存在许

多合理的内容,并且已经被许多语言理论所吸收,尤其是在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中格语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 从格语法到框架网络

格语法中的格可以用来表示句子中单词与单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比如上世纪60年代费尔默在《“格”辩》中提出的施事格、工具格、客体格、处所格、承受格和使成格。格是格语法解释语义和句法关系的基本工具,可是一共有多少个格费尔默本人却没有明确提到。

句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经验,但是根据句法关系来定义语义格只是间接地体现了人类经验,不如框架语义学那样直截了当地依据人类经验来定义框架。许多研究者认为,进行语义分析时,不能仅靠句法功能和语义关系之间的对应而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需要列出每个动词的句法和语意组合的可能性,而动词的句法和语义组合的可能性则应该通过“框架”来描述。所以,在20世纪末,费尔墨提出了框架语义学,从格语法走到了框架网络。

费尔默2000年的课题根据框架语义学的理论,建立了一个基于语料库的在线英语词汇资源,研究英语中语法功能和概念功能之间的关系,即语义结构。该研究通过手工标注例句以及自动对标注结果进行组织整理,尽量详尽地描述了每一个词位的语意和句法的各种结合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看到了从格语法到框架网络的发展过程,看到了菲尔墨研究的进步之处。首先,框架网络中使用的框架元素比格语法中使用的格更加丰富具体,所以描述单词的句法语义功能也更加方便。句法驱动的基础是动词中心论,所以,语义格的载体只能是动词周边的名词类成分。与此不同,框架要素基于人类经验,涵盖实体、过程和性状,所以,除了动词之外,名词、形容词等词类也可以是框架的载体。框架要素的涵盖面更宽。

其次,由于不同语言对概念系统的词汇化结果不同,而且不同类型的语言具有不同的句法关系。句法关系随具体语言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基于人类经验来定义的语义框架具有更宽广的适应性,因为人类的基本经验是相同的。

最后,从研究方法而言,格语法主要依赖于语言学家本人的语言知识和对语言现象的观察分析而展开,不够客观全面。框架网络的研究则是借

助了计算机的软件,并基于以网络为基础的语料库,避免了主观性和片面性,更能反映语言现象的本质,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总之,20 世纪末菲尔墨在框架语义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框架网络是对格语法的超越。框架网络的目的在于研究英语中语法功能和概念结构(也就是语义结构)之间的关系,建立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词汇知识库。框架网络是格语法的最新发展,它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语言中的题元角色关系,对于语言理论研究和自然语言处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领域,格语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语言信息处理的重要基础理论。

3. 从框架语义学到构式语法

上世纪 90 年代,在认知语言学和框架语义学的基础上,构式语法理论出现了。构式语法理论属于功能主义学派。在框架网络中,每一个框架包含若干个词汇单位。词汇单位是词与意义的结合体。词汇单位可以多于一个词,这为构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988 年,费尔默以习语为研究进路,批判 TG(TG 属于功能主义学派),引出了“构式”这一概念。但是,他主要是对习语的研究,并未将其扩展至常规句式的研究,而且其主要目的还是要证明普遍语法。正是 Fillmore 对习语的研究,给了构式语法之后的研究很多启示。

认知语言学的开创者 Lakoff 对构式语法的产生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强调将语法关系与具体句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Goldberg 是 Lakoff 的学生。受到老师的隐喻理论及 there 构式的影响,以及 Fillmore 习语分析、框架语义学、构式语法和 Langacker 的最简分析方案的影响,于 1995 年出版了专著: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详细论述了其构式语法思想,并用该理论分析了语言的题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认为“构式有自身的意义,可改变词义,并对词汇用法有限制”。

Goldberg 对构式的定义为: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和意义的结构体,且 C 的形式或意义的某些方面不能从 C 的构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时,C 是一个构式。构式的这个

定义范围较为广泛,“构式”即“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一个构式整体的意义要大于各部分意义之和。除了各组成部分的意义,构式还具有自己的意义。在人的心智中,语言是以构式及构式网络的形式表征的。

构式语法不是格语法和框架语义学的简单延伸,它不是 Fillmore 专有的理论,而是一系列相似的理论群。构式语法弥补了形式语言学理论和生成语法的不足,有助于人们对语言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解释语言现象。构式语法作为新兴的语法理论也存在着不足,它以习语为起点进行研究,但最普遍的语言现象却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关于构式和构式意义的独立性等许多理论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在 Fillmore 的理论建构中,格语法、框架语义学和构式语法是三种不同的理论,但在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和解释上这三种理论是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过程,所以,三种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框架语义学超越了格语法,构式语法超越了格语法和框架语义学。

结语

传统语法的研究主要是从词汇的语义句法功能和形式等出发。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有句法自主和忽视语义的特点。因为传统语法和生成语法无法处理词汇语义和句法之间的关系弊端,格语法出现了。格语法把语义格的定义完全基于词汇关系,但语义格对表层句法的映射却并不可靠。框架要素因为是基于人类经验的,所以有相对较大的优势。而框架语义学必然会对框架网络工程有相当的研究和推进,与之而来的则是构式语法,尽管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格语法和框架语义学,构式语法也并非完美。从传统语法倒构式语法,每种理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局限性。然而局限性并不是缺点,正是各理论的局限性促使我们继续探索语言的语义句法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推动语言学理论向前发展。

(责任编辑 南山)

回望与启示^{*}

——民国小住宅对当下住宅室内设计的启示

叶志强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民国小住宅由我国当时著名的建筑师设计,其建筑布局、立面形式以及空间结构都具备较高的设计水准,回望现存民国时期的小住宅设计,至今仍能给我们不少思考与启示。针对当下浮躁的设计风气,民国小住宅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设计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民国小住宅; 室内设计; 建筑设计; 启示

[中图分类号] J5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110-02

民国小住宅,是指民国时期设计建成的有别于公共建筑的小体量住宅建筑。民国小住宅一方面受到特定历史时期审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多数民国小住宅由我国当时著名的建筑师设计,其建筑布局、立面形式以及空间结构都具备较高的设计水准,其中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是宋子文公馆。

宋子文公馆位于南京市鸡笼山北极阁1号,始建于1933年,由杨廷宝设计,陶馥记营造厂建造。建筑依山势而筑,采用西方乡村别墅式,西北侧的缓坡为开敞平坦的铺石院落,东南侧的陡坡则为花园,建筑共三层,钢混结构,总面积约700平方米,平面布局呈曲尺形。公馆底层是侍卫人员住房、厨房及辅助用房;二楼有会客室、餐厅、书房;三楼是宋子文夫妇的居室和子女的居室、浴室、盥洗室。宋公馆的入口处设在二楼的西北面。室内装饰富丽堂皇,摆设各不相同。既有西式布置,又有中式陈设。由石拱门廊步入设有壁炉的宽大会客厅,并由客厅联接曲尺形两端的圆餐厅和书房。尤其富有特色的是:公馆室内的天花板设计,一道道横梁看似木头,实际是用水泥精雕细琢而成,为国内建筑所罕见,现在看来也富于创新精神。施

工时用喷灯熏灼木模板,刷出焦化部分,待混凝土浇捣拆模后,刻印在混凝土梁上的木纹清晰可见,在外刷栗壳色油漆,仿木效果极佳。

从宋子文公馆这一经典案例我们可以感受到建筑设计,室内空间设计一体整合化设计的重要性。公馆内天花处理就是属于这方面较早的有益的尝试,一方面别墅采用现代的建筑构造方式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另一方面为消解早期钢筋混凝土所带来的冰冷、生硬的感觉,采用了木纹肌理的处理给人以自然、朴实之感和整个建筑的西方乡村别墅风格相吻合。

回望现存民国时期的小住宅设计,至今仍能给我们不少思考与启示。针对当下浮躁的设计风气,民国小住宅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设计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与民国小住宅相比,现在的普遍问题是专业化过度。建筑设计跟室内设计脱节,室内设计师不知道建筑设计的整体意图,只能往里面堆很多东西。每一空间界面,每一局部,从界面到陈设,全部都要放满,这只能是堆砌。缺乏室内场所感的表达(所谓场所感即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中的某种经历所激发的情感,如兴奋、欢快或愉悦的心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民国室内空间设计研究”(项目编号: 2013SJB760009)

[收稿日期] 2015-09-30

[作者简介] 叶志强,男,江苏宿迁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情等)。住宅建筑做到土建就算完成了,然后就是所谓的装修了,基本都是后期被叠加进建筑中的。笔者认为:如果设计的初期建筑的构思的概念就能贯彻到室内空间表达上的话,就不必进行单独的室内美化了。因此,不该是装修的概念,而应该是室内设计,它要有意念,有设计,有整体。建筑设计,室内空间设计一体整合化和协同化步调的概念性构思。

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创造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室内环境。这一空间环境极具有使用价值满足相应的功能要求,同时反映历史文脉,建筑风格,环境气氛等精神因素。

建筑与室内的关系不同于建筑与结构,机电等相关专业的关系。结构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支撑同样的空间,机电专业可以在建筑初步定型后再进行设计,但是室内空间不能等到建筑确定之后再开始设计,建筑设计的同时就已经创造了室内空间。建筑与室内是与生俱来的共生关系,是从建筑设计之初就存在的关系,不是直到建筑设计的最终阶段才有室内设计的需要。建筑孕育了室内,有如人体整体与内脏的关系,人不能先长好外壳再塞进器官吧?没有单纯的室内也没有单纯的建筑。没有室内的建筑是纪念碑或者坟墓,没有建筑的室内是空中楼阁。因此,每个从事空间创造的设计师都应该明白建筑与室内的密切关系,不能生硬地割裂他们的与生俱来的联系。

外界认为建筑与室内是相对独立分离的误解往往使人无奈,而有些专业人士也默认了这种误解。从目前流行的某些认识来看,比如把室内看成是建筑设计的最终阶段;认为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继续和深化,是室内空间和环境的再创造”;“室内设计是对建筑空间的二次设计,是建筑设计的延续,是建筑设计生活化的再深入”。等等,这些认识的前提都是把室内和建筑先对立起来,再拉近。实际上,室内不仅仅是建筑的继续,虽然有时室内工作是“接续”在建筑工作之后的,但如前分析,室内设计是与建筑设计几乎同时开始的,一旦构思了建筑,必定就诞生了室内,如果此时不去思考、设计室内,则室内就有陷入盲目发展的危险。又如“二次设计”的说法,实际是剥离了建筑与室内的共生关系,建筑已经设计完了,室

内才去“二次设计”,那就只好拆改了。

作为近现代建筑设计的开拓者之一,杨廷宝自住的“成贤小筑”也是他自己亲自设计的。笔者走进这处毫不起眼,甚至有些简陋的宅子,从中真正感受到了设计的初期建筑的构思的概念贯彻到室内空间表达上。

二层小楼主楼坐北朝南,为西式三开间二层楼房,砖混结构,木门窗,红色平瓦屋面,外立面保持了原建筑的米黄色,水泥砌成拉毛状。这幢实际使用面积只有164平方米的大师故居,加上后院的的车库,使用面积仅232平方米。但走进建筑内部,真正让人体会到其设计颇具匠心,房屋功能齐全,因地制宜,布局紧凑又十分大器。楼下是公共生活用房,用柱和短墙来分出客厅和餐厅,隔而不断,空间流通,吊灯、壁灯及客厅里的橱柜等细节都很有西方味道。特别是门厅里,一块“照壁”,由它把会客与用餐等功能区分开来。书房偏于东南角,有较大开窗直对户外景色。厨房退居一楼东北一隅,较为隐蔽,有独立出入口,以使食物进出和来往人流分开。一楼中间是一处不宽的、通往二楼的木楼梯,为了尽可能满足居住需求,杨廷宝尽量压缩了楼梯结构所占的面积,布局显得紧凑而实用。楼上是主人和家人生活的私密生活空间,三间卧室加卫生间、贮藏间。在主卧内,就如同杨廷宝本人一样,很低调,朴实无华;但简约紧凑又不失大气的建筑风格,另外,在设计中凸显生活细节。

著名建筑师杨廷宝、童寓等这些前辈,他们不是那种无视居住着需求,而只知道把夸耀新奇感当做卖点的前卫建筑师。他们非常了解人的实际行为,也充分注意到市井小民繁杂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基础上,使得这些小住宅从初期构想,到最后完成以及居住使用,真正做到了设计的初期建筑的构思的概念贯彻到室内空间表达上。

目前,现实中建筑与室内的分割是很严重的。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室内设计并不必然地一定由室内设计师来做,完全可以由有经验的建筑师来做,只是室内设计的后续阶段可以在建筑设计的思想框架下由室内设计师“二次”发挥和完善。这也许就是造成公众们认为建筑与室内的分离错觉的原因吧。

(责任编辑 南山)

民国文化元素在城市空间导识系统中的运用^{*}

薛 岩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 要〕 对民国时期的设计原则、设计方法和设计案例进行分析提炼出民国文化元素,并将其融入于城市空间导识系统,以凸显城市文化,打造城市品牌。

〔关键词〕 民国; 文化元素; 城市导识系统

〔中图分类号〕 J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112-03

人们在错综复杂的城市空间中行走或驾驶车辆,可以通过城市导识系统,寻找到达目的地最便捷的路径,指路功能是城市空间导识系统最基本的功能。因此,现在通常认为城市空间导识系统就是给城市人群指路的形象系统。然而,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将成为现代化城市品质提升过程中一个重要而又具体的指标,反映在城市的方方面面。而城市空间导识系统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凸显城市的文化内涵。

如何设计出一套既具有城市文化内涵,又具有指示明确、特色鲜明的城市空间导识系统,使其成为该城市的一张名片,这需要以城市的本土化、文化特性等为基点,将该城市的文化融入于导识系统的设计之中。本文以南京市为例,探讨如何在设计城市空间导识系统中,融入传统民国文化元素,以打造城市品牌。

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从建都之初,不论是建筑、街区建设还是公共设施的设置都受到当时政府的高度重视,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同时,南京大量的民国建筑群保存良好,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素材。为了能更好的提取民国文化元素,需要从最具有民国文化内涵的民国建筑设计入手,进行深入分析。

一、民国建筑的设计原则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建筑师学会会长赵深曾提出“融合东西方建筑学之特长,以发扬吾国建筑固有之色彩”^{[1](P.67)},这也被认为是民国建筑设计原则最好地概括。这一思想源于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游学西方之后,提出的“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成一种新文明”^{[2](P.55)}的建议。虽然,这一建议从表面看是一种“中西互补”,但实质上却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独特优势,是西方文明所不能替代的。

随着这一思想的兴起,当时南京民国建筑群在造型上采用多种样式:有仿中式传统建筑的精品,也有西式建筑的异彩之作,更有中西合璧、西风东渐的实验作品等,并在内容上都有极大的创新,即充分融合中西方文化,洋为中用,融会贯通,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现代特点的各种样式。因而,在融入民国文化元素的城市空间导识系统设计中,首先应遵循民国建筑的设计原则。

二、民国建筑的设计方法

据有关学者研究,民国建筑在设计方法上主要有两种:

一是由吕彦直最早采用,并由杨廷宝发扬光

*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融合民国文化的城市空间导识系统设计研究”(项目编号:2015SJB245)。

〔收稿日期〕 2015-11-10

〔作者简介〕 薛 岩,女,江苏南京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大的借助于黄金分割等古典比例的方法。这种设计方法强调的是将中国传统建筑的造型要素与西方建筑构图法则相结合,从西方古典建筑的比例原则出发,重新规范“中国风格”建筑的造型设计。

二是由梁思成在中央博物院设计中所采用的深入中国古代建筑自身去发现它固有的构图规律的方法。这种传统设计的规律并不是强调“复古”,而是要求设计师在熟悉传统设计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运用西方新的学理进行批判与改造,试图“再造”出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即设计的规范、元素源于中国的传统设计,但所有造型要素又都经过西方美学标准的提炼和修正。同时,设计更强调功能的需要,采用新材料、新技术,使设计在造型上具有西方古典之美,且尽可能符合现代设计的结构理性标准。简言之,这一设计方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再生的起点,参照了西方的古典和现代的标准。

可以说,这两种典型的民国建筑设计方法,也适用于现今城市导识系统的设计,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融入民国文化元素。

三、民国建筑的设计案例分析

为了更好地设计出具有民国文化元素的南京城市空间导识系统作品,本文以民国建筑的典型案例作为切入点,突出具体设计时的关键设计策略:

1. 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

南京总统府是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并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其内建筑不仅具有传统的中式大屋顶和四合院形式,还有当代的西式平房和楼房造型。特别是在其建筑内,将中国传统的中轴线主建筑的格局用逶迤弯曲的西式长廊相连接,构筑了中西合璧、巧妙连接的民国“新格局”。并且还“藏”有一座精致典雅的江南园林——“熙园”,小桥流水,亭台楼榭,树影婆娑,鸟语花香,更突出了其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中西合璧的独特建筑风格。

在设计细节上,其也强调西式元素与中式造型的结合。如总统府的大门对面的照壁,在整体造型上采用中国传统的设计风格,但在照壁立柱上端、顶部下端的细部,线脚却又是巴洛克样式,同时其材料也采用了钢筋混凝土形式,突破了中式木质材质,使这一设计成为了“洋为中用”的一大创举。

因此,在民国时期的设计中,不论从整体布局,还是设计的局部,都采用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这也是我们在设计融入民国文化元素的城市空间导识系统中需要借鉴的。

2. 实用的设计结构

在中国古建筑中,唐代建筑集中国早期建筑精华之大成,具有代表性而辽宋建筑则在继承唐代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变化,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对建筑结构的选择更强调装饰性,而此时的西方结构主义则更注重实用性。因而在中央博物院的设计中,梁思成明确提出,通过“体现中国早期的建筑风格,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促使在中央博物院大殿屋顶的建筑设计上,采用了辽宋建筑的典型风格,即微曲的正脊、上扬的鸱尾、梭形的列柱、生起的阑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屋顶的屋面坡度较平缓,立面上的柱子从中心往两边逐渐加高,使檐部缓缓翘起,以减弱大屋顶的沉重感。同时,使屋顶下的斗拱显得简洁而粗壮有力,起到了结构受力的作用。这一设计正是中国传统建筑结构与西方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体现。

再以吕彦直设计的总统府中祭堂为例,其正立面为重檐,矗立于低平的方形基座之上,其在水平方向,祭堂立面为古典主义的“三段式”构图,特别是祭堂的中间部分,即三扇拱门和重檐顶这两部分构成一个矩形,通过测量,其宽高比例为3:5,两边部分则另占五分之一的比例。而在总统府中墓道广场前四柱牌坊高宽比例则为2:3。其实不论是3:5还是2:3,这两种比例都在斐波那契数列之中,都是四方古典式建筑所偏爱的理想比例。可以说,吕彦直在设计上虽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构造,但从实用性角度,融入了学院派建筑学理论所体现的构图原理,较好地采用了黄金比例。而这种黄金比例既有助于建筑构造的稳定性,又具有极强的实用功能。因此,若将3:5的黄金比例分割运用在城市空间导识系统中,这对立柱式导识系统的设计尤为重要。

因此,如何选取传统设计建造中的精华,将传统文化与实用结构相结合,是民国文化元素在导识系统设计中的最好体现。

3. 传统的设计色彩

在中央博物院屋顶的色彩选择上,建筑师采用了棕黄色琉璃四阿顶,这种屋顶颜色在任何现存的辽宋建筑中并不常见,而是与明清皇家建筑

相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国立中央博物院在颜色上借鉴了明清的建筑宫殿。

又如在紫金山天文台本部的主楼正中有一石阶,在其中段有一三孔石牌楼,此牌楼不仅顶部覆盖着精致的蓝色琉璃瓦,其正中的“天文台”三个大字,也采用了蓝底填金的颜色,这样不仅使字体妩媚古朴,也颇具传统韵味。

可以说,不论是棕黄色还是蓝色,甚至是现今大量使用的民国灰色,从色彩上都略显沉稳,但又不显单调,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韵味。因而在融入民国文化元素的导识系统的设计中,在色彩的运用上若能更好地突出民国文化元素,应该多选择以蕴含传统中国韵味为基调的色彩。

4. 现代简约的混合装饰元素

传统的中国装饰元素,强调图案的复杂性。同时每一种图案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并雕工精细,建造时间长。而在1925年,由吕彦直所设计的孙中山陵园祭堂,在其重点部位如檐口、门廊、须弥座却采用了简化传统构件和传统图案装饰,从整体上给人以清新挺拔、简洁洗练的现代感。

在中山陵的图案设计中,吕彦直采取了中西方混合的装饰元素,即图案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但在构图上却具有鲜明非传统特征的西式学院派的多种特点,并淘汰一些与迷信和等级制度有关的细部,如用几何图形取代屋脊吻兽的龙形图案这一传统装饰中表现帝王权利的象征等。可以说,这一图案设计虽然保留了许多传统装饰母题,而对龙形图案的摒弃,正是与中西合璧的设计相呼应。

因此,在城市导识系统的设计中,应以传统图案元素为基础,借助西方几何元素的变形设计,采用这种中西方混合的装饰,以突出民国文化元素。

5. 就地取材的材料

传统的中式材料一般以木质为主,但在民国建筑中,却大量采用石质和现代混凝土材料。特别是在紫金山天文台的施工中,其室内考虑到结构、采光等问题,主要使用混凝土材料。而在建筑外立面,从防风、防火等角度,并考虑到其坚固性和经济等因素,在材料上就地取材,大量采用了紫金山特有的虎皮石砌就地基和墙面,节省了大笔原料费用。同时,用虎皮石砌出的水波纹形状,与紫金山天文台本部建筑的外墙所采用的毛石相对应,并配合座圆顶四周均环绕着天坛式的石栏杆,使整个建筑与环境浑然一体,显得庄重而朴实。更为重要的是,与传统的木质材料相比,石质材料更利于长期的保存和使用,也更适合户外环境。

因此,在设计材料的选择上,城市导识系统设计不仅要考虑其实用和经济等因素,更要采用在民国时期常采用的如紫金山特有的虎皮石、毛石等材料,以体现民国文化元素。

民国建筑在其设计风格、构造、色彩、图案以及材料的选取上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民国文化元素。因此,在南京城市空间导识系统设计中,遵循民国建筑设计原则和方法,充分运用民国建筑的设计风格、构造、色彩、图案以及材料等,才能设计出突显民国文化、打造具有南京城市文化品牌的导识系统,从而提升南京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的品质。

【参考文献】

- [1] 邓庆坦. 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整合研究论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 [2]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责任编辑 南山)

传承与变迁^{*}

——以省级非遗南京白局传承人徐春华为例

段宝君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以省级非遗南京白局传承人徐春华为切入点, 通过对其青年时期在国营剧团体制下的传承方式、壮年时期票友社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退休后政府扶持下的基地传承和“后现代主义课程改革”新型传统音乐的学校传承方式等进行比较, 探讨南京白局这一剧种在传承人三个不同人生阶段中的发展与变迁。

[关键词] 南京白局; 传承人; 徐春华

[中图分类号] J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115-03

白局是土生土长、风格淳朴、地域浓厚的一门古老的说唱艺术, 据今已有 1500 多年的历史, 是织锦工人边织边唱、自娱自乐的说唱形式。白局的历史发展脉络, 总体上跟随社会经济的变化, 曾出现过“三起三落”^①。目前能登台唱白局的老艺人们所剩不多, 笔者把目光聚焦在经历了南京白局国营剧团的建制与解散、数十年如一日传承南京白局艺术的老艺人徐春华身上。

徐春华(1942—), 南京人, 高中文化, 1960 年—1966 年, 调入南京工人白局实验曲剧团任学员、演员, 1970 年—2007 年, 任职于南京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剧场经理, 2007 年退休后一直从事南京白局的整理、推广和传播工作, 现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局传承人。

一、国家体制下的剧团传承

1956—1957 年, 文化部召开两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进一步强调了戏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指导方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1960 年南京市总工会党组在市总工会主席夏冰流同志的积极建议下, 批准将流传于丝织云锦业、南京地区唯一的地方说唱——南京白局进行挖掘整理。1960 年下半年, 南京市工人白局实验曲剧团开始建团招生, 几位德高望众的白局艺人纪鑫山^②、聂少亭^③担任该剧团的专业教师, 传授学员演唱白局, 以期重新将白局搬上舞台。

当时的南京市工人白局实验曲剧团, 作为国营编制的专业团体, 吸引了诸多年轻人的报考。新一代年轻女艺人的加入, 不仅给南京白局增添了新的活力, 而且改变了过去白局演唱中男性为主的状态。徐春华就是第一批招收进来的年轻女艺人。

据徐春华回忆: “进团之后, 跟随纪老师大学唱南京白局的诸多曲牌, 如《满江红》《银纽丝》《八板》等。”在剧团学艺的过程中, 女学员们在发

* [基金项目] “十二五”科研规划第五期重点项目课题“口头传统的延续——南京白局传承人徐春华的个案研究”(项目编号: JSNU2015ZD02)。

[收稿日期] 2015-12-10

[作者简介] 段宝君, 女, 安徽界首人,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① “三起”是指白局艺术最兴盛时期, “三落”是指白局艺术衰败时期, 分别是曾国荃破天京后, 民国初年, 以及“九·一八”事变后。

② 白局知名艺人, 16 岁学艺, 曾将京剧花脸唱腔运用到白局中, 形成独特的风格流派, 人称“纪派”。

③ 聂少亭, 纪鑫山的琴师。

挥自身声音的基础上,汲取多种唱法,扬长避短,不断在实践总结中,逐步形成不同的风格。为了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她们还学会了运用各种道具:如手绢、扇子、惊木堂等。

当时的南京市工人白局实验曲剧团,受到了老百姓的好评,城南城北、大小书场,常常座无虚席;五县四郊、田野麦场,年年送戏下乡。南京白局这一剧种,以国营剧团建制的形式,在国家政策和经济的扶持下,其发展势头和前景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其他南京白局社团等无法相比的。

徐春华回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剧团里不允许再唱白局了,开始改唱样板戏。在白局改唱样板戏之后,徐春华所饰演过《红灯记》中的李奶奶,《走阳川》中饰演翠林妈,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欢。但好景不长,随着政治运动的变革,剧团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据徐春华回忆:“60年代末,白局剧团的所有演员被下放到了干校,70年代初,该剧团就解散了,可以说南京白局的音乐还停留在原始阶段。”^①

徐春华作为南京市工人白局实验曲剧团的见证人,除了见证剧团的兴衰之外,也见证了民间音乐在国家体制下的传承方式。在剧团里,音乐的传承与习得是相对集中、快速和正规的,正是这种大班授课的方式,给不同剧种的演员们提供了相互学习切磋的机会。剧团里的师徒关系,虽然没有正式的拜师仪式,但作为国家体制内的演员,有着共同的权利,这种师徒关系虽不如传统中师徒关系紧密,但相对松散、平等。

二、民间票友社的口传心授

70年代的南京市工人白局实验曲剧团解散后,剧团的演员们为了生计,各奔东西。幸运的徐春华被分在了南京市工人文化宫,主要负责舞台场地的管理工作。相对宽裕的工作时间,为她进一步学习白局提供良好的平台。1980年,纪鑫山先生去世了,徐春华在探望琴师聂少亭师傅时,偶遇另外三位白局老师。

据徐春华回忆:“3位师傅,唱的内容让我很震惊。在剧团的时候,是左的时代,不允许唱情爱的片段,只能唱一些曲牌和小段子,而师傅们唱的《山伯访友》《二姑娘害相思》等,让我下定决心,继续学唱白局。”^②

每周去几位师傅家,徐春华静静聆听观察,凭记忆学会曲目的内容,体会腔调的韵味,有时候长篇的唱词记不住,徐春华会把唱词抄写在纸上,回家再细细琢磨。每周大家聚在琴师聂师傅家的时候,师傅们会跟着胡琴,一句一句教徐春华唱腔,手把手地规范她的表演动作。徐春华后续所唱的白局段子和长篇书目均由这一时期习得。

1985年,徐春华开始召集当年在南京市白局剧团解散的成员,组成白局票友社,定期进行白局活动,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1995年-2015年近20年的时间里,陆续有几十名本地、外地的白局爱好者,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徐春华,要求学唱南京白局。比如北京曲艺爱好者黄兰兰专程赶来学唱白局小段、上海30来位中学生利用暑期实践时间来南京作白局调研、南师大毕业生夏天跟随徐春华老师学唱白局6年(目前在南京云锦博物馆工作)等。徐春华节选南京白局中的经典唱段,如当年师傅们传授给她一样,一字一句、一腔一调地免费传授给学生。在众多学生中,目前从事白局演唱及相关工作的学生已有六七人。

这样的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正是中国传统音乐形式和发展的主要方式,虽然口传心授没有书面记载的规整化一、有章可循,但是却给表演者们极大的即兴发挥空间。

三、政府扶持下的基地传承

2005年,全国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工程,经历了南京白局专业剧团的建制与解散,数十年如一日传承南京白局艺术的徐春华,于2008年被评为“江苏省非遗南京白局传承人”。这个光环对徐春华和南京白局艺术,起到了深层次的促进意义。

借着“非遗保护”的东风,全国各级政府给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巨大的支持,市、区、县的文艺汇演、长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汇报演出等诸多活动,徐春华均受邀参加。退休之后的徐春华,全身心投入到南京白局的推广工作中,如受张艺谋邀请到《金陵十三钗》剧组作南京方言指导、在各大地方电视台作南京白局的普及指导、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作南京白局的发音人等,徐春华为南京白局的推广和传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①②}南京白局省级传承人徐春华的口述采访资料,2015年10月。

为了让南京白局更好地有效传承,在南京市政府非遗项目保护和发展的研讨会中,徐春华多次提议建立南京白局基地进行传承的思路。在南京市政府多方面努力下,传承基地于2015年3月建成。该基地位于秦淮区公园西街53号大观园内,全称为“徐春华南京白局传承社”,招收对象为各年龄层次的南京白局爱好者。每周一、四、日上午免费授课,每一期培训为11天,主要由徐春华和她的徒弟们,进行南京方言的培训、南京白局的说唱和传统白局的表演。传承方式,依旧为传统的口传心授,也有学员自带录音机进行录制,回家细细揣摩跟学。所学的曲目既有传统曲目,也有徐春华的创新作品:传统八板+新编《金陵古城好》;传统《梳妆台》+新编《明城墙十三门》;传统银柳丝+新编《玄武湖》;传统穿心调+新编《八卦洲芦蒿香》等。

政府扶持下的基地传承,由于不收取学员们的任何费用,实际上是一种公益传承。这种方式,打破了传统自负盈亏式的传承模式,是在国家“非遗”保护政策影响下,部分学者专家关注后,所出现的一种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代表性演出。

四、“后现代主义课程改革”视野下的学校传承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哲学家提出了后现代主义课程范式,主张强调各民族国家特别是文化弱势国家课程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21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选择建立在以母语、双语、多语与多元文化音乐的知识体系的模式发展,并对课程进行改革。随后国内一些教育机构、中小学校开始关注本土音乐文化,重视地方性音乐课程的开发。

2007年至今,徐春华受邀担任多家学校兴趣课程《南京白局》的指导老师;2007年受聘于南京考棚小学;2010年,受聘于江东门小学和绿洲幼儿园等。根据不同的受教对象,徐春华创作出适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发展的白局新作品,如在中小

学担任指导老师时,创作出《南京美》《请客》等作品,在绿洲幼儿园担任指导老师时,创作出《老师像妈妈》等作品。徐春华先一句一字教会幼儿园老师,后由幼儿园老师向孩子们传唱教授。

南京十三中的音乐老师乐康,是徐春华早年间在白局学生,受学生之邀担任该校南京白局课程的课外指导老师。为了更好地让学生了解、喜爱南京白局这门古老的艺术,师徒二人把南京白局经典曲目《机房苦》,通过校本剧的形式进行改编加工,由学生出演剧中的各个角色、手工完成各种道具、为南京白局的表演进行伴奏等。学生惟妙惟肖的表演,在区级节目汇演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越来越多的孩子了解并喜爱南京白局。

“后现代主义课程改革”视野下的学校传承,是南京白局在当代社会中所寻求到的一种新的生存空间和经济来源,也是中国传统音乐在民间和政府两者支持下生存和发展的平衡点。

五、结语

全文以南京白局传承人徐春华的从艺经历为线索,考察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音乐传承的变迁与异同。通过对其青年时期在国营剧团身为国家干部时期的平等关系的师徒传承方式、壮年时期票友社口传心授为重要方法的传承方式,与退休后政府扶持下的基地传承和“后现代主义课程改革”新型传统音乐的学校传承方式进行比较,充分体现出现在徐春华三个不同人生阶段时剧种的发展与变迁。

通过对徐春华的从艺经历的考察,不难发现音乐变迁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徐春华作为南京白局传承与发展的关键人物,是一位承载着中国音乐传承变迁的典型人物,透过徐春华的个案,能够看到中国音乐传承的时代变迁。

(责任编辑 南山)

法国合唱作品 *Les sirènes* 的分析与演绎

许 洋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 要〕 作曲家莉莉·布朗热的大部分的乐曲作品在她生前都已首演并于 1918 年前后出版发行,其编号并非完全依据乐曲完成时间排序,并舍弃了自己不满意的作品。目前国内对于这首作品的研究少之又少,笔者将针对这部合唱作品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创作的背景、歌词、曲式、旋律等内容,为该作品能够被国内的合唱团所运用及演出提供理论等方面的支持与帮助。

〔关键词〕 莉莉·布朗热; 法国合唱作品; 水妖; 二十世纪早期音乐

〔中图分类号〕 J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118-04

莉莉·布朗热是法国的女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目前仅存且已出版的她的世俗合唱作品共有九首,创作时间都十分接近,主要集中在 1911 至 1913 年间。1913 年,莉莉·布朗热获得罗马音乐大奖可视为她的合唱作品创作的分水岭。早期的世俗作品写于 1911 至 1913 年间,是为了准备罗马大奖初选的习作;后期名垂青史的四首宗教合唱作品——《诗篇二四》、《诗篇一二九》、《诗篇一三》、《古老的佛教祷文》写于获奖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3 年至 1918 年)。近百年来,世俗作品大都隐没在光芒四射的宗教作品下,她的作品题材都源自 19 世纪法国诗词,音乐与文字间充满了戏剧的张力,声乐与伴奏技巧表现力极强。

莉莉·布朗热为部份的乐曲编写了管弦乐伴奏,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修订,为作品的出版做准备。大部分乐曲在她生前都已首演,并于 1918 年前后出版发行。其编号并非完全依据乐曲完成时间排序,并舍弃了自己不满意的作品。笔者将针对她创作合唱作品中的一首《水妖》(*Les sirènes*)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创作的背景、歌词、曲式、旋律等内容。

一、创作背景

在希腊的神话故事中,「水妖」用歌声和美貌引诱渔夫的渔船航向危险处,使之在不知不觉中丧命,此神话题材在当时深受欧洲艺术家们的喜爱。在德彪西的《夜曲》(*Nocturne*, 1899)第三乐章中,加入了无词女声合唱为管弦乐增加色彩,人声器乐化的创作手法,让它成为了不朽的经典。1912 年 3 月,在莉莉·布朗热家举办的音乐聚会中首演,由路易斯·奥伯特(Louis Aubert, 1877—1968)指挥恩格尔·芭托莉合唱团(Engel-Bathori Choir),莉莉·布朗热自己担任钢琴伴奏,这也是她首次以一位作曲家的身份出现在公开场合,当时该乐曲献给了当代著名的女中音芭托莉(Engel Bathori, 1877—1970)。

二、歌词内容

《水妖》的歌词共分为四段,格律自由充满音韵之美。第一、二段主要用来描绘水妖的姿态,各有四行,一四、二三行押韵(abba)。当第三行诗提及「雾」(*la brume*)的时候,则以短促的句子回应了诗意中的短暂梦幻;第三段诗歌则由五行短句构成,形容水妖在浪潮中快速地穿梭;第四段则是三个长句,内容魅惑而绵长。

〔收稿日期〕 2015-09-20

〔作者简介〕 许 洋,男,江苏无锡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助教。

诗文大意如下：

Nous sommes la beauté qui charme les plus forts,
Les fleurs tremblantes de l'écume
et de la brume,
Nos baisers fugitifs sont le rêve des morts!

Parmi nos chevelures blondes
l'eau miroite en larmes d'argent.
Nos regards où l'éclat changeant
sont verts et bleus comme les ondes.

Avec un bruit pareil
aux délicats frissons
des moissons
nous voltigeons
sans avoir d'ailes.

Nous cherchons de tendres vainqueurs.
Nous sommes les soeurs immortelles
Offertes aux désirs de vos terrestres coeurs.

我们是美,极尽迷惑能事之美
颤抖的花朵,
浮现在浪花与迷雾中
我们短暂的亲吻,是死者的梦幻

在我们金黄的鬓角间
海水闪耀成熠熠的银色泪滴
我们炯炯闪烁的眼神
似波浪般翠绿与湛蓝

在如收成时
微波轻轻的颤
声响之下
我们飞舞着
无需翅膀

我们在寻找温柔的征服者
我们是不朽的女神
为满足你们凡人内心的欲望

三、曲式结构

这部作品的编制是为钢琴、女高音或次女高音独唱以及女声三部或女声两部与男高音而作的三声部合唱。全曲共 109 个小节,整体速度为慢板,拍号为三四拍子,演出长度约五分钟(参考奥尔夫指挥斯图加特爱乐合唱团于 2000 年录音版本)。曲式结构为带再现的单三部曲式加尾声的结构(ABA – Coda),首尾段均由合唱团来负责,两

个段落几乎完全相同,只有钢琴部分有所变化。第二段则以独唱为主,合唱在中段后期重新进入(表 1)。^① 德彪西与纳迪亚(莉莉·布朗热的妹妹)对莉莉·布朗热的影响,在该作品中表露无遗,无义的音节、重复的伴奏音型、持续音充斥全曲,停滞迂回的和声肢体制造出迷蒙鬼魅的音乐气氛。

表 1 《水妖》曲式结构

段落	小节数	歌词	和声对位	主要音乐特征
A(10 + 19)	1 – 10/11 – 29	第一段	三部对位	升 F 持续音
B(52)	30 – 81	第二、三、四段	女高音独唱 + 三部对位	变化和弦
A(19)	82 – 100		同 11 – 29 小节	
尾声	102 – 109	无意义音节	三部和声	低音三度下行

四、旋律色彩

乐曲的旋律形态以四小节左右的自然音阶长乐句为主,并从上行四度的动机开始,进行声部对位(谱例 1),乐曲第二段为独唱旋律,亦是从上行四度动机起始,但改变了部分音高(谱例 2),使主题旋律发展的淋漓尽致。

而在乐曲的第一、三段中,模仿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开头乐句所作的旋律充满了不规则的变化半音(谱例 3)。在音域方面,《水妖》是莉莉·布朗热世俗合唱曲中音域最适中的一首(谱例 4),

若想以女低音代替男高音的声部,则应提高八度来进行演唱。唯独在无义音节的段落中,为了不破坏平行七和弦特有的音响效果,应该用原本音高来演唱(谱例 3),但却会造成女低音声部的音域过低,增加了排练演唱时的难度。

五、和声特征

乐曲的和声主要从钢琴部分进行分析,声乐部分为对位的织体,纵向的和声并不明确。第一段建立在主和弦空五度的持续低音上,以切分的节奏为主,不断的重复着上行八度的音程,好像意

① 钱仁康、钱亦平,音乐作品分析教程.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图在模仿浪潮的波动(谱例1)。第二段开始脱离了持续低音,以左手连续三度下行和弦(谱例2),配合右手在低音区的不规则的分解琶音进行,加快了乐曲的和声变化速度进行自由地转调。第三

段延续第二段的分解和弦模式,但混入了第一段的持续低音的特征,使每两个小节内都补进一个长低音的和弦,在波动的旋律中确立了稳定感。

Soprano *a tempo*
en dehors avec charme **2**
p
Nous som - mes la beau - té qui char - me les plus forts. Les
We mer - maids hold the charm of beau - ty to be spread Like

Alto **旋律动机**
fp
Nous som - mes la beau - té qui char - me les plus
We mer - maids hold the charm of beau - ty to be

Tenor
fp
Nous som - mes la beau - té qui
We mer - maids hold the charm of

a tempo *fp* *rall.* *a tempo*

谱例1 《水妖》11-14小节

Soprano Solo
p clair
Par - mi nos che - ve - lu - res blan -
A - mid the blond - ness of our tress -

与第一段相同的旋律动机

三度下行音列

谱例2 《水妖》31-33小节

Soprano
sers fu - gi - tifs sont le rê - ve des morts!
fu - gi - tive kiss is the dream of the dead!

半音旋律

fp douloureusement, en dehors
Ah! Ah! Ah!

平行七和弦下行

谱例3 《水妖》24-26小节

女高音 女中音 男高音 (女低音)

谱例4 《水妖》音域表

六、速度与节奏

在速度与节奏方面,全曲皆为三四拍,其中并没有拍号之间的转换。第一段从慢速开始,配合钢琴部分的切分节奏型,声乐部分同样以八分音符以上的长时值音符为主,营造出一种缓慢、柔和的气氛;第二段速度稍稍加快(plus vite),钢琴的时值变为十六分音符,声乐部分同样出现十六分音符让乐曲变得更为生动;第三段开头作者标注“回到原速”的速度,但在第二段结尾的渐慢之后,并没有表示回到第一段或第二段的速度。笔者在此认为,由于声乐部分与第一段完全相同,延续第二段十六分音符的伴奏型,可以推论出应以第二段较为流动的速度来演奏第三段。

七、旋律织体

乐曲旋律织体方面,以声部为界限将段落进

8 Tous *mf*
Nous cher - chons out de ten brave - dres vain -
We seek out the brave to ad -

模仿进行

多重声部

中声部旋律

三度进行的低音

谱例5 《水妖》60-62小节

八、结语

在印象主义思潮中昙花一现的音乐天才莉莉·布朗热,二十四年短暂的一生使她没能成为一代作曲大家,也无继承者可继续发展并开创她乐曲风格的流派,虽然她的妹妹娜迪亚·布朗热致力于推广、演出她的作品,但由于莉莉·布朗热生前的作品数量不多,许多优美的音乐旋律又被时间的洪流所掩盖,所以她的很多优秀作品都被当今世人所遗忘。尤其是她珠玉般的合唱作品,被公开演出机会更是少之又少。莉莉·布朗热在作品旋律创作方面的天赋也使得乐曲在创新之余展现出深厚的歌唱价值;乐曲中饱含二十世纪印象派那独有迷人的音乐语句、生动的歌词描摹以及高超的技巧表现更是她的作品不应被埋没的原因。

行切割。第一、三段使用了三声部模仿对位形式,在此两段的结尾模仿了德彪西的半音旋律并插入了小重唱组,以无词歌的形式来演唱平行七和弦(谱例3),最多的地方同时使用五个声部的重叠音响,与第二段的独唱部分呈现出了鲜明的对比,而钢琴伴奏部分则节奏规律,但有变换的和声进行。多重声部的丰富音响营造出旋律的整体情境(谱例5)。这部作品除了是莉莉·布朗热的世俗合唱曲音域最适中的一首,力度层次要求也是最小的(pp-f),全曲以弱音量为主,随着音乐情绪的渐强渐弱进行。曲式简明精练,旋律优美,和声变化丰富,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因此也成为莉莉·布朗热·布朗热最为成功的合唱作品之一。

在排练这部作品时,应着重注意歌词与旋律的关联性,结合法语的拼读韵脚,展现出作曲家创作旋律中轻盈飞扬的特性,并加强和声对位、演唱观念以及合唱队员的音准训练,才能享受法式音乐作品在旋律和声上带来的变幻莫测的色彩。此外,乐曲所需的声乐技巧更是合唱团员们无可规避的考验。这部作品对于拓展合唱团员的音色以及音量变化层次方面的帮助颇为巨大,而作品钢琴伴奏的华丽音群与声响,配合上指挥者在作品中的统一驾驭能力,完成全曲的演绎将是一场畅快淋漓的音乐竞技。

(责任编辑 南山)

黄自艺术歌曲中钢琴声部的民族化特色初探

张 丹

(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 江苏南京 210001)

〔摘 要〕 黄自先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创作数量最多的是声乐作品,而其中尤以艺术歌曲影响最大。本文论述了艺术歌曲中钢琴声部的重要性以及黄自艺术歌曲中钢琴声部民族化的特色,并举例说明作品中伴奏声部民族化的体现。

〔关键词〕 黄自; 艺术歌曲; 钢琴声部; 民族化

〔中图分类号〕 J6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1-0122-02

艺术歌曲是一种结构短小、歌词精美,旋律和伴奏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声乐作品。在具体作品中,钢琴不再是简单的伴奏乐器,而是与歌声相结合构成艺术歌曲这一形式。相比歌剧和其他歌曲来,艺术歌曲的伴奏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伴奏由从属地位真正变为平等地位,主要是在艺术歌曲的创作中体现的。

受西方音乐艺术思潮的影响,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中国也相继出现了艺术歌曲这一音乐形式。它一方面积极吸收了德奥艺术歌曲的成就,同时,对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给予了具有建设性的发展,进而使其成为在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出现的具有东西音乐文化交融和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20 世纪 20 年代初至 30 年代末是中国艺术歌曲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一、黄自艺术歌曲中钢琴声部的创作与民族化风格的渊源

黄自,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 34 个春秋的短暂一生,尤其是在回国后仅约十年的音乐创作活动中,为我国专业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自既受到过正规西方音乐教育,也接受过中国传统音乐的熏陶,留学归国后更是致力于民族音乐的发展。这使他的艺术歌曲的创作既具有

欧洲艺术歌曲的技巧高度,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他在认真研究了中西方音乐文化之后认为:“把西洋音乐整盘的搬过来与墨守旧法都是自杀政策”,只要“学西洋好的音乐的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和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这种思想体现在了它的一系列的音乐创作之中。在钢琴伴奏的创作上,黄自注意了声乐与伴奏的结合,伴奏中丰富的和声运用和处理、伴奏形态的设计都体现了黄自艺术歌曲的民族化风格 and 特点。因此,研究黄自艺术歌曲中具有民族化特色的伴奏是很有价值的。这些作品也正是黄自在吸收了西洋作曲技法后,在中国音乐民族化发展道路上的探索与努力的见证。

二、民族化特色在黄自艺术歌曲中钢琴声部的体现

1. 古曲《清平调》的借鉴

《花非花》的旋律以淳朴的五声音阶构成,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旋律以古曲《清平调》为基础;和声没有太多的色彩变化,而是简单朴素,给人清新淡雅的感觉。钢琴的低音部重复着旋律音,和声变化不大,又被夹在中间,因此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和弦进行。

〔收稿日期〕 2015-11-20

〔作者简介〕 张 丹,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二系讲师。

《花非花》在旋律上与《清平调》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是黄自先生在创作中有意识的吸收了古曲《清平调》中的某些音调成分,来作为这首歌曲的音调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他加上了很多自己创造性的发展,譬如两者的音乐结构上就有所区别。《清平调》是以一个乐句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系列变奏,结构越来越缩小。而《花非花》短小又方整,节奏很统一,句法也很均匀。伴奏的和声构成上,几乎只用了两个和弦在交替,一个是主和弦,另一个是Ⅳ,只是在引子的终止式和最后的终止式运用了功能和声,给人以结束感。全曲10个小节,有7个小节使用了主和弦,和声当然给人比较静止的感觉,功能性也相对较弱。这些正是映衬了歌词朦胧的气氛,淳朴自然、恬淡清净的音乐,描绘出一幅朦胧美丽的景象。

2. 宫羽调式交替下的浪漫气息

《点绛唇》是一首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具有一定民族风格的独唱歌曲。本是词牌名,词名为“赋登楼”,选自宋朝诗人王灼的名作。

王灼的词是分为两段来写的,黄自根据原词的格式把这两段的开头处理成相同的旋律,好像平行乐段一般,下阕由于句数、字数以及个别字的声调有所变化,音乐上也随之做了变化发展。整个作品的旋律是在古诗吟诵的声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黄自基本上采用一字一音,古朴典雅,但各种节奏的运用又使得作品不失跌宕优美,恰当地表现出了原词的意境,充满了对祖国山河的赞叹之情和对春色美景的眷恋之意。词曲配合上也相当讲究,特别是小附点和装饰音的运用,这些细致的表达配上钢琴声部柱式和弦整齐均匀的演奏来做对比,更赋予汉字以音乐美。

整首作品气势宽广,情绪明朗又乐观。钢琴左手声部的音型从头至尾始终如一,从前奏开始就先是在低声部奏出和弦主音,接下来紧密又连续演奏柱式和弦,把背景气氛烘托的气势磅礴,浑厚的低音更是渲染出宽广豪放的气势。钢琴右手旋律声部使用了连续的和弦式奏法,非常恰当的表现出作品的浪漫主义气息。

全曲从旋律上看,黄自依然运用了五声音阶来作曲。上阕落到羽音上,下阕落到宫音上,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的宫羽调式交替。在伴奏的和声编配上,却是以欧洲古典和声体系为基础,但是其中附加了六级音的运用及和声内部旋律性的加强等处理,可以看到这个作品正是黄自对于民族风格的和声所做的探讨和研究。欣赏过这首艺术歌曲的人都会体会到其中散发着浪漫主义气息的同时又蕴含着独特的民族风格。

3. 西洋技巧的完美借鉴

黄自先生善于科学、理性的将西方音乐创作的技巧完美的同我国民族音乐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作法不仅是他本人音乐创作的特征与风格,更能代表着在20世纪初我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发展与变革。譬如《南乡子》这首优秀的、充满爱国激情的抒情独唱歌曲中的钢琴声部就采用了连续三连音的和弦奏法,从中不难发现舒伯特的《魔王》中钢琴伴奏的影子。舒伯特的钢琴伴奏在扩大和声、丰富色彩、描绘情景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他是第一个将和声、伴奏、旋律和歌词视为同等重要的音乐家。黄自先生在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上的很多处理和创新,也是有舒伯特的影响的。

《南乡子》,歌词出自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名作。“南乡子”是词牌名,“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是词名。这首词的情绪比较乐观,给人以斗志昂扬的感觉。黄自先生所作的这首艺术歌曲同样分为两段来写作,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这上下两段的旋律几乎完全一样,最有特色的地方应属每段结尾句中出现的七度音程大跳,充满了“不尽长江滚滚流”和“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豪迈气魄,表现出无限的澎湃热情。

钢琴声部中右手从头至尾没有改变三连音的连续和弦奏法,左手低音声部采用了八度双音的方法来加厚低音旋律,使得音色更加浑厚有力,全曲整体上更加气势磅礴。

(责任编辑 南山)

On the Narrators and Narration in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MIAO Huai – m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Chinese ancient novel narrative tradition, does a lot of innovations. There are several narrators in this novel, such as a super storyteller as well as the stone and Cao Xueqin. For each narrator lies in a different background, the narration of the novel is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namely, the super narrative level, the main narrative level and the sub – narrative level. The writing purpose is properly presented through these narrators and narrative levels, which shows the excellent narrative skills. Applying the super narrative level aims to dilute the sense of reality of the works. And discussing the narrative skills in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help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and in – 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lassic works.

Key words: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ancient novels; narration

Unity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UI Zhi – sheng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t is a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they have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the aspect of value basis, value content and value objectives.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re the core of socialist culture, which stipulate the nature and dire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full pla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leading and guiding role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provides a goo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for building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Key words: Core socialist values;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unity

New Stories in the Invincible Array ——On *Cherish the Memory of Wolf* by Jia Pingwa

ZHANG Xiao – q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Cherish the Memory of Wolf* written by Jia Pingwa tells a new story about wolf from the angle of Gao Ziming – an intellectual. On the surface, the novel seems to be about ecology, but in fact, it is filled with metaphors and symbols. Modern civilization is an invincible array actually and brings the withering of life. After wolves completely disappear from the world, people would turn into werewolves. The author affirms the vitality of the earth and folk culture, and also expresses his concer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throughout the novel.

Key words: *Cherish the Memory of Wolf*; life; narration; folk

City Life in Severe Drought ——A Case Study of How Citizens in Jiangnan Region Spend Summer in 1934

ZHANG Fan

(*School of Socie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In 1934, it was hot and dry in Jiangnan region for a long time.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the residents there spent summer at leisure through a variety of ways. Cool drinks, vegetables and ice creams were very popular among the public; parks and scenic spots provided a good place for the citizens to kill the time in summer; some wealthy people even chose to travel to places like Qingdao; factories and work units adjusted their office hours accordingly; and the citizens wore cloths that made them feel cooler.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took some measures to give support to the public,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quality inspection on cold drinks, extending the opening hours of the park and relaxing the public dressing requirements. These ways taken by the citizens in Jiangnan region in the “pre – air – conditioning era” not only present a picture of life in modern Chinese cities, but also provides a useful historical reference on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for today’s society.

Key words: The year 1934; severe drought; civil life; to spend summer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in Robert Frost’s Poems Based on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WEI Meng – ting

(*Jing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1169, China*)

Abstract: Metaphor is a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element in poetry. Poets use it to provoke the readers’ thoughts and imagination as well as their personal emotions. On the other hand, metaphor also helps the readers put some abstract concepts into concrete ones. In this article, 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put forward by Fauconnier is applied in the analysis of two major topics in Frost’s poems, namely life and desperation. Three metaphorical networks are raised: “NATURE – AS – LIFE” network, “EVENT – AS – EMOTION” network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networks, trying to explore how Frost creates a consistent concept via metaphors and how readers understand these metaphorical concepts in Frost’s poems with their cognitive ability. What’s more, by th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on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 image metaphor through the whole poem, which would help readers better comprehend the metaphors in Frost’s poems and enlighte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poems.

Key words: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poems; Robert Frost; metaphor